

那夜無星

八九民運二十年顧後瞻前

鄭宇碩 羅金義 編著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八九民運二十年顧後瞻前

那 夜 無 星
八 九 民 運 二 十 年 顧 後 瞻 前

鄭 宇 碩 羅 金 義
編 著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出 版 社

©2010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176-0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at Night at Tiananmen Square—
1989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176-0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詳細目錄	vii
序言	xiii
編者前言	xv

導論 鄭宇碩	3
--------------	---

反思前路

第一章 中國民主往何處去？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 鄭宇碩	15
---	----

第二章 中共的漸進式民主與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呼喚—— 理論、政策、矛盾 丁偉	37
--	----

第三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中國特色本質」 洪清田	55
----------------------------------	----

第四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中國特色進程」 洪清田	75
----------------------------------	----

第五章 「六四事件」與中港兩地民主發展的互動 蔡耀昌	99
-------------------------------------	----

回顧

第六章 「六四」後的反思對中國發展的推動作用—— 二十年的變化和我的探索 劉銳紹	117
--	-----

第七章		
兩岸重大學運的歷史比較分析——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野百合學運」	林仁傑	131
第八章		
「八九民運」的文化意義及其啟蒙意涵	張嘉娟	153
第九章		
二十年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概覽	周義澄	189
回 憶		
第十章		
直接目擊與傳媒再現——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場域之爭」	譚志強	221
第十一章		
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裏的「六四事件」——		
介乎曖昧與避諱之間？	黃偉國	241
第十二章		
香港電影中的「六四事件」	陳家樂、朱立	257
第十三章		
《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表述的「天安門屠殺」——		
象徵鬥爭、文化適應與普世價值	羅金義	283
編後記	羅金義	305

導論	鄭宇碩	3
----	-----	---

反思前路

第一章

中國民主往何處去？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	鄭宇碩	15
引言——「天安門事件」前後的政改		15
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		17
建立社會保障網		20
從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汲取教訓		23
沒有民主的良治		27
結論		30

第二章

中共的漸進式民主與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呼喚—— 理論、政策、矛盾	丁偉	37
前言		37
政治改革——理論與現實的鴻溝		38
先經濟後政治論		39
先法治後民主說		41
漸進式政治改革及黨內民主說		42
民主化會令到多民族國家分裂		44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何去何從？		45
結論		50

第三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中國特色本質」	洪清田	55
引言、命題		55
「中國性」(Chineseness) 文化基因圖譜		59
千年變局——二百年未進入問題		63

中西比較——兩種「人本主義」和兩種文明形態及 兩種政治形態	64
中西比較——兩種「人本主義」、兩種文明形態和 兩種政治形態的兩種歷史進程	68
百年來的中國路向——救亡為先、民主和科學次要	70
民主和民主化是中國、中國人的人本主義的再造	72
第四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中國特色進程」 洪清田	75
引言、命題	75
只把香港當負累 沒看到香港的「真價值」	77
香港角色——漸引入「經濟、社會、政治」基因及 部分「行政、法治、民主」基因	81
三十年來中國思潮、社會和外交轉型	83
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和中國民主化	85
三十年重複二百年的思維模式—— 「消極一國兩制」與「積極一國兩制」	87
中國的考驗 世界的考驗	89
香港的歷史新角色——民主試驗田	90
香港和中國——現代化的同道中人	92
「香港學」——香港和中國的共同資源	94
第五章	
「六四事件」與中港兩地民主發展的互動 蔡耀昌	99
前言	99
「八九民運」前夕的香港民主發展狀況	100
「六四事件」與民主派角色轉變	103
「六四事件」與基本法定稿	105
「九一直選」至回歸前後的政治格局	105
「七一大遊行」以來的變化	106
「六四事件」與香港角色	108

支聯會二十年	109
「六四事件」與香港社運模式	110
總結	111

回顧

第六章

「六四」後的反思對中國發展的推動作用—— 二十年的變化和我的探索 劉銳紹	117
「六四」以來民間變化大	118
「經濟實力—公民權—政治權」路線圖	120
「三合會主義」到「四合院精神」	122
「新三民主義」	124
「條塊分割法」與進退之道	126
「六四」的解結之法	127

第七章

兩岸重大學運的歷史比較分析——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野百合學運」 林仁傑	131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131
「六四天安門學運」的原因與影響分析	132
1989年前後中國的社會環境	133
「六四學運」的影響與意義	136
「我們正在創造歷史」——台灣「野百合學運」的分析	141
199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	141
「野百合學運」的起因及過程	142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野百合學運」之比較	146

第八章

「八九民運」的文化意義及其啟蒙意涵 張嘉娟	153
前言	154

「代際意識」與「八九民運」	160
啟蒙的抗爭與儀式——「八九民運」的呈現	163
紀念性空間的歷史、文化與論述——天安門廣場	174
小結——「八九民運」之啟蒙意涵	179
第九章	
二十年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概覽 周義澄	189
從興盛、低落到新興力量加入——	
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幾個發展階段	189
前1989年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	
「中國之春」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189
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興盛——	
從民主中國陣綫、學自聯成立到海外民運大聯合	193
挫折後的穩步前進——	
從華盛頓會議失敗到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再嘗試	196
流亡運動走向低潮與民運組織的內鬥	198
新興力量的加入——	
海外流亡運動進入可持續增長階段	202
國際遊說團體、自由言論平台、組織力量基地——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主要功能和存在價值	204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一個基本功能	204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二個基本功能	205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三個基本功能	209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展望	210
四個群落	210
香港、台灣、國際社會對海外流亡政治運動的	
物質道義支持	213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兩大重要合作力量——	
西藏流亡運動及法輪功運動	214

回 憶

第十章

直接目擊與傳媒再現——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場域之爭」	譚志強	221
直接目擊「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意義		221
傳媒再現——一種以質量分析出發的研究途徑		223
中國政府的傳媒再現——「反革命暴亂事件」		224
台灣的傳媒再現——「反共抗暴民主運動」		227
港澳的傳媒再現——「中國愛國民主運動」		228
海外人士的傳媒再現——「平反六四」和「回家」		231
總結		232

第十一章

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裏的「六四事件」——		
介乎曖昧與避諱之間？	黃偉國	241
教科書與政治		242
分析方法及框架		245
文本分析		246
發生於1989年的事？		246
過程		248
後果		251
定性——一邊倒正面取向？		253
結論		254

第十二章

香港電影中的「六四事件」	陳家樂、朱立	257
引言		257
反對中國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		258
香港電影中「六四事件」的敘事和風格		262
動作類型		262

借昔喻今	262
坦克與人民力量對峙	264
攝影機推軌運動和俯拍、仰拍角度	265
主題蒙太奇	267
香港獨立電影及紀錄電影中的「六四事件」	274
總結	279
第十三章	
《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表述的「天安門屠殺」—— 象徵鬥爭、文化適應與普世價值 羅金義	283
導論——西方媒體也被「他者化」？	283
必也正名乎	286
強加民主還是譴責殺戮追悼無辜？	287
逢迎政權還是專業新聞？	287
「妖魔化」中國的聚光燈？	289
象徵鬥爭、文化適應還是普世價值？	291

序 言

隨時光的流逝，有關「六四」的著作越來越少。這本文集既是應時產物，也堪稱鳳毛麟角的佳品。世紀以來我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不外硬體國力（軍事經濟）或軟體實力（科學民主）兩途，其中以前者為主流居多。沉溺於硬體的發展導致對軟體價值——理性（科學的根基）與人的尊嚴（民主的大道）——的貶斥。「六四事件」乃大歷史路徑中的重要拐點；學生運動的鎮壓也是歷代專制政權漠視國人生命的慣技。改革開放早期硬軟發展比較均衡的路綫因「六四」而被埋葬，至今猶未修復。

本書作者期望為「天安門事件」的見證盡一分力，為維護知識分子的風骨盡個人責任，這是紀念「六四事件」的高尚舉措。本書編者的出版精神——重視人的尊嚴、承擔社會良知和關懷國家民族——亦可圈可點。總而言之，本書不容錯過！

關信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2010年3月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編寫一本紀念「天安門事件」的論文集呢？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一直表示無意平反「六四事件」；官方的立場是已有定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普遍認為官方重評「六四事件」不免牽涉當時眾多高層領導人，有些目前還身居高位；從中國當局的角度而言，這自然不利安定團結，故此對平反「天安門事件」現階段難寄厚望。海外從事統戰工作的人士就勸喻各方「向前看」，不要糾纏於毫無建設性的爭議，應該珍惜目前中國各方面的成就，專注面對未來的挑戰。

鑒於多年來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討論在國內是禁忌，30歲以下的年青人，包括大學生在內，對「天安門事件」所知甚少。這大概是中國當局所樂見者。面對歷史須要勇氣，尤其是政權形象與認受性所繫的歷史事件。反過來說，迴避歷史反映缺乏勇氣與安全感。今天中國經濟增長驕人，事實上亦無任何有份量足以挑戰現政權的組織或力量，難以理解缺乏面對歷史的勇氣。年前趙紫陽喪禮的處理就顯示中國當局氣量與自信俱不足。就算穩定的考慮壓倒一切，穩定要建基於化解矛盾，而不是掩蓋矛盾。

目前中國領導人為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與挽救道德淪亡的危機，不惜重新利用儒家傳統的價值觀，胡錦濤宣揚的「八榮八恥」就是明顯的例子。儒家道統講求從個人「誠意正心」做起，誠自是中國人對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幾項重要的悲劇從反右到大躍進、文革，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或是認為經得起歷史考驗者均是敢說真話的人。知識分子有責任要說真話；往前看要建基於誠懇地反省過去。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胡耀邦等鼓吹「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自然要從「實事求是」做起。近年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崛起，中日關係是其中一項重要議題。中國領導人屢屢呼籲日本政要「以史為鑒」。中國國民絕不容忍日本右翼份子掩飾侵華史實，那中國領導人對天安門事件又怎能內外有別，雙重標準呢？

客觀評價「天安門事件」自然關係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在中國人眼中，中國領導層容許討論「天安門事件」就是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徵兆；重評「六四事件」就是推動真正政治改革的序幕。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自由、人權、法治與民主；這當然是發展與現代化的終極目標，是真正「以民為本」的領導人所追求的目標。

中國人民與世界人類均擁護中國的和平崛起。但是如果人民不能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和平崛起還有什麼意義？過去中國政府對外的立場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生存權與發展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當中國領導人努力為中國爭取作為大國的地位影響力之際，生存權已經不再是重要議題，發展權亦應該超越生存了。現階段中國的發展怎能不落實自由、人權、法治與民主呢？大概中國領導人也明白一個民主的中國比標榜中國和平崛起更能令國際社會放心，所以近年中國領導人出訪國家時，也會談到民主和普世價值等課題。

中國的強大促成各種「中國威脅論」。中國可能出現的危機同樣令中國的鄰邦戒懼，從而影響它們對中國的評估和與中國的關係。如果中國經濟崩潰，大量難民外逃，中國的鄰國實在吃不消。如果中國因為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政府無能以及貪污腐敗以致政治、社會穩定受到威脅，起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也會受到衝擊。

目前中國的環境污染已經蔓延到鄰國。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高消耗，令國際原材料市場構成壓力，甚至形成供需的不平衡。中國國內的改革是國際社會期望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一項訴求，以保證中國的發展對世界不致構成威脅。

對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關注關係到中國的人權狀況、政治改革和貪腐，這些都是20年前「天安門事件」的核心訴求。中國領導層明顯要致力打擊貪污；人權狀況多年來也有一點改善；但中

共無意放棄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亦無跡象從事民主化自然影響到它的外交。世紀之初美國政壇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傾向拉攏俄羅斯遏制中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前者是一個民主國家。同樣的理由今天亦驅使他們支持與印度修好來平衡中國的崛起。

上述的討論，旨在說明本書作者的立場與寫作動機。我們認為中國研究沒有禁忌，我們要求實事求是；往前看亦必須以史為鑒。本書各章嘗試探索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有關中國政治改革、公民社會發展和民主化的議題，包括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

最後，編者在此感謝各位作者的支持與合作，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同寅在出版過程中的專業協作。

鄭宇碩

2010年4月

那 夜 無 星

八 九 民 運 二 十 年 顧 後 瞻 前

導論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現代知識分子，是社會群體的一部分，不敢像范仲淹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知識分子的特徵，應該是重視人的尊嚴；對作為社會良知的承擔，不會輕易卸責。本書的作者，希望在「天安門事件」20周年之際，表達一點心意，一點對國家民族的關懷。

紀念「六四」，一方面是求真，另一方面是對歷史負責任。中國領導人在中日官方交往中，經常提到「以史為鑑」；在雙邊關係陷於低潮時，更嚴厲批評日本迴避真相，歪曲歷史，然而在處理「六四事件」時，就一點點求真和「以史為鑑」的精神也沒有。

中國共產黨絕對無意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只是絕不容許挑戰其政權而已。現階段中國領導人維持中共政權的方程式是經濟發展加基本的社會保障網再加沒有民主的良治。迅速的經濟增長激化了新疆的動亂是最顯著的寫照。

中國領導層了解單憑經濟增長再也不足以提供政權的認受性；面對貧富越趨懸殊，政府必須提供一個起碼的社會保障網。近年政府財政充裕，有條件為全民加強必要的社會服務，因此農村的教育經費和對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支援大幅增加。

在不衝擊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國領導人也追求良治，這正是大談黨建、黨內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因；但其局限性亦非常明顯。打擊貪污就清楚反映這種良治的局限性。先不談民主與法治，為避免衝擊一黨專政，連主流媒體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也不能有效監察官員的貪污，這就難怪貪污泛濫了。

過去三十多年的驕人經濟成長，使一般國民不願求變，對未來改善生活仍有相當的憧憬，這其實是很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基礎。像台灣、南韓上世紀80年代後期推動的民主改革，相信是最理想的模式。平反「六四」就是這種改革清楚的訊號。

然而最近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氛不是寬鬆而是收緊了。與1988年的南韓漢城奧運相反，去年的北京奧運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機，而是領導層壓縮公民社會繼續發展的藉口。從收緊輿論包括網上輿論，打壓維權分子、非政府組織、各類異見分子等現象觀察，這種收緊在北京奧運前開始，北京奧運後未有結束。當然，這是因為2009年是「天安門事件」20周年，也是西藏動亂、達賴喇嘛出走的50周年，「五四運動」的90周年，開國大慶的60周年。

這種心態足以反映政權的虛弱；而這種虛弱，是因為不敢改革，不敢面對歷史。不斷找借口推遲改革，其實就是坐失改革的良機。到最後，經濟起飛階段完成，經濟增長開始放慢，市民對未來的期望不再樂觀，對領導層推動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大打折扣，屆時中國領導層就算有心推動政改，不但事倍而功半，阻力就更大，步伐就更難控制。

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可能是對中華民族「六四事件」20周年紀念的最佳獻禮；中共宣傳機器的回應是重推《六四真相》。慶祝60周年軍警林立，北京列為一級保衛，沿用北京奧運期間的規格，這難道是反映「國之大治」？

十年前建國50大慶剛完，李慎之在10月10日公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建國60大慶前民間則流傳據說是萬里口述的《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國慶六十周年前夕一位

老同志的談話》。過去十年黨內開明派「救亡圖存」的努力，收效不大，間接證明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就內地的政改，香港能起的作用有限。不過香港享有的言論自由，現階段尚能提供一個重要的討論平台。近年本港的統戰機器，在龐大資源的支持下，對本地輿論逐漸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相對而言，學術界與新聞界「自我制約」之風更盛。

本書作者就平日研究的基礎，為本書撰寫篇章，期望為「天安門事件」的見證盡一分力，為維護知識分子的風骨盡個人的責任。

第一部分「反思前路」首章由編者之一的鄭宇碩執筆。作者認為現階段在中國追求民主依然是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不管是自上而下由統治精英開創的民主改革，抑或是自下而上由群眾發動爭取民主運動，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容易出現。一般國民基本上接受中國的現狀，因而不願意不惜犧牲去爭取政治改革。

目前內地的知識分子階層相當一部分是幹部、企業經理和專業人士，可說是既得利益階層。有論者判斷，要是再出現一次「天安門事件」，這些身處既得利益層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會站到政府的一邊。1989年後，中國領導層就吸納各方面的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這顯然是成功的。

中國領導人吸取了「天安門事件」以及其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教訓。他們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亦深明「政治秀」之道，溫家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最基本的問題是：一個權力精英集團，能否長期以經濟成長、社會保障網、吸納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等政治手段來維持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丁偉一章旨在回顧過去20年關於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爭論，並試圖從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探討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路。丁偉認為中共中央黨校於2007年10月發表的政治改革倡議報告，揭示出政改的若干端倪；首要問題就是要界定中

共在急劇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角色。把黨權置於法權（人大）之下，或許就是現階段政改的突破點。

丁偉批評目前中國領導人抽象地肯定源自西方民主、法治、人權等價值觀的普世意義，但在實踐上則否定西方的做法。作者認為黨內民主與村委會選舉，不能作為政制民主化的起步；二者裝飾意味相當濃厚。若要實行基層民主，要鄉鎮政府以至更上一級縣政府由直接選舉產生，方能形成管治上的根本改變。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中國就不能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

在第三章洪清田解釋其樂觀預期的原因。雖然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的民主化表面上停滯不前，但中國社會實際上為中國民主化廣積實力。鎮壓「六四」民運以來20年的改革開放，促使內地經濟和外面世界接軌。這20年是中國民主化沒有目標的「拉布」，最終中國必會實現民主，而這正是中國秩序的重構。

洪氏批評中國政治只有權謀。近200年來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態度跳不出「以我為主」和「中體西用」的框架；迄今未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西方的開放、務實和理性的態度。

清末西潮下的救亡和啟蒙（改造）兩條路線之爭，其實就是集體專制權威暴政與個體自由民主法治之爭。毛澤東的新中國形成了完整的集體主義；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唯生產力、唯經濟、唯發展和唯穩定」之路。江澤民和胡錦濤亦未進入問題。洪清田期望中華民族總動員，從唯經濟的道路轉向「人」的民主化。

洪清田在第四章論述中國民主化的基礎在每一個中國人從「集體人」轉型做一個「個體人」。作者批評中國社會和文化視「個人主義」為精神鴉片；反而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形成完整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服務的多體制結構配套而成一個獨特的總體運作模式。洪清田嚴厲批判中國領導人把香港視為負累，沒有看到香港的真正價值。

雖然香港採取「拿來主義」，一味模仿；但洪清田認為百多年來香港文化基因的突變，是中國面向未來的知識寶庫。洪氏提倡把香港經驗的研究發展成一個知識體系，為探索中國文化轉型作出貢獻。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檢視「六四事件」對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民主發展所造成的互動影響。他首先探討「六四事件」對過去20年中港關係和香港民主發展的影響；繼而討論20年來香港支援中國民主工作對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作用；最後從組織發展和社會行動的角度研究「六四事件」對香港民間社會的意義。

如果沒有「六四事件」，蔡耀昌估計香港的民主發展將會緩步前進；而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會較正常發展，但影響大局的力量仍然有限。

雖然在內地被視為「反動」甚或「顛覆」組織，支聯會仍然能夠在香港合法存在而且繼續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維持支聯會的旗幟作用，而香港一直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可以合法、公開悼念「六四事件」的地方。「六四事件」同時也匯集了一大批堅定的爭取民主力量。

「反思前路」這一部分的作者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中國民主發展前景的樂觀取態，很多時不是具體地確定了近期民主發展的社會、政治趨勢，而是根據他們對人性的了解，對個人尊嚴的肯定。

劉銳紹寫本書第二部分「回顧」的第一章，旨在探索中國富強而開明的前路，尤其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作者的判斷是民智漸開，公民社會逐步形成；過去20年，老百姓不但在認識層面上了一個新台階，「軟抵抗」的行動也愈趨成熟。

根據劉銳紹的觀察，中國老百姓用行動勾勒出一個路線圖：先鞏固自己的經濟實力，然後再爭取公民權利，最後再爭取政治權益。作者謹慎地說明目前種種公民意識和政治意識不斷提高的

現象尚是零散的，未能形成大氣候，甚至有重新被壓倒的可能；但他抱着必須朝「從無到有」的發展角度看問題。

雖然劉銳紹認為「六四事件」已經到了解結的時候，但官方的信心和決心尚未足夠。他提議中國領導人先讓那些飄泊海外年老的異見人士回國；他謙稱這是「改良主義」階段論的一項建議。

林仁傑一章試圖回顧和省思北京「六四天安門學運」與台灣「野百合學運」，並比較這兩次學運對於後來兩岸社會的影響。作者認為「六四事件」是中共強烈拒絕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而近年中國的發展趨勢與美國所期待的和平演變大相逕庭，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不一定能導致政治改革的起步和自由民主的實現。

林仁傑認為兩岸這兩次學運都是在威權政治體制下表達自由民主的訴求；而均涉及領導層的鬥爭，因而變得更為混亂。「野百合學運」牽涉到所謂李登輝路線與非李登輝路線之爭。

林氏引述海外學者的看法，認為這兩次學運事件試圖將群眾隔離在學生抗議群之外的作法，是受到傳統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影響。作者則認為這種做法反映了學運高貴的純潔性及其高度的出世性。

張嘉娟一章的重點在以文化變遷的角度去分析「八九民運」，並且將該歷史事件的要素：人、事、時與地作為文化符碼分別討論；作者把「八九民運」視為一種傅柯式的史學文本。由於80年代後視為「啟蒙時代」，在一定意義上意味着「五四時代」的重返，因此作者亦探索「八九民運」所呈現的啟蒙意涵。

張嘉娟認為「天安門一代」的學運領袖，一方面受到「新啟蒙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仍然帶着在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下成長的烙印，就想像與模仿西方的民主，意圖發起一場民主運動中，運動的內涵擺脫不了「文革」的影子。

「八九民運」期間，公共空間與公共對話均是重要的啟蒙指標。但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這樣的啟蒙基本話語，難以避

免地導致流血的結局。這與啟蒙風潮帶來存在主義，引發對「異化問題」思考和尋求「自我」是自相矛盾的。

周義澄以參與者的身分，為20年來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提供一個概要的敘述；文章集中討論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綫和中國自由民主黨等組織。作者亦坦率地討論從本世紀初開始，流亡運動走向低潮和民運組織內鬥的情況。

劉賓雁痛言流亡組織內鬥的結果「驅使更多的中國人嫌惡政治，驅使越來越多的海外有志華人脫離民運，切斷民運的財源」。周義澄也指出幾乎所有內鬥都沒有涉及當事人政治路綫或思想理念的重大分歧，主要是財務、人事安排和行為作風問題。幾乎所有被指控為貪污者都沒有在法律上被證實為犯罪並受到所在國的法律制裁，或者受到某個團體的行政懲罰，最後都不了了之。

周義澄希望透過新興力量的加入，海外流亡運動能進入可持續增長階段。作者認為流亡運動的主要功能為國際遊說團體、自由言論平台和組織力量基地。

本書第三部分是「回憶」，首章作者譚志強的主題是直接目擊與傳媒再現。譚氏認為從歷史考證的最低要求來看，所有個別人士「直接目擊」的追述，必須要與現在可以得到的其他人士的「直接目擊」追述，或中國官方披露較為可信的相關情節互相排列、比較、分析之後，才有可能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合併出較為真實的圖像。

譚志強認為香港取得「六四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優勢，與本地新聞媒體和出版商無間斷地大量出版與「六四事件」有關著作有關。

中共政權沒有隨着東歐劇變、蘇聯崩潰解體，作者認為1992年鄧小平南巡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決定是關鍵。「六四事件」後不到三年，中國主流媒體完全退出了該事件「話語權」和「詮釋權」的戰場；而中共政權繼續有效統治的「認受性」，已經幾乎全部依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

黃偉國一章關注焦點是香港的中史教科書中的「六四事件」。它針對1997年後香港出版的中史教科書，根據它們對「六四事件」的論述作分析，探討「六四事件」如何被主觀描述，以及各類描述背後的脈絡和本質定向。作者希望探討教科書在富爭議性或政治敏感事件的論述對歷史教育產生的影響。

有學者提出，假如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只會對出版社做成不便，包括以政權的角度去分析事件只會使師生反感，繼而影響到政權透過教育過程建立和鞏固其政治文化主導權的優勢，較容易的做法是對事件絕口不提，或者以含糊以對的方式處理。

黃偉國的結果研究顯示教科書表面上對「六四事件」並無忌諱，但它們刻意迴避描繪事件的經過、責任和有關人物。這種情況反映本港歷史教育看似為政治服務的勢頭：對國家的正面成就要詳加講述，對領導人（特別是未去世者）要全盤肯定；反之對國家的黑暗面要輕輕帶過。

陳家樂和朱立一章討論香港電影中的「六四事件」。作者認為除了1967年的左派暴動外，「六四事件」及「九七回歸」是香港這50年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時也觸發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移民問題。香港電影雖然商業掛帥，但關注這兩大政治事件的電影不少，一些更掀動人心。

在政治表述上，香港的主流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存在着一定的差異，後者娛樂性稍欠，卻令觀眾反思，《沒有太陽的日子》是代表作。

針對「六四事件」的鎮壓，香港電影的借古諷今，顯示娛樂元素、批判及諷刺政治的結合，回應了時代的需要。商業電影並非完全是「虛假意識」或「純粹幻覺」，它們有其隱藏的政治表述。不過，作者認為香港電影的政治表述大部分是硬加進去的，反映過渡時期的香港電影頗有「後現代主義」色彩，帶有拼湊和混雜的風格，以及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狀態。

最後一章羅金義以「六四事件」為個案——一個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方最為敏感、最難尋求妥協的議題，探究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感知和了解有什麼誤差。因為要研究西方的主流媒體，作者選擇了美國的《紐約時報》與英國的《泰晤士報》作為抽樣源。

作者的研究認為這兩大西方報章並沒有借助「八九北京學運」來從事「象徵鬥爭」。要說它們確是在爭取某種文化正當性，定義某種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那只能說是對血腥鎮壓的譴責和追究，以及為受害者追求正義。

羅金義認為「文化適應」不容易在西方對中國的感知上出現轉變；而中國社會對西方的文明價值有頗大的誤解。羅氏否定中國官方對「人權高於主權論」的批評，提出公平審訊權、獲知真相權、言論自由權和新聞自由權高於政權利益，而這些基本人權均是普世價值。

本書的出版，反映香港仍然是從事中國研究的理想地方，只要肯努力，種種「自我約制」的壓力還不致於成為不可克服的困難。文集的水平明顯尚待改進，然而大學教員為提升自身機構的國際排名，很多對母語寫作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不少中學教師要求有多些「六四事件」的參考書，協助他們輔導同學了解這項重要的歷史事件，本書希望能幫上一點忙。

編者再一次感謝各位作者的耐心和貢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鄺子器先生和陳家揚先生，為本書的面世盡了不少力，謹此致以深切謝意。本書尚嫌倉促，錯漏之處，自屬編者的責任，尚祈各方不吝指正。

鄭宇碩

2010年4月

第一章

中國民主往何處去？ 紀念「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引言——「天安門事件」前後的政改

2009年是「天安門事件」的20周年。「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當代劃時代的大事，對中共政權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對以後中國改革的路向亦有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角度而言，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同年底的東歐劇變以及其後的蘇聯崩潰，基本上結束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宣稱市場經濟及自由民主政制壓倒了計劃經濟和列寧式的一黨專政。^[1]

在「天安門事件」前，中國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事實上比波蘭的「團結工會」和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還走得遠。1980年8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發言；^[2]這份政治改革的大綱在知識分子階層中大為振奮人心，引發不少「第五個現代化」的討論。為了贏得其他黨領導和廣大幹部層對經濟改革的支持，鄧小平稍後擱置這些政治改革計劃；鄧小平對他們的讓步和補償形成日後貪污泛濫的種種機會。

1987年中共舉行十三大，趙紫陽的報告根據鄧小平80年講話的精神提出具體的政治改革方案。^[3] 它的基調是黨政分開；黨專注政策綱領、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工作，國家機關負責日常的行政工作。在黨機關擔任具體職務的幹部不再兼任政府部門的行政崗位。在政府架構內，行政、立法部門也要分開，政府領導人不應同時擔任行政、立法部門的職位。

改革的思路是建立清楚的分工從而形成制衡的機制。次年，趙紫陽提出取消大多數政府部門內的黨組；同時將大學、企業、事業單位非黨職位的管理從黨中央的組織部移交給國務院的人事部。^[4] 趙紫陽希望透過公開招聘建立一個現代公務員制度。

「天安門事件」後，趙紫陽的政改建議不再提起，這些建議被視為削弱黨的領導和控制。中共十四大時江澤民報告所建議的政治改革只不過是行政改革，重點在精簡黨政機關。^[5] 此後，黨政分開的提法成為禁忌；近年的政改着重開拓黨內民主，意思是在黨不放棄對政治權力壟斷的前提下，促使各級黨領導更切實地回應民意的訴求。

雖然在經濟市場化的大潮下，各類基層黨組織趨於軟弱、渙散，但中國領導層一直強調黨建的工作。90年代初，各類企業包括中外合資企業和外資獨資企業均要設立基層黨組織；近年各類企業均要設立官方的工會組織。^[6] 90年代初，在黨一元化領導的旗幟下，各級地方黨委書記大都兼任同級人大常委主任；而在精簡機構的原則下，縣級及以下的黨組織部門和政府的人事部門、黨組織的統戰部門和政協都紛紛採取「兩個牌子、一套班子」的方式。

自80年代初以後，「三信危機」越趨嚴重，意識形態呈現真空狀態。在貪污泛濫的情況下，黨員的模範作用無從談起。過去十多年黨的整風運動動員能力和作用愈來愈有限。但中共依然控制黨政機關以及公營部門所有的委任；黨成為一個權力精英集團。對所有熱衷成為權力精英者中共仍然擁有莫大的吸引力。

這個權力精英集團當然無意放棄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黨的挑戰在如何行使它政治徵募的權力，網羅各個領域的精英，形成一個包容的集團在各個領域和環節有效實踐黨的領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要求基本符合這個重要的方向。^[7]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共小心翼翼阻止任何新的權力中心的出現。波蘭的「團結工會」提供了重要的教訓，中國領導人容忍各類工人的抗議、請願活動，但一旦有活躍分子要組織獨立的工會，公安部門就立刻鐵腕鎮壓。1999年法輪功成員在中南海組織示威的動員能力令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震驚，這是它遭受嚴厲鎮壓的主要原因。

要一個具有廣泛包容性的精英集團維持嚴肅的黨紀不是容易的事，這明顯是現階段中共的難題。但它的好處是能攏集各種利益和利益集團在黨內解決它們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台灣國民黨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改革也是採取這樣的方向。

這樣的取向會容許黨內的改革較為平緩地進行。中國領導層必須有長遠的目光和優秀的統御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要理解黨的馬列主義本質最終要有所改變。這些現階段只能求諸下一代的中共領導層。

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

中國的改革派經常被批評缺乏理論去賦與他們的改革綱領必需的認受性。鄧小平的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這種試驗性的取向正是鄧實用主義的作風，亦符合中共的傳統。中國幅員廣大，難以一刀切地全面執行一項改革藍圖；中共領導層一般容許甚至鼓勵各地緊跟中央的精神從事不同模式的實驗。

不過，要維持黨的領導一定要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即使稍為修訂一下正統的馬列主義。再者，經濟改革有很強的連鎖性，而優先次序一定要清楚界定。缺乏一個全面的改革理論就較難統

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並訂定其先後次序。直到目前為止，保守派和「新左派」依舊在理論和宣傳系統維持相當的影響力。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的重要貢獻就是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題；這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成為黨的基本路綫。¹⁸¹ 鄧小平一力提倡社會主義經濟也可以採用市場經濟架構，促成90年代中國經濟繼續改革和取得驕人的成績。

在南巡的行程中，鄧小平嚴厲批評姓資姓社的爭議。他提出實用主義的三個原則：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

自改革開放以後十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至此得到確認。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黨的工作重心要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要求遵守經濟規律，尊重價值規律。1982年中共十二大，黨的路綫成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為輔」。到十二大三中全會時修訂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商品經濟」。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計劃商品經濟成為「計劃與市場內部統一的架構」。十三大四中全會又修訂為「經濟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經濟架構」。到中共十四大方一錘定音，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¹⁹¹

這些理論上的演進大概落後於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這亦反映黨內意識形態的爭端。中國領導層從未闡釋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有什麼實質上的分別；總而言之，要維持黨領導的認受性就要高舉社會主義的招牌。

90年代中期，中國的主要經濟學者就發展市場經濟有不少爭論。就這些爭論，可以見到他們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殊於市場經濟。當時的共識是市場在中國尚未充份發育，計劃經濟在幹部層和國民的思想、心理和行為模式尚留存不少束縛。

經濟學者爭論的要點在發展市場的優先次序。一些經濟學者強調價格改革優先；一些經濟學家建議從速發展股份制，即重視

產權制度的影響；另一批學者則認為改革必須「配套」，即全面改革的重要性。

在9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中央政府的角色和財力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地方政府對鄧小平南巡的積極反應和其後的「圈地熱」引致嚴重的經濟過熱。^[10] 當時的常務副總理朱鎔基負責宏觀調控；朱鎔基成功地使中國經濟「軟著陸」，但他的手段主要還是行政措施而不是市場機制。朱的方式引發宏觀調控應否進行及其可行性的討論。

討論的結果相當清晰，宏觀調控被視為必要，只不過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宏觀調控的手段要盡量依賴市場機制。到今天，宏觀調控一直是國務院引導經濟發展的責任；而最近應對國際金融海嘯的措施，可見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和宏觀調控對市場機制的尊重。

要有效進行宏觀調控，一定要相當程度的中央集權。在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各級地方政府從計劃經濟中解放出來，開始積極爭取本身的利益，甚至成為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的阻力。中央政府在90年代中期的對策是分稅制；到90年代末期的對策是全面接受全球化，加入世貿組織。

根據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的一項調查，1978年，中國公共財政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1.2%；這比例到1990年跌至18.7%；1993年為16.2%；1994年為11.8%。^[11] 除去地方政府的收入，1993年中央政府的公共財政收入只佔國內生產總值5.4%；1994年為3.9%。加上預算上的赤字、對外借貸、國內國外發行的國庫債券，1993年中央政府的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6.2%；1994年佔4.2%。同期美國的比例為19.8%；德國為30.8%；法國為41%；巴西為28%；印度為15%。中國的比例顯然是非常低。

1994年引進的分稅制逐漸有效地扭轉上述的趨勢，加上經濟飛躍的增長，中央政府的財源大幅增加，不但有能力進行宏觀調控，亦有資源在近年去推動建立社會保障網，藉以維持社會的穩定。

建立社會保障網

經濟市場化引發的另一項重要問題就是社會保障。過去在城鄉二元化的體制下社會保障亦是城鄉分割。改革前城鎮居民在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工作者全家享有全面的社會保障；農村居民就只能倚靠集體（人民公社）非常有限的社會服務。隨着經營不善的國企要破產，國家就要承擔起建立一套新的社會保障網的責任。

9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層因中央政府財政資源短缺，強調「小政府，大社會」。1995年7月，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政委主任李鐵映宣稱中國沒有能力負擔「高福利」^[12]。李解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要強調發展生產力；着重權利與責任相結合和個人參與，讓大部分人不用倚賴財富和收入再分配。

中國城鎮居民社會保障最重要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原先的設計是「三家抬」，由僱主、僱員和政府承擔供款。而所謂政府的承擔，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最初中央政府希望把本身的責任限制在扶助貧困的地方政府，即財政轉移支付上面。但各省級政府貧富不均，富庶的沿海省份如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還勉強可以應付，內陸邊遠省份顯然沒有這種能力。

推動國企破產自然產生大量下崗工人，中國領導層在90年代末的設計是下崗初段，國企仍要負擔工人的生活費和社會保障的供款；然後第二階段由失業保險承擔；最後由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救助接手。但破產國企大多再沒有資金去支持下崗工人；失業保險制度尚未有機會積累資金（供款）有效運作；最低生活保障迅速成為城鎮居民的基本社會保障網。

中央政府一方面是預期不足，另一方面亦反應迅速，在兩三年內大力支持省級政府設立以低保為基礎的社會保障網。在胡錦濤、溫家寶主政這幾年，社會保障受到中國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他們認為單靠經濟發展已不足以維持中共政權的認受性。

1997年9月，國務院明確要求在1999年年底之前，全國所有城市和縣政府所在地的城鎮，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9月，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正式頒佈時，全國納入低保的人數只有282萬左右；到2002年6月，這一保障受益人數迅速攀升至2,250萬人，隨後穩定在2,200多萬人左右。^[13]

現階段的城市低保制度開始強調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即說是當城市居民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向政府提出救助申請，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維持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則是政府必須無條件承擔的責任，是政府應當提供的一項基本公共服務。

多數農村居民都有自己的承包地，雖然收入低但所生產的糧食能夠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除非遭遇自然災害或突發性事件，多數能夠解決溫飽問題。但是城市新貧困群體就缺乏基本的替代性生活資料。有收入來源，沒飯吃的可能性相當高。而且只能滿足最低生活需求的一點收入亦剝奪了他們發展的權利，教育、醫療、住房等現實困難都沒法克服。

城市貧困群體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的根本出發點在調整工作的報酬和經濟活動的誘因，通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達到「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相對貧困規模的擴大，城市相對貧困程度的加深，都是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背離，也使整個社會開始質疑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貧困問題與拆遷、上訪、亂收費以至貪污監權等問題糾纏在一起，是對中國社會穩定最大的威脅。

2007年是城市低保制度建制十周年。在這個基礎上，由於經濟高速增長，中央財政較為充裕，中國領導層致力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提高失業保險金標準、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以及在全國的市區縣建立城市醫療救助制度，以彌補現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缺口。^[14]

這幾年維護農民工權益是社會保障領域的一項重點。在2007年第三季度末，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的

農民工人數分別達到1,700多萬、2,900多萬、接近1,100萬和3,400多萬人。^[15]相對於超過1.2億農民工而言，這個比例仍然相當低，但亦反映了胡、溫對維護弱勢社群的努力。為表示重視農民工的政治權益，全國人大常委已經表示，今後要明確規定農民工的全國人大代表名額。

中國領導層顯然了解要維持中共政權的認受性以及社會、政治穩定，一個全民的社會保障網不可或缺。2007年初，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當年要在全國範圍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估計當年年底納入農村低保的困難群眾超過三千萬人。^[16]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時提出，中國到2020年要實現全民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衛生發展目標，這標誌着中國將進入世界上實施全民保健的國家行列。早在2003至2005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開始試行。當時政府對所有參合者以最低人均年20元的標準予以補助一半。自2006年，最低補助的標準增加到人均年40元。2008年初，標準再在兩年內增加到人均年80元。^[17]

作為醫療保險的供款而言，這數目十分微薄。但標準的迅速提高，反映中國領導層對為農民「保大病」的決心。政府補助的責任並非由某一級政府承擔，而是多級政府分攤。基本上，對中西部地區和少數東部貧困地區來說，政府補助的一半，由中央政府承擔，而剩下的一半，則由省、市、縣多級地方政府分攤。^[18]

上述的討論，主要說明中國新領導層了解經濟市場化對社會主義和社會穩定的挑戰。他們銳意建構社會保障網以減少社會矛盾，畢竟在經濟高速發展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環境下，貧者無食無醫的情況是不可以接受的。

雖然在建構社會保障網取得進展，但貧富差距仍然在擴大。最近十年，中國城鄉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比衡量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從1997年的2.47倍上升到2006年的3.28倍。其中僅在2004年出現了小幅下降。^[19]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與最低省之比從2001年的2.446倍下降到2006年的2.33倍，稍有改善。但各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最高省與最低省之比則從2001年的4.182倍增加到2006年的4.605倍。^[20]

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內部、農村居民內部和全國的實際堅尼系數分別為0.335、0.368和0.475。^[21] 預計在2007年和2008年，上述的堅尼系數還會稍為上升至0.34、0.37和0.48。^[22] 過去數十年，中共標榜均富，現在貧富懸殊竟處於南美國家的水平；更加嚴峻者，在一般國民眼中，中國大富豪的財富往往是藉着貪污不法的手段取得。如果國民對經濟前景樂觀，認為本身收入水平會繼續改善，他們還會多容忍一點。相反，如果經濟放緩，一般國民生活水平下降，他們的不滿就會升溫。

從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汲取教訓

「天安門事件」繼後東歐、蘇聯共產政權倒台，讓中國領導人維持高度警惕。作者無法取得任何重要文件，以下的討論主要從近年內地重要智庫學者所發表的文章整理出一些相信具參考價值的觀察。

前中國社科院蘇聯東歐所所長李靜傑認為從蘇共的倒台，中國（其實指中共的領導層）可以取得八項教訓：

- (1) 集中全力發展生產力；
- (2) 意識形態上要有彈性、要進取；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 (3) 學習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特別要重視對外開放；
- (4) 不但要增強綜合國力，更要着重提升國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 (5) 要正確地實踐民主集中制，開拓黨內民主，加強打擊貪污；

- (6) 公平地對待知識分子；
- (7) 全面理解民族問題及民族間關係緊張的基本原因及其複雜性，保證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決權，加速經濟發展作為解決民族問題關係緊張的基本方法，認識在多民族地區實踐政治多元化的危險；
- (8) 先在經濟領域推動改革，在其他領域包括政治領域也要推動改革。^[23]

在2003年李靜傑在接受外國學者訪問時表示，蘇聯崩潰和蘇共倒台一直衝擊中國領導層的思維，他們嘗試理解其影響和教訓，從而避免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李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有三面鏡子，一是蘇聯，它的民主化走在經濟現代化前面，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二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它們的經濟現代化走在民主化前面，是成功的經驗和中國學習的對象；三是印度，與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政治方面不是一個好的範例。^[24]

除了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外，李的論述大致反映中國領導層的路向。另一組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中共對外聯絡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亦提出一系列的八項教訓：

- (1) 改革不要急促，先集中建立生產力和資金的基礎，再建構政治和文化的上層建築；
- (2) 不斷改革，與時並進；
- (3) 學習資本主義的教訓；
- (4) 社會主義一定要富裕及民主；
- (5) 加強黨建，重視科技以發展意識形態，建設黨內民主，打擊貪污；
- (6) 處理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重視他們的社會作用和角色；
- (7) 處理好民族問題，經濟發展是解決民族緊張關係的基本方法；
- (8) 發展全面正確的改革戰略，對整個過程要有耐性，容許黨內多元的意見和反對聲音。^[25]

上述兩組權威性的論述如此相似，相信中共內部已有相當的共識，亦代表着當前黨的路綫。最後參考中共對外聯絡部一個課題組所提出的五項教訓：

- (1) 建設社會主義不可避免要犯錯誤，但錯誤要承認，不容忽視和否認；
- (2) 堅決貫徹黨領導，但要不斷改善黨領導的能力，透過黨組織建設，加強幹部的宣傳思想工作，實踐民主集中制和黨內監督制度，提升幹部質素等；
- (3)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推動政治改革前先提升生產力和生活水平（這是戈爾巴喬夫的最大錯誤）；
- (4) 強調各民族的團結，打擊分裂主義；
- (5) 提防西方的「西化」、「分化」戰略，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要提高警惕。^[26]

大概這份報告是黨內的內參刊物，所以語調比較尖銳。中國的智庫專家不但關注前蘇聯東歐的教訓，也留意現存共產政權的問題；似乎北韓、越南和古巴的分析較多，老撾的研究甚少看到。

中國的公開和內部刊物不會對北韓提出任何批評，這明顯是一項禁忌。就與中國專家、學者的私人談話中，不難發現他們對北韓的厭惡、不滿和失望。他們對金氏王朝的個人崇拜有強烈反感，有時甚至與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相比較。他們認為北韓自救的唯一途徑就是倣效中國的經濟改革。^[27]

中共對外聯絡部和其他涉外黨政機關嘗試對北韓推動一種「經濟改革外交」，就是盡量對來訪的幹部、企業經理、經濟學者等介紹中國的改革經驗。公元2000年到2006年金正日四次訪問中國，中國方面也同樣竭力介紹中國的經政模式。^[28] 在中國眼中，北韓經驗似乎只是反面教材。

越南的改革起步比中國晚，模式與中國非常相近。其農業改革相當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食米出口國，僅次於泰國。越共也同樣面對貪污、幹部道德低落以及「和平演變」的危機，其黨建

和整風的對策與中共亦大同小異。^[29]不過越共的黨內民主比中共更先進，地方黨委多個候選競逐的實驗引發在中共內部的一些討論。^[30]

古巴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經驗相當吸引中共研究的興趣。中共組織部的一項研究就此提出三個因素：一是黨建與反美的民族主義的結合；二是黨與人民維持密切的聯系；三是提倡社會平等。^[31]近年兩國兩黨交往非常頻繁；2004年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胡錦濤讚揚古巴的傳媒政策在海外惹起不少注意。^[32]

除了汲取前蘇聯和東歐變天的教訓外，中共的智庫組織亦低調地關注近年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即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次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中亞吉爾吉斯坦的「黃色（鬱金香）革命」。中國領導人亦視這些革命導致政府倒台為其前車之鑑。

根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附屬國家安全部）和其他智庫的分析，中國關注的焦點有以下六個方面：^[33]

- (1) 革命的本質，中國的分析拒絕接受這些是真正的革命運動，而傾向視它們為「權力鬥爭」、「政變」等。
- (2) 中國的分析強調美國的顛覆角色，是美國針對共產國家「和平演變」戰略的一部分。「顏色革命」是美國與俄羅斯競逐勢力範圍的一種戰略手段，也是美國推動民主與維持其霸權的結合。^[34]
- (3) 在戰術上，中國的分析相當重視像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角色，以及它們與美國政府機關的緊密聯系。中國方面認為這些非政府組織在宣傳民主、自由和培訓當地民主運動活躍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
- (4) 這些分析明顯擔心「顏色革命」在中亞地區、白俄羅斯等國的示範作用。^[35]
- (5) 上述分析留意俄國普京政府的反應，包括禁制、驅逐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加強聯邦安全局對它們的監

控，杜馬（國會）通過新的管制法律迫使它們向政府登記註冊等。^[36]

- (6) 中國對「顏色革命」的戒心也促使政府採取一些戒備措施。中國媒體對「顏色革命」一般不予報道；政府取消了批准外國報紙在中國印刷的計劃。2005年10月當佐治·索羅斯訪問中國時，當地媒體不予報道，他的一些會面和演講也被取消。^[37] 中國政府加強了對外國非政府組織的監控。據聞2005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普京對胡錦濤就外國非政府組織的顛覆活動提出警告。^[38]

上述中國權威智庫就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的分析，間接反映了中國領導層對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態度和在可見的將來的基本路綫。

沒有民主的良治

進入21世紀，中國學術界認識到中國正邁向一個複雜而不穩定的發展時期。2003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一些官方智庫指出，根據外國（主要指拉美大國）的歷史經驗，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處於1,000至3,000美元之間的階段，社會階層化會加劇，中產階層及其影響力會擴大，各類文化思潮崛起，貧富懸殊會惡化，各類社會矛盾包括民族之間的矛盾會尖銳化。這些智庫學者希望中國能學習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利用這一個經濟起飛期，為日後經濟發展打好基礎。另一方面要避免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於70年代後陷入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早在1961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1,000美元；但其後四十多年，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只增長1.9%。^[39]

在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很難期待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出現，甚至連直選鄉鎮長這樣的進展也無法推動。胡溫的理想大概是恢復50年代的好時光，在黨領導下，各級幹部無私地為人民服務。

2005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誕辰紀念日），中國社科院的馬列毛思想所升格為研究院，其體制大為擴充。前一年，中共中央亦推動一項為期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計劃，包括為大專院校提供教材。^[40] 2005年1月，中共為其7,000萬黨員開展一項三階段溫和整風的教育運動，主要學習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要求」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41]

這些努力大概成果有限。幹部層和大學生對馬列主義教育明顯缺乏興趣，很多大學近年已經放棄馬列主義課程。不過，黨作為一個權力精英集團仍然有它的吸引力。為了填補這個意識形態真空，中國領導層採取多元化的措施，從利用民族主義到提倡法治，以至恢復過去知識分子儒家精神的「八榮八恥」。

胡溫雖然無意推動政治改革，但改善管治是維持中共政權認受性的一個重要目標。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黨領導層提出要建立黨政領導幹部任期、辭職和問責的具體制度。兩年後頒佈的《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確實要求主要負責官員要為其工作範疇的嚴重過失和錯誤引咎辭職。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問責呈辭是公務員管理制度的一部分。^[42]

中國領導層非常重視提升幹部的質素以改善管治和推動現代化。在改革開放期間，教育程度和海外經驗越來越受重視。年青一代幹部積極回應；銳意求上進的中青年幹部不少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和海外工作經驗。少數「海歸派」有破格提升的機會。十多年前，這種情況在沿海地區漸趨普遍；現在內陸省份也紛起效尤。地方政府財政漸趨寬裕促使培訓幹部的撥款大幅增加；中層幹部到海外學習、考察的機會不少。

達致良治的一項障礙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膨脹，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層面不易貫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種種現象未見有改善。2005年底，在中央政府宣佈實行向大專學生貸款的計劃後六年，仍有八個省級政府未有落實這項政策。前上海市委書記

陳良宇抗拒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是海內外廣為流傳的小道消息；^[43]最近面對金融海嘯，據傳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向技術水平低的加工企業施壓的政策與中央亦有所抵觸。^[44]

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情況不一樣。地方官員要滿足地方上的利益，不然本身要面對龐大的壓力。地方官員為求升遷，要建立政績，不少所謂「政績工程」是嚴重的浪費。中央政府過去為了減輕本身的政策負擔和財政壓力，樂意推動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因而擁有財政資源，特別是為中央政府提供財政資源的沿海省份。

在急速的經濟與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化不易鞏固，法治當然尚未完備，地方政府能「鑽空子」的漏洞不少。很多熟悉中國政情的人士相信，地方政府有如西方國家的中國餐館，通常有兩三盤賬，一盤是供中央政府查閱，一盤是地方政府據以施政者，另一盤則掌握在地方政府第一把手手中。中央領導人一旦處於弱勢或者民望偏低，地方政府「瞞天過海」的現象就更為嚴重。

貪污濫權大概是現階段對政治穩定的最大威脅。2007年1月，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紀委全會上發表講話，將「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表述為反腐倡廉的戰略方針。顯然在經濟市場化的大潮下，商業賄賂成為貪污的主流。胡錦濤在2006年初召開的中央紀委全會上強調：「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堅決糾正不正當交易行為，依法查處商業賄賂案件。」此前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要求：重點治理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採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等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全國檢察機關依法大力查辦發生在工程建設、醫藥購銷等重點領域、行業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國家公務員利用行政審批權、執法權索取、收受賄賂的案件，嚴重破壞市場秩序、危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等案件。^[45]

這些官方的發言，事實上具體地反映貪腐問題的嚴峻。中紀委在2007年5月底下發了《關於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同月，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列入

國務院直屬機構序列，在監察部加掛牌子。^[46]反貪污腐敗的文件和機構不缺，關鍵是打擊貪污的殺手鐮，厲行民主與法治違背一黨專政的政治底線，打擊貪污就成為「葉公好龍」。

退一步而言，不談民主與法治，單就加強輿論和人大系統的監察，就已經不是維持一黨專政所能容忍。到目前為止，中國領導層仍然緊抓新聞媒體；過去兩三年，對媒體、網絡社會、非政府組織、異見人士等的控制與打壓，基本上是加強了，而不是放寬了。而在北京奧運前採取的種種收緊措施，因為金融海嘯觸發的經濟困難，至2008年年底仍未見有所鬆動。

鑑於媒體和刊物都隸屬或起碼要「掛靠」一個官方組織，故過去幾年有所謂「異地報道」的現象。意思是廣東的媒體，「不怕官，最怕管」，不敢報道廣東省內的黑幕和醜聞，但對廣東省外的貪污腐敗，就比較大膽揭發。不過近年中共中宣部對這類「異地報道」大力阻嚇，故此從事「異地報道」的媒體也得大為收斂。

中國各級人大代表以中共黨員佔多數，故此各級人大的黨組可以以黨紀約束身為黨員的人大代表。因為要維持黨領導以及黨的形象，各級人大至今尚未能真正發揮其監察政府的職能。「天安門事件」後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人大系統就無從發揮其制衡和監察的角色。

不少中國領導人都提出過貪污會亡黨亡國的警告；經濟放緩、貧富懸殊、貪污腐敗，加起來正是做成社會不穩的基本因素。而中國領導層打擊貪污戰略上的局限，正反映出要長久維持一黨專政的危機。

結論

根據上述「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討論，可以總結出若干觀察。首先，在中國追求民主依然是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不管是自上而下由統治精英開創的民主改革，抑或是自下

而上由群眾發動爭取民主的運動，在可見的將來，均不容易出現。經濟成長為絕大部分國民帶來生活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了對未來生活繼續改善的憧憬。因此領導層「穩定壓倒一切」以至經濟成長要「保八」的思維符合一般國民「不求變」、「怕變」的心態。基本上中國的現狀可以接受，中國國民不願意不惜犧牲去爭取政治改革。

在精英的層次，目前的情況與「天安門事件」時有一項重要的分別。80年代末，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大部分尚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故此有「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現在的知識分子階層相當一部分是幹部、企業經理和專業人士，可說是既得利益階層。有澳州學者認為，要是再出現一次「天安門事件」，這些身處既得利益階層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會站到政府的一邊。^[47]

維持經濟增長，為弱勢社群提供社會保障，吸納各方面的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是中國領導層鞏固一黨專政的基本戰略。在不影響一黨專政的前題下，中國領導層樂意追求良治。他們對形勢有準確的判斷；民意調查、「金盾工程」等手段有助他們掌握形勢；中央政府手上龐大的財政資源亦增加了他們應付危機的本錢；正因為了解本身的弱點，他們更多地使用懷柔的手法。

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發展不平衡和利益矛盾增多，全國群體性事件的規模和次數反映社會不滿的累積。全國群體性事件在2005年一度下降，但從2006年又開始上升。當年各類群體事件有六萬多次，翌年上升到八萬多次；2008、2009年的形勢自然不容樂觀。^[48]

像2008年6月底的貴州瓮安事件，由偶然的事件引發，但蔓延速度很快，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事件的原因並沒有直接利益關係，往往是為了發泄對一些長期積累問題的不滿。即使地方官員初期處理不明智，但一驚動高層，處理的字旨就立刻轉為平息民憤。像中國官方媒體指出，中國當局應對突發事件能力有所提高。^[49]

「天安門事件」前，中國村一級就引進民主選舉，但鄉鎮一級的選舉始終無法突破。關鍵在鄉鎮一級是基層幹部，選舉會衝擊「黨管幹部」的底線，嚴重侵蝕一黨專政。90年代下半期出現的城市社區選舉，同樣沒有重大突破。究其原因，是中國領導層完全沒有通盤政治改革的藍圖。面對盤根錯節的各種既得利益，像城市社區選舉一類改革試點以後就寸步難行。

面對日本自由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局面，小澤一郎曾建議其內部派系分裂形成兩大保守黨競爭的新形勢。^[50] 這種局面目前亦難以在中國預見。中共當然不是鐵板一塊，但維持一黨壟斷政治權力的共同利益與共識在可見的將來足夠阻止黨的分裂。

大概各類諮詢機制會繼續發展，列寧主義的政黨亦要建立群眾組織，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發揚「群眾路線」。現階段的諮詢機制當然有新的包裝；中共領導層要求各級幹部贏得民意支持，良治總要有民意基礎。目前中國領導人已深明「政治秀」之道，溫家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中國領導層上述戰略的成功，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吸收了「天安門事件」以及其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教訓。今天「北京共識」^[51] 在第三世界有能力與「華盛頓共識」^[52] 抗衡，自然有其吸引力。但最基本的問題是，一個權力精英集團，能否長期以經濟成長、社會保障、吸納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等政治手段來維持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不是「為人民服務」，這是以服務來換取人民手中的基本政治權利。人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人民不是經濟動物，人民是要有尊嚴地當家作主的。這才是「天安門事件」的真正歷史意義。

註釋

1. Francis Fukuyama (200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2. 鄧小平 (1983)。〈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280-302頁。
3. 趙紫陽 (1987)。〈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41-59頁。參閱 Willy Wo-lap Lam (1989). *The Era of Zhao Ziyang*. Hong Kong: A. B. Books & Stationery (International) Ltd., pp. 203-206.
4. John Burns (1994). "Strengthening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1990 Nomenc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pp. 461-463.
5. 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向中共第十四大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的第二章第七節闡述他的行政改革建議。報告全文見《文匯報》(香港)，1992年10月13日，19-20頁。
6. 到2007年底，全國外資企業和內資私營企業的工會組建率分別達到73.6%和69.6%。全國工會會員總數達到1.9329億人。參閱李培林、陳光金 (2008)。〈力挽狂瀾：中國社會發展迎接新挑戰——2008-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6頁。
7. 「三個代表」要求是指中共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參閱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年7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1-12/03/content_499021.htm。
8. Joseph Y. S. Cheng (ed.) (1998). *China in the Post-Deng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 9.
9. 同上，10頁。
10. 到1995年7月，國家計委的一名官員仍然表示要加強宏觀調控以更好地控制通脹；參閱《明報》(香港)，1995年7月14日。
1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June 9, 1995.
12. 參閱《信報》(香港)，1995年7月29日。
13. 劉善堂 (2008)。〈城市貧困治理中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見白鋼、史衛民主編，《中國公共政策分析，2008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59-160頁。

14. 王發運、王曉明 (2008)。〈2007年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50-51頁。
15. 同上，51頁。
16. 張時飛、唐鈞 (2008)。〈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形成〉。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57-58頁。
17. 參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8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第六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19/content_7819983.htm。
18. 顧昕 (2008)。〈全民醫療保險走上正軌〉。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95頁。
19. 楊宜勇、顧嚴 (2008)。〈2007-2008年：中國收入分配新動向、新趨勢和新思路〉。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15頁。
20. 同上，217頁。
21. 同上，218頁。
22. 同上，219頁。
23. 李靜傑 (1992)。〈蘇共失敗的歷史教訓〉，《蘇聯東歐問題》，6期，3-14頁。
24. David Shambaugh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Berkeley, L. 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76-77.
25. 陸南泉、姜長斌、徐葵、李靜傑 (2002)。《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859-881頁。
26.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課題組 (2001)。〈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給執政共產黨人的警示〉，《黨建研究內參》。4期，13-15頁。
27. David Shambaugh (2003).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Playing for the Long Term," *Washington Quarterly*, 26(2), 43-56; and David Shambaugh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 pp. 82-83.
28. Philip Pan (2006, January 19). "In China, Kim Vows Commitment to Talks." *Washington Post*; and Joseph Kahn (2006, January 19). "The Secret's Out: North Korea's Leader Did Visit China." *New York Times*.
29.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 (2000)。《黨建研究縱橫談 (1999)》。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344-348頁。
30. 陳燕華 (1993)。〈越南的改革開放的成績和問題〉，《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現已改名為《國際共運史研究》)，1期，11-13頁。

31. 張強 (2004)。《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380-387頁。
32. 林和立。〈中共要向古巴學習？〉，《蘋果日報》(香港)，2005年10月24日，A22頁。
33. “‘Color Revolutions’ and Beyond”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by individual author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6), June 2005, pp. 5-36.
34. 劉建飛 (2001)。《美國與反共主義：論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及梁雲彤等 (1992)。《美國和平演變戰略》。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35. Qi Zhi (2005). “What a Warning Signal Given by ‘Colo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Beijing), No. 3, p. 30.
36. Peter Finn (2005, December 22). “Revised Russian Bill Governing NGOs Fails to Mollify Critics.” *Washington Post*.
37. David Shambaugh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Berkeley, L. 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91.
38. 同上。
39. Joseph Y. S. Cheng (2007). “Introduc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Challenges,” in Joseph Y. S. Cheng (ed.), *Challenges and Policy Programmes of China’s New Leadership*.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p. 1-2.
40. 《東方日報》(香港)及《文匯報》(香港)，2005年11月5日；《大公報》(香港)，2005年11月25日；以及新華通訊社電，2005年11月16日。
41. 新華通訊社電，2005年11月28, 29及30日，2005年12月20日。
42. Joseph Y. S. Cheng (2007). “Introduc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Challenges,” in Joseph Y. S. Cheng (ed.), *Challenges and Policy Programmes of China’s New Leadership*.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 7；以及新華通訊社電，2005年12月2日。
43. 參閱《經濟日報》(香港)，2005年11月18日。
44. 俞文學，〈黨刊再暗批溫家寶〉，《開放雜誌》，264期，2008年12月號，15頁；及管見，〈溫汪的分歧與中共的難題〉，《動向》，280期，2008年12月號，16-17頁。
45. 文盛堂、李元澤 (2008)。〈2007年中國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形勢〉。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129-131頁。
46. 同上，135-136及139頁。
47. Jonathan Unger (2006). “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69(3), pp. 27-31.

48. 李培林、陳光金（2008）。〈力挽狂瀾：中國社會發展迎接新挑戰——2008–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見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10頁。
49. 同上，6頁。
50. Ichiro Ozawa (1994).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he Rethinking of a Nation* (Eric Gower Ed.). Tokyo and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51. Joshua Cooper Ramo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pp. 11–13.
52. John Williamso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 8–19.

第二章

中共的漸進式民主與 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呼喚 理論、政策、矛盾

丁偉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前言

中國經濟開放改革30年，舉世矚目；而經濟與軍事力量日趨雄厚，又使中國崛起成為主宰世局發展的重要變數。不過，世人對中國崛起，欽敬之餘卻帶有畏懼，恐怕中國會走向霸權主義，不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天朝大國」的傳統，而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現實。當權力只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人民缺乏渠道影響政府施政及監察統治者，法治如何彰顯？若法治不彰，人權又何以得到保障？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層層相扣，互為表裏，若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政治發展趨趨不前，中國如何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

究其實，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經濟改革伊始，鄧小平即提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整個80年代，經濟改革層層開展，逐

步攻關，由農村解散人民公社，以至中央向地方政府及企業「放權讓利」，還有在1985-86年間攻「物價關」，中國逐漸擺脫計劃經濟的枷鎖走向市場經濟。與此同時，80年代初，鄧小平即已提出幹部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及專業化等要求，幹部終身制固然要取消，黨政機關的職位也落實任期制。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黨政分開的政策。1986-88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言論越趨開放，權力制衡、國家與社會關係、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等各種言論，都得到廣泛傳播，因此當時有論者認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在中國已開始萌芽生根。整個80年代，無論是政治或經濟領域，都給人一種欣欣向榮，充滿希望的氛圍，儘管改革過程當中也引發不少焦慮(比如物價上漲及貪污腐敗)。遺憾的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政治上迎來了「萬馬齊瘖」的局面。20年來，特別是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飛躍發展，但政治改革卻是停滯不前。經濟成就似乎成為中共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依據，而民族主義則成為凝聚群眾的主要意識形態。

本章旨在回顧，過去20年來關於中國政治發展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爭論，並試圖從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理出其發展脈絡，從而探討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路。邁向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勢所趨，但政治文化土壤是成就民主政體的首要基礎；中國政治文化若得不到深刻改造，民主發展肯定舉步維艱。

政治改革——理論與現實的鴻溝

為何要有政治領域的改革？在國家與個人(公民)關係這個層面，要釐清的其實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統治者不錯是掌有公權力，但他運用權力只能為被統治者(人民)服務，處理各種公共事務，他的權力是由人民賦與的。民主國家由人民賦與權力予統治者是通過選舉過程，但在一黨專政的格局下，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究竟是走向何方？

過去20年，國內外學者對政制民主化，政治與經濟關係都提出了不少看法，歸納起來有，犖犖大者如下。

先經濟後政治論

中共理論家多年來都以蘇聯改革模式作為反面教材。中央黨校的研究認為：「經濟決定政治，經濟改革的力度和進程決定政治改革的力度和進程。……從前蘇聯改革的教訓來看，基本上走了一條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後進行經濟改革的道路：結果政治體制改革進展太快，經濟體制基本上沒有動。」^[1]中共則先改革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上不急於求進，進行各方面的協商妥協，從而保證政治體制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結論很簡單，蘇聯失敗、中國成功，因為前者已經分崩離析，而後者則高速發展。但蘇聯瓦解，不能全歸咎於「先政改、後經改」。蘇聯的僵化政經體制當時已病入膏肓，戈爾巴喬夫希望透過政制改革，依靠民主發動民間力量推動改革進程，但民主化也解放了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力量。他們既然無意再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整個聯盟自然分裂。反之，中國經改成功，但各種社會問題積重難返：官員貪污腐化、公權私用，整個社會綱紀敗壞，道德淪喪，工商企業弄虛作假，官商勾結，正義不能伸張……種種問題都因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日趨多元而變得十分尖銳，但政改步伐仍是原地踏步，單靠「妥協、中庸」等傳統價值，如何解決這眾多難題？

因此，蘇聯崩潰後，蘇東陣營的「大爆炸」(big bang)策略，一下子令計劃經濟爆破，從零開始建設新社會，並不是太壞的選擇。蘇東陣營是把舊有的斯大林政治體制(一黨專政)及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徹底打碎，並在廢墟上建立全新的民主政制及市場經濟。儘管在舊體制擊碎、新體制未建成之時，人民要承受莫大的痛苦，但逐漸可邁向康莊大道。反之，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廈，儘管已是千瘡百孔，但中共領導人認為大廈結構基本良好(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不成問題)，只需引入市場機制，把經濟搞上去，「大廈」的各個瘡疤自然會逐步清除。可是，若大廈結構(即一黨專政的本質)出問題，修修補補的改進工作，又焉能使這座「社會主義大廈」長治久安？若公權力嚴密控制在黨的手上，但它卻沒能力去解決社會經濟轉型的各種問題，威權主義若沒法讓社會不再「爛下去」，所謂「拉丁美洲化」的情況就會在中國出現！特別是目前的經濟體制加強了官僚和政府的「尋租」行為，使高級幹部

和權貴子女在掌握政治權力之時還獲取經濟力量，加劇了社會不公，並使改革特別是政治民主化更加困難。^[2]

「先經改後政改」是中共領導人引以為傲的傑作，不過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卻有另一番論調。他認為若中共沒開展政治改革措施，經濟改革根本不會發展得那麼順利。他強調：「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提出改革的任務，就在於當年的真理標準討論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圍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只要讀一讀鄧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實是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就可以體會到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動下起步的。……在中國搞改革開放，搞現代化，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動民主也是不行的。……30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每推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也深化一步，從來沒有停止過。當前正在實施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具有這一特色。」^[3]

其實李君如所指的是一些推動（經濟）改革的政治指導原則，但這和最終達到民主化的具體政治改革措施完全是兩回事。毛澤東時代結束，人心思變，倡導改革當屬重大政治決定，但總不能說這本身就等同於政治改革，當然同時期鄧小平也提出政改及民主化的必要性，在當時來說的確十分難能可貴。

內地另一位學者王邦佐，則乾脆認為「鄧小平的原意是強調開展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改革應該互相依賴，互相配合，而不是在比較兩種改革孰快孰慢。再以邏輯思維來看，既然經濟體制改革如此依賴政治體制改革，既然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不是恰恰證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功績嗎？……如果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上層建築束縛經濟基礎的發展，怎麼能夠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呢？為什麼要把功勞僅僅歸之於經濟方面而把問題通通放在政治方面而將兩者割裂開來呢？」^[4] 這段論述只是說明沒有政改何來經改，但鄧小平作出開放改革的「政治決定」，並不意味着政治體制改革即同步進行。事實上，專制政權若政策得宜，又能維持基本社會穩定與政治秩序，的確可促進經濟發展。但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多元及利

益衝突，肯定會對政治現代化作出呼喚。因為專制性質的一元統治，終將難以配合多元社會的需要。

先法治後民主說

政治改革，民主化並不是首要目標，若中國達致法治，即可長治久安，這是北京大學學者潘維的主要觀點。潘維對新加坡及香港兩個小型華人社會「情有獨鍾」，並據此總結出「諮詢型法治體制」的六大支柱，也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六大支柱是：中立的文官系統，自主的司法系統，獨立的反貪機構，獨立的審計系統，以全國和省人民代表大會為核心的廣泛的社會諮詢系統，受法律充分保護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5] 潘維對西方民主以「十字軍」姿態出現，十分反感，認為民主「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宗教」^[6]，民主全能、「民主迷信」迷惑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潘氏強調只要達到諮詢型法治六個要求，中國即可建立比民主制更優越的法治政體：

- (1) 強調「法律」做主 (rule of law)，拒絕「人民」做主 (rule of people)；
- (2) 強調法的正義性；
- (3) 嚴格執法，刻意增加立法難度；
- (4) 限制政府的職能和規模，造就有限政府；
- (5) 強調政府行為透明；
- (6) 追求符合中華傳統的秩序和自由。^[7]

對於一個國家能否政治清明，公平與正義能否受到伸張，潘維確認法治至高無上的價值。但香港在殖民地時期享有完善的法治與自由，也的確源於英國本土民主制度的保障。潘維說「把民主說成法治的條件反映了民主迷信的風行」^[8]，實際上並不是迷信，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歷史上不乏專制政權因執法公正嚴明而天下大治的經驗，但如何保障下一個專制政權也能夠同樣厲行法治？若專制政權性質不變，人民福祉只能聽「天」（子）由命，國家

無法不陷入治與亂的循環。民主制度就是要確保台上的統治者儘管不能永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至少不能胡作非為，並按照已訂立的規章制度辦事。若缺乏民主條件，很難想像潘維上述的六大支柱及六大條件能夠茁壯成長。

新加坡雖有形式上的英式議會制度，但掩蓋不了李光耀專制統治的本質。李氏家族基本控制政經司法各個制度，但紀律嚴明，正是專制統治也能達到人民安樂的絕佳例子。不過新加坡雖厲行法治，但言論結社等自由依然有限，法律的公正與正義性也未能完全做到，與政府及執政黨有關的政治官司，政府總是贏家。^[9] 問題是將來進入後李光耀時代，同樣的專制統治能否維持嗎？又是否會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如何保障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後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正是任何專制國家在英明君主過去之後遇到的問題。

漸進式政治改革及黨內民主說

多位內地學者都認定民主進程不能緩進也不能急進，最好是推動能照顧到中國國情的「漸進式民主」。山東大學學者徐艷玲反對「民主緩行論」，後者認為民主政治建設不宜急進，原因有三：一是中國民主建設的經濟文化條件不足；二是人民民主素質低；三是民主政治影響社會穩定。^[10] 徐氏肯定民主是一種擇優、糾錯和制衡機制，而民主化過程中帶來的「動態穩定」總比透過政治高壓帶來的「靜態穩定」為佳，可是，徐氏提出的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順應中共官方提出的主調，特別是關於黨內民主的論述。儘管中共官方論調也擁抱民主，但他們的確考慮到上述「民主緩行論」的三大理據，因此希望在西方民主模式以外另闢蹊徑，而漸進式民主建設，並從黨內民主開始籌劃，已被視為當前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仍然存在為數不少由共產黨控制的國有企業。它們雖然要在市場「競爭」，但其「黨營」或「國營」性質，也意味着國家公權力的行使；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統一」，使它

們立於不敗之地，更何況這些大型國企都在各行業處於龍頭的壟斷地位。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由「黨領導」，也就很難想像，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不是以黨為中心。有論者曾指出，基層民主的村委員會選舉，不過是一種「烏籠式民主」，因為選舉是由村黨委佈置主持，上面還有鄉政府，鄉政府是政權組織，但村委會則否。這種「指導式民主」並不是民主，正如烏籠選舉並非真正選舉一樣。這樣的「民主建設」，不啻是設計出一套由「黨領導的民主政制」，令人質疑它是否真能帶來民主的各種制度化建設。正如黨國干預市場，市場便難以妥善運作一樣，黨領導下的民主，是否真能賦與人民多種政治選擇及保障人民各種權利？

中共當前炙手可熱的理論家俞可平，強調中國的民主政治，首先要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並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11]前者由「核心到外圍」，後者則「由下而上」推進民主。俞可平認為，完善黨內民主制度：「重點在於改革黨內選舉制度、黨內監察制度、黨委的議事制度和決策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務公開制度。」^[12]他並指出，踏入21世紀之後，中共已開始試行「黨內監察條例」，普遍推行重大事務的黨委票決制，黨政領導幹部競爭上崗制度在更大範圍內推廣。^[13]至於高層民主，相信是指「執政黨依法執政與參政黨依法參政結合起來」^[14]，其實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八個民主黨派（參政黨）過去數年在「中國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15]，似乎顯示出在中共理論家心目中，在黨領導下民主黨派更多地參與政治事務，也是「民主政治」的體現！

從概念以至實踐，一個政黨內部是否民主，和國家政治體制民主與否並無任何關係。一位開明君主當會廣言納諫，勤政愛民，但這不能掩飾政體專制的現實。開明君主如何卸下權力給人民，沒有外在的壓力恐怕難以達致。開明君主願意為人民服務，和他是否樂意接受一個由人民賦與權力的新制度，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說，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ism）的體現，即統治者（黨）也受到憲法的約束，中共黨內實現民主如何過渡到國家體制的民主化，相信沒有人能夠找到邏輯的必然性。正

如內地學者余明指出：「政治權力的集團性壟斷和社會各利益主體缺乏最為基本和公平的博奕，是目前中國社會最大的風險因素。」^[16]而民主體制則為公平博奕提供了場所。

事實上，誠如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強調，黨內民主難以行得通，「因為變革不可能從控制最嚴的地方開始……因為任何改革都不會從自己有效控制的地點開始，改革只會出現在權力控制薄弱的地方，不會出現在控制最嚴的地方。……黨內民主……只能是在壓力累積和控制衰減的結果。」^[17]很難想像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是由黨員普選產生；即使要徵詢七千多萬黨員對黨改革的看法，並且還要達到共識，已不是易事，更遑論過渡到一個民主政黨的艱巨工程。

民主化會令到多民族國家分裂

有論者認為，「從前蘇聯等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化很容易導致多民族國家的分裂。中國如果要避免這種情況，國家權力必須隨着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而得到強化，而非弱化。」^[18]這個論點有兩個涵義：一是民主化的過程要十分慎重，政治改革搞不好會亡黨亡國；二是民主化不能弱化國家權力。中國正在崛起，對內對外都需要國家強大，政制民主化若弱化國家權力，不如把過程拖慢，漸進式民主因此是必然出路。

可是，蘇聯及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國家分裂，並不是民主化的結果。這裏所謂的「多民族」，指的是多個「族裔」(ethnic groups)，它們原本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內。蘇聯、南斯拉夫與中國一樣，都是一個「民族」(nation)，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儘管這個「民族」包含有56個族裔。這多個族裔凝聚團結在「民族」裏，絕非易事。「民族」需具有某些「高超的原則」或是精神價值，超越各大族裔在文化、歷史、語言、宗教、傳統的分歧，使各大族裔都甘於留在中華民族，並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為榮。蘇聯和南斯拉夫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並沒有妥善地建構這些「高超原則」從而成為民族團結

的紐帶，他們依靠的是空洞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政治高壓。當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倡議下實現民主化，意識形態幻滅之餘也廢掉了政治高壓，各族裔的民族主義力量乘時而起，蘇聯當然分崩離析。如果沒有民主化，蘇聯可能依然存在，但是要維持聯盟的完整性靠的還是政治高壓。與其說民主化是蘇聯崩潰的起因，毋寧說蘇聯共產黨七十多年的統治中，並沒有好好建構民族團結的紐帶。如果有的話，各族裔只會緊密凝結團結在一起，而民主化能賦予人民與各族裔各種權利，又何足懼哉！民主與聯盟內各族裔的團結並不排斥，不是有了民主大家便趁機散伙，關鍵在於「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過程，是否成功建構凝聚各族裔的「高超」精神價值。^[19]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何去何從？

鄧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政治改革，源於毛澤東晚年權力過份集中帶來連串的慘痛教訓，鄧氏壓根兒不會想到一黨專政所能帶來的弊端，更不會因此推論到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

政治權力關係，最核心的問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但中共領導人從不認為黨與人民如魚得水的關係出了什麼問題，大多數黨幹部為人民服務，但因政治體制不盡完善，個別幹部濫用權力貪污腐化固然不足取，卻無損於大局（黨領導一切）穩定。伴隨着社會多元化衍生的各種社會矛盾，中共不得不嘗試深入探究政制改革的可能性。

要着手處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課題，首先必須要釐清政治現代化的系列問題。政治現代化是否一定意味着國家體制走向民主化？而民主化又是否意味着要取消一黨專政？對西方人以至移居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來說，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但中共領導層則避免使用「政治現代化」一詞，因為現代化蘊涵着從「落後」到「先進」的意思，中共不認為自身的體制「落後」，又何須「現代化」？只是體制存在某些不太適合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弊端，須要

「改革」就是了。中共理論家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民主，但民主化過程和一黨專政並不排斥。曾經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就明確指出：「不追求民主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追求民主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20] 因此，統治集團當前殫精竭慮要考慮的是，如何在肯定一黨專政的大前提下推行及實現民主。

對江澤民來說，「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成功，關鍵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看能否增進各族人民團結，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21] 要達到這些結果取決於政治現代化，關鍵在於下列四點：

- (1) 如何令掌有公權力的官員幹部不濫用權力、化公為私？
- (2) 如何建設高效能而又廉潔的各級政府？
- (3) 如何保障人民各種權利？
- (4) 如何領導社會道德文明重建？

當前黨不獨壟斷權力，連人民可以享受多少權利也由黨決定。朱鎔基總理曾提倡「小政府、大社會」，但小政府指的不單是規模，而是盡量減少職能，是制訂規範讓私營部門（大社會）公平競爭及全面發展。可是當今的各級政府仍是「大有能」，這是一黨專政的必然結果，若政府「小」了，黨的「用處」自然減少。國家機器強而有力，改善公共權威，增強國家能力，似乎是今天中共理論界的主調。但在一黨制下追求國家強大，又將如何影響政治民主化？

學者楊光有一個饒有意義的觀察，他說「中國所有最嚴重、最緊迫的問題，所有久拖不決無法破解的難題……都多多少少可以歸因於政治體制改革遲滯。……凡是中國解決得比較快比較好的問題，幾乎都是不涉及現行政治體制變革的問題；凡是必須通過改變現行政治體制才能夠獲得解決的問題，最終都因為政治改革的缺席而成為老大難問題。」^[22]

筆者同意美國學者Edward Friedman的分析^[23]，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溫家寶，中共領導人的理想，是走向「新加坡模式」，因為這是「管」得好的典範。^[24] 權力集中，執政黨不容挑戰；自上而下建立社會秩序、領導經濟發展（新加坡政府不同階段都會選擇一些「有前途」的「關鍵工業」去投資，帶動全國經濟發展）；政府廉潔有效率（儘管不太透明），並提供良好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制度；人民享有相當自由，但言論、出版、結社等權利則受到政府的嚴密監管，即使宗教自由也受到約制；人民有異議盡可能在「體制內」發表，而不應在體制外透過反對黨發出抗議，從而作出對社會「不和諧、不團結」的舉動。是以新加坡雖容許反對黨存在，但各大反對黨（工人黨、民主黨）在任何行動（動員民眾、宣傳教育、示威抗議）都舉步維艱，而且屢受執政當局的滋擾，特別是法律訴訟。新加坡雖承襲了英式議會民主，人民享有普選權利，但放在一個「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背景中，阻止不了「一黨獨大」的現實發展。新加坡雖有法治，但涉及政府的政治官司，法律界都質疑司法機關的公正性，因為政府總是贏家！人民行動黨領導國家，也主導整個社會的前進方向。

很難想像中共會接受西方的多黨制模式，而人民行動黨領導新加坡政府的「卓越」表現，中國領導人必然深有感觸。當前內地學術界一個流行的名詞是「良治」（good governance），如何在現有政治體制及維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現「良治」，新加坡的經驗教訓能否借鏡？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該如何開展？

已故美國學者Michael Oksenberg曾指出「軟民主」（soft democracy）的看法：「中國很可能採取自上而下，指導下的漸進的『亞洲模式』……有足夠的參與者和競爭來美化『民主』的標籤，但尚未達到堅實的民主深度……在大多數（亞洲）案列中，領導國家的是強有力的領導人、統治地位的政黨、帶領經濟前進的強大官僚機構、強大的軍事機構及家族勢力。」^[25] 所謂「亞洲模式」，見諸過去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國家與地區在戰後的發展，西方人的名詞是crony capitalism，台灣人發明的名詞是「黨國資本主義」^[26]。

這些政體形式上具備西方民主的制度安排，但執政黨長期控制國家機器，並使反對黨難以壯大，又駕馭具壟斷性質的黨營（國營）企業，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集於一身，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受到壓縮，黨國約束人民自由，在必要時還會實行政治鎮壓。

當前中國缺乏的是那個形式上的西方民主政制，更易於令中共向「黨國資本主義」的過渡。黨不獨控制國有企業（所有關鍵工業），成功的私營企業家還被招納入黨。2001年7月江澤民號召資本家入黨，已拋棄過去意識形態的藩籬，共產黨希望發展成「全民」（national）政黨。這個「政治收買」或「政治吸納」的做法，同樣延伸至知識分子。社會各界精英結盟，使共產黨逐漸遠離工人農民。^[27] 據美國學者Bruce Dickson估計，企業家當中有30%已入黨，而全國人民當中只有5%是黨員。^[28] 共產黨演變成全民精英黨，改革前中共政治經濟權力固然集於一身，改革開始後私營企業興起，企業家入黨以及黨幹部成為企業高層，使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結成的神聖同盟更形鞏固。中國的貪污腐化，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正是因為這種結構性的因素：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表面上可以區分，公營機構理論上是為所有私營機構及個人服務，但黨控制一切的格局，自然使得官商勾結、公私不分的現象難以解決。正如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台灣，黨國利益輸送是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不過台灣還有形式上的西方民主體制，待蔣經國在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當人民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權利，鞭策及監督統治者，這種所謂「軟民主」體制才能轉軌到正宗的民主體制。

可是，一黨專政不容挑戰，政治改革如何開展？2007年10月，中共中央黨校發表政治改革倡議報告，強調若民主改革停滯不前，中國將走向不穩定。報告建議包括：

- (1) 限制執政黨的權力；
- (2) 黨也要受法律約束，厲行法治；
- (3) 各級人大應由人民選舉產生，因為它們是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

- (4) 全國人大人數減少（目前有3,000代表），並有更大的權力影響、審訂及審計政府財政預算；
- (5) 制訂新法律，保障新聞自由。儘管政府監管新聞發佈仍有必要，但不能任意審查及禁止出版；
- (6) 尊重宗教自由，因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並不排斥。^[29]

這份報告已提出改革的一些端倪。首要問題就是要搞清楚黨在急劇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角色與定位。即使黨的絕對權威與地位不容挑戰，我們相信政治改革仍可邁開步子。

關鍵在於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即使黨依然領導政府及議會，但容許人大享有全國人民最高權力機關的名與實，全面賦與人大立法權與監督權，讓其「法權」高於「黨權」，那黨的作為就會受到高度約束。正如內地學者王邦佐說：「黨的領導必須在憲法與黨章規定範圍內行使權力，黨的權力不得凌駕於憲法之上。」^[30]若全國人大代表都由選舉誕生，更能加強其全國人民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威性。至於政府，應取消過去那種「大有為」的無事不管形象，而演變成「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也就是朱鎔基所講的「小政府」。「良政」或「良治」意味着政府要提供最好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即搞好最基本的醫療、教育、房屋及基本建設，制訂清晰的市場運作遊戲規則，讓各經濟體大展拳腳，執法則要公正嚴明。當然政府也要尊重以至保障人權。比如2009年3月兩會開會，四川省領導人仍不願承認，2008年5月地震期間，是政府的豆腐渣學校工程導致大量學童死亡，他只歸咎於地震的超強度。中共領導人經常強調生存權是人權的基本，豆腐渣工程使小孩無法頂住地震，生存權也失去了，政府無法保障其人權，甚至是間接剝奪其人權的始作俑者，但至今拒不承認責任，又怎能怪家長都遷怒於政府？

人大「升級」、政府「有限」、司法機關則要真正享受司法獨立，才能發揮其維護社會公正、伸張正義的巨大作用。當今的所謂司法獨立，實際上只是「法院司法獨立」，法院不錯是獨立判案，但法院內有黨委，法官判決實際上還是黨委決定。真正的司法獨立不容黨的干預，始能建立司法機關的權威性。

體制內的問題還有地方及基層政府。現今上情不能下達，中央政府的良好政策，落實到基層就變了樣，關鍵在於「吃皇糧」的基層政府幹部太多，^[31]但他們卻不受地方老百姓監管。現今實現的所謂基層民主，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並不是政權組織。它上面有鄉政府，這個鄉政府應由選舉產生，鄉以上的縣政府也應由選舉產生，真正實現基層自治，老百姓的生活及地區發展的命脈才更有保障。

體制內的另一個問題是新聞自由。大眾傳播媒介是黨的宣傳工具，還是人民的喉舌，至今還是眾說紛紜。其實黨的機關盡可保持其宣傳機構，向大眾宣揚其政策，但也應容許高度的媒體自由，讓大眾抒發其心聲，下情得以上達，才能使人感到心情舒暢，把不穩定的根源消弭於無形。

至於體制外的發展，關鍵在於能否容許社會組織獨立自主地存在。集會結社的權利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是約束執政當局不可胡作非為的最有效力量。馬克思早就以「國家控制社會」，轉化為「社會控制國家」的格局，作為民主化的分野。強大的公民社會透過民主機制主導國家，才能使後者好好地為社會服務。

最後一個改革議程，就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土壤。當前中國的政治文化，既受到傳統中國鄉土政治文化影響，繼而經過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的薰陶，又經歷開放改革時期意識形態與道德真空的瘋狂歲月，如何在尊重本國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實行精神文明的重建，讓人民懂得尊重異己的重要性，既是建設民主所必須的土壤，也是推動民主發展的精神力量。

結論

鄧小平對中國的民主前景相當樂觀，他在1987年曾表示，中國在2050年左右可以實行普選：「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

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32] 23年轉瞬過去，中國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原地踏步，今天距離2050年就只有40年，白駒過隙，下一代中國人可以普選國家領導人及人大代表嗎？

看來已沒有人記得鄧小平這個承諾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還找不到一個突破口。許多人依然擔心，民主化會導致民族分裂、或是國家弱化，而中國高速發展之時正需要國家強大及民族團結。但畢竟中共也沒法否定民主的普世價值，溫家寶總理就不止一次肯定民主、人權、法治等來自西方的價值觀的普世意義，不過具體做法就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這是抽象地肯定源自西方民主的價值，實踐上則否定西方的做法。那末，適合中國國情與文化的民主模式，又是怎樣的呢？

中共一批退休高幹，在晚年時紛紛著文推動民主改革。^[33] 他們的「利器」是以馬克思經典著作論證民主的必要性。杜光指出，馬克思對民主的認識深刻明確：「民主是人的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首先是在國家制度上的表現。……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34] 民主意味着「社會控制國家」。人民制訂憲法，憲法的權威性至高無上，憲法民主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把黨權置於法權（人大）之下，或許是政改的突破點。

至於黨內民主與村委會選舉，不能看成政制民主化的起步，二者看來頗具裝飾意味，後者更美其名為「基層民主」，其實村委會並非政權組織，同級還有村黨委「領導」，上一級的鄉才是政府行政區域的最基層。若要實行基層民主，鄉政府以至上一級的縣政府由選舉產生，方能起到管治上的根本改變。

鄧小平的2050年實行普選說不應視為戲言，難道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華誕的時候，我們還能接受這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嗎？

註釋

1. 參看中央黨校研究室課題組，《從經濟發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2006年6月15日，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286。
2. Robert A. Pastor，《中國實行民主的途徑》。Pastor原是美國卡特中心中國農村選舉項目的負責人。參看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72。
3. 李君如（2008）。〈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勢〉，《江海縱橫》。5期，24-25頁。轉載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八特點與三大走勢〉，《北京日報》〈2008年9月8日〉。
4. 王邦佐（2003）。〈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和發展路徑〉，《政治學研究》，2期，21頁。
5. 潘維（2003）。《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36-42頁。另參看何增科（2004）。〈漸進政治改革與民主的轉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3、4期。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97。
6. 潘維（2003）。《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10頁。
7. 同上書，42-44頁。
8. 同上書，51頁。
9. 新加坡最大的律師行，其主持人正是李光耀夫人。
10. 徐艷玲（2007）。〈走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觀念誤區〉，《科學社會主義》。1期，66頁。
11. 張伯匯（2009）。〈民主化〉。載於羅金義、鄭宇碩編，《中國改革三十年：變與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15頁。
12. 俞可平（2008）。〈中國治理變遷30年（1978-2008）〉，《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期，6頁。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6765。
13. 同上，4頁。
14. 李君如（2008）。〈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勢〉，《江海縱橫》。5期，25頁。
15. 同上。
16. 余明（2006）。〈淺論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6期，92頁。
17. 劉軍寧，《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抑或憲政民主？》，載於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網站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946。

18. 鄭永年 (2001)。〈政治改革與中國國家建設〉，《戰略與管理》。2期 (總45期)，17頁。
19. 國內學者王懷超 (中央黨校) 也不認同蘇東劇變是政治改革造成的。他確認蘇聯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出於蘇聯領導集團無視時代進步和生產發展的要求，無視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長期堅持僵化的舊體制包括政治體制，致使長期積累的眾多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總爆發的結果。這個觀點可說是一矢中的。參看王懷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4年〉，《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4月22日〉。轉載自人民網。
20. 張伯匯 (2009)。〈民主化〉。載於羅金義、鄭宇碩編，《中國改革三十年：變與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14頁。
21. 江澤民 (2002)。《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303頁。
22. 楊光 (2004)。〈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當代中國研究》，2期。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38。
23. Edward Friedman (2009). "China: A Threat to or Threatened by Democracy," *Dissent*, 56(1): 7-12.
24. 筆者1985-86年間在新加坡工作，當時該國對中國剛「開放」，之前因為政治原因，反共的新加坡政府嚴拒中國旅客入境。我有機會碰到新加坡立國以來首次接待的中國學者。有一位學者也曾到過香港，我問他如何比較港新兩地，他很客氣地說兩地都好，我說總有分別吧？他略加思索後即說：「香港是搞得好，新加坡是管得好！」前者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後者則是由上而下「管」出來的。我問他喜歡哪套模式，他說還是「管得好」比較穩妥。似乎紅旗下長大的人，還是較為傾慕李光耀的「威權主義」。
25. 轉引自Robert A. Pastor，《中國實行民主的途徑》。參看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72。
26. 陳師孟等 (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澄社。
27. 吳國光，〈政治改革、政治鎖壓與政治吸納：中國政治發展及其挑戰〉，2006年2月23日，見<http://blog.yam.com/philosopher100/article/5728491>。
28. Bruce Dickson,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The China Program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9 January 2004. Transcript by Federal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D.C.
29. 該報告長達366頁，可參見Chris Buckley (2008, February 18). "Elite China Think—Tank Issues Political Reform Blueprint," *Reuters*.
30. 王邦佐、謝岳 (2001)。〈政黨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演進邏輯〉，《政治與法律》。3期，7頁。
31. 參看中央黨校研究室課題組，《從經濟發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2006年6月15日，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286。

32.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20頁。
33. 較著名者包括李銳、胡績偉、李普、何方，還有已逝世的李慎之、王若水、何家棟等。《炎黃春秋》是他們的輿論基地。
34. 杜光（2009）。〈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炎黃春秋》。1期，6-7頁。

第三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 「中國特色本質」

洪清田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研究員

引言、命題

開放改革30年和「六四天安門事件」20年以來，中國的民主化表面停滯，沒有體制上的進步，民主訴求及民主化課題由外國到中國、由官方到民間，不成為主題，少人提；少數微弱的官方內外民主理念、訴求及討論被官方和民間自發的「反民主、反自由」風氣中和及反制、圍堵和清剿。

實際上，改變和成績不少，但都是在最基本、最廣闊的根本層面，本質上改變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為民主和民主化廣積實力，等待再出發。

單就黨政軍官方的宣稱觀點和立場而言，30年來已大不同。

30年前，現在通用的「民主」概念和名詞，是資本主義形式民主，中國奉行的是馬恩列毛的「實質民主」，超越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

20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不分、不論什麼牌子的「民主」，都是全國全民禁忌，「民主」等同文革的打砸搶「大民主」。

現在，官方不分、不爭論什麼牌子的「民主」，龐雜認同「民主」和自由、人權、法治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中國20年前「六四」以軍隊鎮壓北京和各地的反貪反官倒的民主運動，和現代社會普世價值和正常行為背道而馳，激起中外全球義憤，法國總統斥為Crime against Humanity。那二三年，全世界在猜，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重採自閉的鎖國國策，縮回絕對權威的封閉體系，像現在的南韓和緬甸。

吊詭地，中國這20年，可能是200年來年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單一制政體第一次有機會長期穩定發展而又走上普世路線走對了路的。

鄧小平似反思「六四」悲慘劇，知「永不翻案」擋不住歷史人心，設法拼命補償，選擇性跟隨「六四」的部分訴求，超出「六四」的想像，比「六四」更「六四」。他似從另一個方向和毛澤東晚年一樣，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夙願，九二南巡，使開放改革真正不可逆轉。20年來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單一制政體總體而言算是規規矩矩接受和遵循外面世界的路向和標準，取得成就，創出奇跡。

然而，歷史不大可能全是直線的，也不是誰設計的，而是人、人、人和大自然正正反反有緣有故、無緣無故的交叉感染和碰撞、交流和融會。

20年來的「中國奇跡」，也為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單一制政體的「以我為主」提供條件，為民族優越論提供佐證。

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單一制政體開始對目前狀況和處境不耐煩、不高興，不再規規矩矩做人，要決定世

界的路向和標準，取得更大的成就，進一步維護民族尊嚴、「以我為主」和民族優越論。

中國不走回頭路，沒有「返祖」重回絕對權威的自閉體系，開放改革上快速公路，形成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千百年不變、200年來之不得的「具中國特色」的「無限開放、無限封閉的絕對權威體系」，近似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

中國鎮壓「六四」的反貪反官倒的民主運動後，加大力度和幅度開放改革，使內地經濟上引進來、走出去，和外面世界接軌，對香港則相反，在基本法頒佈前加大力度和幅度收緊港人自治範圍。

六年前香港的「七一」50萬人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後，中央「軟更軟、硬更硬」，中國（由中央到地方）對香港全面「以我為主」，政經、社會、文化、教育各層面全方位巨細無遺「以我為資源和主體，以我為座標和路向」，加大力度和幅度介入港人自治範圍，但也給出一個有條件「隻普選」的時間表。

在主導、主宰香港（類）現代的運作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中國（由中央到地方）、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單一制政體也必然在香港接受香港和世界按現代社會普世價值和正常行為為標準的檢驗。

民主的歷史轉型（歷史的民主轉型）艱難，但現在中國可能比三、四百年來由西方到全球各地的歷程合理。

「民主」和「民主化」是「政治」的事，但中國沒「政治」。

中國200年來要學的，不但是民主、自由、科學、科技、人權、法治、經營、管理，還要學政治、行政、管治。中國有「中國天下」、「中國教」和「中國秩序」，中國不單沒「政治」，中國也沒「社會」，沒「人」。中國、中國人的「民主」和「民主化」，如中國、中國人學登月，比學登月更難。學登月有客觀的目的、方法和標準，人人接受和認同，高低是非、行不行，不會各說各話，各搞一套。

學「政治」、「民主」和「民主化」，可以各說各話、各搞一套，沒完沒了。

中國民主化的難，難在技藝是其次，最難是中國只願學上太空和探月，不願學「政治」、「民主」和「民主化」。

中國民主化是中國文化基因圖譜的重整、重編、重構（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再造一個新「人」、一個新「組織」、一個新「群族」、一個新「政府」、一個新「政黨」、一個新「中國人」、一個新「精英層」、一個新「社會」、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民族」、一個新「文化」、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人種」、一種新「人類」。

百多年因鴉片戰爭割出去、走出去的香港，無意間扮演了一個中國現代化的角色。自從97香港前景問題出現以來，30年來香港、香港人、香港社會為本身的生存迫中國回到政治、民主的正式起點再向政治化、民主化出發。

中國百多年如肯、願學西方時，必加入「中國特色」：用中國思維看西方，把西方新生事物「工具化」、「物化」、「去精神化」，當作秘笈和符咒，學「民主」和「民主化」一如學科學，片面學簡單因果關係，不學完整的正反自由互動均衡秩序和自覺自制謙卑，初見成效，便忘其以，自我（Ego）大膨脹，要「以我為主」，超越西方、他者和自然，要完美、完整；以「量」無限直線推衍，誤將「量」作「質」。

對民主和民主化，中國一如對西方、科學、經濟，先是恐懼，不久是鄙夷，不屑一顧，一下子要「實質民主」。文革直接和法國大革命銜接，「大民主」大失敗。30年的開放改革仍走不出文革「大民主」的陰影。

20年前「天安門民運」是民主化的「兩點之間直線最長」（有目標有方向、有心有意無知），20年來反「天安門民運」之路是民主化的「拉布」（沒目標沒方向、沒心沒意無知），但終逃不出歷史的五指山。

21世紀中國繼續百年兩難：民主化和不民主化？民主化或不民主化都可能走上的正路和歪路，21世紀是中國的抉擇時刻。不論中國往何處去，內外千百年舊習和百年新因素對中國走向正路和歪路，都必有正和反的作用。中國必須的民主化和現代化，是中國秩序的重整、重編、重構（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也是世界秩序的重整、重編、重構（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

「中國性」（Chineseness）文化基因圖譜

「中國性」（Chineseness）的文化基因圖譜，由「中國天下」、「中國教」、「中國秩序」、「中國權力核心」和「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合成的「中國政軍道統」，「天上多元神、地上單元權」由皇帝一個「絕對自由人」上承於天，貫通；皇帝擁有、主宰、關照、統攝、代表天下和天下萬民，天地人合一，「或然＝已然＝應然＝必然＝自然＝實然」。

「中國天下」、「中國教」和「中國秩序」、「中國權力核心」和「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的形成過程：

- (1) 中國與其他農、牧、漁業，原始宗教、社會和文明，多元的世界觀和自我意識並起，各自為主、自我中心。
- (2) 五千年前文字發明，以線條簡約的象形符號文字（ideogram）一直以來保持。理性化文字符號和總體性（holism）非文字的表達方式（如嚎哭、呼叫、歌唱、音樂、繪畫等等）共存。
- (3) 三皇五帝開始轉向文字文明（文字凌駕非文字，形成中國的「文字文明」、世界觀和自我意識，以我為主、自我中心的社會和文化早熟、完整和鞏固。詩是文字和非文字的橋樑，春秋戰國的古中國是「詩的國度」）。

- (4) 多元文明單元化而成「中原」：春秋戰國文字成熟，百家興起，各家各派的多樣性中的同質同向（維護人神接壤的原始宗教意識和意義，千方百計由內心和外力強化由上而下的專制極權）。
- (5) 同期古希臘的另一發展方向（個體化、民主化、世俗利益化、由下而上和上下對流的意識及知識），後來西方繼續，千方百計尋求「人」的解放和自由自主，並推向全世界。
- (6) 「中國道統」的人本主義：極上和極基層的權力、意識和知識合成「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形成如水如氣如流的虛軟紐帶，浸淫、統合和消化一切矛盾，一體同化，完整完滿和極致的自主自由「實體」；極上和極基層人人在「實體」中各安其位、安身立命；這完整完滿和極致的自主自由「實體」不變不可變，萬變不離其宗，成為無限大封閉體，吞噬一切，同化一切異質性和個體性。
- (7) 「中國天下」、「中國教」、「中國秩序」：「天上多元神、地上多元權」。
- (8) 「天上多元神」與「地上多元權」的溝通和交替（天人合一）：皇帝上承於天，是天人之間唯一溝通紐帶，人兼神職，形成單元的無限大封閉體的大一統「本體性」。
- (9) 單元的無限大封閉體的五層結構、形態和特性，及其存在正當性和合理性、長短優劣，轉化和更替（「中國天下和中國秩序」、「中國教」、「中國權力核心」、「中國意識和知識觀及精英層」、「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
- (10) 權力核心的五層基本結構、形態和特性，及其存在正當性和合理性、長短優劣，轉化和更替（類宗教性、軍旅、皇權、文化道德）；
- (11) 「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

- (12) 權力核心的五層基本結構之間各歷史階段的組合和關係，各歷史階段的形態和特性，及其存在正當性和合理性、長短優劣，轉化和更替；
- (13) 春秋戰國各家各派今天剩下儒和道，加上外來華化的佛，法家實存名亡，形成「儒表法裏」。
- (14) 權力核心的內外精英的關係，轉化和更替，從沒質疑或改動「天上多元神、地上多元權」，而是先驗神聖化。
- (15) 權力核心的內腐：皇權的五層人事結構（皇帝、宗室、外戚、宦官、權臣）、形態和特性，Claude Levi-Strauss所講的「野性哲學」的「野性堅持」的自然變質、轉化和更替。
- (16) 滿清立國時總結金遼蒙和入主中原和漢文化的關係的經驗，極力避免被漢人軟化和同化，集滿漢文化之「精、長」（滿人剛陽慄虐、漢人陰柔奸詐），強化皇權，單元的無限大封閉體和權力核心全於皇帝一人，遊牧的慄悍掠奪和小農的「儒表法裏」合成和劣質化；入關前因而成功，入關後開出康雍乾「盛世」，能秦皇漢武和孔孟所不能。
- (17) 康熙一人集滿蒙漢文化之大成，天縱英明，個人文化藝術和思想修養極到家，城府權謀極深，文治武功。乾隆繼之，60年由盛轉衰。康熙和乾隆能秦始皇所不能，實現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共同構想的「中國道統」（「中國天下」、「中國教」、「中國秩序」、「中國權力核心」和「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康熙和乾隆更能歷朝皇帝所不能，藉博學鴻詞科、南書房、文字獄和四庫全書，將整個「天下」/「天朝」轉化為文字、意識和知識和訊息。這是一個將物理時空的「天下」/「天朝」抽象化、概今化為超越物理時空的「天下」/「天朝」的過程，兩人獨攬，天下無人，訓古盛行。兩人實現了物理時空的「天下」/「天朝」的權力統治，更實現了超越物理時空的「天下」/「天朝」的意識、知識和訊息統治。中國「天下」/「天朝」也因而走到歷史盡頭。

中國沒「人」，只有「子民」/「中國人」：天下只有天子一「人」（馬克思講的「絕對自由人」），單一實體性，一人上承旒天，下保萬民；萬民集體生存，不可分為一個個有個人實體性的「人」，個人身體、思想、感情和財產、知識、意識不屬於個人；集體全民和個別子民全是天子私產，一切全由天子主宰；天子人兼神職，內聖外皇，全知全能、全德全包，為集體全民和個別子民供物質、精神的安全和歸宿，以及終極本體性的存在意義、文化身分認同和靈魂。

中國沒社會的「社會」（只有社稷）：中國單一實體性，沒有有個人實體性的「人」，天下只有天子一「人」，所以不成「社會」。由大量沒有個人實體性的「人」組成的集體稱為「社稷」，沒有有實體性的「人」、機構、體制和活動；任何「人」、機構、體制和活動一旦累積「實力」、「實體性」，即傾力壓制、消滅，形成反商、反智、反知識的傳統文化。

中國沒政治的「政治」（只有權謀）：政治是有個人實體性的「人」組成的「社會」中分配各種利益、資源及權力的方式、制度和程序，維持秩序。中國一切全由天子及其權力核心主宰和調配，利益、資源及權力是「等而下之」的技末；從屬於天子人兼神職控制的物質、精神的安全和歸宿，以及終極本體性的存在意義、文化身分認同和靈魂。實際運作以權謀、暴力、道德文化維持秩序。

「中國天下」、「中國教」、「中國秩序」和「中國權力核心」以原始宗教、文字文明、「天上多元神、地上多元權」人本價價、思想和道德，沒有現今觀念中的「政治」、「行政」、「管治」，沒「實體性」，全是奴，「經濟」也沒名份地位；更無論民主、自由、科學、科技、人權、法治、經營、管理。全不准有本身的實體性（可以自由意志、自由介入生活、知識和情理現實中，自主抉擇，從中形成和展現存在性和身分意識）。

千年變局——二百年未進入問題

鴉片戰爭帶來的千年變局，是皇權、權力核心、沒社會的「社會」（社稷）、單元的無限大封閉體全塌。

二百年來對西方、西學和普世「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的幾階段的幾種態度、幾種方式，全跳不出「以我為主」和「中體西用」，迄今未及日本明治維新對西方的開放、務實和理性態度。

民主這麼難，因為要由「君主」變「民主」，觸動文化基因圖譜，過程和後果未可知、不可料，可能真的、被認為喪命，魂飛魄散。中國不再中國，中國人不再中國人，中國社會不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不再中國文化，中國黨政軍道統不再中國黨政軍道統。

「魂」是「人」（集體人）的終極、絕對來歷、文化意識和身分認同。「體」有五種：中國教、皇權、權力核心、無；限封閉體、無人（個體人）社稷）。

中國200年來被迫面對「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和「價價、思想和道德，政治、行政、管治、經濟」，被迫學習，全視之為「體」與「魂」服和驅使的「用」。

現代化、現代性是「個人」、「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和「價價、思想和道德，政治、行政、管治、經濟」都各有「實體性」，按本身內在邏輯和規律運作，可能有別於「體」與「魂」的邏輯和規律，不為「體」與「魂」所「用」，即被「體」與「魂」的大一統、單一制視為「僭越」、「凌駕」、「分化」、「分離」、「顛覆」，傾「體」與「魂」之力，消滅於萌芽時期。

不單民主和化在中國為什麼這麼難，「人權、自由、工商百業、經濟金融、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也觸動文化基因，也難。

中國的千年未有大變局：建立「人」、「社會」、「政治」、「科學」、「法治」、「經濟」的實體性（可以自由意志、自由介入生活、知識和情理現實中，自主抉擇，從中形成和展現存在性和身分意識）。

中國的千年未有大變局：重新捏造一個新「人」、一個新「組織」、一個新「經濟」、一個新群族、一個新「政府」、一個新「政黨」、一個新「中國人」、一個新「精英層」、一個新「社會」、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民族」、一個新「文化」、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人種」、一種新「人類」。

中國200年未進入「千年變局」的問題：在問題遠近周圍徘徊，時出出入入問題，時而自造現實、介定處境，「以我為主」、「以我為現實」、「以我為標準」。

二百年來，中國面對西方、學現代化的科學、民主、自由、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法治，常加這種「具中國特色」的「前現代」添加劑。科學變（機械）學科主義，民主變實質民主、集體主義民主（民主集中制），自由變積極自由，社會主義變平均主義、均貧主義，唯物主義變（機械）唯物主義/唯心主義，法治變人治，資本主義變關係資本主義。中國自家有唯傾向的法家也變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奧運也變「俱具中國特色」的奧運。奶粉和債券還較有客觀標準，其他的科學、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唯物主義、法治、資本主義、法家欠客觀標準，更難，理論和實踐更糾纏不清。

中西比較——兩種「人本主義」和兩種文明形態及兩種政治形態

中西方二三千年來形成兩種「人本主義」。

中國的「人本主義」天人合一單元，地上反映天上形態和秩序，地上「道統」上承於天，「天」無言，堪（天）和輿（地）之術

溝通天、地、人，儒家以「人」為本位，求「聖」多於「神」、「仙」、「鬼」。

「中國道統」的「人兼神職」、早熟的單元人本主義。

西方「人本主義」是「神本」文化的現代化。西方是「人神分際」的二元論，「人神互動」，但人在生時永不人神接觸，世間由教義式宗教和教會控制，生存和生活是為來生後世作準備。「人本主義」從「神本主義」局部分拆出來，由人扮演部分宗教和教會的角色和事務，自主自決。

文明是人以人的局限把玩、玩弄 (tinker with) 本體性 (Ontology) 的過程和遺下的痕跡。

本體性是「人之為人、世界之為世界的最終、最本原絕對的因由和來歷，真實和規律貫通生活和生命的一切極微、極宏時空和人事」。

諾斯替 (主義) (Gnosis) 是「人在找尋生命和世界的來歷和意識、生存的意義和方式、改變現實生活和超越生死的方式」。

- (1) 諾斯替 (主義) 的驅動力來自「人慾」、「意識」和「知識」，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巫術、方士和邪教/宗教/哲學/科學/資本主義和唯物主義。
- (2) 這些階段以不同的方式找尋生命和世界的來歷和意識、生存的意義和方式、改變現實生活和超越生死的方式。
- (3) 過程中，人類 (個人和各種集體) 無不在tinker with存在的本體性，上下求索、窮究「人之為人、世界之為世界的最終、最本原絕對的因由和來歷」。在「人慾」、「意識」和「知識」驅動下，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大自然分分合合，生生死死，留下物質和精神痕跡。
- (4) 這些反反覆覆的過程和正正反反的成果，就是文明、文化。

文明、文化的驅動力來自「人慾」、「意識」和「知識」。巫術、方士和邪教、宗教、哲學、科學、資本主義和唯物主義對文明、文化的「人慾」、「意識」和「知識」各有不同處理方式。巫術、方士和邪教是「人慾」和「意識」結合的神祕主義，最接近總體性（holism）、感性美學，以非文字媒介表述為主。西方的宗教和東方的人生哲學系統從巫術、方士和邪教中掙扎出來，禁「人慾」、以「意識」和「知識」為主體建立永恒不變的人觀、世界觀、宇宙觀和神觀的體系，混融成一體，以文字及非文字媒介表述。西方的宗教比東方的人生哲學多用非文字媒介。西方的哲學從宗教經院和哲學系統中掙扎出來，以「知識」界定「人慾」和「意識」，建立人觀、世界觀、宇宙觀和神觀的體系，混融成一體，以文字媒介表述為主。西方的科學從宗教經院和哲學系統中掙扎出來，撇除「人慾」和「意識」，完全以理性「知識」建立變的宇宙觀和事物觀，以及分合轉化的規律。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人的解放」是個體人從政教合一中掙扎出來，身體、性格、人性、靈魂解放，以「人」為「主」，以「人」為「本」。

西方的二元人本主義是人和神的（自覺）博奕，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遍見5R；比較分清Natural Intelligence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國的單元人本主義是人和神的（不自覺）博奕，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遍見5R。不分清、分不清Natural Intelligence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視Natural Intelligence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一。

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和「價價、思想和道德，政治、行政、管治、經濟」全是西方的二元人本主義中，人以人的局限把玩、玩弄（tinker with）本體性（Ontology）、和神的（自覺）博奕所遺下的痕跡和工具。

面對問題，西方上上下下多元互動，官民自揭瘡疤，以知識面對、處理和解決知識產生的問題，一如以自由面對、處理和解決自

由產生的問題，以民主面對、處理和解決民主產生的問題。這樣不能完全、完美處理和解決全部問題，但可能是人類可以做到相對的最好的，此外是另一路向、方式和模式的。

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社會，就是讓更多的人以人的局限參與知識、經濟、政治和主權的公共事務的社會，全民一起進入未知。這樣社會給更多的人更多自由（知識、財富、民主、人權、資訊），但有很多相伴的風險、誤差和弊端，不能完全、完美處理和解決人類的全部問題。

「前現代」社會相反，由絕少人上承於天，人扮神，以血緣和時空親密度形成核心集體，應允天下絕對可以完全、完美處理和解決人類全部問題，為民謀福祉，但大眾不能參與知識、經濟、政治和主權的公共事務的社會（根本沒「公共」的概念），不能介入自己的生活（根本沒「自己」、「生活」的概念）。

民主是「民眾」/「大眾」代替以前有的極小權力核心：

- (1) 參與選出代表，掌握和行使各種公權和主持公共事務；
- (2) 參與決策；
- (3) 監督原有和新任的掌權者的行為；
- (4) 擁有公共財和整個社會，以及其公共體制；
- (5) 為體制、人員及公權力提供道德正當性；
- (6) 參與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和神（自覺/不自覺）博奕；
- (7) 民主是「民眾」/「大眾」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和神（自覺/不自覺）博奕的制度和程序；有道德正當性，但不一定有客觀正確性。

民主的兩重關：

- (1) 人進入未知面對兩重檢驗：客觀上、自然規律上是「對」或「錯」，眾人主觀感覺和認定（perception）上是「對」或「錯」。

- (2) 前者是「實質」(substantive)性的，不由「人」的觀感決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者是「人」的主觀感覺和認定(perception)決定和轉移的。
- (3) 兩者可以兼融合一、分歧或對立互斥。

西方民主不能「保證」處理好客觀規律上的「對/錯」和人的主觀感覺和認定上的「對/錯」之間的矛盾，只能以制度(system)和程序(procedure)提高決策質素。

中國以人為本位，「天人合一」：

- (1) 「感應、理想、想像、事實、情、理、主、客」不分；
- (2) 千百年一直是天下生活和「生存追尋」(Gnosis)由領導總其成，調配社會多層的一切體制，集中不分公私的權力和資源，帶領和發動全民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和神(自覺/不自覺)博奕；
- (3) 個人和集體一體，集體由一「人」(絕對自由人)總匯聚精，代神職；一人、人人和集體互相依賴共生；
- (4) 一人、大眾、全民明言或隱喻「保證」「永遠」「光榮、正確、偉大、神聖」；
- (5) 一人、大眾、全民自命哲學上和實踐上處理好客觀規律上的「對/錯」和人的主觀感覺和認定上的「對/錯」之間的矛盾，不會有矛盾。

中西比較——兩種「人本主義」、兩種文明形態和兩種政治形態的兩種歷史進程

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遷：知識和資源的擴散和倍增，內外精英的輪換和轉化(宗教革命、科學革命、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法治自由民主化)，以宗教、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向全球。

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個體性和世俗利益：多元實體性和新集體、新秩序。

- (1) 西方從政教合一中解放出來，宗教仍佔終極、絕對、永恆不變層面的位置，但讓出現實生活的政治和經濟、管治和行政的空間和實務，形成宗教和社會的二元性，二元互滲互濟。
- (2) 公共權力再分為立法、司法和行政。
- (3) 司法最接近超自然、神、上帝，任事者有特定條件，獨立判斷、自由心證，終身任職。
- (4) 立法是「全民」以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行使獨立意志，選出執掌和行使公權力的代表，決定重大政策和方向，任事者沒特定條件，有明確任期限制。
- (5) 行政由全民選出，執掌政府和行使公權力，和現實的日常生活關係最密切，任事比司法層面人員少特定條件，比立法層面人員較多特定條件，有明確任期限制。

西方捏造一個新「人」、一個新「組織」、一個新「經濟」、一個個新群族、一種新「政府」、一個新「政黨」、一個新「西方」、一個新「精英層」、一個新「社會」、一個個新「國家」、一個個新「民族」、一個個新「文化」、一個新「葡、西、荷、法、英、意、美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人種」、一種新「人類」；

蒙古衝擊西方，衝擊中國（漢文化）。西方回應蒙古、中國（漢文化）回應蒙古大不同。

中國「君主帶領全民回歸全知完整本體」5R模式的五千年歷史運作：到明朝內陷（蒙古對西方刺激，對中國沒有，更收縮內向專制，文字文明奸詐虛妄和原始宗教的愚昧暴虐）。

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迄今仍比較向「前現代」的集體主義路向、方式和模式。在最高層「前現代」的集體主義路終極原則和原理下，具體社會的實際運作是由上上下下、方方塊塊條條各成山

頭的單元主義，無制約專制極權，介入個人的一切，主宰和操控一切，也供應和保證一切。上上下下、方方塊塊條條介公私不分，專制極權和愚昧無能混雜，全沒相對客觀標準和方式檢驗，最後是唯上唯權，人、妖、獸、魔和神、聖不分，不可分。最核心最腐敗，單元單邊單向腐敗下去。

中國文化和猶太文化：猶太文化珍惜集體和個人的多元互動關係，處理好集體和個人的多元互動關係、穩定和發展的多元互動關係，可以以民主抗衡危機，一邊作戰一邊換總理。中國沒有、不稀罕和不要（處理）集體和個人的多元互動關係。

中國到清末，滿漢蒙文化合成「完整完滿」的魂體用，春秋戰國的模式衰竭，喪失機能，不能（也不願）再新陳代謝。

百年來的中國路向——救亡為先、民主和科學次要

清末西潮下的救亡和改造的兩條路線之爭：集體專制權威暴政與個體自由民主法治之爭。

對科學初期唯心本能排斥後，轉而概念上以純工具器用的「科技」看科學，簡單將「目的」「手段」/「方法」等同和還原，不究每種科學/科技的原理、條件、虛假性和局限；如迷信符咒秘笈般迷信「找到」和「拿來」的科學/科技，不顧「科學精神」。

內外精英層爭國族的路向的主導權，以中國文化的單元單一制自我神聖心態排他、獨尊方式推行，沒有香港百年的多元自由環境。

抗日救亡，為了全民生死存亡的真正神聖目的而集體專制權威暴政，無限無私奉獻付出，貶抑個體自由民主法治。中國救亡，蔣介石靠農牧社會的單元集體主義發揮作用，不是靠科學及民主。

毛澤東找到竅門：進一步開動農牧社會的單元集體主義，結合「戰時民主」；49年前「神聖目的、集體專制權威暴政」結合軍事

民主，個體與集體合一，無限無私奉獻付出，形成集體主義式自由民主法治；奪取政權。

毛澤東跌落黑洞：迷信中國農牧社會的單元集體主義及西方馬列主義和史太林，「戰時民主」退化，不靠資本主義民主，49年後忘其以，妄想超越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為了虛假、虛妄神聖目的而集體專制權威暴政，貶抑個體自由民主法治，人人無限無私奉獻付出；陷入千百年中國的集體專制權威暴政傳統黑洞。

中國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後：

- (1) 停下來，變成中國千百年模式，由領導總其成，調配社會多層的一切體制，集中不分公私的權力和資源，帶領和發動全民進入未知，冒險犯難批削和轉化「本體性」，和神（自覺/不自覺）博奕；
- (2) 「保證」「永遠」「光榮、正確、偉大、神聖」，自命哲學上和實踐上處理好客觀規律上的「對/錯」和人的主觀感覺和認定上的「對/錯」之間的矛盾；
- (3) 拒絕和打擊由「民眾」/「大眾」作主和參與的民主。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理論是為了「(每個)人的解放」，超越資本主義的虛假意識和意義。列寧以無私的、特殊材料造成的革命先鋒隊執行革命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加入中國的集體主義，民主變集體主義的實質民主（民主集中制），自由變集體主義的積極自由，科學變集體主義的（機械）科學主義。

毛澤東一人總其成的絕對、終極、完整集體主義落實到各種傳統的中國所有公公私私層面和體制，又專門特製創新層面和體制，巨細無遺，無所不包，控制思想感情比中世紀西方政教合一更甚，更有效。

毛澤東一如乾隆，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在哲學、文化思想和美學上主宰一切，進入人心，能秦始皇和孔孟朱陸所不能，中國的專制極權前所未有，愚昧也前所未有，竟迷信中國農牧社會

的「土法」，搞大躍進和文革，如原始宗教要超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根本規律。

鄧小平的放改革起初期觸及千百年層積的中國問題和49年後層積的中國問題，回歸「經濟規律」，但限於個人識見、思想慣性和中國社會及文化現實，選擇「唯生產力、唯經濟、唯發展和唯穩定」的路。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未進入問題，根本沒認真考慮。

民主和民主化是中國、中國人的人本主義的再造

二三十年來的一統天下，「中國天下」、「中國教」和「中國秩序」、「中國權力核心」和「中國價值、美學和文化身分」形成具中國特色的「人本主義」，沒「社會」，沒「政治」，沒「人」，只有集體主義的「中國人」。

中國、中國人的民主和民主化，是重建「人」，給每個個人實體性。這是一個沒「社會」的社會、沒「政治」的政治、沒「人」的民族的文化基因改造。

二百年來中國的千年變局，是重構再造一個新「人」、一個新「組織」、一個新群族、一個新「政府」、一個新「政黨」、一個新「中國人」、一個新「精英層」、一個新「社會」、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民族」、一個新「文化」、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一個新「人種」、一種新「人類」。

30年來香港迫中國重回民主化起點再出發。

20年來中國、中國人全國全民總動員，從「唯經濟」、「純經濟」的進路回到「政治」和「社會」的起點，轉向「人」的民主化。

香港和中國要補的「人權、自由、工商百業、經濟金融、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在中國千百年中的概念的課。

參考書目

- Lee, Pui-tak (compiled) (2001).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 Lethbridge, David (Ed.) (1980).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stadt, Leo (2007). *Profits, Politics and Pan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Ltd. (1992). *The Basic Law*.
- Birch, Alan (Ed.) (1991). *Hong Kong: The Colony That Never Was*. Hong Kong: The Guidebook Co Ltd.
- Cheng, Joseph (Ed.) (1995). *From Colony to SAR: Hong Kong's Challenges Ahea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Joseph (Ed.) (2007).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Endacott G. B. (Ed.) (1973).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nds of HK Committee (U.K.) (Ed.) (1992).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aipei: The Friends of HK and Macau Association.
- Heilbroner, Robert (1961).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atten, Christopher (1997). *Letters to Hong Kong*. Hong Kong: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 Stumpf, Samuel Enoch (1999). *Socrates to Sartre —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6th ed.). McGraw-Hill Book Co.
- Sutherland, Kathryn (Ed.) (1993).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elect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 Henry (1993).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Mind: Intellect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Hong Kong: China Foundation.
- 楊奇 (編) (1994)。《英國撤退前的香港》。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雲濤、金雨雁等 (整理) (1996)。《金應熙香港今昔談》。北京：北京龍間書局。
- 鄭宇碩、盧兆興 (編) (1997)。《九七過渡：香港的挑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羅志華 (出版人/編) (2000)。《天書impossible：論香港的文化教育》。香港：青文書屋。

- 沈嘉榮 (1998)。《中國現代化百年探索》。南京出版社。
- 沙蓮香等 (1998)。《社會學家的沉思：中國社會文化心理》。中國社會出版社。
- 金耀基 (1989)。《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台灣：台灣經濟與生活出版社。
- 洪清田 (1996)。《港台大陸星一道四路》。龍水堂。
- 洪清田 (1996)。《港台大陸的乾旋坤轉》。龍水堂。
- 洪清田 (1996)。《天朝魂索的「解重構」》。龍水堂。
- 洪清田 (2009)。《香港學發凡》 (未出版)。
- 洪鎌德 (1999)。《當代政治經濟學》。台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胡國亨 (1995)。《獨共南山守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胡國亨 (1998)。《法人的統治——邁向以公司為本的經濟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香港社會科學研究社 (編) (1988)。《普及文化研究》。香港：青文書屋。
- 馬克垚 (1997)。《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
- 陳榮灼 (1992)。《「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張德勝 (1997)。《思入風雲——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與社會變遷》。台灣：巨流圖書公司。
- 張德勝 (著) (1995)。《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台灣：巨流圖書公司。
- 曾澍基 (1985)。《香港政治經濟學》。廣角鏡出版社。
- 劉紅星 (1999)。《先秦與古希臘：中西文化之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蔡澤華 (1997)。《先秦諸子經濟思想述評》。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
- 酈純 (1978)。《洪仁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盧瑋鑾 (編) (1983)。《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 (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
- 吳萱人 (編) (2001)。《香港文社史集 (1961-1980)》。香港：採編組合。

第四章

民主和民主化的 「中國特色進程」

洪清田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研究員

引言、命題

中國、中國人的民主和民主化，是人類歷史第一次一個十13億人的幾千年單元單一制古文明，人人由「集體人」轉型做一個「個體人」，在這基礎上以新機制建構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集體，常規運作。

中國、中國人的幾千年單元單一制古文明，只有集體主義的「中國人」，沒有個別、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在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到今天，只有「中國人」，沒有「人」。要做「人」，先要、只能做「中國人」。不做「中國人」，做不了「人」。

中國、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民主和民主化，必要條件是建立個別、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的概念、價值和現實。

所謂個別、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的概念、價值和現實，是指人之為人，不以「無限終極絕對的文化道德心性之學和社會他人認許」為先決條件，而是與生俱來的「人」，人人各自擁有一己的肉身、思想、感情和財產，自由自主。

西方興起的現代文明人權、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和資本主義，具個人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不是絕對，但是是基礎。

英人鴉片戰爭帶鴉片給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也帶給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這種具個人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的概念、價值和現實，可以成為人權、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和資本主義的基礎。

百多年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受不了，視「個人主義」為精神鴉片；不論有沒有選擇的機會，總是不斷反覆，幾番來回自我折騰，不知要不要。不但不知要不要人權、民主、自由、法治和資本主義，也不知要不要科學和經濟。這些層面某一時期找對座標和標準，走對了方向，取得某些初步成績，不久便忘其所以，走向反面，自己清洗掉，沒有累積。

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多年在思索和測試要不要、合不合現代文明，恐怕往下一二百年還需要、還在思索和測試。

英國殖民化香港，帶給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基本的具個人與生俱來的實體性的「人」的概念、價值和現實，直接或間接選擇打個折扣實行人權、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和資本主義。香港是百多年來最長期穩定「拿來主義」移植和應用西方的一些現代文明元素，一直用對座標和標準，走對了方向，讓中西古今矛盾在最大的自由中有秩運作，物競天擇。不像上海，香港在正軌上取得一些初步成績，沒有走向反面，自己清洗掉，在一千平方公里的獨立法和區裏有長期累積，形成完整的社會及文化，工商經濟、政治、管治、教育、社會服務的多體制結構配套而成一個獨特的總體運作模式（Total Working System）。

起源於鴉片和其他商品集散地，首先是「洋人社會」、「碼頭社會」和「倉儲社會」，加入華人後是「買辦社會」、「幫辦社會」、「難民社會」、「移民社會」，發展出「工商社會」、「華商社會」、「廠商社會」、「民俗社會」，近半世紀是「金融社會」、「專業社會」、「自由社會」、「媒介社會」、「中產社會」，近十多二十年是「公民社會」、「全民社會」。

香港有打了殖民化折扣的人權、自由、法治和資本主義，沒有科學、民主，但間接享用英國的民主，香港的工商經濟、政治、管治、教育、社會服務是沒有民主體制的「類現代」模式，形成多體制結構配套而成的獨特「類現代」總體運作模式（Total Working System）。

香港在70-80年代之交，已具備民主和民主化的條件。

97的回歸中國，曾經有極少數人認為是香港民主和民主化的契機。二三十年來，香港民主和民主化本身進展不大，「九七回歸」後沒如二三十年前港人期望和中國允諾的長足發展。

香港現在重複中國內地百多年的幾番來回反覆折騰。反而，二三十年來香港促進中國的開放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民主、民主化和現代化打下基礎。中國官民口頭上的人權、自由、法治、民主觀念，漸漸趨向西方幾百年來倡的普世定義定性。

只把香港當負累 沒看到香港的「真價值」

中國本身遠缺條件，不知何時、怎樣才能累積足夠的現代化條件。香港是中國本身內部最適宜進入思想、言行和政策禁區和險區的地方，可以利用香港的優勢了解、策劃以最安全可控情況向未知和不確定「探險」，先頭部隊偵察兵。

中國可以這樣從香港的國恥中收回成本，供中國一二百年所用。

香港盛產買辦，整個香港是一個「買辦社會」，或出不了奧巴馬那種個別的成熟的「第三種文化」，但整個香港就是一個奧巴馬。香港現在可以給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的貢獻，是又一次把「人」（個人和組織的亞細亞模式關係）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按現代普世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

幾千年來，經孔孟和秦始皇的文武大一統，形成單元單一制的專制思想感情和權力實利社會，成為文化魂和身分認同。中國、中國社會、中國人把「人」（由皇帝、權貴到士農工商）置於最高位置，追求天地人合一，貫通生活和生命、今生和來世，形成「具中國特色」的「中國人本主義」。

「中國人本主義」由一個「絕對自由人」代表、代替和擁有普天之下百姓萬民（亞細亞生產關係和集體主義組織模式），號稱天下為公，人人（我）無私，無分彼此，五倫血緣和地緣關係紐帶重疊編織成無數網絡。實際運作是個人和集體的軟軟硬硬力量，內在化及外施的，凝聚成「天朝」體制。集體「以我為主」，君臨內外「他者」，以「量」的力量主宰事實和事務，從中體現「人」（我）的價值和意義。

「天朝」體制和意識人人有份，人人互相認同、歸屬和擁有。無數血緣、地緣關係網絡中的「人」（我）凌駕「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成為「人文（類）宗教」，極致唯心和無限封閉。不符合無數血緣、地緣關係網絡中的「文化道德義理」者是禽獸，不是「人」。不成為「文化道德義理」定義下的「中國人」，在中國做不了「人」，不是「人」。

這個人、社會、文化和民族的「中國模式」給宋明清「玩殘」，這百多年給西方和日本砸爛。

幾千年來，秦始皇被批，但化整為零和變種，由歷朝承傳，暴

政內腐，變成愚昧。孔孟的文的大一統和秦始皇的武的大一統相反，一直被夢想，沒有被懷疑，孔子千年一脈奉為「素王」，孟子是亞聖。文的武的大一統互相奧援和掩護，而至宋明理學的極度唯心主觀，空談心性，在西方壓力對照下，變成阿Q那種結結實實的愚昧和虛妄。

幾千年來，只有明末清初三大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因亡國亡族亡文而深痛反省，開始深入、系統化質疑幾千年來孔孟文的大一統，回歸「原儒」，直斥歷朝暴君獨夫的「家天下」以最高超、虛妄義理把「人」當草芥。但成效不彰，歷史軌跡沒變。滿清開國到康雍乾，朝代抽取漢文化混進遊牧民文化，淘空、消耗滿漢蒙文化，創出中國最後的「盛世」。

在歷史的局限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沒有反省孔孟思想把「人」置於（個人和組織的「我」，包括皇帝、皇家皇廷）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上的問題。這歷史工作由毛澤東執行。

毛澤東可能是幾千年來第二個（第一個是孫中山）最認直面對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挑戰，引入外來異質基因改造中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國人、中國文化。他們要把「人」（個人和組織、全民全族）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按人類共通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他們革命不是只奪取權力，而是要改造中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國人、中國文化，比商湯的革命更革命。要把「人」（個人和組織、全民全族）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按人類共通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他們革命不是只奪取權力，而是要改造中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國人、中國文化，比商湯的革命更革命。

孫中山沒有在哲學思想層面處理這問題，毛澤東則傾個人一生之力在哲學思想層面上思考和處理這問題，並發動全國之力實踐中國這個哲學思想層面上老大難問題。他的唯物主義是要把

「人」（個人和組織、全民全族）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要中國人按人類共通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他的革命不是只奪取權力，不單是要改造中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國人、中國文化，而是要實踐他的哲學思想。

毛澤東不單比孫中山更「激」，而且越老越認真推行年青時的哲學思想，要由中國人「超前」創新人類共通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東風壓倒西方，對人類作更大貢獻。他領導第三世界反資反帝反修和反霸，替天行道，以皇道反霸道，自己超越一切成為「思想霸權」。他反中國文化，但為了反中國文化和反資反帝反修和反霸，一如傳統中國農牧社會把「人」（我）置於「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上。他要消滅儒家、復興法家，卻陷入儒家的唯心主觀空想。

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禍國殃民後，鄧小平撥亂反正，但階段性、選擇性實用主義，不爭論，不進入這歷史課題。但這個歷史課題貫通最現實和最抽象，不因你的意志而消失，它幾十年來不斷拍打、影響中國內地內政和外交，對台對港政策。中國總要「以我為主」，君臨內外「他者」，主宰事實和事務。

香港現在可以給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的貢獻，把「人」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按現代普世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往下百年仍用得着。

百多年，香港都這樣在無意間提供給中國、中國社會和文化、中國人一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座標和異質性，把傳統中國農牧社會的「人」和「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的上下位置顛倒。

中國走向世界，是一個對中國和世界的考驗：中國人人有份，人人互相認同、歸屬和擁有的「天朝」體制和意識，如何和世界建立千百年沒有的關係。單元的「以我為主」如何「理性化、去魅、除

魔、多元化」的過程。一個指標是看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是把「人」（個人和集體的「我」）放在「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之下或之上，願不願、能不能按現代普世的「思想、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形態、宗教」辦事、做人。

香港百多年，可能是第一個中國人社會可以做到者。香港的經歷和經驗，往下百年對中國和世界仍用有價值。

香港角色——漸引入「經濟、社會、政治」基因及部分「行政、法治、民主」基因

香港無選擇走上一條路向，無意間走對了路，「拿來主義」用西方的模式，個人實體性，自由多元法治人權。香港沒科學，沒民主。

東亞的現代化之路，都是在回應西方。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印度和中國內地/大陸「由君主到民主」的經驗，各不相同。「自由放任、積極不干預」在香港創出奇跡，在中國內地/台灣不能、不適用：

- (1) 香港「化外之地」，外在於中國單元文化思想、單一體和單一制（中國內地/台灣傳統天朝和現代民族主義「以我為主」，囿於單元文化思想、單一體和單一制）；
- (2) 香港向外來現代世界開放，學習和應用（中國內地/台灣不、難向向外來現代開放，學習和應用）；
- (3) 香港引入自由、多元、法治系統，兼容矛盾（中國內地/台灣不、難引入自由、多元、法治系統，兼容矛盾）；
- (4) 香港順應世界潮流時勢，政府指導矛盾自行競爭和汰弱留強（中國內地/台灣堅持順應本身世界的潮流，自成時勢，政府唯心否認矛盾，強制壓抑異質異類異見，不容自行競爭和汰弱留強，指令生死存亡）；

- (5) 香港內外危機時，政府務實、自覺處理，藉危機整頓和上新台階，和外來現代世界接軌（中國內地/台灣唯心否認危機，政府不務實、不自覺處理；事事以「我」的生存、榮辱和尊嚴、利益權勢為唯一重點要義中心，本能反應、不惜代價拱衛，不以「事」的客觀性和客觀規律為依歸，不能、難藉危機整頓和上新台階，和外來現代世界接軌）。

香港形成「自由秩序、自由體制」，率先和世界接軌，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影響中國內地（總體、上層、基層和知識層），不論影響好壞對錯，香港所受待遇都不好。

百年來香港應用的觀念和體制，以及給中國的觀念和體制：恥辱感、工商業和金融業自由經營、自由社會秩序、個人自由、知識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傳媒自由、自由體制、人權、私產權、歷史觀、時事態度和立場、政治理論、社會制度、城市基建和規劃、法治、民主、人權理論、法治理論。

香港給中國的觀念和體制背後的文化內含和文化基因：個體性、自由觀、「人」觀、「我」與「他者」、單元與多元、秩序觀、體制觀、中國觀、西方觀、現代觀、傳統觀、「變」觀、政治觀、危機觀、社會觀、文化交流觀、生死觀、精英觀、知識觀。

香港和中國同樣要補「人權、自由、工商百業、經濟金融、民主、法治、科學、道德、美學」在中國千百年中的概念的課。

中國會為了「以我為主」的「大一統」這更大目的和意義而策略性「放棄」平時天經地義的神聖「體」與「魂」的觀念和價值、原則和政策。

中國對香港的民主和民主化，30年前不脫文革的馬恩列毛思想，以共產主義的「實質民主」否定香港「次級」的資本主義「形式民主」和民主化；之後不論什麼牌子的民主都反對、打倒、揶揄、嘲諷，近七八年也不再分什麼類型的民主，趨近普世慣用的資本主義「形式民主」和民主化定義，但以現實國情和客觀條件限制「原

則肯定、技術否定」。中國對「民主」的原則性立場和理論，但只是口頭，沒落實的路線、計劃或時間表，連多方深入討論也沒有。

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是香港和中國的互動。這是人類大文化之間交流、衝突和融會的規律：征服者、進入者和被征服者、被進入者都不能不「互相同化」，又都怕被同化。歷史上滿蒙金在中國，西方歐美全球化，現在中國走出去，走上世界，都怕被同化，但都不能不「互相同化」。

中國回應香港的「類現代」，是中國在接受世界的檢驗。

三十年來中國思潮、社會和外交轉型

30年的開放改革，中國由極低點強力反彈，由無到有，內外條件「神奇」出現和齊備，中國百年第一次實現中體西用的「具中國特色現代化和現代性」，重現千年天朝夢想。奧運是30代中國的復古新生活運動。

開放改革首十年，中國慢慢摸出柏拉圖講的「山洞」，「凡事派」和「檢驗派」生死鬥，再慢慢回到60年代中國內部的「走資」政策（如包產到戶、承包制），再開放南方試點接觸外面資本主義世界，只在廣東福建建立四個特區，引入外資和外來經營和管理模式。市場、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是全國全民的本能禁忌；只可以談「生產力」，但也被指「唯生產力論」。

改革派望向香港，興起「香港學」。「收回香港」是當時國策大原則，可以以「統一高於一切」為說詞，在意識形態、政策座標和行動標準上抗衡龐大的反對派的力量，開放南方，在廣東和福建建立四個特區。上海仍關閉，預防外來「毒素」蔓延時，必時可以守住上海的防線。

姓「資」姓「社」爭論興起，中國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初階，卻以「社會主義初階」論自圓其說。

1986、87年一部分人掀起「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開放改革派講換腦袋。

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舉世預期中國將再封閉鎖國，中國沒倒退回60-70年代毛主義，反而加大力度開放改革，和資本主義接軌，形成「八九悖論」。中國加大力度反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用西方生產力和混合經濟模式，回到50年代中共治下中國，再回到30代中國，再出發。為消除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西方毒素，大開放，一哄而起大搞復興中華文化的民間運動，一時間千百計官方及民間團體及組織遍地開花，其中不少是神秘主義的怪力亂神、方術之士，幾年後又搞運動消滅這些官方、半官方及民間團體及組織。

開放改革後15年的一個轉捩點，是92年鄧小平南巡，開放上海，中國再也不能走回頭路。香港大資本大舉進入內地。姓「資」姓「社」爭論再起。鄧小平「不爭論」一錘定音，「穩定壓倒一切」，唯經濟、純經濟、泛經濟，自然環境遭受極大破壞，尤其是空氣及水源。

中國轉型走過幾個階段，由「生產力」衝破計劃經濟，斷而以「混合經濟」自況，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名詞引入自由經濟，近年自稱「市場經濟」，要求西方給予「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內部和外交（中美、中英、中日關係）的爭議和課題，都反映近百多年的歷史和當今的紛爭，不時夾雜不少農牧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歷經的「主客觀的鬥爭和內內外外的互相適應」的兩極思維，令部分西方聯想德日崛起的異同。

世界外交的根本問題，是一方面各國之間的關係和秩序，既是弱肉強食、又是折衷均衡的「運動遊藝戲」（game-play），另一方面各國之內大眾與精英之間、建制之內精英和建制之外精英之間，各階層的利益、認識及價值之間，既一致又分歧。這兩方面交錯，有當下即時又有悠久歷史的矛盾。

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世界外交的新形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大風險、更全球化、更新媒界化和資訊化。傳統的中國性和當下世界的「運動遊藝戲」(game-play)，對中國和世界的考驗和挑戰都是新的，前所未有的。現階段中國形勢和處境，未及日本、南韓和香港的階段，未進入台灣和印度的問題。中國的主觀能動性：可能的好和壞。

「中國走向世界、世界接受中國」是對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共同考驗和挑戰。香港對中國的作用，是百年來提供交換和變壓平台，古今中外的知識和資訊的自由轉化，供更多更理性的理解、溝通和取捨，有判斷和抉擇。

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和中國民主化

20年來，中國在89年轉轍，百年來第一次連續20年穩定社會發展，經濟、城鄉、自然環境、國際關係、行政、思潮、價值觀都因「穩定壓倒一切」的「唯經濟、純經濟、泛經濟」而產生百年巨變，大好大壞。

今天中國的考驗，是13億被「激活」的人，個人實體性膨脹，能量通過資訊化急聚急散，對內怎樣有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新秩序、新制度、新政治和行政和法治體制，以及自然環境，對外有一個新國際關係，內內外外培育一種新文化、思潮、價值觀、人格人品。

千百年來，中國官民互相依附和支配，集中形成一個天人合一的同質同化秩序、制度、文化。這個專制權威的「中國秩序、制度、文化」在西方衝擊、挑戰下瀕臨生死界。中國抗日靠這個專制權威的「中國秩序、制度、文化」取勝。毛澤東要在有生之年改造它，全國全民陷入這個「中國秩序、制度、文化」的專制權威黑洞。

現代化是個人實體化，自由自主，不再依附集體，官民分家、公私分際，互相容忍和兼容、調配和支持，以理性程序組成新集體，不求一個天人合一的同質同化秩序、制度、文化。

現代化體現於「知識、經濟、政治」四層面，四層面並進兼容，形成反專制權威的「秩序、制度、文化」，讓個人、社會和國家民族自治自理。

3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唯經濟、純經濟」，「知識、經濟、政治」的「秩序、制度、文化」局都脫節，一些過份膨脹、快速，一些過份滯後，一些向現代、後現代速，一些向前現代。

現在中國內部危機及風險：跡像不斷，體制和上中基層人員質素，危機及風險可大可小，難知大小；可能是一個千百年計的宏觀總體體制的「終極問題」。中國和印度比較，是印度的政經社會權力結構已成形，問題多如毫毛，但不傷根本憲政體制，中國則是根本憲政體制未現代化。中國現在並未把根本憲政體制的現代化提上議程，而是傾力思考、實踐和論說，「要不要現代化、怎樣走自己的現代化路」，千方百計避免走多黨分權、輪流執政的西分模式。鴉片戰爭170年來，現不現代化仍是中國主觀上的兩難。

客觀上，20年來因經濟發展而回到現代化起點再出發，為中國的民主化播下條件，但還未回到民主化的起點和再出發。

在工商百業、經濟金融的「混合式」和過渡期，中國實現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現代性的個體性和世俗利益，通過「經濟、社會、政治」層面而進入「行政、法治、民主、憲政」層面。

21世紀中國繼續百年兩難：

- (1) 走哪條路，出去不出去？怎樣出去、怎樣不出去？
- (2) 要不要現代化、怎樣走自己的現代化？
- (3) 民主化不民主化？怎樣民主化、怎樣不民主化？

這些大抉擇，這樣或那樣，都可能走上的正路和歪路。內外千百年舊習和百年新因素，結合今日時事人，正反角力互動，都可能對中國走向正路和歪路起微妙譎異的正反作用。

中國往何處去？

三十年重複二百年的思維模式—— 「消極一國兩制」與「積極一國兩制」

49年後，中國共產主義黨政軍和社會及人民心理，都仍在「戰時狀態」和「作戰模式」，未能、沒想過停下來，恢復平常、正常的狀態。

憑着「戰時狀態」和「作戰模式」的能量和動力，前30年全中國要追趕去的千百夫計時間，並且要超越西方，千方百計自創哲學、價值和理想社會及世界，自訂路線和標準，結果走上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的人類曠古荒誕悲劇。

20-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依外來標準和路線，讓出意識形態的「本體性」，換回發展空間。開放改革的成功和奇蹟就這樣來的。幾經內外爭持，中國共產主義黨政軍和社會及平民百姓承認「落後是發展的空間」，意味之前的「落後」，也意味「發展是來自改錯」。

開放改革成功也令中國、中國人重新看自己，自尊意識大漲，不再承認「落後是發展的空間」，意味成功不是因為自己改正錯誤，而是來自本身的優越性；之前不是「落後」，「發展不是來自改錯」，中國要繼續發展，必須繼續發揮本身的優越性，回歸傳統，發掘本身的優越性，為全人類作更大的貢獻。

30年重複200年的一些模式：

- (1) 向西方開放和學習，接觸蠻夷、學英文和衣着、剪辮，引入新學，自由化，衝擊5R每層面，又要維持一個由核心到基層的共有共享共尊共遵的秩序，貫通個人和集體，互相認同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 (2) 農牧社會和文化容納商品經濟、貿易，開始轉型。
- (3) 軍事、組織、科技、器具上的「中體西用」。
- (4) 由農牧、商貿再工業社會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道德倫理的轉型，個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私產保護，新知識

教育，和千百年古文明背道而馳；「中體西用」外，觸及「文化魂」（「人之為人」的存在意識和意義、本體性、文化身分認同、世界觀、思維模式等等的合成）（單元感性總體性給理性分割，對權威和權力和法治、人權、個人實體、自由、三權分立的新觀念。

- (5) 由商貿、工業再金融社會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道德倫理的轉型，掌握各種專業知識。
- (6) 由商貿、工業、金融資訊化社會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道德倫理的轉型，講究獨立媒體、資訊自由、人權、私隱，還有民主、多元以及獨立工會、示威遊行、獨立政黨、選舉、問責政府和官員，輿論和社會監督。

20-30年來中國每個階段的改變，都是乾坤顛倒，匪夷所思，離經叛道、數典忘宗，「人不再是人」，中國、中國人認不了自己。

每個階段的改變，中國、中國人受不了，千方百計保持千百年的文化精神、世界觀和思維方式：

- (1) 奉「單元的無限封閉體」的唯一同質性為自然、應然、必然、已然和實然，「以我為主」。
- (2) 向外學是「中體西用」，只承認西學的「器用」性和理性，不承認西學的精神性和文化性，學西學以為西學如武俠小說的秘笈，早已在某一處，只要「找到」、「拿來」用就可以，不究西學本身的原理、文化內含和文化底蘊，不知「知識」也是「意識」，都是過程，要持續試對試錯。
- (3) 以集體主義的「運動」方式，以「量」取勝，同一方向一哄而上，取得成初步成效，便忘其所以，成功意味本身的優越性，直線無限推衍，可以超越所有西學、現代性和一切「他者」異己、異端。

中國對民主，一如對所有西學、現代性和一切「他者」異己、異端，起初是不屑一顧，不得不面對時是莫名恐慌，害怕、逃避，

之後苦學初見成效，即忘其所以，鄙夷，回到超初的不屑一顧，有條件「以我為主」，不信邪，要走自己的路，不是不跟、巋然不動，就是在自攘一套，要一步登天，反超前，沒人會、敢反向思維，任何負面跡象都視而不見，不能從現實現象出發，結果大災難。

開放改革初，因鄧小平一家身受其苦，明令禁止搞運動和株連。在政治上開放改革前十年還有些「運動」，後來20年全刹住，但經濟上30年仍是「運動」的集體主義模式。奧運又是集體主義的「運動」模式。

二百年，中國、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在幾個極端間搖擺和反覆折騰，以「運動」模式搞文化、政治經濟，自我消耗，幾次舉國歡騰，一起入歧途，大叫「找到了」，一浪浪向前衝後退下來，還不知錯。

三十年開放改革，中國又在經濟層面重複同一個循環。

中國的考驗 世界的考驗

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是中國文化基因的重整、重編、重構 (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也是世界秩序的重整、重編、重構 (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

廿一世紀是中國的抉擇時刻，也是世界的抉擇時刻。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中國文化基因和世界秩序的隻重重整、重編、重構，一起交差平衡並進。

比較德日、印俄的民主化和現代化、文化基因和世界秩序的重整、重編、重構：

- (1) 德國是西方的二元人本主義，以集體主義（機械/偽）科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搞現代化，集體主義淹沒個體理性，超出人的局限，陷於集體主義瘋狂，人、妖、獸、聖、魔一體不分。初階民主也不管用，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後文化基因改造（才）成功。

- (2) 日本是東亞的一元人本主義，以集體主義（機械/偽）科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滋養「人代神職」的一元人本主義，超出人的局限，陷於集體主義瘋狂，視之為「現代化」/「開化」，人、妖、獸、聖、魔一體不分。初階徒具形式的民主全不管用。發動一次世界大戰後文化基因改造似未成功。
- (3) 印度是東方的二元人本主義，集體主義（機械/偽）科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共生並行的現代化。初階民主和經濟發展緩慢。
- (4) 俄國/蘇聯是西方的二元人本主義，曾近似國以集體主義（機械/偽）科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搞現代化，集體主義淹沒個體理性，超出人的局限，陷於集體主義瘋狂，人、妖、獸、聖、魔一體不分。初階民主、資本主義也不管用；轉向共產主義，成為人類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建立全球共產主義陣營，60年後崩潰，由蘇聯回俄國。起急落後再以集體主義（機械/偽）科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共生並行，進行現代化，經一段末日景象後，初階民主和經濟發展迅速。

香港的歷史新角色——民主試驗田

中國現代史從西方開始，由外引入。三五千年來，中原農漁社會遊牧社會互動、交戰和融會，遊牧入關，農漁南遷。大部分南遷農漁和本土社會互融，客家族堅持獨特身分、文化和社群。土家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入關遊牧社會自命「天朝」，反過來稱南遷的農漁為「南蠻」。到客家人洪秀全和孫中山「北伐」，由南北回歸中原。

二百年來，中國面對西方、學現代化的科學、民主、自由、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法治，常加這種「具中國特色」的「前現代」添

加劑。科學變（機械）學科主義，民主變實質民主、集體主義民主（民主集中制），自由變積極自由，社會主義變平均主義、均貧主義，唯物主義變（機械）唯物主義/唯心主義，法治變人治，資本主義變關係資本主義。中國自家有唯傾向的法家也變唯心主義、主觀主義。奧運也變「具中國特色」的奧運。奶粉和債券還較有客觀標準，其他的科學、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唯物主義、法治、資本主義、法家欠客觀標準，更難，理論和實踐更糾纏不清。

香港無選擇走上一條路向，無意間走對了路；以西方的模式，個人實體性，自由多元法治人權。

改革開放首十年的香港角色（被肯定，內地「香港學」）。1989年「六四」後改革開放後20年的香港角色（被否定和壓抑，以上海取代香港，以「中國模式」取代「香港模式」）。香港沒科學，沒民主。民主是最後一關香港成為完整現代社會，中國不讓香港成為完整現代社會，取得「實體性」，一如千百年中國單元單一制不讓任何人群、階層、活動、意識、思想、感情成為完整的自由自主體系，取得「實體性」。

中國的現代化、走出去、生存卻不能不讓各人群、階層、活動、意識、思想、感情成為完整的自由自主體系，各自取得「實體性」（「多元實體化」）。中國的現代化、走出去、生存是「多元實體化」，即是在「個人實體」基礎上建立新的「多元實體」，在「多元實體」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社會模式和形態。

外表可見，這是地殼變動，大陸板塊移動（Continental Shift），內裏不可見是一個個13億人的文化基因的重整、重編、重構（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的千百年大變局。

香港百年「無痛」經歷，成為文化基因突變異（Mutation）的罕有奇跡。香港面對的文化基因重整、重編、重構（Realignment and Re-configuration），必是中國將來（有幸）要面對的。香港百年的文化基因突變異（Mutation）經驗，是中國的知識和意識財富。

香港和中國——現代化的同道中人

中國千百年，自成世界，另一文明形態，在自己的文明形態裏凡事「先知先覺」，200年來面對西方主導的世界和文明形態「不知不覺」，拒絕「知覺」。

香港百年向世界開放，「後知後覺」，輸了一仗又一仗，但贏回整個金融制度，和世界接軌，成為世界中心之一。如果說美國是英國模式的放大和變種，香港可以說美國是英國模式的縮小和變種。

整個香港、政治和經濟，以至企業、機構和金融的事件、實務、現象現實，都可以視為「人」進入未知的黑洞的歷險過程，全部人不論哪派、哪種立場，都是從不同進路、由不同方向摸索進入未知的黑洞，「玩」的是同一個「遊藝運動戲」(Game-play)。像一場賽事，大家要分高低輸贏，但也是同道中人，一起為提高水平而競爭，可以雙贏。各人付出和回收應有一個恰當均衡點(Equilibrium)。

任何公共事務和行為，都有兩層面，一是私人利益直接悠關的賽事，一是眾人共同利益間接悠關的制度。社會的政經、管治和公私機構和企業的經營和管治，領導必須跳出一場賽事，抽離地看到整個「遊藝運動戲」(Game-play)。

西方文藝復興以來500年，進入未知的黑洞，19世紀東方除了日本不跟，要堅持「以我為主」，走了一半要走自己的路。中國要寫自己的文章，200年來未成功，也不知成不成功。

香港壓根兒沒想到寫自己的文章，只是抄別人的，「拿來主義」拿來用，竟然這樣子成功。香港的中英歷史恩仇觸動中西千百計的文化的內核基因，香港經歷歷史長河中的風險和機過，無不引發中西千百文化的內核基因的重列(Realignment)和重編(Reconfiguration)。

香港和中國內地對百年香港生於重重中西矛盾的經歷和成

果，沒有自覺，沒有認識，沒有綜合的研究和理論建構，有的最多是分科研究和零星描述。我們不大認識香港的來歷和經歷，形態、結構和運作模式，為什麼有些極高成就，有些極不足，完全欠根基，不可思議。我們不大認識香港百多年的經歷和成就本身的重要性及意義，以及對照中國百年、千年的重要性及意義。我們不大認識香港運作所需的知識與意識、曾經和還可以貢獻中國的知識與意識。

出於種種有意無意的原因，中國內地和香港本身都對百多年的香港，都不重視。就香港而言，香港缺少從事「意識」和「知識」的階層、機構和人員，有的也沒有把總體的「香港」作為對象。就中國內地而言，傳統中國和年後的中國內地有太多從事「意識」和「知識」的階層、機構和人員，但另有一套千百年來完整的「意識」和「知識」體系，也不斷以其自成完整的一套「意識」和「知識」體系描述和解釋、介定和批判香港，但也少系統化建構香港社會，一如少系統化建構中國社會。

沒人用文字完整紀錄和梳理香港百多年這些物質和非物質的奇異現象，沒有出現這麼一本、一套配得上這些百多年詭譎、精彩的事實事功的「香港」書。最接近這麼一本書的，可能是孫中山之前洪仁玕寫的《資政新篇》。太平天國起義時，洪仁玕兩次逃港，通過香港開闊了歷史視野，看到英國人的社會、國族和世界，對照中國，羅列出中西之別，援引西學入中國，希望中國走上西方初級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政新篇》後來成為孫中山《建國方略》的藍本之一。

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從中國的需要出發，帶着問題、通過香港全方位審視中西世界，對香港的跨學科、綜合、宏觀描繪是間接。一百多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直接跨學科、綜合、宏觀描繪香港的《香港概論》（兩冊）。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內地興起「香港學」，內地黨政人員和文教界直接跨學科、綜合、宏觀描繪香港，寫成《香港概論》。一些香港學者和人士以不同程度參與事。據聞50年代畢業於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後來回廣州師承陳寅恪、文革挨批後解放的金應熙，低調為《香港概論》定向和鋪墊，最大程度上在容許的範疇裏充實了《香港概論》。《資政新篇》和《香港概論》可能是最接近姜恩柱所講的那麼一本「香港」書，但都距「香港」的現實現象、內容和意義很遠，算不上這麼一本「香港」書。

「香港學」——香港和中國的共同資源

「香港學」最基本的含意和總取向是：

- (1) 香港生於重重中西矛盾的經歷和各層面的成果、知識及情理體系，強弱優劣，分科分門、分行業、分部門、分層、分性質或綜合、跨科際的研究、認識和理論建構。
- (2) 香港的來歷和經歷，形態、結構和運作模式，為什麼有些極高成就，有些極不足，完全欠根基，不可思議，如何補救補課。
- (3) 香港百多年的經歷和成就本身的重要性及意義，以及對照中國百年、千年的重要性及意義。
- (4) 香港一國兩制下運作所需的知識與意識。
- (5) 香港曾經和還可以貢獻中國的知識與意識資源。
- (6) 索「香港」的「知識體系」：個人、企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和人類在瞬息萬變、風險和機遇並存、道德考驗處處的世界，大氣候大環境的風險和無能為力之中，如何自處，找尋規律、價值和意義，建立知識和意識；公共體制如何建立、運作和變遷；集體的社會/國族/文化如何建立、運作和變遷；人類、整個世界和文化如何運作和變遷。
- (7) 把「香港」變成一個「知識體系」：個人、企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和人類面對本身內外層面和上中下等

級身分地位，知深淺、距離和裂溝；認識和出入多元、多實體、多系統各有反的邏輯和規律，如閒庭信步；尊重各「人」，服膺共「事」，把「事件」作為一個「知識體系」處理，事件的進行和爭議都是一個「知識化」過程，人人在「事件」和「知識化」之下，內外各層面和等級一起學習和進步，一起探索未知和接近永不能接近的「客觀性」，總結經驗，形成「知識體系」；接受「客觀性」的考驗和裁決。

- (8) 探索中國文化千百年轉型：加入方法論和知識論的基因，由單元而多元，由集體主義而個體自由、民主、法治，由農牧社會及文化的「人神妖獸」合體而現代化人和民族。

香港百年讀別人的文章，教育由書本到書本，留等有人寫「香港」這本書。香港百年用事實寫文章，留等有人把「事實香港」變成「符號香港」。

參考書目

- Tsang, Steve (2004).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opkins, Keith (Ed.). (1971).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stadt, Leo (2005). *Uneasy Partn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Faure, David (2003).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 Cheng, Joseph (Ed.). (2005). *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Interpreting a Historic Even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Joseph (Ed.). (1982). *Hong Kong in The 1980s*. Hong Kong: Summerson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re.

- Lau, Siu-kai, & Louie, Kin-sheun (Ed.). (1993).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Clifford, & Chueng, Oswald (Ed.). (1998). *Dispersal and Renew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楊奇 (編) (1990)。《香港概論》。香港：三聯書店。
- 楊奇 (編) (1996)。《香港概論 (下卷)》。香港：三聯書店。
- 陳清僑 (編) (1997)。《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丁新豹 (編) (2008)。《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
- 余繩武、劉蜀永 (主編) (1995)。《20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 金泓汎 (編) (1990)。《亞洲四小龍崛起的奧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 俞明 (主編) (1998)。《南京條約與香港百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洪清田 (1993)。《彭定康治港得失》。香港：天地圖書。
- 洪清田 (1995)。《中方入港尋方向》。香港：天地圖書。
- 洪清田 (1996)。《政治轉型與政黨破土》。香港：龍水堂。
- 洪清田 (1996)。《21世紀回望台港大陸》。香港：龍水堂。
- 洪清田 (1996)。《流/難產中的香港文明》。香港：龍水堂。
- 洪清田 (1998)。《董建華治港思路大透視》。香港：明報出版社。
- 洪清田 (1999)。《從〈雍正〉〈還珠〉看中港台社會文化》。香港：明報出版社。
- 胡國亨(講述) 劉潤和(編撰) (1993)。《到富強之路》。中國基金會。
- 倪健中等 (主編) (1996)。《告別港英：兩個世紀之交的兩個香港之命運 (上、下冊)》。中國社會出版社。
-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 (2000)。《停不了的使命——廉政二十五年週年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
- 高承恕、陳介玄 (主編) (1997)。《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灣：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 黃文放 (1997)。《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 曾澍基 (1984)。《巨龍口裏的明珠》。廣角鏡出版社。
- (英) 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 (著) 葉篤義(譯) (1994)。《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
- 劉兆佳 (2000)。《香港21世紀藍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錢益兵、賀耀敏 (1995)。《香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冠中 (2004) 。《香港三部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明報編輯部 (編) (2004) 。《愛國論爭》。香港：明報出版社。

鄭宏泰、黃紹倫 (2004) 。《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家研究》。香港：明報出版社。

練乙錚 (2008) 。《中國——練乙錚文集I》(第二版)。香港：天窗出版及信報財經。

李照興 (2008) 。《潮爆中國》(第三版)。香港：天窗出版。

第五章

「六四事件」與中港兩地 民主發展的互動

蔡耀昌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副主席

前言

1989年春夏交替期間在北京發展出來的「八九民運」以至其後的「六四鎮壓」，被統稱為「六四事件」。「六四事件」距今已超過20年，但這歷史事件，不單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到了今天仍舊影響着中國的政治發展。

「八九民運」與「六四鎮壓」主要發生在中國大陸（或更準確一點說是主要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市），但有關事件無論在當時以至在其後的時間，都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和中港關係造成相當深遠的影響；可以斷言，如果沒有當年的「六四事件」，香港在往後這二十多年的政治發展進程肯定和現實情況有非常大的差異，因而要了解甚至要前瞻香港民主發展，必然要對「六四事件」及其影響作出全面分析。本章正要從這方面作出總結與檢討。

一直以來，研究及討論香港政制與民主發展的文獻，都會毫不猶疑地認同，從政治過程看，中國因素是異常重要且具決定性的；不過，至今仍然較少有文獻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系統地檢視「六四事件」對香港過去二十多年民主化發展的影響，筆者認為這是有所不足的。而換另一角度看，政治過程影響絕對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在探討中國因素對香港民主發展影響的同時，亦值得加以分析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民間力量對中國民主發展起的作用。

綜合來說，本章旨在檢視「六四事件」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兩地民主發展所造成的互動影響，文章將分三部分：首先會重點探討「六四事件」對過去二十多年中港關係及香港民主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是從反方面看「六四事件」以來香港的支援中國民主工作對推動中國民主化所起的作用；最後則從組織發展及社會行動的角度去檢視「六四事件」對香港民間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意義。

「八九民運」前夕的香港民主發展狀況

相信沒有人能想像到1989年在中國大地會突然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請願與民間運動，也想像不到會出現軍隊與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進行開槍的「鎮壓」場面。在「八九民運」到臨前，香港社會亦正就其未來的政治民主發展進行討論以至出現各種政治力量的頻密較量，但顯然沒有人預料到「悄然而至」的「六四事件」會全方位地改變了往後的政治格局。

由19世紀40年代開始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一直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長期以來根本沒有什麼民主政治發展。香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香港總督——在殖民地歷史的一百五十多年間均由英國政府（名義上由英國君主）委派英國人出任，直至1985年以前香港立法局的議員亦全數由港督委任產生，因此並無任何程度的民主可言。

及至中英兩國政府於20世紀80年代初討論有關香港前途問

題之際，香港政府才開始逐步在政治架構中引入民主選舉的元素，包括在1981至1982年間成立部分成員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諮詢組織「區議會」，並且於1985年首次以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部分立法局議席。

香港殖民地政府之所以在已實施殖民地統治近150年的時間突然推動香港民主化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無疑與香港前途問題有關，即在中英兩國談判香港未來的政治歸屬問題前，中國政府早已表明必須收回香港的主權與治權；英國政府因而亦對香港「非殖民地化」早有準備，而在結束殖民地管治前在有關地區引入西敏寺式民主政制正是英國政府的一貫政策。而除了以上的政治因素，同樣值得重視的是香港社會隨着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經濟發展以至二次大戰後土生土長新一代的成長，香港市民要求「當家作主」的民主聲音也日益高漲；在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合法性及權威實際上已遭到愈來愈大的挑戰，因此，政制民主化在香港歷史進程中不能再長期拖延。

然而，在那個時期，香港的民主進程卻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主要的制約力量來自中國政府。一方面，中國政府一直認為英國政府在香港推動民主化是其「非殖化」陰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親英國的政府，以確保香港日後縱使不再是英國殖民地，英國的利益仍能獲得保障；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認的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制度根本地缺乏「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的傳統與經驗，中國政府相當質疑於香港推行民主，再加上香港原有的既得利益階層（特別是工商界）經常強調民主普選會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令中國政府更大力反對香港在那時候推行民主。

總體而言，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香港的民主發展階段仍舊處於初階，在行政立法等主要政治架構大體上並無真正民主的性質。

另一方面看，由於中英兩國政府於1984年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並簽署了有關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公開承諾於1997年當香港主權與治權回歸中國後，香港將會成為中國領土內一個

特別行政區，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並且在1997年當香港特區成立後，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將由選舉產生；因而，中國政府也不能否定香港要往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只是他們強調香港民主進程必須透過作為香港特區的小憲法《基本法》作出規定。

當中英兩國政府於1984年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中國政府隨即在1985年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基本法》，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以收集社會各界意見，最終經過五年的諮詢討論工作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正式制訂及通過《基本法》。由於《基本法》的內容規定（特別是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部分）直接影響1997年後（甚至也會制約1997年以前）的香港民主進程，因此《基本法》的制定過程，本身就是引發香港民主發展討論的重要「場所」。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及通過程序都算不上民主，包括負責草擬《基本法》條文的「起草委員會」，其59名成員中全數是由中國政府委任產生，當中23名香港委員，只有司徒華及李柱銘兩人的立場較傾向民主。然而，換另一角度看，中國政府在那時至少不會完全排斥這些「另類聲音」，只是從「起草委員會」的佈局中已可看到中國政府對於香港邁向民主化的立場十分保守。

1989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就《基本法（草案）》在香港進行諮詢，而這是全國人大計劃於1990年4月正式通過《基本法》前的最後一次諮詢，因此也是決定香港未來民主進程發展相當關鍵的時刻。早在1986年，香港爭取民主的團體已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1] 他們認為《基本法（草案）》中有關政治體制的建議方案違反民主原則，因此計劃在諮詢期間提出反對意見及抗議，雖然明顯地以當時的政治力量對比看，香港爭取民主的聲音將很難有足夠實力改變中國政府的原有立場。

如果沒有「六四事件」，筆者估計香港的民主發展將會是緩步地前進，而何時達到全面民主的普選階段，相信不會在香港回歸前與以至回歸後的一段短時間會有答案；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許會較正常地發展，但顯然不會成為中國政府認可和接受的主要對象，與此同時，香港內部爭取民主的聲音雖然會繼續存在，但能影響大局的力量將繼續有限。

「六四事件」的發生，把這政治格局與發展方向全然改變了。本文會分階段檢視分析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政府關係的改變及民主派的定位轉變，並探討香港民主進程所受到的影響。

「六四事件」與民主派角色轉變

「八九民運」的到臨，特別是「五·一三」學生絕食行動和「五·二十」戒嚴令發出後，整個中國以至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一下子集中到北京，而差不多全體香港市民都紛紛上街及捐款等方式對「八九民運」表示支持；「六四鎮壓」那一刻，香港市民亦同聲悲哭，對共產黨政權更是既恨且怕。

在「五·二十」戒嚴後於香港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在「六四」前後發動了多次支援北京民運的大遊行和大集會，每次示威行動的參加者是以數十萬以至過百萬人計，可說是差不多代表了當時全民的聲音。而「支聯會」的組織核心，就是當時爭取香港民主的「民主派」；他們在中國政府作出鎮壓行動並且明確把「八九民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後不僅仍繼續公開譴責中國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更進一步把「支聯會」由一個臨時性的聯盟轉為註冊組織，以作長期鬥爭；而當時「支聯會」的正副主席，正是身兼「基本法起草委員」及立法局議員的民主派領導骨幹司徒華和李柱銘。可以想見，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事實上，正因為「六四事件」與「支聯會」的存在，中國政府與香港主流民主派的關係變得全面惡化。過去20年，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溝通對話交流基本上全然中斷，部分民主派人士更在過去多年連返回大陸的權利也被剝奪；也因此，中國政府在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模式中處處設限，以盡可能減弱民主派在政治架構中的力量。

在「六四事件」發生前，雖然香港民主派的意見基本上不大獲得中國政府的認可與接納，而在香港民主化發展的問題上，中國政府更顯得早有他們的立場，那就是在1997年也盡量維持香港現狀（包括民主步伐也不想有大幅度的改變），但那時香港民主派至少能和中國政府維持溝通、交流，在制定《基本法》的重要「起草委員會」架構中亦有兩名民主派人士，至少在中國政府的建制中扮演「建設性反對派」的角色。然而，「六四事件」至今的20年間，中國政府與香港民主派長期處於對立、不信任與缺乏正式溝通交流的境地，連過往僅有的「建設性反對派」角色也失去了；從某一角度看，對原來香港穩步邁向民主的進程無疑增添了一定變數。

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發生，也令香港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的角色定位得以顯著提升，亦令爭取民主政制這一訴求獲得更多香港人的持續認同。

在「八九民運」發生前，香港民主派也曾多番發動市民爭取民主，個別大型集會也曾出現近一萬人參與，不過一般普羅市民的持續參與及支持程度並不是太高，因而可以看到該段時間的爭取民主運動的民意壓力對建制大體上起不了實質作用。^[2]然而，經過「八九民運」期間香港社會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動員參與，不僅令香港人更積極地關注中國民主發展，也同時令他們更確切的關注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民主派在領導「支聯會」工作中表現出其政治道德，亦由於他們敢於向中國政府說「不」，因此獲得了香港市民的廣泛認同，而這「民主旗手」的角色定位，到了今天仍令民主派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3]

「六四事件」與基本法定稿

「六四事件」的發生，除了改變了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以至民主派的角色位置，也直接影響《基本法》的最終定稿內容；由於《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制以至中央特區關係，其影響亦相當深遠的。

有關政治體制與民主發展的部分，當我們比較於1990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定稿與「六四事件」前公佈的《基本法（草案）》，可以發現當中出現了不少倒退的規定。首先，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基本法》都未有確保何時才能達致全面民主的普選，而就何時才能落實普選的機制，《基本法》定稿較原來草案設下了更多的關卡；第二，在立法會的表決程序中引入「分組點票」模式，令由議員提出的議案更難在議會獲得通過，因而進一步削弱了立法會所能發揮的作用。

《基本法》對香港政制發展的規定，到了香港回歸已經超過十年的今天，仍然產生十分大的制約；亦由於《基本法》對何時能實施普選並無明確規定，因而令政制改革的議題成為香港長期揮之不去的爭議點，這看來是當時中國政府也是預料不到的。

「九一直選」至回歸前後的政治格局

縱管在香港政制發展中有十分大的限制，但在1991年首次進行的立法局部分議席由分區「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發展，卻令大量香港民主派同時擠身立法機關議事堂，這不但對原來的議會在運作模式上造成衝擊，也促進了香港的政黨發展。^[4]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亦引發了中國政府與西方多個國家政府的摩擦，英國政府也因而在1992年換上一位政治家當港督，那就是彭定康。彭定康到任後不久，即推出其「政改方案」，嘗試從

《基本法》條文中的空子中找出盡量可能推進香港民主的政制發展模式；有關「政改方案」推出後引來中國政府的強烈批評，更促使中國政府最終「另起爐灶」，包括取消了全國人大所規定的立法局議員「直通車模式」，並設立了連《基本法》也沒有規定的臨時立法會。

但是，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及其與中國政府所發起的政治爭拗，令1995年新一屆立法局選舉中，民主派進一步取得更廣泛的選民支持，並差不多取得該屆立法局的大多數議席。這樣的發展，一度令當時的立法局成為十分強大有力的議會，包括在任內通過了超過十項由議員提出的立法草案。

當然，由於中國政府堅持在「九七回歸」之際設立臨時立法會以取代原來《基本法》規定的原有立法局議員「直通車」過渡組成的第一屆立法會，令絕大多數民主派立法局議員被迫在「九七回歸」時「落車」。

香港回歸後，由臨時立法會負責制定往後立法會的具體選舉模式，而原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被全面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回復原來較保守的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模式，並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引入「比例代表制」，確保市民支持度普遍較低的親北京政團及人士都可以取得相當數量的立法會議席。香港的民主進程，在該階段可說是「不進反退」。

「七一大遊行」以來的變化

中國政府與香港民主派之間的關係，自「六四事件」後基本上一直處於對立的境地；這樣對立和缺乏溝通的狀況，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也未有出現任何改變。於「九七回歸」後，中國政府與香港民主派的關係更好像一直「凍結」在原來對立與缺乏溝通的狀態中，看來中國政府對此並無意作出任何調整。

不過，於2003年爆發的、超過50萬香港人參與的「七一大遊行」，又為中港關係（包括中國政府與香港民主派的關係）與香港民主化發展帶來新的變數。

作為自1989年以來香港爆發的最大規模示威行動，「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毫無疑問與香港特區政府打算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訂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有關，而該《基本法》條文的產生背景又顯然地和「六四事件」分不開。^[5]「七一大遊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與社會運動，是繼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的行動後，另一為香港的民主運動重新注入強大動力的事件，這令中國政府不能不通盤檢討其對香港的政策（包括與香港民主派的原有關係）。

中國政府對香港政治發展的政策轉向，綜合來說可以「一手硬、一手軟」來形容。一方面，於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政制改革的機制進行釋法，以及作出否決在2007及2008年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決定，對此中國政府顯然是以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企圖壓住香港人要求立即落實民主普選的訴求；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則大量派出內地人員來香港向社會各界及包括民主派在內的政圈人士收集他們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的看法與分析，更曾一度公開「釋出善意」以改善和個別民主派人士的關係。更令人原先所意想不到的，是在「七一大遊行」中遭到香港人強烈批評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5年其第二屆任期中途突然以健康理由宣佈辭職，而與此同時他又立即獲命任為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名義上地位屬於國家領導人層級，雖然並不具政治實權）；可見，中國政府至少會主動考慮更改一些非常不受香港人歡迎的政策和政治決定。

過去幾年，中國政府與香港民主派的關係始終未有明顯改善，但其活動彈性在一定程度上較過往十多年為大；政制改革與民主發展方面，到了今天仍舊有未有真正確實的時間表與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方案，但又基本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規定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在隨後一屆普選立法會。

總括而言，2003年「七一大遊行」所爆發出來的民間政治力量，並未徹底改變自「六四事件」以來的政治及民主化發展困局，但也局部地促使中國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取態較過往更有彈性。

此外，「七一大遊行」的強大民意力量不但促使原來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被迫無限期擱置，亦間接導致行政長官董建華提早下台，更進一步確立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不能不詳加考慮香港人主流民意的取態。當然，這些政治上的轉變，是否能真正確立香港的民主化發展，仍有待觀察。

「六四事件」與香港角色

上文從歷史發展角度檢視了「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影響與變化，以下則嘗試反過來看「八九民運」以來香港在中國民主發展方面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因應支持「八九民運」，反對當年中國政府於「五·二十」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香港前所未有地出現數以百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參與示威活動，這也促使了「支聯會」這獨特組織的成立。

支聯會的成立，是當年歷史事件所引發的、突如期來的產物；但相信其時任誰也想不到，支聯會在其後一直是在香港推動關注和爭取中國民主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她的存在亦對香港的社會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推動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方面，支聯會從成立當日起至今便一直擔當十分重要的旗幟角色。而如果細說，支聯會的支援內地民運方面所起的作用，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八九民運」期間，第二階段是「六四鎮壓」後至「九七回歸」期間，而第三階段則由「九七回歸」後至今。

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5月21日，當時北京學潮及民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甚至其時中國國務院經理李鵬已宣佈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也正因如此，由司徒華號召的「五·二一」大遊行獲

得破紀錄的百萬港人支持參與，有關策劃者更在當日遊行過程中宣佈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當時簡稱「全支聯」，而這亦為支聯會的前身）。「五·二一」大遊行以至支聯會的成立，大大推進了香港市民對內地民運的支持，而且可以說是把支援內地民運變成了當時港人的「全民參與」；其後個多兩個星期間，香港幾乎每日都有數以十萬計的遊行示威活動支援內地民運，較經典的是「五·二七」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及號稱有一百五十萬香港人參與的「五·二八」全球華人大遊行。而「五·二八」大遊行的參與人數之多，至今仍是香港的歷史紀錄。

支聯會的成立不僅進一步推動香港人站出來聲援內地民運，同時支聯會亦對當時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及其他爭取民主的力量給予實質支持，包括派出代表於五月底到北京聯絡當時的學生領袖等。

支聯會二十年

「六四鎮壓」過後，北京當權者大舉搜捕學生及其他民運領袖，令這些民運中堅不是被捕便是被迫流亡海外，再加上內地持續的「白色恐怖」，令原先稍為寬鬆的公民社會亦幾近絕跡；因而，支聯會在香港能公開並且合法地繼續推動平反「八九民運」的工作，反倒成為海內外民運的重心點，至少在旗幟性上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可能因此，當時便曾有內地官員公開指責香港是「反共基地」。

香港在支援中國民運上的旗幟性角色，不但沒有因「九七回歸」而減退，反而由於「一國兩制」的特殊關係，在「九七」後香港特區基本上保留其原來的制度，令在內地被視為「反動」甚或「顛覆」組織的支聯會能夠繼續在香港合法性存在且繼續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也因而在過去十多年間，香港一直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可以合法並且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這令支聯會的旗幟作用在「九七」後可以說被賦予更深層的意義。

近年，隨着中港兩地人民更緊密的往來，愈來愈多內地人民透過「自由行」、到港進行商業活動或以讀書等方式來港，因而支聯會的活動又多了更廣闊的空間去向內地人民宣傳「六四」真相，此舉對突破內地對「六四」消息的封鎖起着不少作用；這微妙的轉變，絕對是20年前人們所預料不到的。

相信更令人原先所想像不到的，是過去20年支聯會都從不間斷地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至今每年仍至少有數萬人參與（據估計有愈來愈多內地人參與其中）；這不僅是香港人值得引以為傲的歷史紀錄，在世界上這類持續並且生命力強的民間運動也是少見的。

當然，任何一個地方的民主發展與社會進步，都必須依靠當地人民作出爭取；不過，作為中國領土內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在促進中國內地進步與民主方面所能起着的旗幟角色與示範角色，顯然不容忽視。

「六四事件」與香港社運模式

最後，本文轉為探討「六四事件」的發生及支聯會的發展對香港本土社會運動（包括民主運動）在具體操作模式方面的影響。

在「八九民運」以前，香港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是透過組織發動起來的；然而，香港人在支援「八九民運」所作出的種種行動參與（特別是上街參與遊行集會及捐贈支持北京學生），都主要是透過傳播力愈來愈大的傳媒獲得有關訊息後的即時反應，也由於有關的社會行動參與主要是傳媒的間接動員而非傳統的組織動員，因此一方面發動出來的參與規模有可能會相當驚人，另一方面其參與人數和規模的不可預測性亦十分大，並且類似的社會動員在大規模爆發過後又可能會很快消退下來。

毋容置疑的是，「八九民運」過程中由支聯會所舉辦的遊行集會，是香港有紀錄以來至今舉辦過參與人數最多的民間社會

行動；而在往後，每年最少有數萬人參加並且持續了2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更開創了社會運動的先河。此外，正如上文所述，在「八九民運」以前，香港大多數的眾群社會運動都是透過組織發動的，但支聯會自1989年至今的多次大型遊行集會，大多數參加者都不是組織動員出來的，而是透過傳媒以至由於議題獲得市民認同而主動出來參與的，這為過去十多二十年香港的群眾社會運動開創了新的方向。「九七回歸」後參與人數幾近創歷史新高的2003年「七一大遊行」，其組織工作、宣傳方式及群眾參與模式，大體上取材於支聯會的經驗；可見，支聯會模式對香港大型社會群運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響。

「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超過20年，每年支聯會所舉辦、為數至少有幾萬人參與的「六四燭光集會」，其參加者不乏是多年來持之以恆、一直堅定參與其中的香港人。這些為數其實不少的堅定參與者，不僅成為支聯會活動的中堅，更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與參與者，包括作為近年「七一大遊行」的積極參與力量。

由於可以看到，「六四事件」不僅影響着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也匯集了一大批堅定的爭取民主力量。

總結

曾有評論指出，假如沒有「六四事件」的發生，香港的政局便不會如今天般仍舊是一大僵局，同時香港的民主進程也可更平穩地發展。這也許是合理的政治分析和預測。

然而，歷史發展所顯示出來的，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如果沒有「六四事件」對香港造成的衝擊，香港普羅市民對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的支持和參與很可能跟現時情況大有不同，參與程度也很可能大打折扣，這從廣義的民主發展角度看並不是更佳的发展方向；第二，平穩和諧的政制發展不一定意味中國政府便必然會放手給予香港人全面民主選舉權利，反而在經歷「八九

民運」以至「七一大遊行」後的香港民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令中國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視及回應。

要在現階段總結「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意義和影響，以至要檢視中港兩地在民主發展方面的互動，顯得是相當困難的；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六四事件」相信必定會有着重要的角色位置。

註釋

1. 有關組織參與者日後更成為現時香港民主派的骨幹成員。
2. 較明顯的例子就是「八八直選」的爭取。雖然香港民主派曾組織近一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進行「爭取八八直選大會」，同時發起簽名運動並獲超過十萬名市民簽名要求在1988年有部分立法局議員透過直接選舉產生，但在中國政府的大力反對下，當時的香港政府最終還是宣佈不實施「八八直選」。
3. 舉例來說，於1991年進行首次立法局直選，18個直選議席中，民主派便壓倒性地奪得至少16席，成績遠超乎原來想像；不少學者事後分析，那是「六四效應」所致。
4. 由於香港民主派組織（特別是有政黨性質的香港民主同盟）在「九一直選」中取得漂亮成績，而且在議會中又逐步確立類似政黨的分工模式，令其他建制及保守的政治力量不得不也向政黨化方式發展，包括香港傳統親北京力量於1992年匯集組成了民主建港聯盟，另外立法局內的工商界力量也在1993年組成自由黨。
5.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包括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在香港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區政治性組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繫。《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最終定稿條文，是在「六四事件」後經大幅增添有關內容而成的，而當中包括禁止顛覆的規定也讓人感到是要將中國內地的「顛覆」概念引入香港。

參考書目

- 魯平口述，錢亦燕整理（2009）。《魯平口述香港回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許行（2009）。《百年中國 民主滄桑》。香港：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等。
- OurTV.hk內容策劃（2009）。《我們的七一：廿一世紀香港公民社會啟示錄》。香港：一品文庫。
- 楊森著，林祺娟文字整理（2008）。《輕身再上路：楊森的從政記事》。香港：田園書屋。
- 陳雲（2007）。《民主戲一場：香港文化與現實政治》。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 郭一鳴主編（2005）。《言歸「政」傳》。香港：成報出版社。
- 蕭蔚雲（2003）。《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文放（2001）。《解讀北京思維》。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
- 蔡子強等（1998）。《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 許家屯（1994）。《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

第六章

「六四」後的反思 對中國發展的推動作用 二十年的變化和我的探索

劉銳紹

資深新聞工作者

一年容易又「六四」。如今屈指一算，89年的「六四事件」至今，已足足20個年頭了。在「六四」發生後的初期，我經常就一個問題苦思冥想，希望找到答案。那就是：在「六四」之後官方抓了一批人，也公開點了一批人士的名字。這些人被視為「大逆不道」，「搞亂社會人心」，「製造動亂」，但實際上這些人到底犯了什麼罪？竟然令官方對他們如此恨之刺骨，誓要擒之而後快呢？

其實，他們只是懷着樸素的民族感情，為國家的事情而憂心，繼而發為文辭，宣之於口，見於行動，欲作警世之鐘而已。誰料忠言逆耳，犯顏進諫，但卻招來橫逆。一些人成為階下之囚，一些人被逼效法豕突狼奔，流亡異域，國門不能入，有家歸不得。這一切一切，到底是誰人為之，孰令致之？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在這些被公開點名的人中，我竟然是其中一個，而且是十分罕有被點名的香港人，更是被外界視為「左派中人」的「自己人」。被點名初期，我不斷在想，我到底做錯了什

麼事情，竟然「蒙上垂青」，榜上有名？後來，我更被拒國門之外，成為「有家歸不得」的一員。這對我來說，不失是一大折磨，就像站在母親身旁，但卻不能觸摸一下，呼喚一聲。

不過，我很快就想到了答案。我之所以被點名批判，應該跟我、我的同事，以及一批忠於事實的新聞界同寅在「六四」期間的報道有關。這些歷史存真，刺痛了那時候掌權的人。如果真的是這個原因的話，我心裏馬上釋然，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我的錯，況且判斷對錯的不是官方，而是真正懂得判斷善惡的老百姓。所以，「六四」之後不久，我很快就沒有什麼包袱，我繼續輕裝前進，我繼續堅持我的路。個人的榮辱和外界的評介，都變得渺小如塵。

所以，這20年來，我思考和行動的重點不再停留在「六四」的悲情，而是要繼續探索中國富強而開明的前路，尤其是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令我感到：富強容易開明難，而且富強之後如果沒有醒悟，那麼開明就會更難，甚至會變成有錢的惡霸，中國又會從一個貧窮落後的深谷走入另一個自掘的深淵。在這個深淵裏，無道德為棟，無精神為樑，只要上面有泥土瀉下來，中國就會棟折權崩，多年努力全功盡費，豪情壯志同付秋風。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中國怎樣才能避免再走彎路？更不要再犯鎮壓自己人民的罪？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怎樣才能更成熟起來？怎樣才能理性地推動中國前進，做到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這些問題多年來都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

「六四」以來民間變化大

回顧「六四」以來的20年，中國社會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官方自然以此為榮，認為這是當年決意鎮壓才能換取的穩定局勢；甚至有高層官員說：如果那時候不是當機立斷，就不會有今天的成果了。

我對「翻天覆地」的解讀完全不同。這20年來的發展和成績，都是老百姓用了新的回應方法爭取得來的，官方只是被動地順應

老百姓的「軟抵抗」，並失去了過去那種從心所欲的駕馭本領。官方只能偶爾發惡，但又不能長期發作，更多的是被老百姓的要求和反抗推着走。接二連三的事件令我感到一種最大的欣慰，就是民智漸開，老百姓的腦袋清醒過來了，毛澤東年代的愚民政策已不能再起什麼作用了。用社會學家的話說，這就是公民社會逐步形成。這也應驗了毛澤東一句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在這裏不妨舉一些事例以說明之。「六四」之後，官方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要求群眾互相檢舉，但得到的反應是：真的有很多人檢舉，但被檢舉最多的是李鵬，第二位的就是楊尚昆。這些舉報人多是用公眾電話舉報的，舉報之後馬上離開，官方欲追無從。最令人欽佩的是文化巨匠季羨林，他也打電話舉報了，但他舉報的人正是他自己，因為他完全支持學生的行動，所以他也是「支持動亂的一分子」，請官方來抓他吧。

可見，「六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一早已經平反了。這與文化大革命不同，文革進行多年，以至結束之後多年，老百姓才逐步從迷霧裏走出來，明白文革的背後原來就是中共高層的鬥爭。但對於「六四」，老百姓很快就了然在胸，即使在過去20年裏官方避談「六四」，封鎖「六四」的資訊，但內地的老百姓仍然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保溫」，這是中國老百姓抗拒的一種軟力量。從這個角度看，要求官方平反「六四」，已顯得無意義了，因為官方的平反只是一種姿態，即使有朝一日官方平反「六四」，但是否等如官方能吸收經驗教訓呢？且看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只有寥寥數語，就可以知道要求官方深刻反省錯誤，到底有多大實效了。所以，一切貴乎民智繼續開發，理性的民間力量繼續壯大，與官方形成一種既可制約但又良性互動的關係。

可喜的是，在過去20年裏，老百姓不但在認識層面上了一個新台階，在行動上也愈來愈成熟。這種成熟雖然與現代化公民社會的依法抗爭（共產黨被國民黨欺壓時也提過「合法鬥爭」）和公民抗命還有一段距離，但卻有其特點。那就是沒有組織的，沒有預謀的，沒有人指使的，也沒有政治動機的。大家只是從基本生活的

要求，從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從自然的個人行動逐步變成集體行為。所以官方不能像過去那樣，機械地指責老百姓的反抗是有組織、有預謀和有政治目的。這正是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同時也合符中國社會的特點。

所以，按此思路觀察「六四」之後的中國，就會發覺在老百姓的自然動力下，中國社會和民間力量出現了一些頗為微妙的變化，形成一些值得深入分析的特徵。

「經濟實力—公民權—政治權」路線圖

第一個特徵是：老百姓不謀而合地用行動勾勒出一個路線圖，就是先鞏固自己的經濟實力，然後再爭取公民權利，最後再爭取政治權益。

有人說我這個「經濟實力—公民權—政治權」的總結只是官方立場的翻版，或者是另外一種包裝而已。一些朋友對我說：「官方不是經常強調『先經濟，後政治』、『人權就是生存權』嗎？這種說法只會弱化中國人在政治方面的訴求，把他們局限在『向錢看』的軌跡之上。我們應該超前地看問題，提升中國人的政治意識，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我完全不否定這些說法的最終目標，但卻不能這樣機械地看問題。其實，先強化整體的民間經濟實力，然後再提升他們的政治訴求，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發展軌跡。香港也是這樣，上世紀60年代以前，我們的父母一代還在為口奔馳，即使港英政府給予更大的政治權利，也沒有太多人理會。當然，執政者從來不會主動與人民分權，這是另一個問題，但必須從老百姓的實際狀態思考，其政治意識可以不斷提高，但卻不能揠苗助長。

根據聯合國的研究，按今天的國際經驗和標準，一個社會每年的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這個社會的公民意識將會抬頭；當

一個社會每年的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這個社會的政治意識將會抬頭。

觀乎今天的中國，全國的人均收入已近3,000美元，遠超1,000美元的國際標準。所以，維權事件不斷出現，這正是老百姓爭取公民權益的行動。這些事件一般與政治無關，官方也不能扣上政治的帽子。此外，在中國較發達的城市和地區，人均收入更超過4,000美元或更高的水準，也超過了3,000美元而政治意識抬頭的國際標準。所以，在發達地區的政治訴求也出現了，維權律師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案件中逐漸發揮功能，個別人大代表也發出「異見聲音」，一些官方智囊也有跟官方不同的意見。中共中央黨校年前也研究過這個問題，曾派人到其他國家考察，其中不少人也贊同中國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和政治意識正不斷提高，他們也建議官方不能再一成不變了。

雖然，上述現象都是零散的，未能形成大氣候，甚至有重新被壓倒的可能，但我們必須朝「從無到有」的發展角度看問題，隨着老百姓的民智和回應技巧不斷提升，如果中國共產黨看不見人民醒覺的力量，而像當年國民黨那樣冥頑不靈，繼續走高壓的路，那麼他們只會重蹈國民黨的覆轍。

所以，不能埋怨內地人民只懂賺錢，不了解人類更高層次的文明訴求。香港是一個幸運的地方，我們可以起一個引導的作用，但也要順着內地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批評官方故意拖慢內地的民主發展和政治改革，我們可以批評那些見利忘義的「向錢看」的行為，我們可以肯定和讚賞內地民主先鋒的努力和犧牲，但卻不能一概而論、抽離現實地強求內地所有人都要豁出去，甚至把「先鞏固經濟實力然後再尋求政治實力」的過程視為「歧途」，加以貶斥。

事實上，內地老百姓走出這條道路，正是「六四」之後大家不謀而合的探索，這個過程是不自覺但又發揮了作用，既分散行動但又凝聚了力量。如果不去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內在情況，就很難發

現和發揮這一特點。我把這一特點稱之為「潛動力」。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社會動力，但看不見這種「潛動力」，所以也陷入了只及一點，不及其餘的誤區。

「三合會主義」到「四合院精神」

第二個特徵是：內地老百姓回應官方管治的方法和技巧不斷聰明起來。隨着這20年的觀察，我把這個老百姓的「政治智慧化」過程總結為一句話：慢慢從「三合會主義」提升為「四合院精神」。

所謂「三合會主義」，不是指黑社會，而是把「合情，合理，合法」裏的三個「合」集中起來。這本來沒有什麼特別，我只是把這種方法用通俗化的語言歸納和表達出來而已。不過，這確是中國老百姓過去20年來的爭取方法，不單在維權事件上應用出來，在政治事件上也如此。

「六四」之後，官方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壓制行動加強。但這畢竟逆民意而行，故不能持久。由1992年開始，「群眾性事件」不斷冒出來，數目大增。內地的「群眾性」事件，是指上訪，請願，示威，遊行，罷工，罷課等爭取公民權益的行動。在1992年之前，這類事件不超過8,000宗，但由1992年開始，這類事件不斷增加，引起了官方的重視，但一直無法壓止這類事件繼續發生。到了2008年，官方統計這類事件已增至10萬宗左右，但內地社會學家根據各省的資料進行統計，發覺這類事件不下12萬宗，換言之，官方有可能壓縮數字，以免影響更壞。可見，中國老百姓愈來愈懂得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爭取權益。

老百姓知道，投訴要找到對頭人，而在中共的體制裏，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就是老百姓投訴貪官污吏的權威地方，所以不妨拿中紀委的一些數字作為參考。2003年7月1日至8月20日共51天，是中紀委官員視為「應接不暇」的51天，創下一時紀錄。在這51天裏，直接到中紀委門前請願陳情的人士共一萬多人次，集體上訪者

共453批，平均每天約二百多人。更突出的是，中紀委收到投訴後進行調查，發覺只有百分之三是「屬於精神錯亂」的，其他投訴都確有其事。近幾年來，中紀委不敢再透露這類數字了，估計有增無減。

老百姓在努力爭取合理權益的過程中，又很自然地掌握分寸，用廣東話說，就是「掌握火候」。他們不是專業革命家或社會活動家，沒有什麼社會行動的理論和指引，也沒有刻意的分工，但總體而言，他們卻巧妙地避開了兩種情況。

一是他們的行動內容都是民生性、社會性或經濟性的，而不涉及政治性。他們維護本身的公民權利（例如保護私產，追究貪官），但暫時不涉及政治性的層次（例如政治體制，選舉及被選舉權）。後者的權利很自然地由知識界爭取，同樣按合情、合理、合法的「三合會精神」，以及用言論為主的方式進行。

二是他們暫時不會觸及官方的底線，不會要求改朝換代，推翻政權。「六四」之後初期，老百姓對於官方的不合理政策，不約而同地採取一種「軟對抗」的方法，不公開抗爭，但卻不會按照官方的安排辦事。例如在「六四」之後，官方安排政治學習，以加強思想教育，但這類活動都搞不起來。被動員或勒令參加的人，多是收取津貼學習的，或是脫產學習的。對於他們來說，是公費休息，何樂而不為。用內地一句絕妙的話說，這就是「十億人民一個樣，同心協力騙中央。」

不過，對於官方能夠順應民情而作的改變，例如經濟不斷開放，若干制約貪官的措施，老百姓又雙手贊成，即使這些措施在很多人眼中只屬於小恩小惠，甚至是門面工夫，但老百姓都會接受。這樣才能反客為主，把官方引導到正軌之上，否則連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去肯定，那又如何誘使官方繼續良性改變呢？內地的社會學家形容，這是中國特色的、讓老百姓化「被管治」為「管治」的方法。經過這20年的觀察，我把這種方法歸納為第四個「合」，那就是「合乎操作原則」。這個「合」與上述的「三合會主義」連在一起，就變成了「四合院精神」。

試想，中國四合院的設計，四面通風通氣，令人住得舒服。而且，多理想的政策、多美妙的前景，都必須講求環境和能否操作，如果只想目標而不想達到這個目標的過程，那只是一片空想而已。上述的「四合院精神」和由此而引發的行動，不是老百姓的妥協，而是老百姓的聰明，既減少無謂的壓力，也減少官方的無謂恐慌，從而爭取更多時間含枚疾走，創造民間實力。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國情，與官方強調的國情（需要穩定，以便管治）完全不同。果然，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公民權益的意識已逐步形成。我們不能只看到內地的政治空間仍小，以為一般老百姓「不懂爭取政治權利」就心焦氣燥，殊不知內地的老百姓正在環境許可的條件下，發揮潛動力。

「新三民主義」

第三個特徵是不斷「開發民智」和「壯大民氣」。這一點與上述談到的「提高民技」（即爭取的技巧），我把它們歸納為內地民間的「新三民主義」。不斷開發民智，包括了自覺和不自覺的開發，但同時付諸行動實踐。這是一切改變落後面的基礎，逐步把民間的士氣壯大起來，敢於站出來爭取。沒有這個基礎的爭取，所有改進都是空談。

回顧這20年來，無論官方怎樣壓制，老百姓自我開發民智的渠道已愈來愈廣，而且向縱深發展，光是從互聯網世界上已經可以看得出來。至2009年，中國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已達3.8億，其中有三大特點：一是年青網民已成為主體，68%網民的年齡在30歲或以下。二是農民網民近年來大幅上升，2008年底已超過8千萬人；光是2007年一年之內，農民網民共增加3千萬人，增幅高達127.7%。三是互聯網已逐步成為官方難以卡壓的資訊流通站，揭發多類官方的失政，突破了官方的封鎖。官方雖然仍有多種辦法控制互聯網，但從總的趨勢來看，官方的行政手段難以控制民間智慧，互聯網還將繼續發展。

此外，內地的傳媒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也要尋求市場經濟下的生存之道。官方雖然仍大力控制着傳媒的言論自由空間，但愈來愈多傳媒懂得「擦邊球」的藝術，在適當的時候和灰色地帶上尋求突破，令官方不願意外泄的資訊透露出來，也令官方疲於奔命。我們不能只看到內地傳媒仍然受到重重制肘，身不由己，一些傳媒仍然甘於做官方喉舌，就認為內地的傳媒沒有作用，甚至沒有生命力，殊不知它們正處於一個漸進的階段。看不到這些角力中的漸進，就看不到中國的希望。

還有，近年來「海歸派」的回潮，也帶來一定的衝擊。由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外派的公費留學生超過80萬人，私費出國留學的更數以百萬計。其中不少已回國工作，並已在中層位置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目前，中國正處於兩種思維模式磨合的階段，是舊有的傳統力量同化新生的力量？還是新生力量溶化傳統力量？是非常值得觀察的動向。我們應該有信心，新生力量（尤其是民間力量）將會愈來愈突出。執政者經常強調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但國情也包括了愈來愈強烈的民主要求，如果執政者不能順勢而行，他們將面對愈來愈大的困難。

至於知識界的爭取行動和活動也愈來愈聰明。他們過去的方法基本只有兩種，一是明刀明槍的對抗（例如民運人士），二是「擦邊球」（例如一些知識分子搞函授學校，把民主教育寓於國民教育之中），但近年來他們更懂得拿捏分寸，盡量在官方的政策上限遊走，並在法律的空間內活動，令官方只能關注，警告和偶爾殺一儆百，而不能像過去那樣泰山壓頂。近年來維權律師的興起，非政府組織大量增加（據清華大學調查，目前內地的非政府組織至少已有270萬個，官方則指有五十多萬個），雖然這些非政府組織沒有發展到像海外的壓力團體，但卻是一種新興的民間力量。

上述各種因素，就像酒母發酵一樣，由淡變濃，由弱變強，由少變多。官方雖然不願意看到這些情況，但由於老百姓都是不謀而合地按照上述「三合會主義」和「四合院精神」行動，官方也不

能像以前那樣高壓，只能因勢利導，情況緊張時則依然故我地卡壓，情況許可時則稍作鬆動，形成了「六四」以來的官民互動關係，以至近年來「民告官」的案件不斷增加。20年前，「民告官」的案件幾乎是零，但到2008年，「民告官」的案件已增至約20%。雖然這些案件都是低層次的，但畢竟說明「民氣」逐步上升。大家不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但對於違法枉法的貪官污吏已不再啞忍。

老百姓的要求也推動了一批體制內的人士，有人稱之為「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或「開明力量」。從香港人和國際的角度看，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承認中共的體制內仍有健康力量，即使有，但也是相當微弱，無法發揮作用。我的觀點則是：即使體制內的這種力量微乎其微，但也應該肯定，我會把這些微弱的力量也視為人民力量的一部分，可以擴而充之。

目前外界看到的大概形勢是：官方體制的制肘力量遠遠大於這些健康力量和開明力量，官方的集體目標（包括政權不可動搖和實質的利益）仍是一大誘因，令健康力量難以擴大，甚至被同化。不過，我倒覺得不能單看到這些負面現象，而忽略了細水長流的長遠影響。

「條塊分割法」與進退之道

概括上述變化，我希望今天的中國人都能夠做到以下兩點。其一，在認識上要用「條塊分割法」來看待中國問題，要是其是，非其非，把不同性質的事情分為條條塊塊，逐一思考，而不是停留在過去的「二分法」和非黑即白的方法。一些人士出於對官方政策和內地官場的不滿，很容易產生不滿及否定一切的取態，即使是中國近年來取得的經濟進步，在情緒上也不願意接受，或被政治上的落後掩蓋了對經濟成績的肯定。其實，只要把近30年來的經濟成績視為老百姓爭取得來的成績，就可以辯證地看待中國近年的發展了。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官方只是順應老百姓的要求，同

時也不能不順應，例如最早冒死搞私有制的正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把中國的私有制也衝出來了，官方如今欲阻無從。所以，看到中國近年值得肯定的成績，不妨拍拍手掌；對於應該批評的，可以繼續批評。

其二，在行動上要懂得「互借東風，進退有度」。觀察過去20年的中國變化，鼓起要求改革的東風，是老百姓，官方只是順應這股東風，一方面改變了一些過去的陋習，而另一方面則乘此東風改變一些管治技巧，最終的目標仍是要加強管治。這兩股力量相迎之下，出現了一種「互借東風」而推動中國前進的效應。老百姓不斷通過官方可接受的方法來擴大民間力量，而官方也只能混合和輪流使用順應、引導和卡壓的方法來控制局面和避免民間的反彈。有人形容官方的手法是懷柔與高壓並施，但從長遠效果來看，這正是壯大民間力量和建立公民社會的過程。所以，「互借東風」之餘還要懂得「進退有度」，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什麼時候不能進又不能退，就站着不動。必須掌握分寸，不要揠苗助長，也不要浪費機遇。

官方也應該做到上述兩點，用「條塊分割法」來看待老百姓以至不同政見者的要求，不要看見他們唱反調，就認定他們是「不穩定因素」。官方更應該借助民間要求的東風，順水推舟，由經濟改革進而政治改革。

「六四」的解結之法

我在過去20年裏，不停地探索這些方法。說實在的，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效。有人說我是「改良主義」的翻版，或者是良好願望作祟。但在我的實踐中，卻發現積極的因素正不斷增加。民間的覺醒是最大的推動力，即使是體制內的官場中人，也有一些在改變中。所以，我不怕因為與內地各方官民溝通接觸而被指「意圖不軌」或「刻意逢迎」，也不怕公開批評內地的落後面以至辯論爭論而再次被官方卡壓。一切關鍵在於我的言論和行動是否對

中國有利。過去20年裏，我先後兩次共八年被拒諸國門之外，回鄉證也被沒收過，但這不能阻擋我繼續探索中國如何理性發展的進程。我努力尋求解決中國各種困難的方法，而這些方法要講求操作性強，可行性高，否則空有滿腔熱情而不得其法，只會事倍功半。當然，我尊重其他人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推動中國前進，只要殊途同歸，不會互相排斥就行了。大家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前衛的人士可以起先鋒作用，而這種先鋒作用必須考慮如何轉化出後繼力量。愛國可以是轟轟烈烈，愛得慷慨激昂，但也可以愛得策略，愛得深沉，愛得仰不愧於天而俯不忤於地，愛得敢對萬世千秋。

今天，「六四」20年了，也該是解結的時候了。這個結必須官與民一起解，其中官方的決心尤其重要。他們不能再墨守成規，把解結的機會一一放過。有人建議效法外國的「真相與和解」方式，逐步公開事件真相，官民一起反省，最後達致大和解。有人建議用特赦的方法，先減少壓迫，穩住民心。我看，官方今日的信心和決心尚未足夠，不妨可以考慮眼前一些更漸進式的方法。

例如，官方可先讓那些漂泊海外的年老的異見人士回國，他們已經年紀老邁，儘管回國也只是落葉歸根而已。其次，官方可以再讓已經脫離民運活動的異見人士回國，他們雖然相對年輕，但既然已不再是「高危人物」，讓他們回國也無妨。再者，官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撫慰「六四」的死難者家屬，例如減少阻撓他們進行悼念活動，派員上門以私人朋友式進行慰問，醞釀氣候，以解開這個歷史的結。先做了這些工作，其他日後再談。如官方連這些工作也不做，那就說明他們的誠意和決心也不大了。

也許，我的這些建議又會被視為不受歡迎的癡人夢話。官方可能認為這是糖衣毒藥，最終還是令官方被動。民運人士則會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改良主義」或良好願望的典型，甚至是與官方妥協的產品，放棄了平反「六四」的要求。罷了，話請隨便說，而我則堅持我的「階段論」，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一步一步朝最終目標前進。只要最終令中國富強而開明，人們說怎麼我也不管了。

參考書目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1989)。《人民不會忘記》。香港：香港記者協會。(註：此書2009年趁「六四」二十周年已經再版)

二十三名香港記者 (1990)。《採訪「六四」的烙印》。香港：青文書屋。

丁子霖 (編) (1994)。《「六四」受難者名冊》。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

刑天、一葉 (編) (1989)。《從「四五」到「六四」——兩次天安門事件》。香港：天河出版機構。

第七章

兩岸重大學運的歷史比較分析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 「野百合學運」

林仁傑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束從此開啟了兩岸不同的治理面貌。在台灣，國民黨表面上政府在政治上實行自由民主、在經濟上則是採取資本主義的路線；然由於領導者「國共不兩立」、「反共復國」的意識型態之下，台灣的領導其實採取的是中央政府一條鞭的統治，不容許有異議的聲音出現來危及國民黨的政權。在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由於在政治上厲行共產主義，政治完全一元化，經濟上走的是社會主義路線，因此整個國家形成一個相當封閉的體系。然這兩個國家都可以看出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即是「威權體制」在掌控整個國家的治理與發展。

往後的40年，兩岸由於同時受到一些外在因素影響，例如整個世界的政治外交局勢轉變，另外又分別受到自身內在社會脈絡

的發展，例如新的世代對於政治現況的不滿等，雖然兩岸的政治氛圍都已有所改變，政府也嘗試回應民眾的訴求，但仍舊趕不上民眾對於自由民主的極度渴望。因此，體制外的抗爭已無可避免且虎視眈眈地一觸即發。

1990年代前後，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別發生了相當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六四天安門學運」以及「野百合學運」。這兩次學運事件都有一些共同點，例如要求當政者在政治上能夠更加開放民主。但是1989年6月4日的「六四天安門學運」雖然因此引起全球對於共產黨的一陣撻伐，也迫使了中共作了一些讓步，但整體而言這起學運在政府強力打壓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的污名化之下，筆者認為並不能算是成功的；相反的，1990年3月16日的「野百合學運」在當時可能一觸即發的暴動之下，執政者接納學生「解散萬年國會」等訴求，往後幾年除了進一步讓台灣更為民主化，同時也讓學運在台灣更為風起雲湧。

回顧近20年前，兩岸所發生近代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目前已有相當多的一手資料與後人研究呈現。因此筆者藉由這次紀念「六四學運/民運」20周年的機會，重新回顧及省思這兩次重大的學運，探討並比較這兩次學運對於後來兩岸的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本文所着重於當時兩次學運所發生的時空背景，因為筆者相信特有的社會脈絡才會引起這樣軒然大波的事件；此外，這兩次學運何以會造成軒然大波的影響，甚至當時受到外界極大的關注，這是本文第二個關心的焦點；最後，學運對於整個社會造成了哪些影響，這是本文亟欲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六四天安門學運」的原因與影響分析

關於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儘管中國政府當時盡全力封鎖消息，逮捕相關人士，或是利用其掌控的媒體發佈不實訊息，意圖塑造天安門廣場的抗爭是有人心士顛覆政府的暴動行為，然而

種種有關「天安門事件」的一手報導資料仍舊逃過官方政府的查緝而流出海外。如今透過這些資料的呈獻我們得以還原當年這場中國近代最震驚全世界的民主抗爭運動。

例如十月評論社(1989)所編的《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1989)所編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1990)所編的《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方良柱等人(1989)所編的《悲壯的民運》；聯合報編輯部(1989)所編的《天安門一九八九》。透過這些富有珍貴照片並於當時紀錄下關鍵事件的史料，我們得以重新還原「六四」的始末。又或者是「六四學運」本身的參與者傳記，例如：劉曉波(1992)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從中不但可以看出「六四事件」的經過，還可洞悉參與者的內心世界。另外從西方人的眼中所紀錄的「六四」，也能挖掘出我們所看不到的觀點，例如：史景遷(2007)(Jonathan D. Spence)《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艾克敏(David Aikman)(1990)所著的《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R. Cherrington(1991)的《中國的學生：民主的挫折》；F. N. Pieke(1998)的《1989年中國北京的人民運動》所呈現出西方人眼中的「六四」。

更進一步，透過現今科技的日益發達，例如從「六四民運志」(www.ngensis.com/june4/june4.htm)所蒐整的一手資料跟珍貴照片藉由網路科技而傳遍世界各地。

因此，本文的重心將放在「六四學運」時的時空背景脈絡，以及「六四學運」後來對於中國的影響為何；不再著墨於學運的事件經過。

1989年前後中國的社會環境

探討中國1989年當時的社會環境如何引發「六四學運」，將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何以在1989年會引起中國近代史上如此大的一個暴動。可從幾方面來探討(丁望, 1995a; 丁望, 1995b; 中共問題

資料雜誌社，1989；張良，2001a；張良，2001b；陳一諮，1990；葉明德，1990）：

經濟資本主義化及官場貪污腐敗

1989年當時中國大陸經濟背景、改革和開放打破了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大一統的形式，出現了中外合資企業、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國營也採取了承包制、股份制等，合作社經濟則採取了包產到戶的聯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相對的，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外，出現了很多利益團體，如企業家、個體戶等；工人和農民也分裂為不同的利益團體，例如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專業戶農民和普遍農業勞動者，各自有自身的利益訴求。利益多元主義取代了利益一元主義，必然要求政治多元主義，在人民代表大會內、在黨內都要求有自己的利益的代表。承認多元主義和要求承認多元主義是民主的第一步。

同時，改革和開放出現了商品經濟，亦即市場經濟。當社會開始出現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要求平等經商、公平競爭，取消壟斷，特別是非經濟的特權，必然要求民主。因此多種經濟成分、生產和市場的發展以及新中產階級的開始形成是「六四學運」的經濟背景。

另外一方面，中共十年改革的結果，廣大人民的生活固然較文革時期改善，但商品經濟的引進，卻使得少數高幹利用特權牟取不法利益，因此對官員賄賂、貪污、腐化行為的抗議，在天安門上到處各種要貪官下台、學習胡耀邦清廉的標語處處可見，成為「六四學運」發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國際氛圍的轉換

1989年前後，蘇聯及東歐國家所掀起的政治改革旋風，包括蘇聯承認一黨制下的多元化、匈牙利承認多黨制下的多元化、波蘭團結工會在選舉中的勝利，加上菲律賓、南韓、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的民主化運動。

因此中共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東、西方先進國家，以及台灣、香港的情況，大陸人民已逐漸了解，相較之下更增添了對現狀的不滿，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大學生，對西方民主理念與制度更是耳熟能詳，再加上社會主義原本就含有民主自由的種子。多種因素集合在一起，自然形成「六四學運」要求政治改革、民主法治的強烈呼聲。

知識分子的支持

1978年以來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壟斷，特別是史達林主義的壟斷，人們正通過多年來的實踐再思考、再評價、再認識過去所一貫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加以開放所必然帶來的西方思潮。因此，出現了意識型態的多元化，反對把思想、理論定於一尊，這就成為「六四學運」的思想背景。這種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運動，還因為三中全會以來，學術思想受到多次壓制而受到鍛鍊，日趨獨立思考加強認識，在每一次壓制之後雖有一個沈寂時期，但反彈的力量更大。也因此「六四學運」中匯集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

而這當中學者的支持也成為學運興起的一股相當重要的力量，包括方勵之、包遵信、嚴家其、于浩成、李澤厚、戴晴等人的簽名連署支持，使得「六四學運」的聲勢更為茁壯。

共產黨內的鬥爭

中國近代對於是否開放早年即存在鴿派與鷹派，而胡耀邦之所以下台也是在黨內鬥爭失敗的結果。而黨內高層鬥爭與民運糾纏在一起，黨內高層領導原先在改革問題上的爭論在民運過程中表現為對待民運的強硬路線和溫和路線的鬥爭，是以即使運動中出現若干緩解的機會，佔上風的強硬路線主張對學運不能採取放鬆的態度，任何緩解的可能就必將意味着溫和派的勝利。因此鄧小平在1979年4月25日講話中已經把學運定位為動亂，有計劃的陰謀。從這裏可看出鄧小平對強硬路線的支持。

一旦學運混雜了政治因素在當中，勢必讓單純的學生抗爭埋下更多不可預期的因素，而最終導致「六四」的慘劇發生。

「六四學運」的影響與意義

1989年的「六四學運」不管是對中國或全世界，在當時和後來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也是現今探討1990年代全球學生抗爭的最具代表性案例之一，與1960年代歐美反越戰的學潮均是學運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六四天安門學運」大體上有以下幾點的影響與意義（阮銘，1993；凌志軍，2003；陳一諮，1990；陳小雅，1996；楊建利，2001；劉曉波，1992）：

悼念胡耀邦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導因乃源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因心臟病逝世，引起了海內外的頗大反應，就在翌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北京大學舉行悼念活動，青年學生藉悼念胡耀邦活動宣洩對政府及社會現狀的不滿。在中國人民當中，胡耀邦代表自由改革和思想開放的象徵，對知識分子及年青人特別關懷及保護，而1986年秋的學潮，胡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可是他在知識分子中的地位卻日益高升。胡辭職之後，政治體制改革明顯停下來，而經濟改革又出現問題，通貨膨脹、物質波動、供需失衡，直接對人民生活構成影響，民間隱伏強烈不滿情緒，人們特別不滿一些幹部特權階級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特別是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在懷念胡耀邦之同時，要求政府對胡耀邦作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及澄清胡氏被迫辭職的真相，這等於要求政府正面對待開放改革，加速胡氏所支持的民主自由步伐。

胡氏之死，與「五四運動」70周年之日相距相當接近，這是學潮愈變規模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五四運動」的精神在於民主與科學，也是中國青年學生當前最為渴求的。1989年4月18日，5,000名來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政法學院等大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沿途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官盜」、「打倒貪污」、「民主萬歲」等口號，使悼念活動正式披上政治色彩，而學生提出的

政治要求亦越來越明顯，而矛頭開始指向政府高層的領導人。學生隨後提出簡單而明確的要求：要求對話、要求民主，可惜對話不成，而官方媒介《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8日發表一篇措詞強硬的社論，指學生運動為「一次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引起學生強烈不滿，於是引發多次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最後學生採取絕食行動，希望政府能理解他們的願望。學生的願望在1989年5月20日實施戒嚴令開始，差不多已完全被粉碎，數十萬大軍圍住北京，為武力鎮壓響起警鐘。1986年的學潮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告終，而1989年的學運則遭到血腥暴力鎮壓。

十年的改革開放仍然是政治掛帥

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於1989年6月15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其中聲稱（引自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1989）：

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全國就會發生更大的動亂和分裂，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會毀於一旦，十年改革建設的成果就會喪失殆盡，全國就會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文革結束十多年，許多人以為一些名詞、手段會成為歷史陳跡。可是，人們在「六四」中又再度見到「階級鬥爭」，再次聽到「反革命分子」等字眼。人們懷疑，「革命」的含義應該是怎樣，而「反革命」又是什麼一回事？與政府或當權者持相反論調，在民主社會原屬平常，但在專制的中國國內，竟然不能相容，一句「反革命」，便把人壓下去。1989年6月4日以後，當權者在全國上下通緝學生領袖、工人領袖，除了官方的「假消息」外，其他消息一概禁止流通，否則被指煽動「反革命」及「造謠」。上海有三個工人領袖在1989年6月15日被判處死刑，各地已拘捕了數以千計「暴亂分子」，公安還四處追查有關人物。事實上，全國已進入白色恐怖之中，連家人也舉報自己親屬，文革期間的互不信任，人民被迫噤若寒蟬的情況，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日子，再度在中國大陸重現。

事件充分體現了中國政權的法西斯本質

在「六四」之前，許多人對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有着相當的期待，認為以鄧小平等人在毛澤東年代歷經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磨難，在政治與意識型態方面應更為開明、民主。然而「六四事件」卻充分體現了共產政權的法西斯本質，不因經濟改革而有所改變。

例如當時「北京市高校聯合會」於1989年6月4日所發佈的《告全世界同胞書》中就指控（引自十月評論社，1989）：

4月15日，發起於北京，燃遍於全國，影響及全國，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青年學生舉起爭民主，爭自由，反專政、反獨裁，剷除官盜，廉潔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意願，喊出億萬人民的心聲，這次運動繼承和發展了五四精神，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為首的一小撮反黨，反人民分子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懼怕萬分，恨之入骨。他們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為了保護自己及極少數人的利益，掩蓋事實真相，造謠滋事，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反革命動亂，他們的一意孤行威脅、恫嚇，軟硬兼施，以致於向無數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世界特大慘案，事實充分暴露了他們的極端兇殘和腐朽的本質，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獨裁政府，證明了鄧小平，楊尚昆及李鵬一小撮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人民的公敵。法西斯政府已經撕下了偽善的面紗，獨裁者已經暴露了兇惡的嘴臉。

有人認為以上是當年激情的指控，然而「六四」經過20年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仍為兒子在廣場犧牲搜集相關資料，中國公安仍然全天候監視當年主事者的一舉一動。改革開放20年雖然

促使中國經濟出現不錯的成績，卻一點也無法鬆動法西斯政權對人民全面性的宰制。

事件顯示中國仍是高度人治社會

事實上，「六四事件」發生時，許多專家都猜測，下令鎮壓學生的人很可能是鄧小平。在美國出版的《天安門文件》一書中更進一步指出包括調動解放軍、宣佈北京戒嚴、指定江澤民為繼任總書記都是鄧小平下最後決心者。而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要不要實施戒嚴時，楊尚昆、薄一波列席，會中趙紫陽和胡啟立發言反對戒嚴，李鵬、姚依林贊成戒嚴，喬石則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表決時喬棄權，成二對二的僵局，最後，薄一波發言主張把問題交給鄧小平決定。文件中更指出，1989年5月18日早上八點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大老和政治局常委李、喬、胡、姚四人開會，趙紫陽拒不出席，另有軍委會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數人出席，會中正式決定宣佈北京戒嚴。會中王震發言最激烈，主張應由軍隊把學生當作反革命抓起來，不應對他們仁慈。趙紫陽下台並遭軟禁後，1989年5月27日晚上八大老在鄧小平家裏開會，討論長達五小時，會中決定挑選人在上海的江澤民繼趙紫陽為總書記，如此江澤民在八大老的欽點下，登上了中共黨的總書記的寶座。而我們必須知道，不論是鄧小平，或是所謂的八大老，事實上在制度上都已是退休的老人，可是在實質上卻掌握了中國的實權，這種享受實權卻超越制度之外，只有在人治的社會才会有此一現象。

事件突顯中國和平演變的失敗

「和平演變」並不是什麼新名詞，事實上，毛澤東早在文革期間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論及。社論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着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

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社論提醒人們注意這個理論緣起的國際背景：「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現代修正主義篡奪了政權，逐步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給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歷史教訓。」「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從內部來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走上『和平演變』的道路。」（引自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1989）毛式繼續革命論提供中國高度自覺地抗拒和平演變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時代視反和平演變為共產政權持續鞏固的唯一保證，也因為這種瘋狂地反和平演變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1978年在「走資派」鄧小平三度上台之後，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許多人便期待中國內部因為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會導致政治民主化的「自然」結果。這樣的觀點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鄧小平雖然推行經濟改革，但在政權本質上卻仍與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沒什麼差別。這是就中國內部的經濟改革來說的和平演變。

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和平演變來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想讓中國和平演變，讓中共步上前蘇共的宿命；而北京則在爭取時間，藉經濟發展壯大自己。1989年的「六四學運」，是中共強烈拒絕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按照中國官方的標準說法：期望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制度和和平演變，一直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戰略企圖和策略追求，我們對此務必保持清醒，並警告美國及西方國家在與中國接觸時，勿存有和平演變的念頭。

實際上，美國許多研究中國政策的中國專家，大多將這樣一種理論掛在嘴上：「凡是有麥當勞的國家，彼此間絕不會發生戰爭。」這種說法很具體地、也很直接了當地將美國二十多年來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做了簡明的註腳。這些學者都希望透過與中國的

積極交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讓中國自然產生和平演變。對美國而言，對中國的新圍堵政策，其戰略目標是要以經貿文化資訊的交流，加上政治上的分化與壓力，造成中國的和平演變，因此在策略上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法。然而，近幾年來中國的發展卻與美國所期待的和平演變大相逕庭，甚至可能發展成為足以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的區域霸權，美國國內的輿論和強硬派開始強調「中國威脅論」，並批判「和平演變派」的理論，認為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聲勢在繼續上升，侵略性日漸高漲，也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不能再輕信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一定能導致政治改革的起步和民主自由的實現。

「我們正在創造歷史」——台灣「野百合學運」的分析

上述在分析完大陸的「天安門學運」之後，回過頭來看看對岸的台灣，在1991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則是台灣近代史中追求民主自由一起相當重要的社會運動，同時也展現了學生自主、關懷社會的一面。目前「野百合學運」的一手資料，包含鄧丕雲（1993）

《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以及范雲（1993）《新生代——自我追尋》這兩本書之外，還包含何金山等人所合著（1990）《台北學運：1990.3.16-3.22》、林美挪所編（1990）《憤怒的野百合》、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所編（1987）《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及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等書。透過這些一手史料或訪談資料我們得以窺見當年這起台灣近代史上最最重要的學生運動之一。

199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

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面臨了整個社會局勢的內外挑戰，包括當時中國國民黨所實施的戒嚴體制，外在受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大陸的亞洲戰略轉變所挑戰，內部則是官僚系統不再能夠嚴密控制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各層面，最令執政當局不安的應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市民社會的雛形誕生，人民自主意識也跟着

高漲。隨着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社會運動」（當然也包括學生運動），直接挑戰了國民黨的權力。「1987.7.15政府宣佈解嚴」、「1987.9.28民進黨成立」、「1988.1.13蔣經國去世」等諸多大事，無疑對當時的社會投下許多未知數。

1980年代的校園場景不出1950-70年代，包括學校風氣保守；主政者官僚式的作風；教授的教學僵化；教材死守中國化；黨化教育實施；國民黨、救國團、軍訓人員、特務、和職業學生盤據校園等。而學生的社團活動仍舊被嚴格限制，出版刊物仍舊必須經訓導處同意才准予出刊。

在這樣的氛圍下，1990年代前仍發生數起校園學生抗爭活動，但都仍以台大為主，包括：1982至1988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風波、1985年李文忠絕食事件、1986年鹿港反杜邦事件、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台大的「自由之愛」等。

「野百合學運」的起因及過程

學生之所以引發這項運動，其實正是反映了當時全國老百姓不滿國民黨的內部政治鬥爭，以及長期以來政治陳腐的反射動作罷了。1990年3月初，李登輝、李元簇與林洋港、蔣緯國兩組人馬為了競選總統而掀起的一連串政治鬥爭，以及為了討好那700位萬年老國代的種種表現，的確讓全國人民都相當不滿。

3月8日台大學生會曾邀集社運團體、教授協商，達成幾點共識，將行動定名為「還政於民，重建憲政」，包括：3月18日在中正紀念堂舉辦全民民主大會、100位教授連署刊登廣告抗議這種不民主現象、張忠棟等教授更準備在3月10日台大校務會議提出罷課案。台大學生會內部也曾提議3月14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3月21日總統選舉日到仰德大道圍堵老國代，但是另外一個學生組織「民學聯」，卻認為：「總統選舉這種泛政治化的議題，搞一次行動就收場，並不具有學運的根本意義。」

3月9日下午林洋港宣佈正式退出總統選舉，使得國民黨「茶壺裏的風暴」暫時緩和下來，因此張忠棟曾電告學生會：「林洋港退選，政治危機已經解除，因此取消3月18日的群眾大會。」而原本3月10日張忠棟等教授要在台大校務會議提出罷課案，也因此沒有執行。但是學生會副會長鄭文燦卻表示：「（這通電話）引起學生會的憤怒，學生認為教授們的心中，有一個李登輝情節。」3月11日學生與社運團體在立法會開記者會，發表「還政於民，重建憲政」聲明，要求李登輝立即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國民大會。3月13日，四位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燒掉國民黨黨證；3月14日「台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前往國民黨抗議，要求制憲；此外當天中原大學一場座談會上，「解散國民大會」成為全場討論焦點。

由於國民黨一直不願回應學生訴求，台大學運社團與其他社運團體也遲遲沒有下一步。因此在3月16日傍晚台大學生楊弘任、周克任、何宗憲三人，與工技學院學生，總共不到十人，自發性地來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於是，這場「插槍走火」的學生靜坐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曲。

3月16日傍晚有學生靜坐一事，陸續被傳開以後，3月17日全國各地幾乎都傳出要求老國大下台的聲浪。幾所大學的學生都開始有了自發性的抗議行為，例如：文化大學學生組成民主聯盟，3月15日前往中山樓抗議，發生群眾圍毆尾隨教官的事件，3月17日法律系學生「送鐘」給國民大會；政大學生為主組成的「全民逼退老賊運動總部」在3月17日召開記者會，發起全民簽名逼退老賊的活動。

在學運蓄勢待發時，教授的態度是一個關鍵。3月17日台大自由派教授決定發起「柔性罷課」，將3月19日至25日定名為「民主教育週」，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十位教授連署發表公開信給校長孫震，卻遭到孫震的拒絕。這項消息立刻傳達到廣場並正式宣佈，結果得到清大、成大教授的支持，願意與台大教授同步行動。教授的決定給予學生精神上極大的鼓舞，「民主教育週」等於在幫學運團體擴大動員的規模。

另一方面孫震雖然拒絕教授們的要求，卻也在當天下午到中正紀念堂探望學生，表示學生靜坐是正當行為，學校事後不會加以處分。中正紀念堂廣場附近的靜坐人數也開始增加，但是直至中午為止，電視新聞均未對學生的行動作任何報導；教育部也緊急發函，要求全國各地的大學訓導處阻止學生參與靜坐，但校方多表示無法禁止，有些教授還向媒體坦承：「連我自己都想去！」

傍晚時分，李登輝曾透過電視發表公開談話，但不被學生接受。到了晚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社運人士、民進黨人士、大學教授紛紛來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打氣。

3月17日深夜學生召開校際會議，由於四面八方湧來聲援的學生越來越多，使得領導權的分配這個問題也正式浮上台面。加上一些學運組織（如台大學生會、民學聯、新青年等）也想瓜分領導權，於是會議成為各方的角力戰，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最後僅得到一些共識，如靜坐的訴求改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擬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等。

3月18日全國越來越多學生來到中正紀念堂加入靜坐，並發動罷課，使得教育部長毛高文只好出面喊話，希望同學在表達意見時，原則上應在校園中進行，同時訴求方式應顧慮安全、以理性方式表達。毛並針對學生展開罷課或靜坐抗議國民大會一事，表示「嚴重的關切」，但卻又強調教育部不會加以干涉。

下午2時，民進黨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聲討老國代大會活動，由於參加人數有2至3萬人，跟靜坐學生700人比例懸殊過大，但群眾與學生均互相尊重，並未互相打擾。只是過程當中，由於民進黨帶領群眾呼喊「打倒老賊」口號，聲勢過於驚人，使得學生這邊活動被中斷了數次之久。當晚民進黨所辦的活動已結束，但民眾遲遲未散，因此傳出軍系將派鎮暴部隊鎮壓群眾，然則勢必波及到學生，幸賴警政單位出面接手，未讓鎮暴部隊進駐中正紀念堂，否則後果不可想像。在這同時李登輝曾表達親赴廣場探視學生的意願，但是被身旁人士勸阻而作罷。

3月19日廣場上靜坐學生已超過3,000人。下午1時，又有二十餘名教授加入靜坐，總計大專院校教授、學者共有一百五十餘人。

此外，最初討論要以何種東西作為學運的象徵時，整個討論的過程其實非常不順利。學生們認為一定要是「本土的」，並且設計容易，能在短時間製作完成。

經過將近七個小時的討論之後，校際會議表決結果，「野百合」以壓倒性姿態獲勝，正式成為這次學運的精神象徵，並隨即在14個小時內搭建起來。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1) 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自主性）；(2) 全民的運動（草根性）；(3) 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4) 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5) 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6) 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3月20日進展誠如前一天，並無兩樣。只是這時學生人數到達4,500至5,000人，但卻也發現學生群眾的組成似乎變得複雜與不單純。糾察人員陸續向指揮中心回報，各校園黨部學生開始出現在各校靜坐群裏頭，有的學校訓導人員甚至加入學生的討論運作，救國團大量動員學生等，很明顯已有國民黨勢力滲透進來，更加造成廣場上學生的恐懼。

3月21日凌晨，各校代表、三位研究生（曾旭正、吳介民、李建昌）、五人教授顧問團（賀德芬、瞿海源、張國龍、鄭村棋、夏鑄九）召開會議。由於大家意識到學運可能產生變質，如何收尾變成了討論重點。因此當時由瞿海源、賀德芬先行至總統府了解底線，內容則包括：(1) 李登輝必須具體肯定這次學運；(2) 在國是會議中，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是，對於學生的訴求：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應提出有效解決方案；(3) 全體廣場學生於總統先生明確認可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否則將堅持原則繼續抗爭到底。

李登輝答應全部要求，僅將「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改為「國會全面改選」，因前往廣場與學生對話一事，有安全顧慮，所

以李登輝希望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經各校派代表上台表決，通過四點要求，同意派學生到總統府協商：(1) 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決心與情操及學生所提四項嚴肅要求，並對全國民眾發表；(2) 在總統就職前召開國是會議；(3) 全體在廣場上學生同意上述兩項要求如能被接受，立即結束靜坐，如果沒有，將持續採取抗爭；(4) 為確保學生主張能獲得執行，他們將組成一個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他們將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

7時40分，學生代表與李登輝在總統府見面，但學生所提問題不是切不到要害，就是被李登輝四兩撥千斤化解。李除了國是會議召開時兼有明確回應，其餘皆含糊帶過，由於雙方認知太大，為此學生代表范雲則要求離去，此時為9時50分。至11時，學生與李登輝對談的帶子送到中正紀念堂，在看完後由各校討論是否撤離廣場。3月22日凌晨，43名絕食團學生率先表決清晨撤離廣場，最後各校也同意撤離廣場，唯淡江大學反對。「野百合學運」的最後一夜，廣場將近有7,000位學生。到了早上，廣場指揮中心宣佈四大處理原則：(1) 發表一份正式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2) 成立全學聯，持續關切國是；(3) 成立善後處理委員會；(4) 成立「野百合基金會」，管理民眾的捐款。「野百合學運」至此正式劃下句點。

「野百合學運」過後，台灣又陸續發生幾起學運事件，包括1990五月學運——「反軍人干政運動」、1991.5.9「獨台會事件」等，整個學運從此走入眾聲喧嘩的年代。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野百合學運」之比較

關於這兩次學運，Wright (2001:129-137) 曾於 *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比較這兩者之間共同點與差異點，可供我們作為深入探討這兩次學運事件相當值得參考的資料。

「六四天安門學運」與「野百合學運」分別為中國大陸與台灣在近代學生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在1990年代之前，台灣雖然標榜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國大陸實施的則是共產主義的法則，然而在政治上，就某一種程度而言兩者走的是「威權體制」的路線。也因此「自由民主」的口號訴求成為這兩個學運的共通精神之一。

當然兩次學運事件並非只有此共通點而已，當時國民黨在台灣以及共產黨在大陸長期執政下來的結果，政治體制出現極大的腐敗，效率不彰、官商勾結等等情節屢見不鮮，也因此訴諸領導者拿出魄力大力改善當時政府的窠臼也是當時學運興起的極大主因。

諷刺的是從上述兩點可以看出，不管是標榜何種主義的社會，例如資本主義的台灣或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居然最終都遇到人民要求自由民主，這或許除了說人民在政治上要求能享受更多的自由之外，一個政黨長期執政下來的結果往往便是讓政治越來越腐敗。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次學運之前兩岸便已經出現許多的學生抗爭活動，因此可以說這兩次學運是匯集先前的力量，最終引發學生大規模的抗爭活動。例如中國大陸早在1976年即發生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主要是悼念周恩來，並抗議毛澤東的專制獨裁，但此次抗爭學生不是裏頭當中最重要推動者）、1979年的「北京之春」、「八六學潮」等；而台灣早先則已發生如1982-1988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風波」、1985年「李文忠絕食事件」、1986年「鹿港反杜邦事件」、1986-1987年台大的「自由之愛」等。因此我們除了可以說這兩次學運有重大的關鍵事件影響之外（「六四天安門學運」是因為學生追悼胡耀邦；「野百合學運」則是學生要求萬年國會改選而引發），另一方面從這兩次學運我們也可看出不管是在哪種政治體制之下，學生關心國事的態度是不曾改變的。這或許可作為新一世代年輕人的借鏡。

再者，這兩次學運由於都涉及到政治官場裏頭的鬥爭，因此變

得更為混亂。「六四天安門學運」由於牽涉到共產黨裏頭鴿派與鷹派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態度，進而演變成政治鬥爭；「野百合學運」也涉及到所謂李登輝路線與非李登輝路線之爭，也因此這兩次學運後來發展都變的錯綜複雜。不過既然學運的發生是針對當局領導者、政府進行批判抗爭，牽扯政治人物的利益糾葛似乎是不可避免，這或許是學運分子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吧！

另外，Wright (2001) 對於這兩次學運事件試圖將民眾隔離在學生抗議群之外的作法，認為是受到傳統儒家士大夫、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 精神的影響，不願意讓其他身分的人士加入。然而這種作法究竟是反映了學生運動高貴的純潔性，或是表示出學生運動高度的出世性，反而無法獲得一般民眾的認同，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因為這問題也在這兩次學運發展的過程中，一直被提出爭辯不休，究竟是否要讓非學生身分的人民加入。這或許可以相當承認的指出學生運動究竟要與社會做到哪種程度的結合與融入，才能真正算是一場成功的學生抗爭運動。

「六四天安門學運」的主要分子如今多數流亡海外；而「野百合學運」的主要分子則是投身進政治圈、學術界、社運界居多。當年「六四」並無法推動中國更進一步民主自由，相反的，中共反而更加箝制人民的自由，中國往民主自由的路反而更加遙不可及；「野百合學運」則是成功化解國民黨內部一觸即發的鬥爭，並且讓萬年國會解散，台灣民主化又更加往前邁進一步。

領導者一念之間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也正因為當年台灣的領導者處理得宜，避免了一場山雨欲來的風暴，最後平和落幕；然而「六四天安門學運」在領導者決定動用軍隊鎮壓的情況之下，最終造成死傷無數，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最嚴重的抗爭之一，並且讓十年的改革淪為一場空談。

正值「六四天安門學運」20周年，雖然中國大陸的經濟1990年代起突發猛進，然而其政治氛圍、自由民主、人權保護仍舊深受不信賴與質疑；「天安門學運」也一直未獲平反。中國要邁向自由民主的一天顯然還有一條相當長遠的路要走。或許1990年的野百合可以做為中國大陸邁向民主的一個相當重大的借鏡吧！

註釋

1. 除此之外，比較有趣的是D. McMahon (2004) 所做的〈二十世紀中國的三個學生世代〉從P. Abrams的歷史社會學來探討中國三個不同世代的學運，除了從結構與行動主體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行分析之外，作者也提出每個世代的學運往往受到上個世代學運的影響。
2. 「六四民運志」這個網頁共分為五大部分，包含：「上卷：夭折的蓓蕾」、「中卷：未乾的血印」、「下卷：良心未渝的悼念」、「增補卷一：反革命暴亂?」、「增補卷二：首都衛士」。這個網頁所蒐整的資料相當豐富，對於了解「六四學運」有相當大的幫助。加上由於字數的限制，因此本文對於「六四事件」將不再細細贅述。
3. 關於鄧小平、李鵬、趙紫陽、胡耀邦幾個在「六四學運」關鍵的角色，過往的討論大半都將責任全推給鄧小平，認為是鄧小平下令開槍才導致「六四學運」悲劇收場；有些研究則是追究李鵬的責任；多數則是同情胡耀邦、趙紫陽，甚至肯定他們在「六四學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現今也出現另外一派的想法，例如仲維光 (2006)；李劫 (2007)；張良 (2001a) 等人重新去反思趙紫陽、胡耀邦以及這群知識分子在「六四學運」當中的角色，是否被過度歌功頌德，而與學運的悲劇收場一點關係都沒有。這點值得我們重新去省思。
4. 由於囿於篇幅限制加上「六四天安門學運」過程複雜，因此本文不再贅述。然而「野百合學運」對於大陸或香港人或許比較生疏，加上筆者身在台灣，自覺野百合的某種程度成功應讓對岸的人民更為知曉，因而就此佔用一些篇幅。

參考書目

- 十月評論社 (編) (1989)。《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 (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
- 丁望 (1995a)。《六四前後 (上) ——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丁望 (1995b)。《六四前後 (下) ——附錄：文件與參考資料 (1985-1995)》。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 (編)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台北：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編) (1990)。《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香港：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 方良柱等 (編) (1989)。《悲壯的民運》。香港：明鏡出版社。
- 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 (編) (1987)。《自由之愛——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台北：南方出版社。

- 史景遷 (Spence, J. D.)，溫洽溢 (譯) (2007)。《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仲維光 (2006)。〈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當代》。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27期，84-101頁。
- 艾克敏 (Aikman, D.) 等，丁連財等 (譯) (1990)。《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 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 (1990)。《台北學運：1990.3.16-3.22》。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何榮幸 (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李劼 (2007)。〈歷史的祭奠：寫在「六四」十八周年〉，《當代》。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35期，76-105頁。
- 阮銘 (1993)。〈從趙紫陽申辯曝光看大陸政局動向〉。見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 (編)，《憲政民主與兩岸關係：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四週年學術座談會紀實》。台北：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153-156頁。
- 林美娜 (編) (1990)。《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抗議記實》。台北：前衛出版社。
- 范雲 (編) (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出版社。
- 凌志軍 (2003)。《變化——「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大脈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張良 (編) (2001a)。《中國「六四」真相 (上)》。香港：明鏡出版社。
- 張良 (編) (2001b)。《中國「六四」真相 (下)》。香港：明鏡出版社。
- 陳一諮 (1990)。《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小雅 (1996)。《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
- 楊建利 (2001)。〈中共黨內是否存在着民主派？〉。見秦聆 (編)，《「六四」真相名家談》。美國：大紀元出版社。144-149頁。
- 葉明德 (1990)。〈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之緣起——兼論其若干特徵暨影響〉。見趙倩 (主編)，《鉅變與未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大陸情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85-113頁。
- 劉勝驥 (1984)。《北京之春 (1978-1979)》。台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
- 劉曉波 (1992)。《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鄧丕雲 (1993)。《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聯合報編輯部 (編) (1989)。《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Cherrington, R. (1991). *China's Student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 McMahon, D. (2004). "Thre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24(2): 307-319.
- Pieke, F. N. (1998). "The 1989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in Beijing," in G. J. DeGroot (Ed.). *Student Protest: The Sixties and After*.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p. 248-263.
- Wright, T. (2001). *The Perils of Protest: State Repression and Student Activism in China and Taiwa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第八章

「八九民運」的文化意義 及其啟蒙意涵

張嘉娟

台灣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 碩士

每個社會中……都有一些人對於神聖的事物具有非比尋常的敏感，對於他們宇宙的本質、對於掌理他們社會的規範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尋常伙伴更探尋、更企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當下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徵。在這少數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書寫的話語、詩或立體感的表現、歷史的回憶或書寫、儀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動，來把這種內在的探求形諸於外。穿越當下具體經驗之屏幕的這種內在需求，標示了每個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存在。

席爾斯 (Edward Shils) ^[1]

前言

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日，一種泛稱「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的蔓延，並正在重構世界秩序。在這樣一個時代，社會如何發展，文化如何反應，構成全世界知識界或理論界的一個重要話題。對此，許多西方學者提出饒有新意的詮釋見解，雖然各自的方法和側重點不同，但無一不與這種大背景密切相關。並且隨着文化話題討論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加入關於社會和文化前途的討論。^[2]

在中國，事實上對於文化問題的關注與討論在這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間斷，尤其是這個討論多半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相伴相隨，早已是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基本母題。中共建政後，也用自己的方法積極謀取現代化目標，其中最恐怖極端的變化尤以60年代中期毛澤東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為甚。而這場運動在歷經十年宣告失敗後，80年代的大陸知識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反省性探索；再加上鄧小平時代的來臨，「改革開放」政策的轉向使得中國大陸的社會空氣也跟着轉變。因此，80年代在中國大陸興起一股泛稱「文化熱」的「新啟蒙運動」，而這個運動的重點，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不斷獲得轟動效應的《河殤》系列片可以當作代表。

一時之間，知識分子用很面熟、一貫沈痛的心聲指出中國的傳統是「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優越感變成了巨大的文化負罪感」，^[3] 或者提出「中國的現代化已經真正邁開了步伐……難道我們還要到退回去乞靈於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嗎？」的嚴厲質疑。^[4] 並且希冀向西方取經，特別是「應考察西方文化是如何從其傳統型態走向現代型態」。^[5] 雖然，這種看似壯闊的「現代文化型態」有些語焉不詳，但的確是80年代有識之士的共同信念，從現今許多依然隨手可得的文字、資料來看，80年代在討論文化問題時的用語明顯類似「五四」時期的復歸，同時憧憬着「創造出中國文化的嶄新型態」並「滿懷信心地眺望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融會合的遠景」。^[6] 這種氣勢和想像不

能不說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所以80年代無論是學者還是作家，以及最具理想性的大學生，大都持有這樣的心態和渴望。因此，將「文化熱」這種聲音稱為菁英的「啟蒙之音」是相當貼切的。

而1989年爆發的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撰者將它視為這場「啟蒙運動」的實踐；經過了十年的「啟蒙」，神州大地是不是如同西方歷史的進程，可以爆發一場對舊體制全面改寫的「法國大革命」，或是如同北美13州經由啟蒙思想家洗禮之後，成就一場屬於中國的「獨立運動」？當然，任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場驚天動地的學生運動，竟是在「六四」的槍響中結束，並使得啟蒙之音成為一種諷刺，啟蒙主義和一代菁英在歷史的舞台上還來不及謝幕便提前退場。^[7]

1989這一年，若沒有「六四事件」，也許還會接續88年的《河殤》效應，「文化熱」或許還會持續一段時日；而或許，會有許多日子在各類「研討會」、「紀念會」、「慶祝活動」中度過，因為遠的來說，有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近的來說，有「五四」運動70周年、中共建政40周年。因此，原本就可以預測這年無論官方或民間，都有充分的理由舉辦或掀起大規模的活動或會議。^[8]

果不其然，一場鄧小平口中「這場風波遲早要來」的「六四事件」，^[9]使1989年幾乎已經和這件事情劃上等號，其它的事情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明顯被忽略的例子如「中蘇高峰會議」。但事實上，會有這樣的錯覺，要注意的是現代社會不能避免受到的媒體框架所造成的影響。因為，不能否認的是，民運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一點一滴的確成為全世界新聞的焦點（當然除了中國自己之外），直到國際新聞人員全數撤走，中國內部新聞受到封鎖，消息幾近一片空白為止。

而有哪些新聞呢？當時沒有來得及將眼睛緊盯着電視機不放的人，今日若再將當時的中外報刊翻出來閱讀，便能了解這一場民主運動的新聞效應，曠日持久，其他新聞事件很難與之匹敵。隨着時間的流轉，「六四事件」雖只是距今不遠的「歷史」事件，但如今，即使是每一年的「六四」周年紀念，也只剩下零星的、公式化

的短文或評論，這和當年事件發生時新聞媒體、報章雜誌競相報導的「景況」不可同日而語。再一次看當時的新聞報導標題：〈鮮血是我們的老師〉^[10]、〈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11]、〈一滴鮮血從我右腦滴了下來〉^[12]、〈亞細亞的女神在風中哭泣〉^[13]、〈倒下去前它們還唱着歌〉^[14]、〈我發覺摸到的是他的骨頭〉^[15]等可說是煽情的文字敘述相對比之下，實有歛噓之感。

不過，1989年的新聞雖然過去了，但接下來關於「六四」的話語 (discourse) 卻開始集結；「六四」經過當時波瀾壯闊的報導之後，逐漸有史詩化的傾向，並且也由此創造出一批民運人士，所謂學生領袖、民運知識分子、民運理論家……等等。

漸漸的，「六四」脫離了原來自80年代以來的新文化啟蒙思潮精神脈絡之後，已經成為流動的能指 (signifier)，至於其所指 (signified) 則是任意的，任何機構、團體、個人，都有機會佔有這個能指，並在自己所處的脈絡中，以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方式，將他與自己要表達的意義接合，賦予其豐富的意涵。與「六四」相關的話語也在各樣的場域 (champs)^[16]中出現，而媒體因有強大的影響力，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於是，相關話語逐漸向大眾傳媒集結，經由雜誌、報刊、報導、電影等各類型媒介話語的再生產而發聲。其中，1995年由美國獨立製片人卡瑪 (Carma Hinton)、高富貴 (Richard Gordon) 等人花五年時間集資百萬、^[17]製作了版權屬美國新力經典影片公司的「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紀錄片是較著名可作為代表之一的作品。這部紀錄片在製作完成、放映前，即在美國及華人地區掀起一股軒然大波，因為這部影片將學運領袖之一柴玲於「六四」發生前所錄製的一段「自白」剪輯其中，造成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18]的相關話語，這樣的話語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光環無疑是一種傷害。

也因此，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長期以來接納庇護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一些「六四」比較知名的學生領袖如李祿，從天安門「廣場新郎」到華爾街千萬大亨，自言成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忠實信徒」^[19]之後，便受到輿論的嚴厲抨擊。指責他「背離民主運動」。目前已經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在台中定居主持廣播節

目的吾爾開希，更是從當時最具領袖魅力的學運明星，因為形象漸壞，而備受爭議的一位。這些情況，在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大將王軍濤眼中，亦不得不承認：民運不僅不再是良心的象徵，而且甚至成為道義敗壞的代名詞流行於海外華人世界。

然而一個反例是王丹，從「六四」後兩度入獄直至美國求學，王丹所受非議較少。但不管如何，近20年來，對「六四」的反思、反省的文章、專論並不少，但大抵而言，在1995年之前多着重於對中共嚴厲的批評及對「六四運動」失敗原因的探討；1995年之後則着重於批判學生領袖，甚至形成一種「穩定壓倒一切」，「六四鎮壓的必要性」等論述。當然，關於這些論爭，本身也可作為議題加以研究耙梳，但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此。

事實上，以上這些說明，是一種微觀的敘述，甚至是一種帶有評判的敘述，但是這卻是「八九民運」這些年來做為一流動能指的展現，撰者在此提出這個現象，並不是要討論這些學運領袖的功過得失；而是表達對於今人重新再看「八九民運」，勢必和事情發生的當時會有不同的眼光和情懷，這是很難避免的狀況。

「八九民運」的發生，原因當然很多，但撰者以為，若從當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視角觀察，則可將這個運動視為一次「實驗」，一次80年代以來，經由「新啟蒙運動」向西方取經所再次掀起的民主思潮、「文化救國」運動的實驗，而且這個實驗，主要的角色均由「第四代人」擔綱。因此在許多學者、知識分子對「八九民運」所作的討論中，撰者特別認同陳小雅所言，應將民運的研究置於「十年改革史」研究的組成部分，且她特別將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進行宣傳介紹和據以操作的思想、理論、技術手段的作用點出來，因為這十年的文化變遷，誠如陳小雅總結「一部分來自西方啟蒙時代的民主革命理論和歷史經驗；一部分來自近現代西方保守主義思潮；一部分來自近年來東歐民主運動的實踐；一部分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經驗和毛澤東思想。」^[20]

本文的重點即在於以文化變遷的角度分析「八九民運」的發生，並且將歷史事件的要素：人、事、時與地作為文化符碼分

別討論；雖然，若將這些符碼拆解，歷史事件的相貌也許支離破碎，但誠如詹京斯 (Keith Jenkins) 所言「要記得所謂『歷史』 (history)，事實上是『各種歷史』 (histories)。因為，歷史不再只是一件簡單而明顯的事，而要認識事實上有各種各樣的歷史，而其唯一共同的特色，是它顯然以研究『過去』為目的。」^[21]

另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言，亦可以將「八九民運」視為一種傅柯式的史學文本。文本的閱讀並不針對內容，而是針對其語言特點。^[22] 所以，若將「八九民運」視為一文本，則文本的意義來自讀者，而非作者；換句話說，不管作者的意圖為何，讀者的那些文本，始終是變動、不穩定的，而且容許質疑。^[23]

《河殤》的作者蘇曉康，在「六四」發生後流亡至巴黎，接受了一次外國媒體 BBC 的採訪，蘇曉康事後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這個採訪者所問的問題讓他吃驚，例如：「你們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民主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像宗教？」「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你當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真覺得很幸福嗎？」「在不能說真話的社會裏，你意識到自己是天天在說謊嗎？」「怎麼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大學生鬧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釋清楚這些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的提問者是外國媒體，所以從問題中可以理解西方人看待「八九民運」這一個事件的精簡，並且從問題中亦可觀察到一種化約後「東方主義」式的文化符碼特徵，^[24] 例如「天安門」、「紅衛兵」、「大學生」、「民主與宗教」……這一點連受訪者蘇曉康本身都深覺震撼。^[25] 卻也引起撰者的興趣，因為若說西方人看中國是透過「東方主義」式的有色眼鏡；其實，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對於「中國」的認識，事實上也曾經是一段長時間只能想像而沒有去過或是了解的地方，所以，台灣在這一方面所知的「中國」，和西方人想像出來的「中國風格」(chinoiserie) 實在沒有多大的不同。^[26] 關於這點，當然也是有所爭論，事實上這可以作為另一命題加以討論，但這並非本文的範疇，先就此打住。但是撰者主要認同的一點是，雖然在台灣承繼着中國文化是不爭的事實，但假設，若所謂「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 強調要從中國而非西方的語境出發，盡量採取中國本身的判準來決定哪

些歷史現象具有重要性，事實上這無異是一種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悖論。^[27] 因為，當代的「中國人」，尤其是身處台灣的我們，我們也許過的是種「西方化了」的「中國人」的生活，「看」中國的方式也打上了那種生活的烙印。^[28]

因此，撰者並不以為，在了解「八九民運」這個事件各面向上，我們會比西方人要來得深刻或是正確；或者說，撰者對於「天安門」、「紅衛兵」、「大學生」、「民主與宗教」……同樣有雷同的疑惑與興趣。所以，本文的安排，便以此為出發點，討論的焦點則類似於 BBC 露茜向蘇曉康所提出的問題。

首先，80年代末發起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真正的代言者實際上亦是一批又一批在文化符號上代表狂熱的青年學生，而這個現象，本身就值得討論。就如同文化人類學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著作《代溝》（*Generation Gap*）中所提到的「世界正在發生某種非常新奇的事」，因為她意識到一種「代際理論」的出現，^[29] 而參與「八九民運」的這一代大學生有什麼樣的特質呢？這便是本文首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再次，由於80年代被定義為「啟蒙時代」，從某種意義上就是意味着對「五四」時代的重返。對於西方民主的想像與複製，一種「再現」的實驗與扮演，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它是如何呈現？也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經過則是本文第二個要探討的面向。

另外，「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從「五四」以來，「天安門」似乎成為近代中國一個集合各種重要歷史事件的紀念場所，所以若將「天安門」作為一個「紀念性」空間來討論，以政治角色的爭奪為著墨方向，以不同社會主體如何爭奪主導權與詮釋權為主軸，「紀念性」的空間議題等於是權力爭奪的形式表現。^[30] 所以，在「八九民運」中，佔有「天安門」此一空間成為一權力指標，將己身的訴求同「天安門」所代表的歷史文化做某種程度的連結，並在其上建立自己的記憶與認同。對於這個觀點，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面向之三。

最後，「八九民運」呈現出怎樣的啟蒙意涵，則作為本文的結論。

「代際意識」與「八九民運」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主角主要是大學生，之所以強調「代」的問題，是因「代」所顯現的社會現象和思想型態，在中國比起其他國家差異性要大，人們的文化取向展現在「代」的問題較其他國家來得顯著。值得注意的是，「代際理論」和「代溝」的概念，亦是同其他西方理論一般於80年代時進入中國，雖然中國本身與世隔絕了數十載，但是中國青年並無例外地置身於一種共時性的歷史進程和文化運動中；而中國幾代人之間前所未有的反差和對立，也使代溝成為不爭的事實。1980年，《編譯參考》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的政治接班問題〉，這也許是中國引進政治「代」概念的首創之作。1988年，由張永杰、程遠忠所著的《中國第四代人》一書出版，^[31]這是第一部探討當代中國的代文化和代際特徵的專著，由於它的流行和廣泛傳播，固定了關於代際劃分的論爭。此書作者將中共建政前戰爭時期長成的第一代人譽為「一代英豪」，將50年代長成的第二代人稱為「灰色」的一代，「文革」中長成的第三代人被稱為「邊緣人」，「文革」後改革開放時期成長的青年則是「第四代人」。本文對「代」的分野亦是採取《中國第四代人》所劃分的基礎，另外，撰者並將這樣的劃分方式和當時中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相對照，即：第一代人——受過辛亥革命的影響，參加過新文化運動，接受過西方文化思潮，其中接受馬克思主義者成立中國共產黨者，是創造「新中國」的「英雄」，是征服過「二萬五千里」路途的「先賢」，亦是現今中國政治中的老元老，將之稱為「第一代人」。^[32]

第二代人——親耳聽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發出的聲音，決心為「新生」的「共和國」獻出一生的一代，「為了新中國！」他們接受與服從共產黨的所有改造運動，「三面紅旗」、「三反」、「五反」……因此「第二代人」常被認為是禁忌意識強烈的一代。^[33]

第三代人——這一代人是真真正正「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也是經歷過甚至是主導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角色，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十分顯著，「紅衛兵」、「大串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開始，新的時代來臨，帶給這一代的震撼反映在「傷痕」、「反思」、「探索」等文學運動上，他們捧出風格迥異的詩歌、小說、繪畫和攝影作品；千百萬被下放的知識青年重返家園，造成了城市爆炸；他們被貼上各種標籤：「懷疑的一代」、「思考的一代」、「荒廢的一代」而最重要的是，第三代人的論述在於自己說出「我們是被耽誤的一代」。^[34]

第四代人——成長於中共「改革開放」後的一代，對於80年代開始進入大學的這一代人而言，「文革」是一種印象，甚至是一段傳奇，他們毫不猶豫地否定十年「文革」，他們關心爭取的目標是民主，對於中國將走向何處也許不怎麼肯定明瞭，但是對於中國再不能走過去的路非常肯定。^[35] 另外，這一代人，有着濃重的「經濟時代」的痕跡，這是和前面三代人所不同的。「代」和「代溝」的概念在中國的套用和效應是立即且迅速的，那麼，「第四代人」的文化特質如何形成？而除了政治化的流行文化之外，對於「第四代」人何以能夠掀起「六四」這一場前所未見、龐大的政治運動呢？

很明顯的，「第四代」人在踏入人生的一開始，就遇到和前三代人青年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當時的中國，從思想理論界的探討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對未來的社會發展「改革開放」有所期待並開始醞釀。許多社會、政治問題，似乎成了疑案，而弄清這些問題，對整個社會，對每一個人，都有重大的意義。「第四代」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生們，雖然對這些了解並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們卻以此開始了尋找自己觀察社會的角度。

80年代的東西方世界，都把意識型態的輸出作為一個大戰略，兩種輸出都是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社會道德和民族優越感；但是，在輸出輸入的艱難過程中，還是有某種意識型態相互滲透的可能，從而啟發了一些人，在強烈的對比反差中找到出路。

當時中國的一些學者和其他一些人，大部分屬於「第三代」知識分子，準備去確立一個新的「參照系」。他們首先做的是，把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確立起來，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以建立某種準則。為了比較和驗證，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流派的馬克思主義，也被請到了中國。所以「法蘭克福學派」之類的批判理論，在中國政治封閉長達十年之久後，也成為「聖經」進了佛堂，這整個過程，在意識型態場域無疑起了場大變化，也為「第四代」人大學生們準備了一個新的文化意識環境，而對於年輕的一代來說，文化意識環境歷來是他們長成的決定因素和前提條件。於是，在經歷了1980年「競選運動」^[36]的第四代大學生，在「新啟蒙」運動的推波助瀾下，便以空前的熱情和毅力去探究西方思想。那些並不系統的、甚至可能是被曲解的西方思想——包括那些艱深晦澀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大部頭和史學、文學作品——都是時髦的涉獵對象。各種介紹登載西方思想、西方哲人的期刊雜誌，在「第四代」青年學子手中傳來傳去。他們把談論類似的話題，作為自己成熟的標誌，而因為多讀了幾本盧梭、康德，而感覺到自己多了幾番見識的大學生們，亦將自己視為「啟蒙」的前鋒，所以仿效起「啟蒙」應有的文化活動或機構，在大學中，許多「民主沙龍」紛紛出現，例如「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就曾經在北大「塞萬提斯」塑像前號召類似這樣的活動。於是也有些比較激進的人認為，「第四代」這一代人，尤其是大學生們，是西方文化運作下的產物。^[37]當然，這種看法無疑是較偏激的，因為不管西方文化如何滲透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畢竟他們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現實的社會環境，還是以不可抗拒的壓力加於他們之上。傳統的「馬列毛」道德意識、價值準則、行為方式、人際關係……都是不得不接受的傳統壓力，尤其是「第四代」大學生們，他們是在兩種文化的對比及衝突之下形成的。但是，對於西方文化的熱潮卻不因此稍退，儘管也許前一年大學生感興趣的可能是盧梭、黑格爾；而後一年大學生感興趣的可能是沙特、卡夫卡；而再一年的學生只對熱舞、搖滾樂感興趣，但這種一貫的興趣並不因形式的不同而不復存在。^[38]所以，在「第四代」青年的文化發展中，對於前三代人對中共建政以來的那種政治「信仰」，其實是相對薄弱的，於是，對於中共主政者而言，80年代中

期以來的「信仰危機」，實際上主要指涉的便是這「第四代」青年們。於是，一系列龐大持久的思想政治工作運動便由國家主導展開。但是，國家機器的開動，卻和當時中國社會正逐漸形成的文化「公共領域」隱然形成一種角力，而「第四代」青年們開始強調的就是自我意識和強烈表現自我的慾望。^[39] 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西方文化在大學生之間的介入之所以成為可能，實則是因為「改革開放」從根本上動搖了政治時代的一切。經濟的發展，必然呼喚一套與之相適應的精神，用以說明、詮釋和導引。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現代文化，做為商品經濟發展成熟的伴隨物，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40] 於是，就在80年代時序進入尾聲的當口，由他們創作和主導的政治運動戰，便毫不為奇，甚至可說是這一點的最好註腳。

因此80年代一股新興的東西方文化雜質體挾着因為「改革開放」作為後盾的護身符而成為「主流」；人們迎接着預備來臨的民主改革，新中國是否又要到了呢？新中國是不是在這一代人手中真正可以建立起來呢？「第四代」人，屬意於主導80年代、引領風騷的「第四代」大學生們，自然而然摩拳擦掌熱切地期盼着，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

於是，一場意外的來臨，1989年4月15日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在北京大學貼出一批批的悼胡輓聯後，在無數的大字報、精神標語逐漸在各大專院校散佈開來後，在「要求民主自由」、「反官倒」、「反貪污」、「要求不搞反自由化」、「反獨裁」、「反專制」等口號漸漸化為具體的靜坐遊行，到最後學生們佔領了「天安門」廣場，於是維持了五十多日、日後在槍聲中劃下句點、震驚全世界的「八九民運」亦於焉展開了。

啟蒙的抗爭與儀式——「八九民運」的呈現

今日再重讀「八九民運」，對於評價它是不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事實上並不是如此重要，亦不是當事人自己可以標

的；甚至當代人所做出的結論，也難免有侷限性，因此，撰者在此討論「八九民運」這一事件，還是希望透過文化變遷的脈絡，觀察運動中，「啟蒙」的影響帶來的抗爭與儀式。因此，還是先將「八九民運」以撰者的理解與眼光書寫出來，當然，很難避免存在着評論的部分。首先，當然從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引發的「悼胡風潮」開始。

「悼胡」的地點一開始是在北大校園內，一處名為「三角地」的師生聚集場所，在此匿名者貼出了一批痛悼胡耀邦的輓聯，^[41]例如：「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橫連是「國殤」。「悼胡」從16日開始，便開始轉移到天安門廣場。因不滿中共當局對胡耀邦後事的低調處理，許多花圈被送到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放置。17日開始，紀念碑周圍開始出現至少四十多名的武警和便衣公安，但這時氣氛尚稱平和，有不少外國遊客出入拍照，觀看的民眾也愈聚愈多。安靜的局面沒有維持太久，一群約四千多名的大學生集結天安門舉行示威，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此時，場面開始擴大，山雨欲來風滿樓，有一位北大的學生對記者說，「這種情況使人聯想起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42]

公眾自行「悼胡」的活動持續了一個星期，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基座被源源不斷送來的花圈和幛幔覆蓋，而人潮也不斷地湧入很難散去。這樣的情況在「六四」後，參與民運的封從德解釋，認為「中國人的文化當中有一種現象，我叫它是『死亡崇拜』……大家就藉着這個死亡的人表達他們心情很多的不滿……」。另一位參與者韓東方則說「……大家不是在單純關注胡耀邦死這件事，而是人有了一個群體，可以待在一個地方，由此引發出許多其它的話題。我聽到的還有我談的最多的還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43]事實上，從韓東方對天安門廣場所描述的狀態，當時一種「公共空間」^[44]的狀態的確開始萌芽。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潮聚集起來後，開始有人成為意見領袖，一位站在紀念碑台基上的學生演講起來：「……什麼是民主？我個人認為，『民』就是人民大眾，『主』就是當家作主。我們要當家作主！」^[45]

事實上這句「人民當家作主」，就是共產黨為民主所下的定義。但是人民要怎樣才能作主呢？18日早上，罷課的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開了一個大規模的一千人討論會。會後學生通過了「七點要求」，^[46] 寫成請願書送交政府各部門。幾天之後，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成立，北京大學並於4月21日開始全校罷課，而中共方面則決定關閉天安門廣場。於是，22日，趁着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裏舉行胡耀邦告別式時，學生們聚集在人大會堂外，要求李鵬出來親自接受他們的請願書。不僅如此，在高舉着請願書、跪在人大會堂台階上的學生身後，吾爾開希被人托在肩上舉着話筒領呼口號「對話！對話！」^[47] 4月26日，《人民日報》定出社論，將示威行動譴責為「一小撮人」陰謀挑起的動亂，強調「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48] 這個社論激怒了學生，隔日，一場十幾萬學生參與的「四·二七」大遊行從北京各高校的校園湧出，向中國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廣場進發，沿途群眾驟增至百萬人，他們同聲譴責「四·二六社論」。而這次的遊行，政府雖出動了很多武警，但是並沒有和學生發生衝突，所以學生們歡天喜地認為自己獲得了一次大勝利。當然，學生們也不甘心就此罷休，學生進一步要求政府承認他們自己的新組織——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以下簡稱「北高聯」）。學生為了自己能夠擁有與政府對話的「合法性」，所以學生們要選出一個經由學生選票推舉出的「對話團」，爭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他們並表示，如果政府官員不和他們進行「誠懇、平等而直接的對話」，將在「五四」70周年舉行大規模遊行。^[49] 但事實上，不論中共是否與學生「對話團」對話，5月4日學生們早已準備好「五四大遊行」，並且在預期心理下，遊行隊伍如同舉行嘉年華會般興高采烈。

然後，「北高聯」在廣場上發表了「五四宣言」，宣言的內容主要宣告着他們以「五四」之名，行着「五四」之實，「我們才是五四運動民主傳統的真正繼承人」：^[50]

……70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今天我們在此雲集，不光是為了紀念這偉

大的一天，更是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今天，在我們古老民族的象徵——天安門前……我們無愧於70年前的先驅們。……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51]

「五四」大遊行之後，因為形式上的成功，學生開始分成主張復課與繼續罷課兩部分，一部分人回到學校，一部分則繼續罷課尋求與政府進行對話，而他們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政府取消「四·二六社論」的定論，因為社論中對「一小撮人」的譴責威脅着學生領袖的安全。但是，只要「動亂」的罪名不正式取消，學運中溫和的主張就很難佔上風，而激進的情緒則更有號召力。於是，這場運動以更激烈的方式出現了。學生領袖之一王丹回憶說「我們覺得有必要把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以更激烈的方式……確保運動成果，這樣，我們討論的辦法只有通過絕食。因為靜坐遊行，政府已經不在乎了。」^[52] 不過，事實上在學運組織中，支持絕食的學生「常委」並不多，「北高聯」和「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簡稱「北大籌委會」）多數是反對的。於是他們越過組織程序，直接以個人名義發動群眾。而具有群眾魅力的柴玲、王丹等，5月12日晚，在天安門廣場上面對數千人做了絕食倡議，當時響應者不到50人。翌日，柴玲起草了《絕食書》，宣傳絕食，當天下午，由吾爾開希率領的「絕食團」，舉着絕食標語進入天安門廣場時，立刻引起圍觀人群、媒體的騷動。《絕食書》則是出自共產黨多年教育薰陶下的語言，雖然「第四代」大學生熱烈接受西方啟蒙思潮，但是《絕食書》的激昂壯烈，則是處處模仿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豪言壯語：

在這陽光燦爛的5月裏，我們絕食了……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歷史這樣要求我們。……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

民主絕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別了……祖國，母親！……我們去絕食了。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53]

第二天，絕食學生增加至3,000人。

對於中共而言，這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絕食實在不妙，因為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即將訪華，天安門廣場上要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但天安門廣場上卻擠滿成千上萬的學生。所以，在戈爾巴喬夫抵華前一天，14日下午，政府與學生「對話團」正式開始對話。中共官方派出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他在學生眼中是屬於「改革派」的人馬。而發起絕食的部分學生也參加對話團，其中有吾爾開希。但是，由於「對話」時因為沒有照學生的要求現場直播，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沒有聽到任何有關對話的廣播，懷疑自己被出賣了，便成批衝到對話地點將會談中斷，對話宣告失敗。

在這種狀況下，天安門廣場更形混亂，場面幾乎失控。對於此，包遵信在其著作中回憶道「……廣場來的王超華說：我是來向各位老師求救的。廣場上同學的情緒……現在高自聯已經指揮不動，廣場處於一種失控狀態……請老師們去做些工作，勸大家撤離廣場……」。^[54]於是，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前一天，也就是14日晚上，中國著名的12位學者、作家、知識分子，包括包遵信、于浩成、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李洪林、嚴家其、李陀、蘇煒、麥天樞、李澤厚、戴晴等人，^[55]便在手持話筒的學生開道下，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演講，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勸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由於這12位著名的學者、記者、評論家，均以倡議「新啟蒙」思潮、支持自由化變革而著稱，在學生中有一定威望，希冀他們在〈緊急呼籲〉中對學生表示讚揚的同時亦能呼籲學生改變這場運動的策略。但是，〈緊急呼籲〉的勸說還是失敗了，戴晴事後無奈地回憶道「我們知識分子夾在兩批人中間——那就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56]

15日，戈爾巴喬夫抵華，中共中央最後選擇取消天安門廣場的歡迎儀式，而改在機場舉行。與此同時，天安門廣場上宣告由柴玲擔任總指揮、李祿任副總指揮的「絕食團指揮部」成立，參加指揮部的條件是：在廣場遭到鎮壓時率先自焚，這一個組織亦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前身。^[57] 然而這一舉動，卻也使得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組織更加混亂，使「北高聯」不再是廣場上唯一最高學生領導機構，統一指揮的連貫性被切斷，加上李祿的介入，天安門廣場上開始由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58]

16日，北京街頭又舉行一次示威遊行，這一次，知識分子真正走出旁觀者的角色，也加入了運動的行列。除此之外，無數市民、公務員、新聞人員，全部舉着代表自己身分和單位的大旗，喊着「同學們，我們來了！」一同加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59] 17日，北京百萬人大遊行更加入數十萬工人，其中，擁有22萬員工的「首都鋼鐵廠」的加入更具有指標性意義，象徵着一個多月來的學潮，獲得工人及其他階級的認同和支持。^[60]

知識界的支援是十分重要且具象徵意義的。雖然他們在運動後期才敢加入，但是，知識界與新聞界發行了一份刊物《新聞快訊》，是「八九民運」中被中共官方公開宣佈的「反革命刊物」的油印小報，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打破中共官方對於民運及廣場活動消息的封鎖，並且使運動中有一個可供討論問題的空間。^[61]

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活動到這時已經超過五天，很多學生開始昏迷倒地，政府中較溫和的領導人開始試圖去緩解這場危機，組織醫療救護隊以保證絕食學生的健康，官方媒體也開始對絕食有正面報導，人們憑着過去的經驗，認為「這表明黨的路線有變化」。如今，參與遊行示威既合乎潮流，又不擔風險。這是一種非常標準的「群眾心理」。

然後，從新聞畫面中可以看到景象出現：天安門廣場上翻飛的各式旗幟，各種激動人心的口號標語，不時響起救護鈴聲的運送絕食學生，不絕如縷運送衣物、食糧、飲水到廣場上的市民，和不停被播放的運動主旋律《一無所有》，^[62] 場面煞是壯觀。

拍攝這些畫面的國際媒體原本是為了報導中蘇最高領袖會談而雲集北京，沒想到卻遇到了當時全球最具新聞價值的事件。而在被外國記者和各式錄音錄影設備器材重重包圍的絕食學生，很自然的亦表現出一種自身正在改造歷史的豪邁感覺。學運領袖之一的吾爾開希，在此時迅速成為媒體寵兒，成為當時最具知名度的學運明星。這也使天安門廣場中已經分裂的學生組織，繼王丹、柴玲、李祿可以號召學生的領袖之後，又出現一個可以號召媒體的領袖。^[63]因此，5月18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召見這一批學生領袖，這次會面經過剪輯後向全國轉播，穿着睡衣的吾爾開希，醒目的成為鏡頭中主要的焦點。^[64]在這次會見中，吾爾開希的一席話，也為往後天安門廣場的撤退行動留下「沒有台階可下」的伏筆。他說：

李老師，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說服我們這些人。我們很想請同學們離開廣場，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服從百分之零點一，如果有一個絕食的同学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學生也不會離開。^[65]

5月19日，趙紫陽突然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後，李鵬下令戒嚴，消息傳到天安門廣場，學生不滿情緒轉向李鵬，開始吶喊「李鵬下台！」的口號，而「絕食團指揮部」也宣佈結束絕食改為靜坐。與此同時，收到命令的軍隊集結開進北京，不過，部隊卻遭到市民和工人自發的包圍，連續兩天兩夜，部隊困在人海中，無法動彈。

除此之外，許多「支援活動」也陸續熱鬧登場，例如5月26日天安門廣場上一場大規模的演唱會，參與者主要是大陸頗負盛名的「五月天」樂隊，而因為《龍的傳人》聲名大噪的侯德健也共同表演，吾爾開希則是新興偶像，也受邀上台獻聲，他因為絕食體力不支而數度昏倒，但因為感人的言語使會場氣氛達到最高點。^[66]

還有值得一提的「民主女神」像的出現，豎立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像的正前方，這尊塑像高達30呎，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學

生所塑造。而當塑像完成後，許多民眾、學生便在這尊「民主女神」像前拍照留念，認為「它象徵民主、自由」，在北京已經實施戒嚴的時刻的確是一種挑戰的舉動。^[67]

不過，雖然有這些廣場花絮，但事實上整個民主運動已經呈現一種失焦現象，在戒嚴發佈後的天安門廣場上，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這場運動是否要繼續下去？如何下去？於是，主張從天安門「撤退」的學生與主張「不撤退」的學生爆發論戰，學生領袖意見嚴重分歧。但也許，在激動的情緒下使得主張較為激進的學生領袖容易佔優勢，雖然這些領袖多數是在絕食中湧現，但事實上所謂的「領袖」在資格的取得上並沒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選拔，資格彷彿來自於他們所表達犧牲的決心，權力的基礎則是透過不斷的宣傳和鼓勵。但在這種情況下，主張「不撤」的學生領袖還是具有一定的感召力，於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在論戰中成立，柴玲再次成為總指揮，柴玲再次透過廣播帶領着眾人宣誓：「為了推進祖國民主化進程……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排除萬難、鬥爭到底！」^[68]

為此，柴玲後來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說明自己主張「不撤」的原因。

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做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有不少人要利用學運重新樹立他們的形象，像劉曉波等人，他們利用自己在同學中。^[69]

從這段自白可以知道，為什麼許多人在「六四」發生後檢討這場民主運動時，會將一部分責任歸咎於學運領袖之間的權力鬥爭，尤其將矛頭對準柴玲。但事實上，在這小小的「天安門共和國」上，每一天都在發生「奪權」的事件，^[70]而這也是天安門廣場

後來形象漸壞的原因。再加上，一些浮在枱面上的狀況：學生財力耗盡、管理混亂、士氣低落、遍地的垃圾、倒塌的帳棚，天安門廣場上一天比一天骯髒等等。廣場上的人群其實是經常流動的，對廣場上種種作法不認同的人其實早已紛紛離去，而熱情的新人卻又不斷從全國各地趕來，但只要有人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便能繼續吸引世界的關注和同情。封從德說：

為什麼很多同學想待在天安門？我們的目的是喚醒人民，因為天安門是整個共和國的象徵……但是基本上每一天晚上有一個營地聯席會議……撤不撤，每天晚上差不多都是一個主題，但是每次——我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不撤。所以通過這種組織原則，是不可能撤下來的。^[71]

包遵信對這樣的情形在書中也有提，但他觀察的角度則和封從德稍有不同：

外地那麼多學生到北京來聲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他們到北京之後，吃住都在廣場，使廣場衛生、秩序都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他們今天一撥進京，明天又是一撥進京，每一撥人都想到廣場去親自體驗一下靜坐的滋味，好像不如此就不是聲援，進京靜坐成了經受民主洗禮的象徵了。廣場學生難撤的原因，就是每一撥學生都認為自己剛到京，如果撤離，豈不是白白來一趟北京！……最令人頭痛的是，這些來自各地的學生，彼此都互相看不起，「外高聯」成了他們爭奪的一塊肉……「北高聯」對他們也很有意見。^[72]

民運理論家胡平則認為：

有膽識的學生領袖，及時提出收兵的建議，但立即被激進派扣上「學賊」、「出賣」的帽子；而由於激進派

在道義上、勇氣上和信念上都容易顯得突出，再加上這些人事後總是受到專制者更嚴酷的迫害，因而在眾人心目中是殉道英雄，所以對他們策略上的失誤的批評就有可能看做是對他們偉大人格的某種不夠尊敬^[73]

當然，學生堅持不撤退的原因固然很多，多數學生最大的顧慮不外兩點，第一，學生咸認政府沒有任何表示，撤退之後恐會遭到中共秘密處置；第二，廣場已經成為民主的象徵，當時從海外、香港支援的物資與行動源源不絕，使得學生認為若要撤退也要「光榮撤退」。^[74]於是，基於避免中共「秋後算帳」及運動能夠「光榮撤退」，學生領袖們開始提出許多撤退方案。不過，天安門廣場上這時參與的分子已經不再是只有學生而已，一些年輕的學者、知識分子、或是具有知名度的公眾人物甚至來自海外的支持者都「進駐」了天安門廣場，所以這時在領導運動的權力機制上，不單單只是學生領袖掌握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所能控制，而是加上一些外地學生組成的「外省赴京高聯」、知識分子號召組成「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或是由工人、市民號召的「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市民敢死隊」等等，都加入參與天安門廣場上的任何活動。到最後，決定廣場動作的權力核心，歸給了由上述組織再聯合組成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簡稱「聯席會議」這一單位。不過，大抵上來說，「聯席會議」負責制訂方針，執行部分還是交由「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75]

於是，藉着「聯席會議」決議名義，6月2日「絕食四君子」的出現，為天安門廣場上逐漸低落的士氣再次打了一劑強心針，這四個人，就是劉曉波、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他們當時都是頗具知名度的「知識界」人士，尤其是劉曉波，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另外還有多產作家、評論家和文學批評家等多種身分。雖然劉曉波「六四事件」後曾表明這次發動絕食是想降低運動激進的格調，但沒想到卻適得其反，天安門廣場上再次聚起成千上萬的人群。^[76]而這個局勢的轉變，包遵信的看法頗值得注意，他認為

這是劉曉波等希望運用實際行動來掌握廣場，取得對廣場的控制權。^[77] 因為他們這一代人一直在提倡「啟蒙」，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的鬥爭卻「大都停留在意識型態和標語口號化的水平上，只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目標，不講手段、過程」。^[78] 所以，這個發起四人絕食行動的「操作者」，在「六四」後，就成為中共眼中「動亂和暴亂中的…這只黑手」。^[79]

「八九民運」在6月4日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正式劃下句點。

「六四」後，中共官方雖然藉由軍事鎮壓解決了令他們困窘的處境，但卻也在黨內爆發了鬥爭。中共內部經由重批《河殤》，上演了一齣內鬥的戲碼，重提88年就批判過的結論，《河殤》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搞虛無主義，鼓吹全盤西化，對思想政治工作危害極大的壞片子」，因為趙紫陽的庇護，群眾的歡迎，反而掀起海內外的討論熱，對「六四」的發生起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基於此，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便宣告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而趙系人馬也因此中箭下馬，遭革職處分。^[80]

另外，除了中共內部的清理外，首當其衝的就是文化界、知識界，尤其是80年代「文化熱」中的大將，不論他們是否是自願參與還是情勢所逼，在運動後期幾乎全數參與了「八九民運」，成為中共口中「幕後的黑手」。於是「六四」槍響，原先漫天嘎響的自由呼聲一夕噤聲，帶頭的知識分子被抓的抓、躲的躲、逃的逃，文化界又成為「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81]

接下來，撰者將探討「天安門廣場」的象徵意義，因為有這個號稱世界最大的廣場，也才能容納數十萬學生和群眾的示威、靜坐和絕食等抗議行為。因此，天安門廣場的幅員和容納的人數無形中也為這次運動增添了歷史的幅度。不但如此，天安門廣場本身，也因為這一次的運動，又為他在原本既有的烙痕中再一次刻印上新的歷史圖騰。

紀念性空間的歷史、文化與論述——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中是和中國「現代化」進程有着特殊聯繫的，其契機可以溯及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是對於中國現代史稍有知悉者都可以簡單得出的推論。^[82]

北京皇城的正門，以「受命於天，安邦治民」的意義命名為「天安門」，而在它前邊的廣場，「五四」時期其實相當窄小，僅能容納四五千人。^[83] 但也就是因為1919年爆發的這場「五四」運動，為「天安門廣場」留下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也為此後一代又一代從事政治運動的青年們提供了政治活動的「腳本」。所以「天安門廣場」歷史性地成為政治中心的大舞台，而這片壓縮了中國現代史的公共空間，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人的精神「聖地」，直到「八九民運」之後更加具有不可動搖的「紀念性」。

而令人好奇的是，「天安門廣場」最初是如何成為學生運動的集會場所呢？事實上，在滿清帝制時期，它是讓皇帝舉行重要活動所用，嚴禁庶民涉足的地方。^[84] 「辛亥革命」之後，直到滿清政府真正瓦解，中華民國才於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第一次國慶大典。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在故宮太和殿舉行了就任儀式之後，於午前11時登上天安門舉行了閱兵儀式，所以，天安門廣場這時還是典型的慶典與政府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一方，準備在天安門廣場上大肆慶祝一番；當時的教育部便召集北京各專門學校以上的校長，安排學生以天安門為中心向各國公使館區域進行慶祝遊行。然而，沒想到卻因巴黎和會戰勝國之間的交易和談，使得北京學生的慶祝遊行變成了抗議示威。以前的慶典和以官方為主的「天安門」此時卻實現了另一種新的民間參政方式，當然成為具有新意義的指標。^[85]

雖然，從1919年開始的「五四」運動，在「天安門廣場」上動員的是以學生為主的群眾，但是，這標示着運動不是由某種組織產生的，基本上這是由一種「救國」意識（或者民族危機）而引發出

「大義」的作用，並且因為在沒有代表此種「大義」的機構的狀態下，組成自發性代表國民的決議，便形成了一種慣例，並且一直沿用下來。^[186] 因為，「五四」運動擴散的結果是，三位政府官僚被罷免以及中國外交人員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從這裏出發，我們或許可以說，作為中國知識分子記憶中的必然組成部分，「天安門廣場」不僅僅指涉着一個公共空間的可能，而且既深且廣地聯繫着中國歷史上「現代」和「革命」的記憶。它象徵着革命、進步；象徵着知識分子的使命與角色。

1949年10月1日，伴隨着中共建政，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面對千百萬群眾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同時，也開始改造天安門。因而使天安門廣場象徵着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187]

首先，樹立起22公尺高的旗竿，掛上五星旗宣示其主權，並設置宏偉觀禮台；然後，建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拆除清宮東西三座門；接着，在天安門廣場東西兩面建起「革命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並不斷的拓寬馬路，創造一個所謂的「百萬人廣場」。於是，「天安門廣場」從中共建政初期僅能容納七萬人集會活動到建國十周年廣場完工，成為54公頃、「可通過一百二十路縱隊隊伍」、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廣場。^[188] 於是，《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曲，成為人人朗朗上口的愛國兒歌：

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189]

甚至，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將放置毛澤東遺體的「毛主席紀念堂」建立在「天安門廣場」的南端。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天安門就是新中國的象徵，它象徵着「代表人民意志的偉大領袖」，所以毛澤東與天安門合為一體才能將擬規劃的「毛主席永遠在群眾之中」的主題思想表現出來。^[190] 而毛澤東的巨大遺像懸掛在天安門的城牆上，仍然身居天安門廣場中心，繼續主持着廣場上的每次遊行和慶典。毛澤東和天安門儼然是分不開的。所以，「天安門」既和毛澤東分不開，「天安門」又和民主運動分不開，

那麼，從符號的置換中，「毛主席」面前發展出的「八九民運」，似乎形成一種矛盾與衝突，但是，這便是紀念性空間對社會大眾的意義。因為，在這種「動態的結構關係」中，紀念性空間的意義才能不斷被衍伸而非走向終結。^[91]

當然，事實上，在1966到67年間，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就已使得「天安門廣場」這一特定空間，呈現出極端權力與青年學生的激情的衝突意義。^[92] 因此，「天安門廣場」，作為中國文化語境中特定的能指，聯繫着不同歷史階段中的「革命」與政治的記憶；其自身便是一種「中國版」的「現代性」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紀錄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實踐。^[93] 所以，「天安門廣場」，原本擁有的一點文化「古蹟」色彩、卻在這80年的政局更迭中，成為充滿政治色彩的紀念性空間。

綜上所言，可以理解當學生領袖在「天安門廣場」上大聲的說出「我們在創造歷史」時，不論有意識或是無意識，他們已經將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先輩學生的抗議傳統聯繫在一起，賦予了一種「神聖」的意涵。所以，「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與政府的對抗剛結束，如何書寫這段歷史的爭奪戰隨即開始，一種藉由空間的掌握形成的權力，主導出一種論述的形式。而這樣的議題空間，便造成後來一系列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話語論戰，例如至今還在爭議的學運領袖對於「天安門事件」是否存在的道德責任，或是對於整個「六四天安門事件」而言，它帶給這一代人集體記憶的建構形式等等；而這個歷史敘述權的爭奪，和天安門廣場幾乎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中共官方對於「六四事件」在媒體上公開的說法是：

在6月4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過程中沒有一人死亡。在市區其他地方，一些「製造反革命暴亂」的「罪有應得的歹徒」被擊斃，也有少數群眾被誤傷。^[94]

其次是柴玲在逃亡途中的錄音講話由香港電視媒體播放的內容：

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95]

還有在廣場上勸退學生撤離、最後與戒嚴部隊交涉的「絕食四君子」之一侯德健所說：

很多人說，廣場上有兩千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壓碾撤退的學生等等。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96]

當然還有在流亡海外後，最具領袖魅力的吾爾開希向國際輿論描述的天安門廣場流血場面：^[97]

我是北京學運「北高聯」負責人，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數以千計……萬計……6月4號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時候我親自看到了很多我的同學和同胞……我清楚的看見，他們頭部和腹部中彈，肚子還在冒血……我有很多同學被坦克壓死，被扁平的壓在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上，有多少英靈在哪裏怒吼着，長久的安息吧！^[98]

在「六四」發生的當下，「天安門廣場上到底有多少人喪生？」這樣的疑問，透過新聞媒體不斷從這些「在場者」的說明中呈現出不同的說法，並且，亦不斷地和官方所謂「沒有一個人死亡」的說詞做比較。因此，顯然的，中共當局不但是一個「屠殺者」，亦是一個「說謊者」的論述意象 (images) 馬上就能形成。而其他人因為之前可以掌握天安門廣場，因此種種的「在場」說詞，就成了後來歷史敘述權的爭奪戰導火線，而這個爭奪戰，直到今日仍舊沒有塵埃落定的特定結論。只是不能避免的，對於整個事件解釋的發言權，在掌握論述權力的過程中，多半是依着誰所受的不義不

公的對待越深，誰就擁有愈高的發言地位。^[99] 即便如此，即使同為受難者，受難經驗的發言權也並非完全一致。

當然，這與受難者的社會分佈的複雜性有關，在當下現實論述中佔有優勢的作用者，如民運領袖等這樣在廣場運作中已佔有相當位階的知名人士，其經驗較易透過現有的媒體資源傳送出去。所以，我們從上面這些在民運中已建立相當知名度的人物所說的「話語」來觀察，他們首先會將標明自己身分的頭銜表明出來，然後再述說自己的在場，因此，在他們見證下廣場上所發生的事情，便成為不能不相信的「真實」。只是，在事件的熱度逐漸退卻後，人們才發現，當時的說法均值得商榷，於是對於這些學運領袖而言，便紛紛提出「平反六四」、「歷史會有公正的評斷」、「留待歷史的裁判」等說法，其實，這種「留給歷史」云云的說法其真正意涵，就是在事件未受歷史整合前，與「天安門事件」相關的記憶是沒有公共價值，不能算數的。^[100]

因此，回憶過去經驗和共享對歷史的想像，對於民運人士特別重要。所以，「六四」過去已有20載，但每每在有關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活動的儀式中，總是將這群學運領袖視為重要的出席名單，而這也象徵了「六四事件」是由這些人代言，亦即這種正式化的活動規範了誰才能參與這個紀念儀式，同時，承認了這些人有統治相關論述的權力。

當然，撰者在本文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也許會招致道義上的批評，因為畢竟開槍的是政府，中共當局的惡劣行為不容申辯。但是，撰者認為，類似封從德所說「廣場大旗不能倒，堅持一分鐘，就會引起一萬人的覺醒。」或是如柴玲所言「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的這種將「天安門」廣場視為民主祭壇的「啟蒙」思想變奏，事實上，就是由於天安門廣場在「六四」之前即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象徵，一個紀念性空間的典範，於是「六四」後，它除了象徵「八九」民主運動這個新的圖騰之外，又成為爭奪論述權力的場域，並已呈現一種「史詩化」(epical) 傾向。「史詩化」(epical) 的過去是一段絕對神聖的過去，也是一種

象徵完成的過去。但是「八九民運」的目標是沒有完成的——若是以80年代以來擁抱西化，以「民主」為其終極目標而言。不過，若是將上述所討論的「八九民運」之「啟蒙」作為目標的話，則因為「八九民運」在「六四」槍響中已經用青年們的鮮血犧牲換來了歷史命名，因此它很難不成為一段神聖的過去。而這個「史詩化」的效應使天安門廣場擁有了絕對的紀念性，因此爾後，中共官方對於此一空間的開放更加嚴陣以待，首都廣場直接反映着執政者的意識型態。而在廣場上發生的任何事件，便會跟這個紀念性的意涵聯繫起來。

小結——「八九民運」之啟蒙意涵

不可否認的，這群已被媒體稱為「天安門一代」的參與者包括如王軍濤、王超華、乃至於柴玲和同齡人王丹、吾爾開希，甚至是當時年輕的知識分子如提倡「全盤西化」論的劉曉波等，他們都受到了80年代「新啟蒙主義」的影響。但是，同時也不能避免地，他們仍然都在共產黨的教育思想之下成長。因此，如同撰者所提到，雖然，「八九民運」是新生的一代「第四代」人，在接受「啟蒙」思潮，想像與模仿西方的民主後，意圖發起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但是運動的內涵中，卻也有着「文革」的影子，例如「大小字報、遊行集會、總部運動、絕食靜坐、串連全國、指名道姓地要見領導人、『百醜圖』等思路、語言上的雷同……等等」，這樣的民主運動模式，是值得觀察的。

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民主的經驗和實踐，因此，主導運動的領袖們，事實上也是一種「摸着石頭過河」的策略，誰也不知道要將運動帶往何方，這也是為何柴玲在接受訪問的自白中，會有「期待流血」的心理。

那麼，這個張着「西化」大旗，以「啟蒙精神」作為中心思想的民主運動，它的「啟蒙」成果在哪裏呢？這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是「八九民運」的意義及價值所在。在此焦點上，根據李歐梵的

觀點，「八九民運」這一段不算短的過程中，至少形塑了兩項「啟蒙」的「儀式」——「公共空間」和「公民對話」。^[101]

在「八九民運」中，作為最大啟蒙指標之一的公共空間所在，其實就是「天安門廣場」本身。如同韓東方所說：「大家不是在單純關注胡耀邦死這件事，而是人有了一個群體，可以待在一個地方，由此引發出許多其他的話題。我聽到的還有我談的最多的還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來描述天安門廣場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意義。並且，由此也可以聯想，「八九民運」規模的擴張，正是因為這個「空間」的形成，人們在這種空間中交流思想，形成認同，並且相互支援和保護。面對國家權力，個人不再是孤立的個人，他受到他所處的「公共空間」的保護。^[102]所以，「八九民運」的規模，可以說關鍵之一即「公共空間」的擴大，使相當一批原本不願冒共產黨秋後算帳這份危險的普通人，在不太驚恐的狀態下勇敢的參與。

而另外，在「八九民運」期間，「公共空間」的另一表現就是各式各樣的廣場油印小報，包括較著名、由知識界編撰發行的《新聞快訊》。但是，不論是天安門廣場，或是油印小報等「公共空間」，都只存在於運動這一段期間，隨着「六四」的槍聲響起，同時也失去了這一個短暫的「公共空間」。

「八九民運」中另一個代表啟蒙的儀式，就是「公民對話」的出現。「對話」這個名詞，在中共的政治語彙裏極為罕見，最常見的是「講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訓話模式，在下位者只能「學習」。而「對話」的模式是平等的，無所謂聽者和說者，而是雙方在某一個共同的大前提之下所做的交談或交換意見。引伸到政治和外交術語上，其意義是對話的雙方牟取相互的了解，進而發展關係。換言之，對話的模式絕非敵對的，反而有化敵為友的意涵。^[103]所以，學生向政府要求對話，在正常的狀況下、在民主社會中是合於情理的。然而，這群學生向政府示威的訴求正是「民主」這個前提，而在這個只有由上而下「講話」的政權統治模式中，「平等」的對話無異是緣木求魚。

因此，當吾爾開希打斷李鵬的講話，並且稱他「李老師」而非「李總理」，雖然透過電視畫面呈現吾爾開希一種「偏激」的形象，但是這種「對話」方式，儘管只是暫時的，在中國的專制政治模式下，卻具有啟蒙儀式的象徵。綜上觀之，這場運動，除了啟蒙儀式外，對於「啟蒙」群眾本身，如何從這場運動來觀察？事實上，前面即說過，「啟蒙」以及隨之而來的「啟蒙主義」傳統，從「五四」以來影響着每一代的知識分子，然而，對於「啟蒙」的意義，知識分子把握住的精神為何？這種啟蒙主義，可以用魯迅提供的說法來概括：「有一個鐵屋子，全無門窗，空氣即將用盡，裏面的人大多睡着了，只有一個人醒着。所謂啟蒙，就是這位醒者喚醒昏睡的人們，一同砸碎這個鐵屋子。」^[104] 這樣，世界上的人就被分為兩種，清醒者與昏睡者，拯救者與待拯救者。一個社會的前途決定於那些待拯救者能否聽從拯救者的召喚。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八九民運」，就會看到一種現象，「八九民運」的出現是經由新一波的「啟蒙」運動而來，而學生運動的空前，更是經過天安門廣場上不斷「啟蒙」的結果，越來越多人被「喚醒」，而學生做為醒來的人，就必須拯救這個世界。於是，他們的使命當然是要喚醒更多的人，因此從這個角度觀察，為什麼柴玲曾經說過「期待流血」這樣的自白，因為這樣可以「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柴玲也認為這是為民主奮鬥，是一種重要的啟蒙手段。但其實，這也是共產思想下一種「為了理想奮鬥要敢於犧牲」的模式。事實上，在當時的環境下，「死亡」、「流血」、「為自由獻身」等詞彙幾乎是八九天安門廣場上每一個學生的口頭語。他們將民主的啟蒙看為崇高無比，並深信這理想需要豐盛的祭壇。因此，這也是為何在運動後期，政府已經強令戒嚴，但是天安門廣場上還是成立出一支「保衛天安門廣場」這樣誓死「不撤退」的強硬派，事實上，和這個「啟蒙」的想法是非常有關係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封從德在其著作中清楚的看到：「八九民運」中的學生，自視為「五四」青年的後繼，要完成70年前的同仁所未竟的事業，於是將自己的歷史使命認定為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既然是啟蒙，那麼宣傳的強度與廣度自然是越大越好。由此才能理解學生們為何選擇絕食、絕水、等待屠殺，也才能理解為何要到天安門，在上千記者前

將學生運動擴大到社會運動。廣場上縈繞的一個觀念是：廣場大旗不能倒，堅持一分鐘，就會引起一萬人的覺醒。^[105]

除此之外，在「六四」天安門廣場遭鎮壓、運動的學生群眾不得不撤退的時候，封從德亦提到，柴玲曾說「……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106] 由此可知，關於「八九民運」「啟蒙」精神的展現，與之伴隨而來便是很難避免的流血結局。

當然，這樣的想法對於這一代人來說是自相矛盾的，80年代啟蒙風潮曾為「第四代人」帶來的「存在主義」，引發對於「異化問題」的開始思考和尋求「自我」，但事實上，這種對於個人價值的基本尊重仍舊敵不過從「五四」遺留下主張融「小我」於「大我」之中，^[107] 而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這樣的啟蒙基本話語。

註釋

1.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 pp. 5-22. 引自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 (1997)。《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文化，72-73頁。
2. 王逢振 (2000)。《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161頁。
3. 金耀基 (1992)。《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頁。甘陽 (1989)。〈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見甘陽編選，《中國當代文化意識 (反叛篇)》。台北：風雲時代，19頁。
4. 同前註，46頁。
5. 同前註，16頁。
6. 孟繁華，《眾神狂歡——當代中國的文化衝突問題》，10頁。
7. 同前註，11頁。
8. 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陸80年代文化爭論〉，214頁。
9. 鄧小平在1989年6月9日的講話中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引自全哉垣，〈1989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之研究〉，89頁。

10. 杭之，〈鮮血是我們的老師〉，《新新聞》，1989年6月12至18日，93-94頁。
11. 南方朔，〈「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視訊時代的天安門反抗運動〉，《新新聞》，1989年6月12至18日，90-92頁。
12. 徐青雲，〈一滴鮮血從我的右腦滴下來〉，《新新聞》，1989年6月19至25日，41-24頁。
13. 張遜，〈亞細亞的女神在風中哭泣〉，《新新聞》，1989年6月5至11日，64-65頁。
14. 童清峰、葉其峰、廖錦桂、董孟郎，〈倒下去前他們還唱着歌〉，《新新聞》，1989年6月12至18日，18-31頁。
15. 邱近思、徐青雲，〈我發覺摸到的是他的骨頭〉，《新新聞》，1989年6月12至18日，32-39頁。
16. 人類活動的目標在於維持或提升自身在場域中的地位，所以場域成為衝突的地方，以及一種權力的分配場。參見邱天助（1998），《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120-121頁。
17. 「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片得到的資助相當可觀，如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美國公共電視網等機構的贊助。總共募集約160萬美元。參見理查德·吾得沃得（Richard Woodward）（1997）。〈解剖屠殺——本年度最具爆炸力的影片〉，《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272頁。
18. 這段自白是1989年5月28日柴玲和一位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的美國留學生兼自由撰稿記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與香港《天天日報》的記者梁淑英在一所國際公寓中所做的錄影自白。自白的內容萬餘字，但《天安門》這部紀錄片，因為將其中一段較具爭議性的內容穿插剪輯，播出後引發輿論譁然。引自卡瑪、高富貴（1997）。《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175-177頁。
19. 參閱〈從「廣場新郎」到身價千萬的創業投資者——天安門學運領袖李祿將步上紅毯〉，《聯合報》，2000年4月4日，13版。
20.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13頁。
21. 凱斯·詹金斯著（Keith Jenkins），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50頁。
22. 楊大春，《文本的世界》，82頁。
23. 阿皮格南西（Richard Appignanesi）著，黃訓慶譯，《後現代主義》，76頁。
24.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1999）。《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台北：立緒文化。
25. 蘇曉康，《遠寺鐘聲碎》，46頁。
26. 新井一二三，〈「白色恐怖」成了「後現代」——台灣人的歷史觀〉，《九十年代》，1996年4月，98頁。

27. 陳泓達，〈中共意識型態的後殖民意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批判性詮釋〉，18頁。
28. 同前註，19頁。
29. 尼爾·史美舍 (Neil J. Smelser) 著，陳光中、秦文力、周憐嫻合譯 (1995)。《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30-31頁。
30. 吳金鏞 (1994)。〈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頁。
31. 張永杰、程遠忠 (1989)。《中國第四代人》。台北：風雲時代。
32. 同前註，19-21頁。
33. 同前註，30-34頁。
34. 同前註，41-49頁。
35. 同前註，59-62頁。
36. 1980年，中共當局先後在大陸2,757個縣級單位中的1,319個單位辦理縣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大學生們乃紛紛掌握競選的機會來向中共爭取民主權利。現在著名的民運理論家胡平和民運領袖之一的王軍濤，當時都是北京大學的競選代表。中共當局後來發現校園選舉愈演愈烈，便馬上修訂選舉法，加強學校思想工作，禁止校園的選舉風潮。參見康榮 (1989)。〈中國大陸民主化運動之研究——「一二九新民主運動」的個案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72頁。
37. 張永杰、程遠忠，《中國第四代人》，76頁。
38. 蔡源煌 (1992)。《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出版社，219-211頁。
39. 張永杰、程遠忠，《中國第四代人》，171頁。
40. 同前註，68頁。
41. 胡耀邦是中共前總書記，在其長期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時，是被青年學生公認的「青年導師」。1978年任中共宣傳部長時，鼓勵大學生大字報上街，所以被認為觸發了1979年西單「民主牆」的民主運動。而「一二九」運動發生後，胡耀邦因為持改革形象被指為縱容學運而遭罷黜。因此，胡耀邦在政治鬥爭中的悲劇英雄角色在他去世的消息傳開後更加突顯出來。參閱全哉垣，〈1989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之研究〉，137頁。
42. 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是悼念周恩來。引自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台北：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18頁。
43.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59頁。
44. 夏鑄九 (1997)。〈「重」建構公共空間〉。見陳清橋編，《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25頁。

45.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64頁。
46. 七項要求分別是：公正評價胡耀邦功績；公開否定「反對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公佈中共領導及其家屬子女的年薪、財產；新聞自由、開放報禁；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增加教育經費；修改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如實報導學生請願運動真相。見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59頁。
47.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74-75頁。
48. 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39-40頁。
49. 中國大陸月刊編（1989）。〈中國青年民主運動大事紀要〉，《探索與省思》。台北：幼獅文化事業，6頁。
50.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104頁。
51.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五四宣言〉資料引自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60-62頁。
52. 王丹在《天安門》一片中所言。卡瑪、高富貴，《天安門》，110頁。
53. 〈絕食書〉摘錄，引自中國大陸月刊編，《探索與省思》，85-88頁。
54.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102頁。
55. 這群知識分子當時是應戴晴邀請，到《光明日報》會議室開會，因為學運爆發以來，知識界並沒有正面提出支持，所以在戴晴聯繫召集下，這十二人才會聚集一起，希望在報上發表意見。而據包遵信事後回憶，他認為這是戴晴事先設好的圈套，因為王超華的到來，才讓這群知識分子在事前沒有準備的狀況下現身天安門廣場做斡旋的工作。其中，包遵信特別指出李澤厚的態度，「李澤厚總是以他的聰明與矜持，一句話也不吭。」由此可知，事實上這群知識分子的意見並不一致。同前註，104-106頁。
56.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124頁。
57. 封從德（1998）。《天安門之爭》。香港：明鏡出版社，119頁。
58. 根據封從德的回憶，這個「絕食團指揮部」是在「掌聲和眼淚」中宣告成立的，無論是對絕食同學還是對外界，都還缺乏形式上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而且關於「自焚」的加入條件，旋即取消，使得許多學生對這個指揮部不信任。對於運動經過一個月已經形成的學生骨幹群，彼此才有些基本信任與了解，但李祿則是從河南來北京加入學運的外地生之一，「突然冒出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李祿」並且把絕食發起者之一的馬少方等人排拒在外，自然引發普遍疑慮。學生組織開始四分五裂，甚至是「開了廣場『政變』之先河」。參見封從德，《天安門之爭》，136-141頁。
59. 聯合報，〈我們來了！〉。載於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105頁。
60. 中國時報，〈百萬遊行〉。載於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107頁。

61.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162頁。
62. 《一無所有》是有「中國搖滾之父」之稱崔健的著名歌曲，在學運時期成為廣場上時常播放的「主題曲」，歌詞內容頗能和當時學生的心聲呼應，極受歡迎。
63. 對於吾爾開希個人的評價，在「六四」後基本上是貶多於褒，例如封從德事後回憶時，直指吾爾開希是「華而不實利用媒體作秀的人」，「實際上，他基本上不在任何一個組織中做事，而是依賴媒體與輿論的影響浮在整個運動上面」。參見封從德，《天安門之爭》，302、368頁。
64. 在鏡頭之下的吾爾開希，表現出一種「偏激」、「對李鵬沒有誠意」的形象。同前註，156頁。
65. 原載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報》，資料收錄於張京育主編（1989）。《民國七十八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58頁。
66. 侯德健是當晚受邀嘉賓，在唱完《龍的傳人》之後將當晚演唱會拉到高潮，此時侯德健邀請吾爾開希與他一同合唱新作，他說「現在我請一位小英雄一起來唱一首歌，他就是吾爾開希」，雖然這時吾爾開希因為先前種種作風引發學生組織的不滿而遭解除職務，但仍舊引起廣場學生的熱烈歡迎，而吾爾開希上台後因為身體虛弱而昏倒入院。參見中國時報，〈那一夜〉，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220-221頁。
67. 華爾街日報，〈民主女神〉。載於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214頁。
68.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235頁。
69. 柴玲的發言，資料引自星島晚報，〈學運火種必須薪傳〉。載於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255頁。
70. 封從德事後回憶道「……只要是先在這個廣場上的人，他跑到火車站去，對剛下火車什麼也不知道的同學說，我是糾察隊長，你們跟我來，廣場上需要你們！就把這些人拉成他的糾察隊。他們到廣播站或指揮部，將原來的糾察隊趕走，只要廣播站一佔領，權力實際上就成了他們的。當時每天差不多都得鎮壓三四次。我甚至開玩笑說：我現在理解李鵬為何要鎮壓學生了！」
71.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172頁。
72.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256頁。
73. 胡平（1992）。《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73頁。
74. 封從德，《天安門之爭》，222-223頁。及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237頁。
75. 封從德，《天安門之爭》，358頁。

76. 劉曉波 (2000)。《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北：時報出版。
77.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257頁。
78. 這段話引自劉曉波等在6月2日所發表的〈絕食宣言〉。載於《探索與省思》，131頁。
79. 這是中共中央電視台，在6月6日逮捕劉曉波後，於新聞聯播時播出一幕劉曉波在絕食棚中喝着可口可樂時所注解的解說詞。參見卡瑪、高富貴，《天安門》，227頁。
80. 陳安安，〈從人文精神剖析大陸80年代文化爭論〉，215頁。
81. 同前註，217頁。
82. 白永瑞，〈從慶典到抵抗：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五四運動八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3頁。
83. 同前註，4頁。
84. 閻卓儒 (1993)。〈天安門之謎〉。見曹英、于超 (編)，《風雨天安門》。北京：團結出版社，318頁。
85. 白永瑞，〈從慶典到抵抗：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6頁。
86. 同前註，5頁。
87. 戴錦華，〈隱形書寫〉，《鏡城地形圖》，174頁。
88. 吳良鏞，〈天安門廣場今昔探秘〉。見曹英、于超 (編)，《風雨天安門》，301-303頁。
89.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111頁。
90. 吳良鏞，〈天安門廣場今昔探秘〉，314頁。
91. 蔡政騫 (1998)。〈空間權力機器：台北首都核心區總統府廣場之紀念性空間研究〉，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3頁。
92. 戴錦華，〈隱形書寫〉，《鏡城地形圖》，174頁。
93. 同前註，175頁。
94. 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袁木求魚〉，《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355頁。
95. 柴玲，〈天安門大屠殺·柴玲血淚見證〉，《探索與省思》，20頁。
96. 卡瑪、高富貴，《天安門》，232頁。
97. 關於吾爾開希所受到的批評大多自他披露的言論受到質疑而起。例如吾爾開希當晚並沒有在天安門廣場上和最後的學生與民眾一起撤退，封從德在書中寫到：「……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說要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東西！我現在才了解了你

們。』」封從德，《天安門之爭》，189頁。另外，劉曉波也在其著作中批評吾爾開希「裝病昏倒、臨陣脫逃」、「……為了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着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根本不管所經歷的事實是怎樣，一味向國際輿論描述靠自己的想像創造出的流血場面，於是乎……成了傲立於血泊中的英雄」，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除吾爾開希的「身分」問題之外，許多學運分子如常勁、王超華在巴黎會議上紛紛指出，從5月13日之後，吾爾開希便不再代表北高聯，也失去常委一職，5月15日之後，北高聯的負責人是楊濤。楊濤是王丹的同學（北大歷史系八八級），在北大籌委會中和王丹的威望不相上下，只是鮮為港台海外所知。另外封從德在著作中，不客氣地指出「……開希到了海外，更加相信他是『最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領袖』……實際上，開希作為『學生領袖』的形象，確實得力於媒體……整個運動期間，開希在北高聯，有相當長的時間並無主席頭銜，只是大家不好說穿而已。」封從德，《天安門之爭》，181-182頁。

98. 吾爾開希於逃亡後所發表的言論，資料原載於1989年6月28日的《中國時報》，後收錄於吾爾開希，〈學運只是受挫·終將取得最後勝利〉，《探索與省思》，36-39頁。
99. 此乃參見楊照的看法。楊照（1993）。《臨界點上的思索》。台北：自立晚報，29頁。
100. 此處亦是參見楊照的看法。楊照（1991）。《流離觀點》。台北：自立晚報，144頁。
101. 李歐梵（1990）。〈從學運看中國民主之路〉。見八方文化（編），《中國何去何從——海外學者的反思》。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77-82頁。
102. 耶人，〈海外民運跳不出共產模式〉，《九十年代》，1995年7月，88頁。
103. 李歐梵，〈從學運看中國民主之路〉，82頁。
104. 耶人，〈海外民運跳不出共產模式〉，82頁。
105. 封從德，《天安門之爭》，330-331頁。
106. 同前註，201頁。
107.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199頁。

第九章

二十年海外中國政治 流亡運動概覽

周義澄

美國《北京之春》執行編輯

本文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以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者為主體的，對中國共產黨現政權持反對、批評態度，意圖用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取代一黨專制的運動為「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並嘗試對這運動從1989年至今的發展做一個概要的敘述。

從興盛、低落到新興力量加入—— 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幾個發展階段

前1989年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 「中國之春」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政之後，在歷次全國性政治迫害運動中，從上世紀40至50年代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對右派分子運動到60至70年代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一些不願忍受極權制度迫害的個體，設法通過各種方式逃離

中國大陸；即使是通過合法途徑出國探親、求學、訪問者，也在自由世界薰陶下對極權政治體制採取了批判態度。由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和80年代的對外開放，西進東渡南航的出國人員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在國內參加過各個時期政治反抗運動的個人。1989年「六四」之前在海外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現政權的異議運動，這就是王炳章在美國創建的「中國之春」運動和隨後成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

王炳章屬於文化大革命之後首批公費留學生，1982年在加拿大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棄醫從政，來到美國與其他留學生一起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創辦《中國之春》雜誌。1983年12月在「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立。這是當代海外第一個中國政治反對派組織，它標誌着海外流亡運動進入了新的組織化行動的階段。在此以前，海外存在的大多是一些受壓迫者個體的控訴反抗行為。「中國之春」運動和中國民聯首次提出了「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目標和「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法治，保障私有產權，提倡多元經濟」的主張。

以中國民聯為代表的前1989年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與大陸民間反對運動有自然聯繫。1970年代的「民主牆運動」和魏京生等人的行為遭遇，是王炳章投身反對運動的重要動力；將這一運動定名為「中國之春」，也是為了承續「北京之春」民主牆。繼王炳章後於1988年當選為民聯主席的胡平，民主牆時期在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過「論言論自由」，其後參與北京大學競選活動當選為區人民代表，1987年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民聯。與國內民主運動的緊密聯繫使得中國民聯將「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規定為「近期奮鬥目標」。1987年5月民聯出版了《方勵之言論集》，向海外學生學者詳細介紹了當時在國內享有盛名的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教授的自由化言論。

1980年代中國處於改革開放的上升期，海外幾乎所有學校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均受各地中國領事館指導，留學生大多對民

聯這樣的政治反對組織具有某種戒備心理。1985年5月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成立，曾經在1980年參與北京大學人民代表競選的于大海擔任首屆會長。1986年底國內發生學潮，于大海與一批學生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徵集到千餘人簽名，海外留學生首度集體表達了「不同政見」。公開信在報刊上發表的時候，某些學生特意加上「此事與中國民聯、中國之春沒有關係」的說明。胡平在哈佛期間被選為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學學會（中國留美政治學會）會長，之後加入民聯並當選為民聯主席，曾經引起政治學會某些成員的擔憂。隨後被選為政治學會繼任會長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研究生徐邦泰，也是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時競選人民代表，擔任官督民辦刊物《大學生》編委的異議分子，之後還擔任了民聯聯委會主任和民聯陣主席。上述事實表明了這一時期留學生中的矛盾狀態：一方面是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追求，另一方面是對參與有組織反對運動的種種疑慮。

中國民聯在志同道合的留學生中秘密發展，之後部分成員陸續公開。1988年5月在美國肯塔基大學出現了自由選舉產生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其正副會長是與民聯關係密切的人士以及民聯的公開成員，中共使領館宣佈不接受這個選舉結果。民聯在美國大學中的組織公開化。中國民聯還向世界各國發展，至1989年6月四大召開，民聯在加拿大、歐洲各國、日本、東南亞、香港、澳門及非洲毛里求斯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分部或聯絡站，在中國大陸許多省份也設有秘密聯絡點。

中國民聯積極介入國內民間民主運動。民聯成員、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研究生楊巍回國參與1986年、1989年學生運動，兩次被中國當局逮捕判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提到了「反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反動刊物」《中國之春》。《中國之春》特別記者陳軍在北京參與1989年2月33人簽名信事件，成立「八九特赦」辦公室，提交「關於一九八九特赦問題的報告」，被驅趕出境。

在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民聯利用海外自由條件與大陸民主力量配合，把大陸運動情況及時傳向世界，將海外聲援信息迅速傳返大陸。與四五「天安門事件」以及「民主牆運動」相比較，「八九民運」相當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共的新聞封鎖，其每一個進程及時成為國際關注的中心，這主要歸功於國際新聞媒體，也是中國民聯等海外組織推動的結果。高潮時期參與聲援國內民主運動的在香港達百萬人；西歐北美許多城市也有成千上萬人的遊行，其中民聯擔當了重要的組織角色。從美國回北京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劉曉波與民聯有密切關係；攜帶捐款回國支援運動並親身經歷「六四屠殺」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會長、博士研究生楊建利，是1988年加入民聯的骨幹成員。

鑒於中國民聯在海外流亡政治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中共當局將它視為敵對組織。1987年12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以答新華社記者問的方式，首次公開陳述了關於「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官方立場：「中國民聯」是「敵視和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進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宣傳的工具。」「不允許『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對『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秘密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在中國境內傳播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繳。」「在國外參加『中國民聯』後，又回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觸犯刑律的，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六四」之後，當時的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向全國人大會議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多次提到海外「反動組織」中國民聯。至1989年時期，民聯在世界各地的成員近3,000人。

民聯早期成員薛偉在國內曾因「反革命罪」被當局逮捕判刑，1980年自費出國留學，1981年創辦「大陸新移民聯誼會」。考慮到返回大陸可能受到政治迫害，薛偉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被否決後遂向法院控告美國政府，法院最後判決薛偉勝訴。此案創下了在美國的中國大陸人士通過法律途徑獲得人權保障的先

例。中國民聯及其附屬組織「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幫助了很多向居住國尋求政治避難的大陸人士，至1989年達三百餘例，其中大多數成為海外民運的長時間參與者。通過政治庇護獲得在自由世界各國的居留權，是海外流亡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員在申請期間和獲得永久居留權之後積極參與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為這個運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其影響延續至今。

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的興盛—— 從民主中國陣綫、學自聯成立到海外民運大聯合

1989年中國大規模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於6月4日前後遭到當局血腥的軍事鎮壓，1989年和「六四」因此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標記。這一事件給海外流亡政治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幾百名學生、工人與知識分子相繼被迫逃亡或被驅離中國，成了各國流亡運動的重要力量，海外流亡者運動因此成為1989年運動在海外的延伸：壯大了中國民聯，造就了民主中國陣綫新組織。另一方面，「六四」的腥風血雨沖刷了前幾年胡耀邦、趙紫陽新政給共產黨政權塗上的迷人油彩，使得大批順從於中共使領館的學生迅速向民主運動傾斜。一個個大學學生聯誼會舉起了獨立自治旗幟，成為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成立的堅實基礎。各國民眾給「六四」逃亡者以英雄式的歡迎，海外流亡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景象。

由於香港民間組織主要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幫助，以及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六四」之後許多被通緝追捕者經過各種渠道安全逃往國外。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中有15名成功出逃，後來被稱為「黃雀行動」所援救出來的人員達133名。逃往海外的「八九民運」領導人的政治理念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1989年民眾示威活動中，從最初的反對官倒、懲治腐敗到推翻426社論，乃至516、517之後出現罷免李鵬、結束老人獨裁等激烈口號，從來沒有推翻共產黨現政權的想法和提法。換言之，整個「八九民運」只是一個在現有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和共產黨執政的架構下「體制內」的民眾抗議運動，其基本出發點還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過「六四屠殺」血的洗禮和自由社會環境的強烈衝擊，加上以民聯為代表的老反對派的影響，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很快成為在海外的原「八九民運」代表人物的共識。原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嚴家其與吾爾開希，在1989年7月4日共同發表的「國殤日週年宣言」中提出「鄧、李、楊集團」已經喪失「任何合法性基礎」，這種反動政權必將「被徹底摧毀」。

1989年7月，逃往法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原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原北京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以及先前已經在美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和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共同發表成立「民主中國陣綫」的倡議書。9月，民主中國陣綫（民陣）成立大會在法國巴黎舉行，嚴家其、吾爾開希當選為理事會正副主席，錢達為監事會主席，萬潤南被任命為秘書長。民陣章程提出了「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原則。

1990年4月，民陣與民主德國（東德）反對派組織「新論壇」等共同發起，成功地召開了有前蘇聯及東歐原社會主義陣營諸國反對派參加的「民主與人權論壇國際會議」。1990年1月民陣參與了「民主女神號」廣播船計劃，試圖開往中國外海對大陸傳送廣播電視資訊。3月9日啓航，5月25日宣佈停止計劃。民陣陸續在幾十個國家地區建立分部，其成員發展到2,000至3,000人的規模。

這一時期成立的另外兩大組織是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學自聯）和中國自由民主黨。

「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給在國外求學進修的大陸學生學者以極大震撼，他們衝破領事館的阻撓，成立了與原先官辦的學生聯誼會不同的自治組織，或者宣佈原有聯誼會與領事館脫離關係。當時美國有四萬多中國學生學者。1989年7月底，來自美國各大學二百多個組織的三百多名代表在芝加哥舉行代表大會，宣佈

成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選舉史丹福大學的劉永川和耶魯大學的韓聯潮為正副主席。全美學自聯宣稱崇尚科學理性，尊重保護人權，致力於社會文明進步，追求和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政治制度。學自聯的低層次政治訴求與民聯民陣不同，多年來堅守利益集團角色，其主要活動和貢獻是推動1990年布殊總統簽署保護中國在美成員的行政命令，推動國會參眾兩院通過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和布殊總統簽署該法案，成功地使得八萬多留美人員獲取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綠卡）。全美學自聯在促進中國人權改善和維護中國學生學者利益方面的成就引起了美國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成為公認的全國性遊說團體。1990年7月，全美學自聯、加拿大學自聯和德國學自聯與台灣、香港學聯成立了全球中國學聯，劉永川擔任主席。

1989年12月，百多名留學生與民運人士在美國維吉尼亞黑堡秘密召開中國自由民主黨成立大會，通過「組黨倡議書」和「政治綱領」，選舉倪育賢、陳厚琦、時和平為召集人，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1990年7月中國自由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召開，全美學自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同時在此地舉行。美國伊利諾大學的陳厚琦當選為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

在海外有了民聯、民陣兩大政治反對組織之後，為什麼還有人要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這裏大致有三個原因。第一，在任何社會政治運動中總有激進與緩進等不同流派。在海外中國流亡運動中，民聯和民陣的政治綱領雖然都有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內容，但是其政治手段在某些激進派看來過於緩和，尤其是民陣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行為準則。中國自由民主黨在其後來的綱領中提出了「推翻（剷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體」的綱領。第二，民聯民陣雖然是政治團體，但名稱上都不叫政黨；激進派認為必須要有一個相應的反對黨才可以與共產黨較量，於是「組黨」就成了這些人強烈的政治訴求。第三，青年學生提供了激進的人力資源。廣闊的「八九民運」和殘酷的「六四鎮壓」喚起了海外留學生的政治參與熱情，血氣方剛的一部分青年具有更為積極的政治訴求。但是學自聯由於其本身的自然定位，不可能成為

強政治性組織。留學生中的積極政治參與者便試圖尋找更加激動的舞台，嘗試成立名為政黨的團體。這也就是中國自由民主黨早期的建黨人員中有很高比例的留學生，自民黨一大及學自聯二大同時同地召開，與會代表互有重複的原因。如果沒有學生內部強大的激進力量推動，原先民運組織中的激進意見分子便無力舉起中國自由民主黨的大旗。但學生又總是一個易於鼓動而又極不穩定的群體，不久以後海外民主運動整體上逐漸退潮，共產黨政權也沒有如有些人想像的那樣迅速垮台，相當數量原學生組黨積極分子返回學校重拾學業，離開政治活動圈或者回國發展。

民聯和民陣一直尋求聯合與合併。1992年8月，享有盛名的中國異議作家王若望以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身分來到美國，成為推動民運大聯合的重要個人因素。他與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方勵之、劉賓雁的行為方式不同，連續訪問加拿大、歐洲、香港，多次發表演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新聞自由；給『六四』平反，釋放一切政治犯」為海外民運的三條最低綱領，海外民運眾多參與者以為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超越派性、抑制內鬥，了解大陸政情又得到海外人士擁護的領袖。1992年年底王若望夫婦應邀訪問台灣，1993年元旦參加升旗典禮時與李登輝總統會見，隨後獲得民運合併大會經費，民聯民陣盼望多年的大聯合時機成熟。

挫折後的穩步前進——

從華盛頓會議失敗到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再嘗試

1993年1月底，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綫世界聯合代表大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二百多名代表及貴賓參加了大會。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美國國會參議員戈登到會祝賀，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南茜·波洛西女士發表演說。代表們審定了大會政治宣言和各項工作計劃，確定新組織以「保障基本人權、保護私有財產、維護社會公正、實行多黨政治、推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為綱領，「中國民主聯合陣綫」宣告成立。會議在組織領導人選舉方式上

發生爭議；王若望、胡平、萬潤南退出競選，部分代表退出大會。主席團緊急磋商後決定大會繼續進行，選舉照常，徐邦泰當選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綫主席，楊建利、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

1993年5月，不承認民聯陣的一些團體及個人在洛杉磯成立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推舉王若望為總召集人。部分原民聯、民陣成員年底在澳洲召開大會，原民聯聯委會副主任吳方城當選為民聯主席，萬潤南再次當選為民陣主席。

華盛頓會議的失敗給海外流亡運動帶來重大衝擊，一批人員從此離開民運，不再過問政治；對民運大聯合原抱期待的僑界、學界民眾大失所望；隔岸觀火的中共官員心中竊喜；民運聲望下跌，興旺局面結束，受挫折的海外政治運動進入了重新分化組合的緩進時期。

在內鬥中疲乏了的民陣、民聯與民聯陣逐漸停止相互攻擊，其中一部分有志者始終沒有放棄過重振流亡運動聲威的努力。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中國當局陸續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讓一些著名異議人士離開中國。當這些人士來到海外的時候，總會引起試圖重整旗鼓的新波動。1994年4月，「四五運動」的參與者，被中共當局稱為「天安門事件」黑手的王軍濤到達美國。1996年10月，與劉曉波發表《雙十宣言》的王希哲經香港流亡美國。1997年11月16日魏京生來到美國，12月8日與克林頓總統在白宮會見。民主牆時期的特殊表現和所受到的嚴重迫害，加上連續三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被提名人，使得魏京生在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具有巨大聲望，成了人們期待的新領袖。1997年11月底民聯陣—自民黨合併的代表大會在美國紐約召開，當年創建民聯西班牙分部的王策當選為主席，徐邦泰為名譽主席，王若望出席大會，多個民運團體聯合歡迎魏京生，發表「支持魏京生整合與領導中國民主運動倡議書」。1998年11月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在加拿大多倫多成立，魏京生為召集人。此後數年聯席會議正常運作，華盛頓會議帶來的負面影響漸漸淡化，海外流亡運動進入一個穩定發展階段。1998年4月19日，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在克林頓總統訪華前夕被送出境來到美國，為流亡運動注入一支清流。2000年11月中國社會民主黨

在美國紐約成立，1970年代在廣州創辦民間刊物《人民之聲》的劉國凱任該黨主席，宣佈推舉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名譽主席。

從1989到2000年這十多年間，海外中國流亡者隊伍明顯擴展，囊括了國人追求民主自由各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有早期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政治異己（如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探索》雜誌總編輯司馬璐），50年代的大右派（如林希翎），文革中保護自身人權不受侵犯的造反派和異端大字報作者（如上海「工總司」的潘國平、廣州的王希哲、南京的徐水良），「四五運動」到民主牆的精英（如王軍濤、魏京生），70、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如蘇紹智、嚴家其、郭羅基），89年學生、工人運動的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韓東方），民營企業的老總（如萬潤南），持不同政見的自由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如方勵之、劉賓雁），具有民主理念的前任官員（如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開明領導者的智囊（如原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既有苦大仇深的老「反革命」，又有熟悉西方民主政治的留學生（如全美學自聯成員）以及傳統華僑中的反共人士（如民主教育基金會創始人黃雨川）。與這一運動密切相關的還有某些西藏、新疆維吾爾、蒙古族的流亡者乃至美國、台灣的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立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等。中國海外流亡者運動呈現出擁有各路政治代表的全方位陣營。

流亡運動走向低潮與民運組織的內鬥

大約從新世紀開始，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走入了幾乎不可避免的低落時期。其標誌是，許多與民運有關的會議及示威活動參加人數越來越少；「六四」紀念活動規模一年不如一年；大多組織遇到捐款和財務困難，連得像樣的代表大會都開不起來。學自聯在華盛頓堅持每年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但是各大學的學自聯組織已經消失，學生聯誼會重回領事館的懷抱。民運組織和

個人聲譽下跌，當時的明星成為人們批評嘲諷的對象。某些知名人物離開了原先奮鬥的事業，埋頭於自身商業投資活動、學術研究或教會傳教職業，在流亡活動中消聲匿跡，連得一年一度悼念「六四」亡靈的活動也不再參與。有些個人或公司則與財大氣粗的共產黨暗同款曲，從事各種交易。在西方民主國家，不斷出現歡迎中共領導人來訪的群眾遊行和五星旗升旗儀式。

這種低落，是中國社會和國際大趨勢的變動決定的；民運組織內部成員的衰退、背叛、內鬥和醜聞加劇了這種狀態。

從國際大格局看，1989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幾乎一致譴責「六四」暴行，主張並實施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同時期發生的前蘇聯和東歐原共產主義陣營諸國陸續解體變型，為中國流亡政治運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大環境。美國總統布殊發佈保護中國留美學生的行政命令，國會通過了對華制裁的議案，在決定繼續延長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提出人權條件。1993年克林頓總統在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行政命令中加入了人權條件，1995年宣佈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小布殊上台之後對中國心存戒備，911事件之後面對恐怖主義的挑戰迅速調整外交關係，對華政策明顯改變。美國希望中國在國際反恐包括北韓核問題上發揮有利作用。2001年上海APEC會議期間布殊決定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該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局勢對中共更為有利。中美關係處於「最好時期」。

從中國國內發展看，「六四」之後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中共政權色厲內荏地尋求生存之路，大幅度調節自身。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改革開放迅速變成了對私有經濟的全盤肯定和對共產主義的徹底拋棄，以掠奪國有財產為基礎的官僚資本主義或閥族資本主義（Nepotic Capitalism）迅速發展，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中共在國際社會面前逐漸改變了因「六四鎮壓」帶來的醜惡形象，增強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國家的經濟實力。西方國家政府為了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在中國大數額的訂單面前則有意無意放棄了制裁方針。

從流亡運動內部看，缺乏新的內部外部動力機制。各種類型的流亡者在謀生的壓力和中共政權的威嚇利誘前不同程度地退卻轉移。不斷的「內鬥」更添加了陰暗色彩。

海外流亡運動中的影響比較大的「內鬥」有以下幾次。(1) 民聯的「罷王風波」：從1989年初發生並公開化的民聯一部分人要求罷免當時身為民聯常委的王炳章的職務，一部分人激烈反對。

(2) 民陣的「陳萬之爭」：民陣成立之初就產生，1990年二大前公開爆發的民陣秘書長萬潤南與民陣理事陳一諮之間互相指責攻訐。(3) 1991年發生的要求對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執行主席廖大文查賬事件。該基金會成立於1989年11月，分配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有人檢舉廖大文多報帳目，于大海、萬潤南要求派工作組查帳，廖大文辭職，基金會關閉。(4) 前面所說的1993年華盛頓會議，兩個組織合併成三個組織，同時發生對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主辦權的爭奪。(5) 各民運組織內部斷斷續續進行「抓特務」活動，學自聯曾經有人為此成立過「抓特務小組」。(6) 2005年中國人權事件：王丹、劉賓雁、郭羅基等大批理事及理事會共同主席方勵之辭職，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被指責犯規連任和財務不清。(7) 2004年之後多個牌號的「中國民主黨」出現，有的被指為假。(8) 2006年5月在美國發生的來自中國的王怡、余傑等人抱在一起向上帝禱告，宣佈取消維權人士郭飛雄參加美國總統布殊與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會見資格的事件。(9) 2008年出現的以德國費良勇為主席，荷蘭王國興為主席的兩個民主中國陣綫以及領導機構並存事件。用「內鬥」二字概括上面各項事件不盡準確，僅取其約定俗成的意義。政治學家嚴家其說海外政治流亡組織是「跨國的NGO（非政府組織）」，內鬥是常態。作家劉賓雁稱內鬥結果「驅使更多的中國人嫌惡政治，驅使愈來愈多的海外有志華人脫離民運，切斷民運的財源」。

在人們認真審視這些事件時，會發現幾乎所有內鬥都沒有涉及當事人政治路綫或思想理念的重大分歧，主要是財務、人事安排和行為作風問題。幾乎所有被指控為貪污者都沒有在法律上被證實為犯罪並受到所在國的法律制裁，或者受到某個團體的行政懲罰，最後不了了之。

其原因可以從多個方面去尋找。作家安琪女士最早記錄民運組織內鬥的事實並提出「共產黨政治文化的陰影」對海外民運組織、流亡運動的深刻影響，海外民運的「紅衛兵團」的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和道義上的分析。搞民主運動的許多中國流亡者不懂得或者不願意遵循自己舉手通過的民主政治的規範準則；選舉中的失敗者沒有學會尊重和接受選舉結果，更沒有民主社會通行的向勝選者表示祝賀的風度。

此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在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中實際上並不存在可以制約其成員違反組織章程之行為的法律和規則。民運組織成員不是公司僱員，即使被開除也無所謂，甚至可以再立山頭，糾集一些人另外召開代表大會來將他人開除。在法治國家，民事、刑事糾紛的最終解決途徑是法律訴訟，當民運組織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這些國家通常也只能按照公司組織註冊的相關法律來處理糾紛。1994年6月美國加州總檢察長在處理當時民聯、民陣、民聯陣的訴訟案時，依據的就是聯邦及州的公司註冊法律，無法顧及這些組織的內部是非。在近年來眾多牌號的「中國民主黨」面前，有人強調1998年在國內組建的中國民主黨才是正宗，此話並無大錯。但是從歷史看，最早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是1989年3月內鬥時期民聯的部分成員，1995年王若望也成立過中國民主黨並擔任主席。如果有人要通過法律途徑起訴假的「中國民主黨」，也許會非常困難。被指為「假」的組織有可能在「真」的組織註冊以前就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註冊登記。且不說在公司與政黨的登記方面，相同中文名稱的組織還有可能使用不同的英文名稱。事實上，相當一部分流亡政治組織在所在國家並沒有依法註冊登記。

「抓特務」也是如此，儘管被懷疑甚至點名的大小特務不少，但沒有一個被抓出來。當年擁有強大的軍隊和政府的國民黨，在共產黨的間諜滲透面前尚且一敗塗地，今天結構鬆散沒有嚴密紀律的流亡組織更不是它對手。中共當局在海外尋找一些廉價的告密者、綫民或中介公司易如反掌，但真正要把他們抓出來，恐怕需要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才行。

中國人權事件中有人指責劉青是「終身制」，其實這個問題在相當數量以中國民主為課題的受資助機構中都存在。這些機構不像香港《前哨》、《爭鳴》雜誌那樣由私人出資經營，但其法人代表和負責人通常是某一個人，此人就自然成為沒有也不需要經過選舉或任命的「老闆」，這實際上是無改選章程的終身制，或者是有章程而沒有執行的終身制。

這裏將中國流亡運動與西藏流亡運動作一比較（這種比較並不隱含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西藏問題不是中國問題的意見）。西藏流亡運動50年來形成了大數量的人群（大約是14萬人），真實的選民（大約是5萬人）和以最高法院、人民議會和流亡政府（噶廈）構成的民主政治體制。美國國會每年的固定資助非常重要，而居住在各國的藏民向政府「自動捐稅」也是流亡運動的財務來源。尤其是，西藏流亡運動對國際社會來說不僅僅是索取者，同時也給施予者，它給西方世界帶來新的精神資源，這就是藏傳佛教的傳播和達賴喇嘛巨大的道德思想影響。達賴喇嘛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者，荷理活影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等人是他的忠實弟子。1999年8月15日，四萬美國民眾在紐約中央公園大草坪聆聽達賴喇嘛講仁道慈，佛教領袖受到羅馬教宗般的歡迎。相比之下，中國流亡運動中從來沒有具備足夠數量的「真實的選民」；中國流亡者除了接受和學習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申請接受各類國際資助外，未能向西方世界提供有意義的東方精神產品，最多只是對中國社會罪惡的控訴和揭露，無力在國際舞台上扮演偉岸的角色。

新興力量的加入—— 海外流亡運動進入可持續增長階段

經歷了十多年波動，近四五年來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海外流亡政治運動中出現，這就是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新移民，他們

以讀書、探親、婚嫁甚至偷渡的方式來到海外。由於他們的加入，在各國中共使領館面前接連不斷出現抗議示威，在「六四」紀念活動中也重現了熱烈的場景。2009年3月10日，由國際漢藏協會和達賴喇嘛駐美國代表處主辦的紀念西藏抗暴50周年暨「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揭幕大會在美國紐約成功舉行，600名熱情與會者大多是這類新成員，其中還有帶着孩子到會的年輕母親。

新移民的參與在傳統民運組織中引發了爭議，這種爭議與多年前有人批評一些沒有參加民主運動卻取得「六四」綠卡者是吃「人血饅頭」（借由魯迅小說《葯》的故事）引起的爭論有承續之處。一種意見認為這些人參與民運是假，通過政治庇護取得綠卡是真，一旦取得永久居留身分就會離開民運，甚至回去投靠中共；那些打着民運組織旗號的政治庇護公司的目的就是賺錢，與其說是搞民主運動，不如說是難民運動。反對的意見認為，美國這類民主國家每年給予一定數量來自中國的難民以政治庇護，是對中國存在政治迫害這一現實的承認；來自專制制度的人們選擇在自己嚮往的民主國家居留，屬於天賦基本人權，無可非議；當年共產黨人為了吃飯可以出來鬧革命，今天的難民自然可以為了合法身分搞民運；將自身利益與民主理念結合起來，才是海外民主運動真實的基礎；這些人面對中國領事館大聲抗議，將自己辛苦打工掙來的錢捐助國內受害者，是真實地參與民主人權運動，不是假的；在一系列實踐中，一些原先沒有民運經歷，缺乏民主理念的人讀了以前沒有讀過的文章，結交了以前沒有見過的民運朋友，由自發到自覺，最後真的成了民主政治活動積極分子。現在美國來自中國大陸的因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成為非法移民者達幾十萬，不論這些人流亡的具體原因如何，都是民主運動的人力資源，海外政治流亡組織必須重視這一新的力量，聲稱為百姓謀利益的民運組織沒有理由對他們漠不關心。現在一些傳統民運組織着手成立或完善對難民提供服務的法律援助機構，讓更多年輕有朝氣的新生力量充實到自己組織中來。

國際遊說團體、自由言論平台、組織力量基地——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主要功能和存在價值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一個基本功能

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和表達中國人民的真正聲音，影響各國政府和議會的對華政策，充當具有遊說功能的壓力團體，是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一個基本功能。

由於中國專制體制的資訊封鎖，國際社會要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確實困難，海外中國流亡運動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從1987年9月美國參議院就楊巍案和留學生延長居留案舉行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以來，海外中國流亡者參加過許多次這類聽證會。除了學自聯關於中國學生永久居留權的遊說活動外，多年來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人權掛鉤問題，中國加入WTO問題，北京主辦奧運會的人權狀況改善問題，直至推動魏京生、王炳章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都包括海外流亡者做出的努力。西方各國的政府和議會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公開關切，中國國內被迫害人士，包括師濤、高智晟、郭飛雄、胡佳、劉曉波等人的名字經常由訪問中國的民主國家領導人向中共領導人提及。魏京生出國之後長期穿梭於各國政府議會之間，在2008年8月布殊總統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之前會見中國異議人士時，魏京生對布殊提出了批評。民陣、民聯積極參與的2006年5月在德國柏林，2007年5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2008年8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連續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發生了積極的影響。主張在中國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制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自2006年開始連續訪問瑞典、荷蘭、法國、比利時、丹麥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與他們建立政黨聯繫。主持「中國公民力量」的楊建利，2009年2月27日在美國國會作了「《零八憲章》：喚醒美國與中國的演講」，意圖推動美國國會兩院通過支持《零八憲章》的提案。3月，曾經贊同中共鎮壓1989年「天安門運動」和西藏示威者的美國政界「中國通」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被提名為美國情報委員會主席的消息透露出來之後，魏京生和幾十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

寫信給奧巴馬總統表示抗議，傅立民被迫自動退出提名案。美國國會還將通過紀念「六四」20周年的提案。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二個基本功能

利用海外言論自由環境進行理論探討，為國內異議人士發表政見提供可靠園地，這是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二個基本功能，也是未來中國民主社會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

當代中國公共生活中最缺乏的是言論自由，許多理論課題在國內被列為禁區。在民主社會，人們可以自由發表各種意見，展開爭論。多年來海外中國流亡界展開的理論課題包括：關於1989年民主運動的反思和爭議；關於海外民運策略手段的爭論；關於民族問題（漢藏關係、台灣與大陸關係）的爭議；以及在國內被禁止討論的關於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和當代大饑荒等問題的研究。

關於「八九民運」的回顧和反思

1989年民眾運動被鎮壓之前後，胡平連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並在1992年出版了《中國民運反思》一書。1991年一批天安門學生在法國巴黎聚會，回顧反思這場運動，隨後出版了研究文集。1995年6月，針對社會上對學生的質疑和內部的爭論，《北京之春》雜誌社舉辦由眾多天安門學生及知識分子參加的大型討論會，陸續發表了會議發言和爭議文章。北京歷史學者陳小雅女士的《八九民運史》也在海外出版。這些回顧反思肯定了「八九民運」正面意義，駁斥了中共官方及其幫閒所謂「暴亂」和「暴民」的指責，同時檢討自身責任，吸取經驗教訓。其內容涉及對一些事實真偽之求證（大如廣場撤與不撤的過程，小到「絕食書」的作者是誰），不同意見的爭論，包括當年廣場學生尤其是激進派的責任；中共黨內鬥爭與學生運動的關係；是激進派以絕食打斷了學生與政府的對話進程，還是因為政府本無誠意對話才引發學生絕食，才造

成後來的流血；是不是因為學生沒有配合黨內開明派的步調或者沒有從知識分子的勸導而導致失敗；有沒有所謂將學生作為政治計劃「人質」的「三綫計劃」；「六四屠殺」的元兇是鄧小平還是李鵬，鄧小平是否在李鵬「謊報軍情」之下「偏聽偏信」做出了決定等。胡平認為「八九民運」失敗並非不可避免，學生的主要失策在於戒嚴令之前未能「見好就收」，戒嚴令之後未能「見壞就上」。曾經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副總指揮的封從德等人認為廣場學生內部難以區分激進派和穩健派；什麼叫好及怎麼收，什麼叫壞及怎樣上都是問題。王丹同意「見好就收」，但是認為「見壞就上」應該加一個前提。總體上比較一致的意見就是王丹後來表示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對1995年發行的卡瑪·韓丁攝製的紀錄片《天安門》也有爭議。

為了弄清被中共政權刻意隱瞞的事實真相，加拿大盛雪女士主持的「六四」真相調查委員配合北京天安門母親群體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海外還出版了如《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吳仁華撰寫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這類書籍，即使某些含有較多商業炒作因素的有關書籍，也對弄清真相提供了多個可資比較的版本。

關於民運策略手段的爭議

1989年8月部分民運人士在北美《世界日報》上展開了關於「要不要打倒共產黨」的討論，之後又有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的爭議，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與原天安門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就此進行過公開辯論。楊建利提出憲政民主與暴力應當斷絕一切關係，反對以暴制暴；暴力行為會使中國流亡政治運動喪失道義資源和文明世界的支持；項小吉認為對民主運動來說不存在暴力問題，是以正當防衛反抗暴政；擔任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的倪育賢提出「必須堅持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

關於某些理論禁題的討論

在中國大陸被專制者列為禁區的理論爭鳴只有在海外才成為可能，主要包括關於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憲政民主與聯邦制、民族問題和台海兩岸關係、社會民主主義和中國第三條道路的討論研究。

1994年楊小凱撰寫的《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部分章節在《中國之春》、《北京之春》上先有連載。1996年5月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哈佛大學召開「中國文化大革命30周年」研討會，會後出版的文集《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成為美國一些大學研究文革的重要參考書。此後這類研討會多次進行且邀請國內學者參加。2004年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難者》出版，記載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的真實故事。劉國凱所著《人民文革叢書》四卷本也於2006年出版，作者提出的「人民文革論」破除了共產黨「十年浩劫」的專斷，批駁了對文革中人民反抗運動的污蔑。

1986年許良英、方勵之和劉賓雁發起準備在次年反右運動30周年之際舉行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流產的計劃成了鄧小平決定反自由化並導致胡耀邦下台，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被開除出黨的政治大風波的一個引子。20年之後，200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分別舉辦了兩場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方勵之出席會議，許良英作書面發言，一批當年的右派從國內趕到美國參加會議。會議論文結集出版，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編出版了《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勞改基金會與中國信息中心主編出版了《反右研究文集》。

政治學家嚴家其多年來從事聯邦制的研究並主張在中國實施這一制度，他撰寫的《聯邦中國構想》1992年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不過他的聯邦制主張未能寫入民陣綱領。王軍濤來到美

國之後，從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一直將憲政中國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研究內容，2002年與王丹組建了中國憲政協進會和中國司法觀察。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楊建利也組織了「中國未來與憲政民主」國際研討會和參與了《中華聯邦憲法草案》的起草出版。

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是中國民主政治不可迴避的現實難題。各個政治流亡組織始終將漢藏關係和海峽兩岸關係作為主要研究內容，舉辦了多次由漢族和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人士參加的民族問題研討會及數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與台灣民間機構共同舉辦多次關於台灣、大陸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研討會。1996年《北京之春》雜誌出版了《大陸人士論台海局勢》文集。1996年歐洲各國民運組織在荷蘭舉辦「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國際學術討論會。1996年5月曹長青主編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由於這兩個問題深深涉及國家主權的統一和獨立，自然出現了嚴重對立和色彩極端的反對意見。明確堅持統一並反對台灣或者西藏獨立的有王希哲、劉國凱；持另外一端尖銳意見的有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後任陳水扁總統國策顧問的阮銘，政論家凌鋒、曹長青。這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折射出海峽兩岸廣大人群中現存的不同意向。

1990年4月出逃美國後被開除黨籍的原中共駐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海外從未與民運組織聯絡，但是他於1992年6月發表的《試論和平演進》長文，應當視為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一種重要聲音。

以《北京之春》為代表的海外流亡者主持的平面和網絡刊物，為國內持不同政見作者提供了發表各種言論的廣闊園地。《北京之春》擁有百多名國內長期作者，近年來一半以上的文章來自國內作者。《民主中國》、《議報》、《新世紀》等網路雜誌以及《當代中國研究》諸叢刊，還有眾多名目的異議專題網站，對國內讀者產生着巨大的影響。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三個基本功能

作為中國國內民間運動在海外的延伸，海外流亡政治組織是架通國內外兩股力量的主要橋梁，是當代中國在海外的民主基地。這是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第三個基本功能。

流亡海外的組織和個人多年來一直堅持公開或者秘密地為國內持不同政見者提供資訊和財務援助。盧四清在香港主持的「中國民運人權信息中心」將中國大陸消息迅速傳到海外，成為海外媒體的重大訊息來源。1987年黃雨川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堅持每年評選一次「傑出民主人士」，至今已經舉辦21次頒獎儀式，歷年得獎人幾乎包括所有著名的中國民主維權人士。2004年12月魏京生基金會成立「魏京生中國民主鬥士獎」，2007年9月《北京之春》設立「自由先鋒獎」。這些獎項連同海外刊物提供的稿費，是對國內民主維權人士精神上的巨大激勵和物質上的重要幫助。在海外各國有了固定職業的許多個人，每年都不忘將收入的一部分資助國內同伴，作為生活的一部分。

橋樑兩端的人們來往交流。從大陸通往海外的方向來說，民主牆時期主辦《四五論壇》，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建黨的徐文立2002年12月被「保外就醫」送往美國；2007年4月「民主牆運動」期間起草《中國人權宣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的任曉町被准許到香港接受身體檢查，這些人繼續在海外流亡政治中尋找和擔當自己的角色。為數不少的民間學者來到海外短期參加各種半政治半學術的會議，與海外人士進行更為深入的交流。從海外通往中國的方向來說，一批人各顯神通進出大陸來去自由，而更多的海外流亡人士則無力通過合法途徑回到中國，其中有些人被迫選擇了闖關方式，試圖直接介入大陸民間政治運動。其中主要有1998年進入中國大陸被當局逮捕並驅逐出境，2003年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的王炳章；1998年底越境回國後被判處徒刑4年，2002年獲提前釋放的王策；1998年闖關回國被判處勞動教養3年的張林、魏泉寶；2002年為考察工人運動進入中國被判處5年徒刑於2007

年釋放回到美國的楊建利。耐人尋味的是，採取激烈行動非法闖關者並不是海外那些以言論出名的激進派，而是一直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行為準則的楊建利和公開提出「共產黨繼續執政30年方案」因而被斥為「投降派」的王策。楊建利認為其最大的收穫是出獄之後近4個月內會見了近200名國內異議人士，包括劉曉波、江祺生、丁子霖等，這是海外流亡政治運動史上破紀錄的成就。

即使在最低潮的時候，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仍然以這些功能表明了它的存在價值，在海外這個民主基地，至少為未來民主中國儲備了成百上千人的幹部資源。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展望

四個群落

現今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大致包括四個群落，第一是職業的流亡政治家。他們全心身地投入流亡政治運動，如主持魏京生基金會並擔任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聯席會議主席的魏京生；原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全美學自聯名譽主席、主持中國公民力量的楊建利博士；主持《北京之春》和《人與人權》編務的胡平和《北京之春》經理薛偉；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陳一諮；主持勞改基金會的吳弘達；新近出國獲得甘迺迪人權獎的任曉町等。這類人數量很少，從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非常需要更多的職業政治活動家，以形成類似西藏流亡運動那樣的範式。

第二類是在學界、商界、僑界有自己的學業教職或者其他商業業務，以此作為自己的全部或者部分生活來源，繼續在海外中國民運組織中擔任職務，經常或部分地參與其活動的人士。例如民主中國陣綫主席費良勇在德國設有自己的電腦軟件公司；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莫逢傑多年擔任警衛和司機；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常年做運輸司機，現任建築公司業務經理；中國民主

黨聯合總部（海外）主席徐文立在美國布朗大學任職；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王軍濤在新西蘭大學擔任教職；完成了學業的《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在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北京之春》發行人于大海同時從事金融研究；擔任過中國自由民主黨執行主席的熊焱在美國陸軍中任軍中牧師；「八九學運」最早發起者劉剛現在是美國金融分析師；2007年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的周鋒鎖是電腦工程師；還有不少人從事律師行業，如項小吉、李進進。這一類人數量眾多，其中有些人試圖以政治研究領域有成就的專家身分從事中國政治，如王軍濤、王丹；有些人出國之後行事低調，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但與國內朋友保持密切聯繫，長年來資助國內人士，如劉剛等。方勵之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擔任全職教授，業餘時間長期在美國物理學會的人權機構和中國人權中擔任職務，現在還任《北京之春》雜誌的顧問。

值得提及的是一批與海外民運關係密切的從事平面或者網絡報刊的職業人士，以及電台、電視台的媒體從業人員，如原《民主中國》網絡雜誌主編蘇曉康，網絡刊物《新世紀》主編張偉國，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記者和眾多節目主持人，還有那些在由支持中國民主化的政府或民間組織資助的機構中工作的人士。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以稿費為自己主要收入的作家、獨立撰稿人，如旅居美國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鄭義、詩人貝嶺、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還有在海外（歐洲各國）領取政治難民救濟金，同時始終熱心於中國民主事業的各方人士。

有必要簡略討論一下流亡政治人物現有的國籍身分。包括很多流亡組織主要負責者在內的相當多人已經加入了居住國家的國籍。少部分人保留中國國籍的如嚴家其、魏京生、王丹、王軍濤、楊建利、胡平、劉國凱、徐文立、學自聯主席周健、原學自聯、自民黨領導成員黃慈萍等。其中極少數擁有合法中國護照，大多數人的護照被吊銷或者過期未能獲准延期。改變了國籍的海外流亡人士，尤其是流亡組織的負責人面對中國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兩個困難：道義上，他們的忠誠對象應當是現在所擁有國籍的國家，而

不是中國；法理上，他們作為外國人不能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某些流亡者刻意保留自己的中國國籍。當然，在未來的10年、20年間如果在美國聯邦政府官員或者參眾兩院議員中出現了如今加入美國籍的中國流亡者，對中國民主政治肯定具有正面意義。

第三類成員將組織海外民運政治活動和開辦移民服務公司的商業業務結合起來，在教育訓練新一代民運參加者的過程中幫助他們在民主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獲得合法居留身分。這樣的組織採用「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等名義，與移民事務公司一身二任，在美國、歐洲各國和澳洲都有，參與移民事務的形式和程度不一。對這一類人士的爭議頗大，有人認為他們充其量是為了賺錢的商人。

第四類是傳統民運組織以及新興政治組織的普通成員。他們是流亡運動最基本的草根群眾。一些有良知的個人純粹因為某個偶然事件而被拋入海外流亡政治運動的潮流，如在漢藏問題對峙意見衝突中試圖中立的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王千元。

上述四類人員沒有清晰的邊界，實際上有互相流動和交織。

審視比較世界舞台上各國異議政治運動，人們在感嘆中國沒有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至也沒有赫魯曉夫）的同時，也會感嘆中國有劉賓雁，沒有索贊尼仁；中國有方勵之，沒有薩哈羅夫。嫉惡如仇的《中國的良心》無情地鞭笞過人妖之間的醜惡，卻在《第二種忠誠》的制約下始終沒有到達《古拉格群島》之彼岸。1989年1月6日，卓有成就的天體物理學家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大無畏地點燃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民眾運動的火炬；在國內，傳播自由主義，批評專制政治；在海外，自我約束在人權組織之中，較少就中國政治發出智者的意見。中國執政的共產黨領導層內健康力量的形成發展，與民間社會政治力量的成長有密切相關的同步聯繫，這是社會文明整體進展的兩個方面。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期待出現具有深刻民主理念，現代知識背景和理論訓練，政治膽略及堅韌精神，寬容大度的行事風

格，與國內運動有密切的人際關係，且有良好個人道德形象的新一代領袖人物。在某些人身上，人們似乎看見了一綫希望。

香港、台灣、國際社會對海外流亡政治運動的物質道義支持

香港的支持

1989年5月在香港市民支持「天安門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中成立了支聯會，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綱領，立法局議員司徒華20年來歷任主席，推動支聯會在中國民主運動前綫發揮了巨大作用。

「回歸」之後的香港對於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主要是道義上支持，支聯會每年舉辦「六四」紀念大遊行和燭光晚會，使得香港成為中國大地上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每年維多利亞公園數萬人手中的燭光，永遠提醒國人不要忘記歷史的傷痛，也永遠給海外流亡者輸送道德力量。

台灣的支持

作為中國民主化先行地區的台灣，對於大陸流亡運動有必然的支持傾向。「中國之春」運動和中國民聯一開始就得到台灣當局財務上的支持，1988年12月由台灣民間團體安排，首批大陸留學生四人公開組團到台灣參觀訪問。台灣最初支持通過政府的某些秘密機構進行，其原因主要在於台灣行政當局不希望這種支持公開化，並不意味着這種財務支持帶有秘密的情報目的。多年來這種支持有過中斷，也受到統獨問題的干擾，但始終沒有對被支持者預設過任何政治立場上的要求。現在台灣的支持主要由成立於2003年的台灣民主基金會負擔，該基金會為獨立透明的非營利超黨派機構，旨在促進台灣及全球民主、人權的研究與發展，是類似美國民主基金會的民間組織。它將逐漸提供規範化的財務支持，在每年數百萬美元的預算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用於海外政治組織。應當指出，台灣政府負有保護台灣人民的天職，面對邪惡強悍的中共對手，執政者不得不考慮利害關係，不會因為支持大陸人

士的政治流亡運動而影響甚至損害台灣人民的安全利益。民進黨執政時候如此，國民黨政府即使不考慮統獨因素也會如此。歷年來不忘「六四」，堅持民主理念的馬英九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前後態度的某些變化，正是這一事實的反映。對此大陸流亡者要予以理解，不必苛求，還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自身的利益一定要自身努力爭取，不能過於指望他人包括朋友的幫助支持。要面向民間。對於幻想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人士，有責任誠懇提出規勸；要繼續告訴台灣朋友：一個邁向民主社會的大陸，才是兩岸和平的根本可靠的保障。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持

中國流亡者要逐漸建立與各國民主政治家個人之間長期的合作關係，而不僅僅着眼於某一屆政府。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或者議會為了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利益調整對華政策，比如美國政府在反對恐怖主義和陷於金融危機的經濟困境時與中國政府的某些合作，海外流亡運動也要抱理解的姿態。當然不是放棄對那些見利忘義，在獨裁政權面前罔顧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甚至向中共獻媚的政客的揭露批判。在財務資助上，美國民主基金會有一種規範化的制度，這是它的優點；缺點在於某些受資助組織的實際功能與它們接受的資金數額很不相稱，要讓美國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流亡運動的整體情況有符合實際的瞭解。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有朝一日建立自己的財務泉源，應當作為重要的努力目標。

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的兩大重要合作力量—— 西藏流亡運動及法輪功運動

與西藏及其他少數民族流亡運動合作

在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1989年10月達賴喇嘛歐洲代表格桑堅實與民陣負責人嚴家其、萬潤南在法國巴黎秘密會

談；12月嚴家其與達賴喇嘛在巴黎會面，雙方建立聯繫。1991年中國民聯五大明確提出對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的支持立場。1992年10月魏京生在獄中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批評了中國政府的政策，成為他來到海外之後關於西藏問題的基本立場。1995年10月，21世紀中國基金會組織和國際聲援西藏中心合作在波士頓主持了達賴喇嘛與大陸學者之間第一次公開對話。1998年《北京之春》經理薛偉與藏族朋友一同發起成立國際漢藏協會，每年召開有關會議，大陸人士也多次訪問了西藏流亡社會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多年來海外中國大陸流亡運動與西藏流亡運動的合作表明，從近期看，對於雙方反對中共的暴政都有幫助；從長遠看，對未來中國民主社會和平妥善處置中國境內漢藏兩民族關係，讓海外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高度自治的雪山家園更有益處。

與法輪功反抗中共暴政運動合作

法輪功學員1999年4月萬人包圍中南海事件導致中共公開鎮壓，也因此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之後法輪功學員的抗議活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成為揭露中共當代反人權罪行的重要力量。在參與活動的人數和影響的範圍上，法輪功反抗運動包括其擁有大量受眾的報刊電視工具（遍佈各國的中英文《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海外民運組織活動的規模。在反抗中共暴政，捍衛人權，捍衛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上，海外流亡政治運動與法輪功運動的目標是一致的。由於法輪功運動具有的半宗教修煉性質，引發了一些人的顧慮和批評，提出要在捍衛法輪功成員人權的同時，幫助法輪功學員擺脫愚昧和迷信。在討論民運與法輪功的關係的時候，提出反對民運的法輪功化和海外民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的問題。

總而言之，對於海外中國流亡政治運動來說，與西藏流亡運動及法輪功運動的合作，具有共同互利的長遠的戰略策略意義；而與國內民間民主維權運動的緊密聯絡、呼應和配合，更是這一流亡運動存在的真實基礎。

參考書目

Ashley Rindsberg. (2009, March 18). "China's Top Dissident Breaks Silence on Freeman." *The Huffington Post*.

Bill Gerzs. (2009, March 5). "Inside the Ring." *The Washington Times*.

巴黎民主之家、德國萊茵筆會、亞琛八九學社聯合整理 (1993)。《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

公月，〈歡迎「黃雀行動」幕後英雄陳達鈺〉，《北京之春》，2007年7月號。

王丹 (1997)。《我們在寫歷史》。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

王希哲 (2007)。《論台灣》。美國毒蜘蛛出版社。

王若望，〈海外民運的最低綱領〉，《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

王炳章，〈棄醫從政宣言〉，《中國之春》創刊號，1982年12月。

王鵬令主編 (1997)。《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台灣時英出版社。

〈中國民聯章程〉，《中國之春》，1983年9月號。

中國民聯 (編) (1987)。《方勵之言論集》。香港：中國之春書屋。

《北京之春》，1995年7、8月號，2004年8月號。

安琪 (1994)。《痛苦的民主》。香港藝苑出版社。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 (2008)。《西藏簡介》。

吳牟人等編 (1989)。《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上下冊。

亞衣，〈評中共開明派的不同政見〉，《中國之春》，1992年8月號。

亞衣，〈華盛頓：民聯民陣聯合大會紀實〉，《中國之春》，1993年3月號。

亞衣 (2005)。《流亡者訪談錄》。香港夏菲爾出版公司。

亞衣，〈讓中國百姓早日享受現代文明〉，《北京之春》，2007年10月號。

胡平 (1992)。《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

徐水良，〈捍衛法輪功人權是基本原則〉，《北京之春》，1999年9月號。

馬怡陽，〈記全美學自聯「一大」〉，《中國之春》，1989年9月號。

晉硯，〈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成立〉，《北京之春》，1998年12月號。

倪育賢，〈論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北京之春》，1994年9月號。

倪育賢，〈民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前哨》，2005年7月號。

- 麥海華等編 (1993)。《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 曹長青主編 (1996)。《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張偉國主編 (1999)。《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
- 陳力、蘆葦 (1993)。《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
- 陳小雅 (1996)。《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
- 傅英傑，〈自由之花為勇士而開〉，《中國之春》，1985年4月號。
- 楊建利 (2004)。《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香港開放雜誌社。
- 楊建利主編 (1996)。《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
- 董尼德 (Pierre Antoine Donnet) 著 (1994)。《西藏生與死》。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齊墨編 (1990)。《民陣一年》。
- 劉國凱 (2004)。《草根蟬鳴》。美國國際出版社。
- 劉賓雁，〈民運的悲哀〉，《中國之春》，1992年9月號。
- 劉賢斌，〈出獄一百天〉，《北京之春》，2009年4月號。
- 聯合報編輯部 (1989)。《天安門一九八九》。台灣聯經出版公司。
- 嚴家其、吾爾開希，〈國殤日週年宣言〉，《中國之春》，1989年8月號。

第十章

直接目擊與傳媒再現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場域之爭」

譚志強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2008-09）

「人類對權力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直接目擊「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意義

除了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澳門一二三事件」之外，作為現場直接目擊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在北京木樨地經長安大街至天安門廣場之間發生的軍事鎮壓過程（以後簡稱「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其中一位中國新聞路線記者，^[1] 這宗史無前例的軍事鎮壓事件，不但對作者本人和不少港澳台新聞工作者後來的生活造成無可比擬的重大影響，甚至中國大陸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走

向，迄今仍然備受此宗事件尚未被中國政府正式平反而陷入前途未明的混沌狀態。

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直接目擊」追述，除了中國官方經過一番過濾而在大陸出版過的一些著作外，過去20年來在港澳台及海外地區已經出版的有關著作和散篇文章，包括當時在北京現場的學生（包括學生領袖和一般學生）、知識分子、異見人士、新聞工作者的自述，迄今已經是汗牛充棟，在圖書館、網路和書局中唾手可得。但是，個別人士的「直接目擊」追述，本質上就是個別的，缺乏普遍性的，具爭議的。

因為，即使在同一個現場（天安門廣場）、同一段時間（清晨五時至六時）對同一件事情（解放軍開始清場，現場學生、市民、記者、醫護人員和其他人士陸續撤退），在不同的追述文章中，不同的作者對現場發生的若干重大情節，往往都會出現不同的描述。例如，在以下的四個關鍵問題，迄今就出現好幾種不同的版本。這些關鍵問題包括：

- (1) 解放軍在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有無任何人士死亡？
- (2) 清場過程時，帳篷內有無仍在熟睡或堅持不走的學生或其他人士？
- (3) 那一支清場部隊的殺人表現最厲害？二十七軍、三十八軍、還是其他？
- (4) 誰對阻礙清場的人士下達格殺勿論（下令開槍）的軍事命令？軍事命令具體內容是如何的？何時下達的？下達給那些部隊的那些軍官的？^[2]

與此類似的其他相關問題，其實可以說不勝枚舉。因此，從歷史考證的最低要求來看，所有個別人士的「直接目擊」追述，必須要與現在可以得到的其他人士的「直接目擊」追述，或中國官方披露的較可信的相關情節互相排列、比較、分析之後，才有可能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合併出較為接近真實的圖像。例如，在大量分析

有關文章後，上述的四個問題至少目前已經出現初步的，比較接近真相的結論，^[3] 這便是「直接目擊」追述的歷史意義。

傳媒再現——一種以質量分析出發的研究途徑

「傳媒」(media)對「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與基於實證主義或實驗主義傳統的新聞學或傳播學研究大相逕庭的。傳統的觀念認為傳媒所報導出來的訊息(語言世界)，或多或少都會「反映」出若干程度的「社會真實」(真實世界)。但是，最新的「文化研究」卻指出，傳媒不僅僅是一個訊息傳遞工具，它本身也參與構建「社會真實」的過程，在某個特定的「場域」裏，爭取到一個位置去發聲(話語權)，對身在其中的人物和角色，特別是對「他者」(the others)的重新定義、塑造、生產、改寫、和發明。

換言之，「再現」不但是一組內容，一套符號，一個過程，和一種實踐。再現再不局限於語言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依照羅森索女士(Pauline Marie Rosenau)的說法：「再現是代表，在議會內某個個人代表另一個個人；再現是臨摹，一幅油畫在畫布上再現了畫家觀察到的事物；再現是複製，照片複製了被照者；再現是複寫，書記把代表着他的思想的語詞寫在紙上；再現是代替，律師代表委託人出庭辯護；再現是複印，影印本代表着原件。再現以不同的形式成為社會科學每個不同領域的核心。」^[4]

「再現」能提供對社會不同「群體類別間差異」的認識，特別是在社會結構中位於少數、邊緣、外來、弱勢位置的「族群」，往往在「再現」的操作過程中被塑造為「他者」。傳媒以這些族群具有的不同民族、種族、國家、區域、階級、宗教、信仰、世代、性別、性取向等等與主流社會成員有異的特徵而被歸類、被區隔、被排斥，最後喪失本身的「話語權」，無法藉着發出聲音的途徑，去爭取本身應享的基本權益。

一般來說，以「再現」來研究傳媒，大致上存在兩種不同的途徑，首先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觀點，其次是米夏·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譜學觀點。

以巴特的符號學研究途徑去分析，重點在研究文化和語言如何將「他者」自然化成一種「神話」（myth），掏空、扭曲、竊取了符號表面的內容，將其內容更換成其他有利於「當權者」或「某個社會優勢族群」的意義。^[5]

以傅柯的系譜學研究途徑去分析，「傳媒再現」是各種社會勢力相互衝突後的一種體現。這種體現是以「論述」（discourse）的形式存在的，「權力」（power）在其形成過程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針對「他者」所作的論述，其實就是在社會衝突過程中的一組有關如何對「他者」建立意義與行為實踐的陳述，亦即是一種知識與權力去操作和生產意義的過程。

換言之，再現是有條件的，由各種勢力相互衝突之後所形成的「論述」，才形成我們所認為符合某種「社會真實」的「知識」（knowledge）。任何真實的再現，其實只是各種勢力交手之後的一種「論述」而已。^[6]

中國政府的傳媒再現——「反革命暴亂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用「傳媒再現」的方式，最早利用軍人、警察、特務等國家暴力機器，結合各種大眾傳媒的宣傳，在中國大陸這個「場域」內，對「六四事件」的人物和角色重新定義、塑造、生產、改寫、和發明，去建構出一個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真實」的是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

從通過「中央電視台」晚上七點鐘的「新聞聯播」，在全中國大陸通緝接受美國電視台採訪，宣稱廣場上有不少人士死亡的遼寧省居民蕭斌是反革命分子並對其重判十年有期徒刑的那一剎

那開始（卡瑪、高富貴等，1996：229-231），中國共產黨就一方面以國家暴力機器嚴厲打擊中國內地對「六四事件」與官方持不同「論述」的異見分子，一方面通過學習、鬥爭、批判與自我批判等中國共產黨傳之已久的種種「思想改造」手段，強迫中國內地所有人民接受中國共產黨所欲建構的、中國官方版本的「社會真實」、「神話」或「論述」，亦即「六四事件」應該是一場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動亂」或「反革命暴亂事件」。^[7]

因此，自1989年6月底7月初《北京日報》開始連篇累牘地連載半真實半編造的〈平暴備忘錄〉，並經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播之後，一大堆的應景之作出版品，亦臨急就章地、排山倒海地推出市場。（鄭念群，1989；軒彥編，1989；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部編，1989；國家教育委員會編，1990；中共中央宣傳部編，1990；叢書集體編，1990；車慕奇，1990；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1990）^[8] 種種傳媒壓力配合對當時曾經參與「北京天安門事件」的機關和個人的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令這種「神話」或「論述」在1989年至1991年之間，一度成為大多數中國大陸人民不得不表面上接受的「社會真實」。

但是，自1989年6月4日開始，蘇聯及東歐組成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亦同時開始了一場一波又一波的，大約長達三年的國家解體和政權更替運動（簡稱「蘇東波」），直至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為止。這場「蘇東波」令當時打着共產主義旗幟，亦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國領導人，遭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與此同時，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為首的「元老集團」（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內部亦為了「誰下令開槍」這個問題出現分化，亦即無論那一位元老都不願承擔在中國首都的北京下令開槍大規模地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這個大是大非相當分明的歷史責任。^[9]

自1990年底開始，許多當時出版的「平暴」書籍與特刊，被陸續收回停售。中國官方開始以「不議論、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的消極手法，全面封鎖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相關消息，

即使其內容是與官方的口徑完全一致，稱之為「反革命暴亂事件」。除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被迫提早退休外，許多當時執行鎮壓行動的部隊指戰員及普通士兵，亦以各種理由被迫退出軍隊。

1992年9月，實際主持「六四天安門事件」鎮壓行動，一度權傾朝野的「楊家將集團」（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及其提拔的軍事將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被鄧小平解除權力，全面倒台。「十四大」的決議中，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被解散，和江澤民和胡錦濤分別被委任為「跨世紀的隔代接班人」最為重要。

中國官方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宣傳口徑亦開始轉向，不但將「動亂」或「反革命暴亂事件」的用語，改口稱之為「六四風波」，同時也下令中國官方有效控制下的傳媒全面退出了「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場域」，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讓給目前仍在爭取「平反六四」及「返家」的台灣人民、港澳居民、海外民運人士，甚至具有一定中國背景的外國學者和傳媒工作者。

這便反映出中國官方希望通過已經失效的共產主義（文化和語言），在國內經濟瀕臨崩潰，國外的「蘇東波」亦排山倒海而來之際，企圖將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他者」（學生領袖、民運領袖等等）自然地化成一種「神話」（myth），掏空、扭曲、竊取了符號（民主運動）表面的內容，將其內容更換成其他有利於「當權者」意義的行為，最後遭到嚴重的失敗。中國共產黨企圖通各種「思想改造」手段形成的「論述」或「知識」，也無法順利完成。於是，才會替換上「不議論、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的消極手法，全面封鎖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相關消息，以矇蔽代替批判。

換言之，由於「血腥鎮壓」的缺乏「正當性」，在「傳媒再現」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場域之爭」中，表面上實力最強大的中國官方，其實是最早默認失敗和撤出爭論的一方。不過，針

對中國大陸內部希望「平反六四」的異見分子使用的，不講道理的恐嚇手段和赤裸裸的暴力鎮壓政策，則仍延續至今，沒有太多的改變。

台灣的傳媒再現——「反共抗暴民主運動」

除了極少比較具有「台獨」傾向的著作（戰鬥機器搜索群編，1990）之外，「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台灣一度出版了不少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以蒐集資料為主的著作。（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合編，1989；張京育主編，1989；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印，1989；余英時、包遵信等著，1989；包承平等／中國時報系記者群，1989；季季主編，1989；大衛、艾克敏等著，1989；楊渡，1989；聯合報編輯部，1989年；徐璐、黃德北，1989；余光中主編，1989；金耀基等著，1989）

大致來說，這些著作都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場「反共抗暴民主運動」，其基本性質不但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延伸，中國官方對平民百姓的血腥鎮壓，亦與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發生的，國民黨軍隊對數以千計的台灣人民的血腥鎮壓（簡稱「二二八事件」）相似。

但是，這一波「傳媒再現」的熱潮，到了1990年初便很快告一段落。最近十幾年來，除了為中國大陸內部異見人士（陳小雅，1996；包遵信，1997）或海外學者專家（丁望，1995；陳有為，1999；凌志鋒，2003）出版有關著作之外，比較有份量的著作是比較稀少的。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過程，嚴重地嚇怕了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不管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不但令「統一」不再成為具「正當性」的意識型態，還嚴重打擊了台灣內部的「統派」力量。^[10]

與此同時，當台灣內部自外於中國的民意愈來愈強，且在最高領導人的李登輝總統的悉心照顧下，「獨台」及「台獨」主張亦快

速取代了蔣經國時代的中國大陸政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台灣內部的民意主流。^[11] 換言之，即使當時海峽兩岸當局都非常克制，但是，這場血腥鎮壓行動，通過各種影像媒體的「傳媒再現」，直接地影響到大多數台灣人民走向拒絕「和平統一」的道路。（丘宏達，1989：218-221）

既然台灣與中國的命運再不相干，關心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著作，自然會陸續被人遺忘和減少出版。2000年5月，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在「四不一沒有」的掩飾下實行「一邊一國」的「中國政策」，海峽兩岸關係「漸行漸遠漸無聲」，「六四天安門事件」更是被台灣內部的「藍綠之爭」所掩蓋，漸漸被大多數台灣人民遺忘。

迄今，除了一批前「血援會」^[12] 成員每年6月4日仍在台北中山堂舉辦的「燭光悼念晚會」之外，大多數台灣人民（包括當年一度熱烈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相關活動的記者、學者、議員、官員）都已經對「六四天安門事件」興趣不高，不再關心此事。不過數年的時間，如同1959年發生的「西藏反共抗暴運動」一樣，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場「反共抗暴民主運動」的「論述」，便順利地被吸納進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灣進行的「反共教育」和後來民進黨鼓吹的「台獨教育」之內，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研究和分析也漸漸轉入大學機構之內，成為與一般人民生活無關的歷史事件。

港澳的傳媒再現——「中國愛國民主運動」

過去20年以來，一直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不離不棄的是大多數香港居民和少數澳門民主派人士。^[13] 香港居民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傳媒再現」主流，一直都是一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這種主流看法，在經過20年的努力後，逐漸在「傳媒再現」的「場域之爭」中，取得「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優勢，取得以小（香港）勝大（中國內地），並得到不少台灣和海外人士認同的奇蹟。

香港居民的「論述」取得「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優勢，包括幾個重要因素。一是其堅持的目標擁有無可比擬的「正當性」，亦即「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二是上述的目標一直無間斷地由獲得不少香港居民支持的「香港市民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14]（以後簡稱「支聯會」）去追求。三是不少香港本地傳媒不但一直持續地跟進報導中國當局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否平反的最新進展，以及海外民運人士的種種表現，還每年都對「支聯會」舉辦的活動大事報導。四是不管香港本地傳媒還是其他出版商，都不斷地為海內外關心「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人士（特別是流亡在外國的民運人士）刊登、印行有關書籍，不斷發掘出新的不容否認的「事實」，並通過各種教育途徑，令中國大陸以外的年輕人，即使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出生，都能大致上知道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支聯會」舉辦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周年紀念活動為例，每年4月至6月，「支聯會」都會舉辦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清明節獻花」、「復活傳訊」、「毋忘六四長跑」、「向國殤之柱獻花」、「巡迴各區宣傳」、「系列講座」、「民主風箏行動」、「周年反思研討會」、「刊登平反六四聯署廣告」、「紀念六四周年大遊行」和「六四周年燭光悼念晚會」等等，提醒社會各界人士「毋忘六四」，並要求中國當局：「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對於所有志願工作者（義工、志工），「支聯會」可以提供的資料包括：圖書、展板、易拉架、圖片、影片、歌曲、幻燈片、教材套等等。（支聯會，2009：1-8；Editorial Board of the June 4 Eyewitness Accounts, ed., 1990；麥海華、夏其龍合編，1990）

以香港本地傳媒，特別是曾經在北京現場採訪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不斷跟進為例，這些記者和編輯不但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更在本地的大小報刊，包括《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明報》、《星島日報》、《新報》、《信報》、《香港經濟日報》、英文《南華早報》、英文《虎報》，《爭鳴》、《動向》、《前哨》、《開

放》、《亞洲週刊》(中文版)、《明報月刊》、《中國之春》，及已經停刊的《九十年代》、《中國時報周刊》、《當代月刊》上面，斷斷續續地撰寫出他們當年在北京現場採訪時的直接目擊追述，還曾自掏腰包出版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的書籍(張結鳳等著，1989；陳秀文等/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寫，1989；二十三名記者，1990；程翔，1990；凌峰，1990)，不斷地教育香港本地居民去認識「六四天安門事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最近十年，由於網路媒體的興起，他們的作品還通過《民主中國》、《民主通訊》、《看中國》、《大紀元》、《華夏文摘》、《大參考》等海內外資訊網站，向外界發送出他們的「話語」和「詮釋」。

香港取得「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優勢，也與本地新聞傳媒及其他出版商一直無間斷地大量出版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的著作有關。首先是新聞傳媒出版的，比較接近客觀紀事和原始資料的資料集，(方良柱等，1989；明報出版社編委會，1989；《北京學運》編輯委員會，1989；《歷史的見證》編輯委員會，1989；香港文匯報記者編輯及攝影，1989；《亞洲週刊》中文版，1989)，其次是其他出版商出版的資料集、分析和評論。(寒山碧編，1989；《對中國民運的認識反省資料選輯》編輯小組編輯，1989；新苗社，1990；王德耀，1996)

再次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旗下的《中大學生報》，連續出版多期「六四天安門事件」周年特刊，企圖喚醒香港的大學生。(中大學生報，1999；中大學生報，2000；中大學生報，2001；中大學生報，2002；中大學生報，2003；中大學生報，2006)

甚至中國大陸內部許多與政府宣傳口徑不合的有關著作，也是大多數在香港印行銷售。(丁子霖，1994；羅峪平，1999；余杰，2005；丁子霖，2005)

久而久之，「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的「傳媒再現」，連不少海外民運人士也陸續接納這種「詮釋」，並成為目前普遍地被接受的主流「論述」。

海外人士的傳媒再現——「平反六四」和「回家」

對海外人士來說，過去20年來，流亡海外的大多數中國民運人士除了在「平反六四」和「回家」兩個要求比較具有共識之外，他們在外國土地上的表現，特別是在美國的所作所為，一直是相當令人洩氣的。造成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現象，自有中國大陸留美學生本身的思想方式、發展方式和運作方式等層面上的理由，亦即「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往往成為同一回事。（錢寧，1997：285-290）。因此，除了民運組織內部分裂之外，當他們流亡海外一段時間，新聞熱潮過去之後，海外民運人士便陸續自西方傳媒報導中淡出，再加上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內地出現的驚天動地的巨變，海外民運人士遂慢慢地失去1989年至1992年之間在國際「傳媒再現」場域內的壓倒性優勢。（安琪，1994）

不但如此，由於通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獲得既得利益的不少中國領導人，迄今仍未逝世或仍在權力核心。故此，即使已經過去了20年，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希望的「平反六四」到現在仍未出現任何寬鬆的跡象，他們也迄今沒法順利「回家」，返回中國大陸。（張炳玲，2009）

但是，不管如何，由於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一黨專政」（獨裁），「民主」卻早已成為一項全球性意義的「普世價值」，相較而言，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場域之爭」過程中，海外民運人士仍然是在「傳媒再現」上佔有比中國當局更有利的位置。海外民運人士不但可以通過香港、台灣和外國傳媒宣揚他們的主張，也可以在這些中國共產黨無法全面控制的區域，自由地出版他們的「直接目擊追述」（何頻，1989；梁文貴，1989；八方文化編，1990；吳仁華，1991；王軍濤、候曉天，1992；安琪，1994；封從德，1998；中國人權，1999；張良，2001；王丹等編著，2004；吳仁華，2007；張炳玲編，2009），不斷戳破中國官方半事實、半編造的種種謊言，掌握到一定的「話語權」和「詮釋權」優勢。

當然，比較各方面海外人士的「論述」，除學者專家的著作外，在海外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場域之爭」中，比較容易

取得讀者和觀眾的同意，或許可能成為日後公論的「傳媒再現」，仍數以相當低調的表現手法，去蒐集資料、採訪、拍攝、剪輯和首次暴露出北京學運領袖柴玲在學運過程中部分非理性表現的寫實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Carma Hinton & Richard Gordon, 1996；卡瑪、高富貴等，1996：176-177）

總結

由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令早已日薄西山的共產主義，在一夜之間完全喪失了「正當性」（合法性、認受性），故此，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種美好理想，和一種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自1989年6月4日開始，至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其實已經在中國大陸、前蘇聯及東歐國家集團消亡，令共產主義成為一個沒有多少人士會去相信的「神話」。中國官方一度使用各種「思想改造」手段強迫灌輸給中國人民的「動亂」或「反革命暴亂事件」的「論述」，甚至連目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不再多提。

今日仍然打着共產主義旗幟的中國之所以沒有隨着「蘇東波模式」解體，其實是由於1992年2月鄧小平「南巡」時的一個重要決定，亦即向西方資本主義全面開放和全面模仿，給予人民相當程度的「經濟自由」所帶來的經濟成就而存續下來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成為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的主要「正當性」來源。

中國共產黨現在仍然能一定程度地有效統治中國大陸，其實與一個「二律背反」的現象有關，因為，在「正當性」喪失的同時，當大多數中國人民認識到短期之內向中國共產黨要求民主是一種毫無希望的行動之後，這些與西方人民民族集體性格有異的中國人民，也開始在如何建構「民主」的問題上，走上一種與「蘇東波模式」完全不同的軌道。

在目睹蘇聯解體和東歐政權更替後，當地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一般人民都馬上面對着嚴重經濟困境之後，不管是精英階層還是低下階層，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不再將空泛的「民主」掛在

口中，而是趁着鄧小平在1992年2月「南巡」時向人民給予的「經濟自由」牢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舉國上下掀起一片經濟發展大潮，全心全意全力地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換言之，即是暫時以對「民生主義」（改善生活）的追求取代了對「民權主義」（民主政治）的追求，是中國大陸目前正在高速運行的軌道。

於是，如同以前長期生活在「威權統治」下的「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一樣，一個生產力快速提升的，充滿各種「經濟奇蹟」的，徹頭徹尾的「新中國」，便在過去17年內迅速地「大國崛起」，令中國不但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個「東亞（區域）大國」，有時候其影響力甚至溢出至東亞地區之外。

不過，時至今日，仍在有效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最關心的是如何鞏固其本身的統治權力，而非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及如何充分滿足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與此同時，在對「六四天安門事件」詮釋的「場域之爭」這個範疇之內，「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到三年，中國官方及其有效控制下的傳媒，就完全退出了這個「話語權」和「詮釋權」的戰場，拱手將這個「場域」的「話語權」和「詮釋權」讓給台灣人民、港澳居民、海外民運人士，甚至具有一定中國背景的外國學者和傳媒工作者。

所以，即使中國最高領導層現在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中國大陸的各類傳媒，以「不議論、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的消極手法，全面封鎖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相關消息，令不少中國內地的「後天安門世代」（特別是1990年代或以後出生的青少年階層），十之八九都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無所知。但是，隨着網絡傳媒和各類影音資料的日漸普及，只要「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天不平反，如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對中國國民黨造成的負面影響一樣，已經喪失「話語權」和「詮釋權」的中國共產黨，就會繼續為此付出或多或少的各種代價。

總而言之，由於中國官方讓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在與台灣人民、香港居民和海外人士的「場域之爭」中完全棄守，其在中國是否能夠繼續有效統治的「正當

性」，已經幾乎全部押寶在中國經濟現在和將來是否能繼續高速發展之上。在缺乏意識型態的支持下，只要中國目前或將來的高速經濟發展有所停滯或大幅衰退，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再度出現「路線之爭」，甚至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突然「翻案」，以因應黨內的「權力鬥爭」需要，應該是一點都不出奇的。至於未來的中國領導層是否會「平反六四」，那倒是不必太過深究，因為，在這場「國家對社會、政府對人民」的「場域之爭」中，「六四天安門事件」早就被社會和人民平反了很久，只是差在什麼時候由中國當局公開宣佈而已。

註釋

1. 作者當時擔任台灣《中國時報》新聞集團駐北京特派記者，3月15日自台北經香港飛抵北京訪問人大、政協兩會後，除5月6日至8日返港3天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外，一直留在北京進行現場報導。直到6月5日下午兩點，才與所有被國安部官員逐出北京飯店的台灣、港澳和外國記者，以步行方式首先自北京飯店後門出發，經王府井大街與東單大街之間的小胡同，避過所有的坦克和軍人，抵達金魚胡同的王府飯店，再乘坐非法（野雞）小型巴士前往北京首都機場，於黃昏乘坐民航班機返回香港。
2. 最早提出這一連串類似問題並給予初步答案的是一度逃亡到香港，目前在美國居住的民運領袖吳仁華。有關他的追述和具體見解，可參閱他編著的：《天安門廣場鎮壓內幕》（1991），香港：當代月刊；《1989.6.4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內幕》（2007），序言，Alhambra, CA：真相出版社。此外，夏泰寧的〈武力鎮壓的決策過程〉（夏泰寧，1989：130-148）一文，亦對「誰下令開槍」有相當可信的分析和評論。
3. 吳仁華，《1989.6.4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內幕》，同前註。
4.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 92.
5. Cf: Roland Barthes (1972). *Mythologies*, selected &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6. Cf: Michel Foucault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7. 〈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北京）社論，1989年4月26日，第一版；鄧小平，〈對戒嚴部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1989年6月10日，第一版。

8. 這些具官方背景出版社所印行的，宣傳味道非常濃厚的書籍與特刊，都是作者於1990年3月前往北京採訪人大、政協（兩會）新聞並在北京停留約兩個月的時候，在北京的大小書店購買的。至當年12月，作者重返北京採訪第一次「全國台灣工作會議」時，這些書刊已經在北京全數停售。
9. 1992年9月「十四大」召開前夕，本人代表《中國時報周刊》赴北京採訪時，得知當時除陳雲和李先念外，連被鄧小平最信任的，實際上指揮「六四天安門事件」清場行動的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也不肯扛上這個「下令開槍」的歷史責任。鄧小平後來毅然撤除楊尚昆及其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的軍權，恐怕「楊家將」在他死後翻案，將「下令開槍」的責任統統歸咎於鄧小平本人，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10. 最早在海外傳媒指出台灣內部的「台獨」主張會愈來愈強並將成為主流，「統一」會被邊緣化的是作者於1989年6月6日晚上，與前《澳門日報》駐京特派記者陳煒恆接受澳門電視台特備新聞節目時，被主持人胡錦漢問及「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未來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時提出的。這次節目的內容全文於翌日被當地銷量最高的《澳門日報》全文轉載：見《澳門日報》，1989年6月7日，A2版。作者後來亦在《中國時報》大陸新聞版及《時報周刊》（美洲版）上陸續撰文，以各種理由重申此項與當時台灣傳媒主流意見有別的觀點。
11. 這種傾向可以從李登輝總統對收容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的政策，以及台灣及海外民運人士合辦的活動（如「民主女神號」赴台事件）的態度反映出來。
12. 台灣的「血援會」全名「血脈相連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原來召集人是前「唐山樂集」社長陳百忠。不過，自陳百忠於1992年赴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工作定居後，該會已自動解散，在中山堂舉辦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亦停辦了兩三年。1994年之後，部分前「血盟會」成員重新組織舉辦此項「六四燭光悼念活動」，迄今仍有舉行，雖然參加人數不多，出席人士一般都不足100人。馬英九以前每年都會以私人身分參與「燭光晚會」，直至2008年5月20日正式出任台灣總統之後才停止。作者如果當時人在台北，都會出席此項悼念活動。血援會的背景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編輯（1993）。《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香港：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p. 5.13 台灣Taiwan 9。
13. 過去20年來，每年6月4日，以澳門立法會議員吳國昌為首的「澳門民主發展（運動）聯委會」成員，都會在市中心噴水池附近的聖母玫瑰堂小廣場上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參加的人數不多，傳媒也少有報導，但從未間斷過。澳門民主發展（運動）聯委會的背景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編輯（1993）。《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同前註，p. 5.12 澳門Macau 2。
14. 「支聯會」是一個於1989年6月14日在香港成立的，由216個大大小小不同的本地「社團」和「個人」所組成的一個鬆散的「聯盟」（alliance）。領導層由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和若干常務委員組成，下設一個「中國

民主運動資料中心」，運作基金主要由該會向一般市民籌集而來，或由熱心人士主動捐贈。「支聯會」並無專任職員，核心工作人員都由某社團成員的職員兼任。如要舉辦大型活動，需要大批人力支援時，則通過對外招募義工途徑解決。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編輯（1993）。《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同前註，p. 5.11 香港Hong Kong 1。

參考書目

一、中國大陸：

(A) 官方：

鄭念群（1989）。《在戒嚴的日子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軒彥（編）（1989）。《京都血火》。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

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部（編）（1989）。《平暴英雄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英模事跡報告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國家教育委員會（編）（1989）。《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北京：國家教育委員會。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1989）。《動亂真相與「精英」的表演》。北京：人民出版社。

叢書集體編（1990）。《戒嚴一日》（精選本）。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車慕奇（1990）。《北京風波的前前後後：一個知識分子的觀察·思考》。北京：新星出版社。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1990）。《難忘的兩個月：徵文獎勵獲獎作品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1990）。《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立》。北京：人民出版社。

谷文康（1991）。《兩個社會的較量：兼談反對「和平演變」》。長沙：湖南出版社。

王文理、屈全繩、劉紅松主編（1992）。《和平演變戰略及其對策》。北京：知識出版社。

(B) 非官方：

陳子明（1992）。《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香港：當代月刊，1992年6月4日。

丁子霖 (1994)。《永誌不忘：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又名《六四受難者名冊》)。香港：九十年代。

陳小雅 (1996)。《天安門之變：六四民運史》。台北：風雲時代。

包遵信 (1997)。《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風雲時代。

羅峪平 (羅點點) (1999)。《點點記憶：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故事》。香港：天地圖書。

余杰 (2005)。《天安門兒子》。香港：開放雜誌。

丁子霖 (2005)。《尋訪六四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

二、台灣：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合編 (1989)。《風起天安門：全球華人同步聲援大陸民運》。台北：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

張京育主編 (1989)。《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的民主坎坷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編印 (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資料彙編》。台北：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

余英時、包遵信等著，周陽山主編 (1989)。《文化中國續編 1：從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時報出版。

〔包承平等/中國時報系記者群〕 (1989)。《北京學運五十日》。台北：時報文化。

季季主編 (1989)。《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 (一九八九)》。台北：時報出版文化。

大衛、艾克敏等著，譚志強等譯 (1989)。《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台北：時報出版。

楊渡 (1989)。《天安門紀事》。台北：時報出版。

徐璐、黃德北 (1989)。《北京的最後採訪》。台北：自立晚報。

聯合報編輯部 (1989)。《天安門一九八九》，台北：聯經出版。

余光中主編 (1989)。《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台北：正中書局。

夏泰寧 (1989)。〈武力鎮壓的決策過程〉。見金耀基等著，《神州悲劇的沉思：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評析》。台北：正中書局。

丘宏達 (1989)。〈六四事件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見金耀基等著，《神州悲劇的沉思：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評析》。台北：正中書局。

- 江之楓 (1989)。《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台北：中央日報。
- 戰鬥機器搜索群編 (1990)。《歷史如何變成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台北：唐山出版社。
- 丁望 (1995)。《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上冊/下冊)。台北：遠景出版社。
- 凌志鋒 (2003)。《變化：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大脈動》。台北：時報文化。
- 三、香港：
- 方良柱等 (1989)。《悲壯的民運》(第二版)。香港：明報出版社。
- 明報出版社編委會 (1989)。《六四餘震》。香港：明報出版社。
- 《北京學運》編輯委員會 (1989)。《北京學運：歷史的見證》。香港：星島出版社。
- 《歷史的見證》編輯委員會 (1989)。《歷史的見證》。香港：香港大公報。
- 香港文匯報記者編輯及攝影 (1989)。《血洗京華實錄》。香港：文匯出版社。
- 亞洲週刊(中文版) (1989)。《北京民運圖片集》。香港：亞洲週刊(中文版)。
- 寒山碧(編) (1989)。《歷史的創傷：1989中國民運史料匯編》(上冊/下冊)。香港：東西文化。
- 《對中國民運的認識反省資料選輯》編輯小組編輯 (1989)。《對中國民運的認識反省資料選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 張結鳳等著 (1989)。《血沃民主花：學運、民運、國運》。香港：百姓半月刊。
- 香港作家協會編 (1989)。《作家的吶喊：一九八九中國學運香港文選》。香港：繁榮出版社。
- 〔陳秀文等〕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寫 (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 遠東事務出版社 (1989)。《民主中華：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文集》。香港：遠東事務出版社。
-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une 4 Eyewitness Accounts (Ed.) (1990). "The Eyes Have It" (六四見證), HK: Grassy Plan.
- 麥海華、夏其龍合編 (1990)。《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香港：香港市民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 二十三名記者 (1990)。《採訪六四的烙印》。香港：青文書店。
- 程翔 (1990)。《天安門的反思》。香港：勵志出版社。
- 凌峰 (1990)。《血與淚：八九學運札記》。香港：國際文化。

- 胡志偉 (1990)。《天安門血案經緯》。台北：傳記文學。
- 新苗社 (1990)。《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六四周年紀念特輯》。香港：新苗社。
- 陳蘊華 (1990)。《中國學運民運簡史》。香港：平鳴。
- 胡平、王軍濤等著 (1990)。《開拓：北大學運文獻》。香港：田園書屋。
- 香港工會教育中心 (1990)。《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香港工會教育中心。
- 盧子健 (1990)。《六四·無聲勝有聲》。香港：創健文庫。
- 李碧華 (1990)。《天安門舊魄新魂》。香港：天地圖書。
-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編輯 (1993)。《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香港：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 麥海華等編 (1993)。《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香港市民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 楊思敏 (1995)。《六四刻》。香港：詩坊。
- 香港電台電視部 (1995)。《六四這一天》(鏗鏘集)。香港：香港電台電視部。
【影音資料】
- 陳森泰 (1996)。《全球華人的九七》。香港：作者自印。
- 麥海華等編 (1996)。《吶喊與戰叫：支聯會六四七周年紀念圖片集》。香港：香港市民支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 王德耀 (1996)。《說三道四論六四》。香港：夏菲爾出版社。
-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1998)。《六四追擊漫畫冊：時光倒流八九年》。香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 香港電台電視部 (1999)。《天安門一代：六四後的大學生》(鏗鏘集)。香港：香港電台電視部。
【影音資料】
- 韓文甫 (1999)。《六四民運史》。香港：當代歷史研究所。
- 陳敏生 (2001)。《天安門不真相》。香港：四筆象。
- 中大學生報/余文銳總編輯 (1999)。《總有這天：六四十周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 中大學生報 (2000)。《相信：六四十一周年專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 中大學生報 (2001)。《六四未圓永沒完：六四十二周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 中大學生報 (2002)。《六四十三周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中大學生報 (2003)。《六四：十四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中大學生報 (2006)。《為了遺忘的紀念：六四十六周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

陸超祺 (2006)。《六四內部日記》。香港：卓越文化。

羅品超主編 (2007)。《六四詩集》。香港：博大。

趙鼎鈞 (2007)。《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支聯會 (2009)。《支聯會通訊》，2009年3月。

四、海外：

何頻 (1989)。《大捕殺內幕》。香港：香港新青年出版社。

梁文貴 (1989)。《6·4大屠殺評析》。新加坡：梁商業諮詢社。

八方文化 (編) (1990)。《何去何從：海外學者的反思》。香港：八方文化。

吳仁華 (1991)。《天安門廣場鎮壓內幕》。香港：當代月刊。

王軍濤、候曉天 (1992)。《王軍濤：其人、其言、其罪》。香港：當代月刊。

安琪 (1994)。《痛苦的民主：海外民運五年盛衰錄》。香港：藝苑出版社。

Carma Hinton & Richard Gordon (1996).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Brookline, Mass.: Long Bow Group (影音資料)

卡瑪、高富貴等 (1996)。《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同前影音資料文字版)

王紹光、何頻、吳國光、高新、齊秦等著 (1996)。《江澤民面臨的挑戰》。香港：明鏡出版社。

錢寧 (1997)。《留學美國》。香港：天地圖書。

封從德 (1998)。《天安門之爭》。香港：明鏡出版社。

中國人權 (1999)。《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陳有為 (1999)。《天安門事後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一位中國大陸外交官的歷史見證》。台北：正中書局。

張良 (2001)。《中國六四真相》(上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

王丹等編著 (2004)。《「六四」參加者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

吳仁華 (2007)。《1989.6.4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內幕》。Alhambra, CA：真相出版社。

張炳玲 (編) (2009)。《回家》。香港：我要回家運動。

第十一章

香港的中國歷史科 教科書裏的「六四事件」 介乎曖昧與避諱之間？

黃偉國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不敢回憶，未敢忘記。」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1989)

「歷史畢竟不是教導（我們）變成起義者、反對崇拜偶像者、有好奇心的人、異見人士，（因為）這些人皆對民主社會構成危害。反之要變成接受者、缺乏思考能力者、沒有疑問者、馴良的人、服從的人、沉默的人和冷漠的人。」^[1]

(Litwack, 2001)

相隔20年，由筆者成長過程中親身經歷的關鍵歷史事件，變成為（或者不能夠成為）中國歷史科教科書的一部分。箇中涉及既複雜又麻煩的課題，旋由當課程演化成為教科書內容時，如何引入、隱瞞、交待、舖排和描述一個不單只是敏感，更被內地看為政治忌諱的事件透過學校教育（Schooling）讓下一代認知是值得探究。本文主要針對本土出版社於1997年後出版的中國歷史科教科書，根據他們對「六四事件」的展述形式作論述分析，旨在於跨出對表面文字意思的理解，從文字裏看出事件如何被主觀描繪、不同（或相同）描繪方式背後的脈絡及文字背後呈現出來的本質定向。更重要的是教科書對富爭議性或敏感事件的書寫，對歷史教育又構成哪些影響？

教科書與政治

當不少人認為教科書只是作為傳遞客觀資料，甚至是事實的工具，箇中並不會涉及非客觀因素之時；當中一個關鍵點是假如教科書教授的科目及其內容與現實的人和事有密切關係之時，教科書的杜撰及其內容能否再單純是「描繪事實」？還是因應實際需要「重構現實」？Apple與Christian-Smith（1991）分析教科書與政治的關係，發現教科書不單只教授「事實」，當中的文字更隱藏着「政治、經濟及文化活動、戰爭及妥協的結果，在教育體制內有現實目的的人界定、設計及編撰，並且在政治及經濟市場、資源及權力的侷限下出版。」（頁1-2）。簡而言之，教科書不再是一般人想像純粹為教學、為教師和為學生服務，而是受制於外在複雜的環境。此外假如教科書內對國家的想像最終能夠成為學生對國家想像的獨一無二權威版本，「教科書本身是一種明顯的嘗試，旨在於建立新的文化認同」（頁11）。所以當權者意圖「控制教科書背後隱藏的現實」（頁16）似乎無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所有讀者（即師生）全盤接受教科書的一切之餘，「讀者本身會建構屬於自己的回應；換言之，他們不一定被動接受這些文字，而是會根據自身的階級、種族、性別或宗教經驗而閱讀他們」（頁14）。假如

把Apple「關於教科書的爭論其實也是其中一種文化政治的形式」（頁7）進一步引申，意思是說在國家的眼中歷史教育旨不在於讓師生透過客觀的事實來認識歷史，而是透過不同的工具和手段，意圖影響教科書的不同範疇，包括哪些事件如以講、哪些事件不可以講和哪些可以講的事件如何講，箇中更可包含哪些人和事多講和講「好」；哪些人和事少講和講「壞」。教科書最終的內容取向直接影響了師生對事件的認知、持的觀點和態度和對事件中涉及一連串人和事的判斷，從而構成他們如何想像和回應當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當然，不同環境和學校師生會有不同形式的回應，無論是服膺、討價還價或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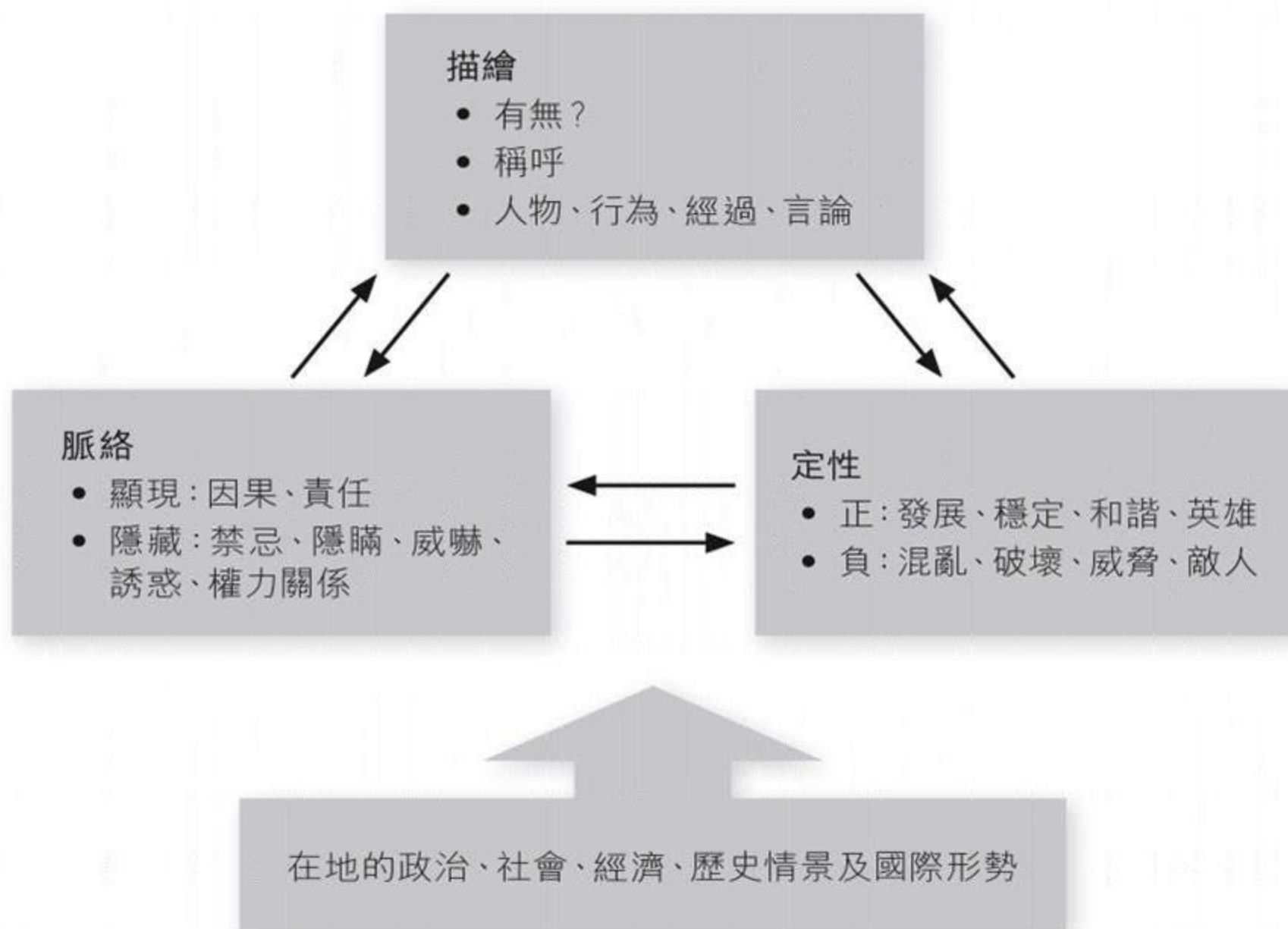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而言，Wang（1993）強化了Apple與Christian-Smith的看法，強調教科書內呈現的「規範、觀點、價值觀及預設的角色，從而遵從對國家的觀念和社會習俗」（頁206）。縱然作者研習的經驗內容是語文科，但其對台灣教科書的內容分析裏發現到讀物的內容強調理想性，並以正面及溫順的形式表達；學生要表現出黑白分明的道德價值及高尚的情操（頁203）。也許教科書的內容宣揚這些價值觀並無不妥，但當學習一些富爭議性課題之時，學生持這一類價值觀會否影響其判斷，例如有意無意中認同和忍讓權勢者所作的錯誤行為，而無視無權勢者面臨的狀況？如四字成語裏所言「隱惡揚善」。當然，Wang沒有就他搜集得到的資料作出較為深層次的解釋，但筆者提出回應上述文化政治的觀點，正可能是形成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在同一情景下呈現出相似的模式。

就着香港中國歷史科課程作經驗研究，政治與教科書的關係隨着政治現實而浮現。1994年，當時殖民地政府教育署長黃星華宣稱出版社刪除新版中國歷史教科書有關「六四事件」的部分，原因在於教科書不宜涉及最近20年發生的歷史事件（李榮安、貝磊，1997，頁409；Kan, 2007, p. 43）。當然，黃氏的言論受到社會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以末代殖民地教育官員的身分透過言論局限教科書的內容可算是不尋常；當然，他的舉動會否為日後加入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而刻意作出的政治舉動，此點較難引證，但可

以肯定的是政府官員把教科書政治化的舉動，反映「六四事件」在部分權勢者眼中仍有相當的政治份量，從而產生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最有趣的是Vickers (2005) 及簡麗芳 (2007) 也作了相近的觀察，指出官員藉事件來揣摩北京政府的心意。

更重要的是縱然事件似乎告一段落，但作為教科書的出版商，對於一些政治上的忌諱，例如涉及中共現政權在政治上的黑暗面，無論是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內地的政治社會狀況等要「小心」處理。部分出版商為了避免觸犯政治忌諱，更主動向當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備工作委員會接觸，預委會的答覆是：(1) 與《基本法》保持一致；(2) 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和 (3) 避免帶殖民地色彩的術語 (李榮安、貝磊，1997，頁410)。表面上，指引的內容尚算溫和，但在中國官場的政治文化裏，用一些十分概括的用詞加上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和利益解讀的處事作風，使上述的答覆變成撰寫教科書的政治界線。例如當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時示威者上街叫口號打倒領導人、黨和政府的時候，可能與擁護中央政府的基本立場出現衝突。事實上，相似的情況在歷史科也出現。Vickers (2005) 提出官方以「專業」理由，包括純粹以課程或/及年青學童心智發展未成熟因素來避開任何政治敏感的事件，從而替自己找麻煩。

承接文化政治的角度，假如身分認同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結合，透過政權允許的訊息、符號、故事和傳奇表達出來，意圖影響個人和集體認知和價值取向，由此觀之，教科書對國家政權、領袖人、該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況的描寫可以成為建構個人對國家認同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簡麗芳透過研究本土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提出假如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只會對出版社造成不便，包括以政權的角度來分析事件只會使到師生反感，繼而影響到透過教育過程建立和鞏固其政治文化主導權的形勢；較妥當的做法是對事件絕口不提，或者以含糊以對的方式處理 (Kan, 2007, p. 126)。當然，教科書如何處理這一段「消失」和「真空」的部分？這正是本文針對的其中一個部分。



分析方法及框架

本文採用話語分析閱讀文本。話語分析可算是突破內容分析，透過重構文字來看事實如何被描述：彰顯了哪些部分，隱瞞了哪些部分，用哪些方法隱瞞？用了哪些特定價值取向的詞彙，使用這些詞彙背後的脈絡和目的。事件有否提及相關的行動者？他們如何被定性所謂好與壞？（參閱例如Wodak與Meyer，2001）簡而言之，描繪、脈絡與定性成為整個話語分析的三大關鍵部分。如上圖所示，三者之間有緊密及互動的連繫。此外，話語分析不可能完成脫離在地的情景，包括政治制度與文化、社會歷史的根源與習俗、經濟發展程度、對外國的關係與觀感等，因環境因素由對內容展示的形式，到相關的人士（包括作者、編者、讀者）的觀感、態度和反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文選取共十本土出版的初中及高中歷史教科書及教師手冊。其中部分教師手冊在原來教科書裏以另頁或者在內文空白

的位置詳盡解說，並提供教師可能的教授方法、重點和相關練習等。部分教師手冊是獨立印行。此外教科書的文字解說，包括徵引權威著作或人士的觀點；及非文字解說部分，包括插圖、漫畫、統計數據，也一併放在描繪的部分。為了方便引文和參考，每一本書均編成特定的編碼，列表如下：

編碼	書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天1	中國歷史旅程教師手冊3	天行教育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7
齡1	簡明中國史3	齡記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齡2	新簡明中國史(教師本)3下	齡記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現1	中國歷史3	現代教育研究社	2004
現2	高中中國歷史乙部課程教師用書	現代教育研究社	2004
文1	互動中國歷史3下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7
文2	探究中國歷史5下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4
教1	新理念中國歷史第二版(中三)教師用書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7
教2	新理念中國歷史教師用書5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5
教3	新理念中國歷史教學資料集(下冊)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5

文本分析

發生於1989年的事？

首先，我們要知道教科書裏有沒有提及這一件於1989年5至6月期間發生的事件。

- 「……6月3日晚上，政府下令軍隊開入北京干預運動，至翌日事件平息，是為『六四事件』。」(天1，頁187)

- 「……觸發了1986、1989年的兩次學潮。1989年『六四事件』後，……。」（齡2，頁88）
- 以紅色印刷於教師用書內有一部分名為【史事追縱】：
「……6月4日凌晨四時半，戒嚴部隊開始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約五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至五時半，整個清場過程結束。……」（齡2，頁89）
- 「……改革開放後，中國先後發生了兩次學潮，最後，在政府的干預下，事件才告平息。」在「學潮」一句以後加上註釋：「……6月4日，中央下令解放軍開入天安門全面清場，事件才告平息，但『六四事件』……。」（現1，頁164）
- 「【六四事件】……6月4日，中央下令解放軍入天安門全面清場，事件才告平息。……『六四事件』……。」（現2，頁216）。其後又用「政治風暴」一詞來形容「六四」及之後的情況（頁218）。
- 「……至6月4日，政府下令軍隊干預，事件才告平息。」（文1，頁96）
- 「……1989年春，北京發生青年學生和民眾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持續至6月，引起全國及國際社會的關注，最後經政府武力干預方告平息。……」（文2，頁76）
- 「其中較為引人矚目的是1989年夏天的『天安門事件』，……；6月4日，中共出動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故這次事件亦被稱為『六四事件』。」（教1，頁229）
- 「……因此，發生了1989年夏天的一場政治風波，即『六四事件』。」在補充的部分：「因此，（中共中央）採取斷然的措施，於6月4日，出動解放軍，在天安門進行清場，平息了這場風波。」（教2，頁255）
- 「【六四事件】指發生於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教3，頁178）

大體而言，除了齡1沒有提及以外，大部分教科書均有提及這一次事件。較為明顯的是部分文本沒有給予事件特定的名稱；部分選擇以不同本質的詞彙來標誌事件，包括事件、學潮、風波、風暴。「事件」一詞是沒有價值判斷的詞語；風波則指一些不穩，猶如海面上因大風而抓起波浪，但沒有危機一詞來得嚴重。學潮實指事件的組織、領導和參與者以學生為主。假如與西方主流學術和新聞媒體比較，後者多以「天安門民主運動」、「天安門學生運動」，甚至是「天安門屠殺」、「北京屠殺」等較為強烈價值色彩的字。同時，本土的教科書也沒有全盤使用內地政壇曾經提及的「反革命叛亂」、「動亂」等具負面價值觀的字眼。事實上，官方甚少再用負面的字眼來定性這件事情，恐怕引起不必要的反應和聯想，繼而動搖中共統治的權威。

此外教科書似乎刻意避免清楚說明6月4至5日中共採取哪些方法和手段處理仍然留在天安門的示威者和結束這一場事件，最有趣的是只有文2採用「武力干預」一詞，教1出現了事件中的其中一個主角「解放軍」，似乎嘗試講清楚事件中若干相關情節；當然部分用較為中性的詞語「清場」。齡2給教師的資料則採用內地的說法交待凌晨中共軍方結束事件的情況。

本土的例子反映出大部分教科書避免使用價值判斷相當重的詞彙，因任何具價值判斷的稱呼，會分別引起擁護官方者和支持同情事件者的任何反應，對事件加以關注，繼而再討論和評價。這也許是官方不想預見；相近的觀察會在本文後半部加以引證和引申。

過程

雖然大部分教科書均有提及過程，但不是所有相關的人物和關鍵事件都包括在內。當然在教師用書或補充資料部分會有較詳盡的描述（齡2、教2和教3），但是否全面和深入還是偏向含糊和表面是一個疑問。

- 「1989年4月，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部分北京學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前悼念胡耀邦。追悼會不久演變成要求反演變成要求反腐敗的民眾運動，其後逐漸失控。……」（天1，頁187）
- 放在注釋部分：「1989年4月，北京高等院校學生為悼念胡耀邦逝世，發起集會遊行，反對貪污腐敗，其後更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齡2，頁88）
- 以紅色印刷於教師用書內有一部分名為【史事追縱】：
「1989年4月，胡耀邦在北京逝世。在追悼胡耀邦的過程中，有的大學裏出現了大小字報，有些青年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請願、靜坐、甚至發生了衝擊中共領導人辦公處中南海的情況。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事態仍然持續。雖然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各部門的負責人曾多次與北京高校的學生和各界人士進行座談和對話，但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5月13日，北京高校數百名學生開始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從15日到19日，全國各大中城市出現了大規模聲援學生絕食請願的群眾遊行，情況更為嚴重。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部分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進駐北京城內的一些地點，與群眾發生衝突。……」（齡2，頁89）
- 在注釋部分：「公元1989年4月，大批學生藉着悼念胡耀邦而發動集會遊行。隨後全國學生及民眾加入支持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而政府處理和反應均失宜，事件發展開始失控。……」（現1，頁164）
- 「公元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北京各高校學生藉悼胡耀邦而發動集會遊行。隨後全國學生及民眾加入支持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而政府處理和反應均失宜；後來事件發展開始失控。……」（現2，頁216）
- 「……1989年5月，青年學生及群眾在北京天安門集會遊行，部分更絕食抗議，反對貪污腐敗。……」（文1，頁96）

- 「……1989年春，北京發生青年學生和民眾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持續至6月，引起全國及國際社會的關注……。」
(文2，頁76)
- 「……，北京學生及市民自發舉行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活動，觸發了反腐敗、反『官倒』的民眾運動；……」(教1，頁229)
- 「【補充】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胡耀邦是在1987年被認為處理『學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辭職的。北京學生及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悼胡活動中，提出改善民主政制的訴求。運動從北京擴展到很多地方，有上百萬學生及其化民眾參加。一時之間，局勢頗為動盪。/ 中共中央認為有人從中挑動，是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要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教2，頁255)
-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猝逝，北京學生及民眾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後發展成為靜坐遊行。由於1988年下半年起中國物價飛漲，官員幹部貪污嚴重，社會動盪，學生與民眾因而提出反貪污腐敗，推行民主政制等訴求。多個城市也相繼出現遊行及靜坐，支援北京學生。當時中央中央對事態意見分歧，官方媒體指學生及民眾的行動是動亂，總書記趙紫陽則持不同看法，並在5月19日晚上到廣場上探望學生。5月20日，中共中央宣佈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調派解放軍進入北京，……。」
(教3，頁178)

在描繪事件時，只提及胡耀邦之餘而沒有提及當時的高層的中央及市領導，包括鄧小平、李鵬、陳希同、袁木等，以及事件中領導學生的王丹、吾爾開希和柴玲等。其中現2的教師用書版本的【參考資料】部分有提及趙紫陽，稱他「因『六四事件』中被指同情青年學生而下台」(頁216)。其次不少書以胡耀邦去世作為引發事件的開端，沒有就國家的政治權力和制度，以及社會問題作為全面和宏觀理解整個事件的基礎，假如教育的目的是對知識的

探索和真理的追求，缺乏對國家政權本質的認識和理解只是刻意迴避認識和探索事件。即使提及胡耀邦去世之事，但為何他的死與「六四事件」有密切的關係，無一本教科書能夠給予清晰的說法。而刻意沒有提及當時的關鍵人物，原因可能有三個：(1) 避免就着他們對事件的責任和對錯作任何討論和分析，從而刺激起師生的好奇心和引發相關的疑問；(2) 當鄧小平在事件裏擔當重要角色但教科書沒有刻意在事件的始末裏提及他，可能的理由是避免政治尷尬，從而變成一個受爭議性人物之餘，又可免得外在持正面意見（親北京勢力）和批評意見（本土支持內地政治自由化的力量）的批評和責難，從而影響教科書，甚至是出版社的聲譽。事實上，差不多所有教科書均以正面評價鄧小平而沒有提及他在「六四事件」所擔當的角色，在第四部分關於論述的定性時再加申論；及(3) 部分教科書把當時的貪污腐敗作為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把當時的政治現象作為事件（甚至是慘劇）發生的唯一原因，但不會就導致和鼓勵這一個現象出現的根源，無論是制度、領導、抑或是政治失誤，甚至是箇中的責任作探討。這一種以單一事件或現象解釋整件事件的手法，實際上也是一種隱瞞事件真相的技巧——意圖轉移視線以似是而非的方式來建立認知和實存（Reality）。

後果

部分教科書有述及事件的後果，包括對中國內部發展和對外關係的影響。

- 「1989年『六四事件』後，政府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回應民間和國際的訴求，令社會趨於穩定。」（齡2，頁88）
- 「『六四事件』曾一度引致中國經濟受國際抵制。」（現2，頁216）
- 「公元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中國與國際關係呈現緊張，影響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同年9月，東歐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紛紛被推

翻，蘇聯國內局勢也極為動盪，……。但是中國最終能面對這場國際衝擊，安然渡過這政治風暴。」（現2，頁218）

- 「雖然中共和政府對黨員和官員的腐敗行為屢加懲治，但貪污腐敗問題仍然嚴重，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仍待不斷加強，與時並進。」（文2，頁76）
- 「然而，在（六四）事件平息後，官場內貪污之風仍未遏止，一些幹部以權謀私、貪污瀆職的現象依然嚴重；同時，國營企業的低效益及腐敗，亦受到外界批評。這都是國家領導層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教1，頁230）
- 「『六四事件』，頗受國際社會的議論，直至於今。而中共亦從中獲取教益，注重民主政制的建設。」/「【反腐倡廉方面】：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和政府各級機構中一些幹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的現象亦相當嚴重。這不僅是「六四事件」的誘因之一，更是危害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安定因素。」（教2，頁255）
- 教3：在中外對照的部分，作者提及下半年（1989），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紛紛瓦解，中國受到西方的經濟制裁（頁178）。

而沒有述及該事件後果者，則講述中國如何繼續改革開放。天1（頁187）、現1（頁164）、現2（頁218）描述鄧小平1992年南巡，並肯定經濟特區的成就。

上述的文本有共同特徵：中共在事件後作出一定程度上的回應。最有趣的是在較具體的描繪中以懲治貪污腐化作為主題，但沒有提及貪污腐敗背後關乎體制和權力缺乏監督的事實，以致問題似乎不斷惡化。總而言之，本部分的描述又重複了（2）過程的狀況——以含混的表述，包括「回應民間和國際的訴求」、「最終能面對這場國際衝擊，安然渡過這政治風暴」、「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仍待不斷加強，與時並進」、「中共亦從中獲取教

益，注重民主政制的建設」來交待整件事似乎已經結束，但是這個方式的表述反映出歷史書在處理富爭議性事件的時候，只是不斷以避重就輕、含混不清和語焉不詳的方式敘事，從敘事時事件因果關係語焉不詳突顯禁忌和隱瞞的特質而已，而逃避根本因果和責任的關鍵議題。

定性——一邊倒正面取向？

根據上述抽取的相關文句裏所採用的詞性，大抵上在描述事件發生的過程時沒有明顯的價值判斷。正如在第一部分所述，除了對事件的稱呼以外；由於事件的發展涉及上至高層的中央及地方領導，下至學生及群眾，任何對他們正或反面的描述會引致相關的討論。所以在該部分以「干預」（天1、文1、文2）、「清場」（齡2、現2、教1、教2）和「開入」（現1）等較為溫和的用詞來描繪解放軍於6月3至5日於天安門廣場對示威群眾和學生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值得一提的是對事件的描繪除了避開鄧小平的角色之外，對鄧小平的描繪和評價是相當正面，似乎希望把他從事件中抽離和消失，從而把他塑造成為完美無瑕的歷史偉人。例如

- 天1：以「百折不撓的鄧小平」介紹他的生平（頁185）；
- 現2：引用徐中約《中國近代史》對他的正面評價（頁217）；
- 教3：引用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以「實用主義政治家」來肯定他的成就（頁173-174）；
- 齡1、齡2、現1、文1：強調他在推行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裏擔當重要角色，甚至強調其經濟成就。
- 教1、教2：以中國代替鄧小平作為主體來描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

假如把「六四事件」放在整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述裏（直至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為止），大部分有述及「六四事件」的教科書偏向事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成長並無影響之餘，行文中似乎

強調了「六四」的「平息」才能保住改革開放的勢頭和成就。假如中共因而倒台的話，只會使中國現代化成功及國家強大的目標不能實現。因此，在建基於中共政權必須保住的潛台詞下，任何對當政者的負面評價會盡量避免之餘，唯有以隱藏脈絡使「六四事件」含糊化，然後強調國家強大和改革開放的成就以淡化「六四事件」之餘，似乎暗中投射了負面評價給同情「六四事件」者：因為「六四事件」只會使以中共為首的改革開放成就——穩定、和諧和發展——毀於一旦。

結論

縱觀上述的文本分析和解讀其背後的脈絡和定性，可得出以下的觀察：

(1) 表面上教科書對「六四事件」一事並無忌諱，教科書在介紹當代中國歷史時有提及這一件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降最大規模的一場由下而上，並以政治和社會改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但教科書卻刻意避開描繪事件的經過、責任和涉及的相關人物，使人感到教科書背後的出版商為了避免任何涉及事件的陰暗面，包括政府對示威人士的傲慢態度、四二六社論對事件定性為叛亂、中央發出戒嚴令和下令解放軍進入北京城鎮壓示威者、6月4至5日解放軍在天安門及鄰近地區的武力鎮壓、以及之後發出通緝令和對相關人士的滋擾等。由此觀之，事件被教科書改寫成一件普通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發展產生的影響有限，似乎不想把他變成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以免成為受到關注的對象。

(2) 文中使用的分析框架旨在透過對不同教科書的文字記錄重新抽取、重組、歸納和分類以發現箇中模式，是次的文本分析發現了無論對事件的稱呼均偏向中性（沒有使用動亂或者運動等付予某些特定意義的名詞）、對事件經過的描繪（除了用詞中性以外，對關鍵事件沒有提及）和事件的結果（中國依然繼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均呈現相似的模式，可以引證了在香港在「九七

回歸」祖國以降，當內地對「六四事件」依然不可以公開提及的時候，香港似乎比內地較為開放，容許教科書講述「六四」，但偏向以「多講多錯，少講少錯」的心態處理；換言之，以最少、最含糊和強調美好前景的正面文字交待事件似乎成為教科書處理敏感和富爭議性事件時的共識寫法。

(3) 從歷史教育的角度來看，從教科書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和寫作方式，反映出本土的歷史教育似為政治服務的趨勢。對國家的正面成就使要詳加講述，對領導人（特別是未去世）要全盤肯定；反之對國家的黑暗面要輕輕帶過，或者含糊其詞，或者只是某些人和事的責任，對領導人的批評只是一種對權威的不敬。假如教科書的內容被視為煽動下一代批判祖國，可視為不愛國的表現。在中國領土下「不愛國」等同被隨意排擠、咒罵、侮辱和傷害的一群。因此，任何可能會被視為「不愛國」的立場、用詞和觀點應完全絕跡於教科書裏。結果，假如師生依賴教科書作為權威地認知當代中國，最終可能成為Litwack眼中一班不會對社會構成「危害」的教師和下一代。可是，隨着互聯網的流行，在網絡上找到「六四事件」的影像（例如YouTube）可謂輕易而舉；^[2] 加上相當部分的港人選擇「未敢忘記」，甚至以行動反彈否認「六四事件」的人，資訊的多元化和港人的道德勇氣，與缺乏吸引力和說服力的教科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註釋

1. 原文是這樣：“History teaches, after all, that it is not the rebels, the iconoclasts, the curious, the dissidents who endanger a democratic society but rather the accepting, the unthinking, the unquestioning, the docile, the obedient, the silent, and the indifferent.”
2. 例如www.youtube.com/user/dinzzz414上載了記錄片The Gate of the Heavenly Peace（天安門）；www.youtube.com/user/1989June4上載了「六四事件」前後本港不同媒體的新聞報告片段。

參考書目

- Apple, Michael W., & Christian-Smith, Linda K. (Eds.).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an, Flora L. F. (簡麗芳) (2007).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Rosenzweig, R. (2001). "Interviews with Exemplary Teachers: Leon F. Litwack," *The History Teacher*, 34(2), Retrieved 2009, February 14 from 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ht/34.2/rosenzweig.html.
- Vickers, E. (2005).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Sheue-shya. (1993). *A Content Analysis of School Reading Textbooks in Taiwan and in Texa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 Wodak, R., & Meyer, M.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李名揚 (2005)。《新理念中國歷史教學資料集(下冊)》。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李榮安、貝磊 (1997)。〈教育——演進的模式和面臨的挑戰〉。載於鄭宇碩、盧兆興編，《九七過渡：香港的挑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401–421頁。
- 杜振醉、區達仁、梁國雄、胡志偉、甄錦棠 (2005)。《新理念中國歷史教師用書5 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梁一鳴、葉小兵、王耘 (2007)。《互動中國歷史3下》。香港：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 梁一鳴、駱為孺、謝偉傑、葉小兵 (2004)。《探究中國歷史5下》。香港：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 梁國雄、區達仁、胡志偉、甄錦棠、容子思、陳志偉、鄺文慧 (2007)。《新理念中國歷史第二版(中三)教師用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陳志華、羅國潤、鄭太經 (2004)。《高中中國歷史乙部課程教師用書》。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 陳佳榮 (2000)。《簡明中國史3》。香港：齡記出版社有限公司。
- 陳佳榮、陳錦輝、郭達亮、文永光、張志義 (2000)。《新簡明中國史(教師本)3 下》。香港：齡記出版社有限公司。
- 臧嶸、陳梧桐、李燕、梁國全、沈思敏、李偉科 (2007)。《中國歷史旅程教師手冊3》。香港：天行教育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 譚松壽、陳志華、黃家樑、羅國潤 (2004)。《中國歷史3》。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第十二章

香港電影中的「六四事件」

陳家樂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高級講師

朱立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

引言

根據中、英1842年《南京條約》，香港島正式割讓予英國，1860年，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將南九龍從租借改為割讓。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署，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租給英國，以99年為期。由於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凌晨屆滿，中、英兩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便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期間會談更曾一度破裂，令香港前途蒙上不明朗的陰影。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歷經殘害人權的「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香港居民因此長久以來對共產黨缺乏信心，其後中國表明收回香港主權，社會廣泛的不安情緒便由此而生。同時，在1989年春中國發生了民運及中共當局以武力鎮壓民運的「六四事件」，極大部分香港人與傳媒幾同聲譴責北京政府，令香港人對中共的疑慮更為加深，對「九七」後能否維持自由、法治的生活更覺不安，本應為喜事的「回歸」卻引發了港人往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移民潮，以求「太平門」。在香港歷史中，除了

1967年的左派暴動外，「六四事件」及「九七回歸」無疑是香港這50年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時也觸發了香港的身分認同和移民問題。香港電影雖然商業掛帥，但畢竟關注或表述這兩大政治事件的電影依然不少，更進一步掀動了香港人的心。

1989年1月6日，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向鄧小平發出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因呼籲中國實施民主而繫獄多年的魏京生，方勵之的信得到了海外著名華人學者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聯合簽署，但中國政府拒絕回應（徐中約，2001）。同年2月，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Bush）訪問北京，方勵之與夫人應邀出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宴會，但為中國領導人派警察阻止，事件激怒了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擁向北京天安門廣場，追悼這位含冤而逝的開明領導人，希望為他昭雪正名，並同時提出言論、集會和新聞自由及大力整治腐敗的要求。中共拒絕為胡耀邦正名，也拒絕與學生對話，及後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各大學並陸續罷課，連日在天安門廣場上示威，喚起了各省的大學生、工人、記者、普通市民等也紛紛響應。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對學生動機相當同情，但卻被黨內其他元老和領導人指為支持學生運動。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譴責學生鬧事，及後總理李鵬和學生領袖的對話破裂。5月17日前後，中共最高層召開了一次「戰備會議」，全體一致議決反對向學生退卻，並立即解除趙紫陽的黨總書記職務。5月19日，北京實施軍事戒嚴，但示威的學生和民眾依然置之不理。5月19日至6月4日期間，聚集在北京天安門的學生已顯得疲憊不堪，但全國各省的學生則依舊蜂擁而至，許多主要大城也群起響應，支持絕食、示威，要求民主與自由。6月3日晚上十時，總理李鵬下令部隊趕赴天安門廣場，在黎明前清場，結果在七個小時內完成了以武力驅離示威學生的行動。

反對中國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

北京戒嚴部隊的武力清場，造成了不少死傷，而且透過傳媒傳遍世界，面對1989年「六四事件」的國殤，香港電影界全以批判的

立場、強烈地反對中國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香港電影工作者雖不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攝、記錄「六四事件」，事後卻仍十分迂迴曲折地來再現此一歷史大事，他們大致用了三種手法：(1) 影射：電影講越南或菲律賓共產黨的殘暴獨裁，讓觀眾去聯想中共，如《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徐克導，1989）、《愛人同志》（黃泰來導，1989）、《安樂戰場》（曾志偉導，1989）及《喋血街頭》（吳宇森導，1990）。(2) 在電影中加插「六四事件」電視新聞片段：大陸民運期間，香港的傳媒做了幾近飽和的報導，電視和廣播的新聞片段及錄音變成了導演的素材，用真實的片斷來說故事，如《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劉偉強導，1998）及《舞牛》（方育平導，1990）。(3) 借昔喻今：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造成許多的歷史傷痕，導演便借這段時期的血腥暴力來諷喻、批判「六四事件」，如《救命宣言》（林德祿導，1990）、《鬼幹部》（金揚樺導，1991）及《棋王》（徐克、嚴浩聯合導演，1992）等。

以「越共」影射中國共產黨，相信源自許鞍華導演並取得空前成功的《投奔怒海》(1982)。現實上，「六四」後的香港電影只是重施故技，把觀眾熟悉的符號形象，加強了動作和血腥暴力，這是一種對「六四事件」暴力鎮壓的銀幕反抗；因為，不可能的現實，反而加強了觀看電影的欲望。如《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的故事發生在1974年的越南西貢（胡志明市），講述張志民（梁家輝飾）與Mark（張志強，周潤發飾）是堂兄弟，為接走僑居越南的老父松叔（石堅飾），決定走私美金，與大拆家周英杰（梅豔芳飾）接洽，卻同遭越南軍人（喪邦）伏擊。據卓伯棠研究（2003，119頁）：「《夕》片中越南學生上街示威，軍隊開槍鎮壓，不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寫照嗎？在越南政府強大的統治機器——軍警的鎮壓下，個人之無能為力，表現無遺。」而徐克的編劇劉大木亦直接地說明徐克的創作意圖：「徐克要表現的國家政治觀很明顯，亦很容易領會。例如「六四」後，便想到加上坦克。《道道道》（1991）裏，我們原本想有坦克，但因為預算問題沒有做。但《英雄本色III》老早已構思了坦克的情節。」（何思穎、何慧玲，2002，201頁）。所以，1975年南越陷共的歷史，成為批判當今「六四事件」的「政治寓言」（political allegory）。

《愛人同志》的主人翁是一名性格衝動的香港記者劉繼祖（劉德華飾），他負責送急件到越南胡志明市（西貢），在過程中遇上越南翻譯員阮紅（鍾楚紅飾）。後來，劉繼祖（阿祖）無理地被越南法官判罪，關進越南勞改營中，受到非人虐待，卻認識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趙正南和一名越南政治犯阮志武（阮紅的弟弟）……在一次街頭示威中，阿祖被無辜地捲入衝突中，最後連自己也被關進獄中。怎知，原來他帶來的急件是反對越南專制統治的報導文章。影片所描寫的越南情況，與實情相差甚遠，非常誇張扭曲，也得罪了逐漸開放的越南政府。但以影射「六四事件」的角度來看，卻有一定的共鳴感與震撼力，例如，香港記者阿祖被指藏有反黨文件，新聞自由完全被威脅，沒有律師辯護和自辯的權利，無辜地被判罪，失去英國公民的上訴權利和人身自由，在獄中受到越南共產黨人的連番逼供和折磨。

《安樂戰場》描寫菲律賓的共產黨，故事發生在1985年，香港旅行團前往菲律賓旅行，成員包括了香港領隊Candy（溫碧霞飾）、菲律賓領隊阿卜（曾志偉飾）、老太（鄧碧雲飾）及歡場女子（唐麗球飾），怎知，一個快樂無憂的旅程，卻遇上菲律賓共產黨游擊隊綁架，被挾持作人質。

《喋血街頭》亦借越南共軍影射中共，故事的時空則在1967年，細榮（李子雄飾）、阿B（梁朝偉飾）、輝仔（張學友飾）自小在石硤尾一起成長，在阿B和小珍（袁潔瑩飾）結婚當晚，阿B和輝仔殺了強哥，三人便唯有逃亡至越南（實際上，電影在泰國拍攝，而《投奔怒海》實則在海南島拍攝），後遇到殺手阿樂（任達華飾）、黑幫頭子梁源盛、歌女甄秀青（甄楚倩飾），阿B想救甄秀青逃離越南，卻遇上越共追捕。

在這些香港電影中，街頭示威、烽火戰場、平民抗爭、坦克車鎮壓等場面都是以往香港電影中比較少見的，反映了香港電影對北京以暴力鎮壓民運的憤怒，這份憤怒的情緒，透過借鑑荷里活戰爭電影的技巧，成為政治表述的方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喋血街頭》中輝仔被越共所迫，開槍殺越南俘虜，便非常類似越戰電影《獵鹿者》（*The Deer Hunter*, Michael Cimino, 1978）裏美國軍人

被迫殘殺無辜越南俘虜的場面。而且，「逃亡」成為情節模式，如《喋血街頭》中，四人亡命地駕車，逃離越南；《愛人同志》中，劉繼明終於逃至中越的邊境；《安樂戰場》中，香港遊客們終於逃出菲共的追捕；《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中，Mark、民與傑亦終能逃出越南。影片的結局回到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 1816–1895）所提出的古典戲劇結構的最後部分——大災難（catastrophe），變成一種以暴易暴的渲洩（Thrall & Hibbard, 1960）。這些影片裏的示威、暴力鎮壓、逃亡等，都很容易讓香港觀眾聯想到大陸民運的過程與下場。

可是，上述這些電影的製作成本都非常高，一些中、低成本的電影中則多用加插「六四事件」電視新聞片段的方式來表達批判和譴責。例如因太過血腥暴力而被列為第三級電影的《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鬪篇》，由文雋編劇，故事發生在1989年香港，主角陳浩南（謝霆鋒飾）失學，生活毫無目的，家庭關係破裂，影片最重要是呈現陳浩南在黑幫大廝殺中，竟平行剪接「六四事件」的電視新聞片段，暗喻「六四鎮壓」正如黑幫廝殺般殘酷。方育平導演的《舞牛》（1990）亦在尾段加插了「六四事件」的電視新聞報導，因為看到了中共對民運的血腥鎮壓，主角牛品超（黃秋生飾）從而改變了對舞蹈藝術的看法，他決定以街頭舞劇介入政治批判。

值得順帶一提，還有麥當傑導演的《省港旗兵（第四集）地下通道》（1990），講述民運人士逃離中國當局通緝和拘捕的故事。一群青年領袖王小慧（吳雪雯飾），僥倖在這次鎮壓中逃脫，為了逃避當局的追捕，四竄逃亡，暫逃入廣州外國領事館內，等待前往香港。而身在香港的民運領袖，全港聲援學生愛國運動協會歐陽卓為了協助這群熱血青年逃出海外，唯有委託省港旗兵擔任營救工作，領袖是大陸通緝犯大兵（徐錦江飾），希望他們能把數名匿藏在廣州的民運領袖運到香港。可惜，電影製作非常粗製濫造，很有借「六四事件」作噱頭之感。

至於借昔諷今，則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傷痕對照當今「六四事件」，無論在政治上和美學上，都可說是相當犯險的創作意念，刻意重提香港和中國長久以來的分歧和距離，強調

中國政府歷年層出不斷且不改的政治災難，令當今觀眾更為恐懼，如《救命宣言》、《鬼幹部》及《棋王》。從意識形態批判學（ideological criticism）的角度看，受「六四事件」的震盪，香港人想像、感受1997年後香港「陷共」的浩劫很可能與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類似，血腥暴力收場，喪失言論、新聞自由，從而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政治恐懼、覺醒和使命感。向以謀利和娛樂為主的香港電影，卻在此時一反常態，用特殊的敘事與風格強烈地批判了對當前的政治。

香港電影中「六四事件」的敘事和風格

動作類型

面對「六四事件」的震盪，香港電影採取批判態度，雖受制於商業類型電影的框架，仍隱晦地表達出政治意識，成為一種類型電影的政治化。如《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愛人同志》、《喋血街頭》、《安樂戰場》都是動作槍戰片，而《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是一部以古惑仔為題材的黑幫電影。動作電影與黑幫電影都具備商業元素，以深受觀眾和片商歡迎的類型電影來包裝政治，既能避過電檢條例，又能開拓市場。這些電影以動作或暴力包裝及渲洩政治不安，同時又用政治不安將暴力「合理化」，結果是在竭斯底里地批判和反對北京鎮壓的同時，香港電影本身也充滿了血腥的鎮壓與暴力。

借昔喻今

運用意識形態的觀點，重新演繹和建構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影射「六四事件」。如《救命宣言》，講述1989年，黃文俊/阿B（鄭浩南飾）和牛少傑/阿牛（盧冠廷飾）當上見習醫生。阿B的父親（董驃飾）是一位大陸醫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批鬥為黑五類。阿B性格敢作敢為，對不平等的醫院制度（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之一）提出改善的意見，但阿B遭到上司朱教授（任達華

飾) 極力反對。阿B代表挑戰專制的人, 而朱教授卻是專制管治的象徵。後來, 朱教授公報私仇, 處處為難阿B, 令成績優異的阿B考試不合格, 不能當上掛牌醫生。後來, 阿B為了救Anita (李嘉欣飾), 違反醫院守則, 私自做手術, 必須接受到醫院內部的調查聆訊, 最後他無罪釋放, 而且升為正式醫生。《救命宣言》拍於1990年, 影片的靈感相信來自新荷里活時期作品《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Milos Forman, 1975), 以國家意識型態機器之一的醫院, 象徵宏觀及專制的國家制度。影片以當代的醫院作為縮影, 顯示了挑戰專制與維護專制之間的衝突, 象徵着「六四事件」中學生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鬼幹部》講述五千年來中國未曾有過真正安定的日子, 血魔作祟而附於有權有勢者身上, 歷代暴君則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中, 殺人無數, 血流成河。尤幸歷代亦有無名天師出現, 犧牲自我, 鎮伏血魔, 可惜, 文化大革命爆發, 破四舊運動, 令本來深埋黑洞的血魔, 因開天闢地破土而出。紅衛兵梁國棟 (梁家輝飾) 與哥哥赤腳醫生林剛 (林正英飾) 成長於「政治運動」中, 梁國棟曾批鬥自己的養父梁初三 (劉江飾), 和哥哥林剛衝突。兩年後, 冰釋前嫌, 聯手對付血魔。被批鬥的雷鳴復 (關山飾) 恢復名譽, 當了永靖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是, 血魔附體於他, 林剛為鎮伏附上自身的血魔, 他自炸而死, 以為血魔就此被消滅, 不料, 30年後血魔又蠢蠢欲動。「血魔」象徵着極左思想的中共政權, 「血魔」的「血」暗示了無數人在政治動亂的時代犧牲了生命, 所以, 血魔 (腐敗的中共政治) 用人們的血來滋養生命 (維護政權), 而這個「血魔」也就循還不息不斷再生, 在歷代的中國又一再出現。

《棋王》講述香港廣告商程凌 (岑建勳飾) 在台北找到一位下棋神童王勝方 (小方), 安排他與棋壇盟主比賽, 小方下棋時專注的神情, 令程凌憶起童年時 (文革時代) 在中國內地認識的圍棋棋王——王一生 (梁家輝飾)。當時農村生產大隊生活艱苦, 但王一生只要拿起棋子, 便永不覺苦, 有人行賄幹部, 換取王一生參賽成名的機會, 但王一生不想把棋藝 (亦是自己) 變成競爭工具。程凌漸感到小方被迫在電視節目中比賽, 小方亦是電視台收視率的棋子和籌碼, 感悟在兩代人中, 人皆如棋子, 都一樣地在鬥爭

的時候被利用。回看「六四事件」，中國學生又何嘗不是被中共當局認為是受少數人擺佈的政治棋子呢？在1989年《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中提到：「在悼念活動期間……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在《棋王》這部電影裏，用的是非常隱晦的方式，認為任何人或學生都不應是鬥爭中的棋子，間接批判、否定了「四二六社論」的說法，亦影射了應該平反「六四事件」。

坦克與人民力量對峙

阿圖塞（Althusser, 1971）認為軍隊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鎮壓工具（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在「六四事件」中，掌握了軍權的人便掌握了權力，以軍權武力來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民是極度專制、殘忍和獨裁的手段，亦暴露了中共政治元老的政治心態，據徐中約（2001，968頁）分析：

他們（中共元老）是長征一代僅存的碩果，長年歷經了破壞、階級鬥爭、內戰、外戰、這種或那種沒完沒了的群眾運動。他們已對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變得高度敏感。在長期的權力糾纏中，他們接受這樣的單向思維：權力就是生命，沒有權力活着也沒有意義。他們相信，在任何鬥爭中，絕不容許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須堅定、殘酷，甚至狠下心腸。還有就是，先下手為強。

既然，政權是如斯的「珍貴」，所以，死守權力的手段更是不擇手段！這種軍權的壓迫感，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的香港電視新聞節目中被廣泛報導，如1989年5月22日的「危城告急——中國往何處去」、1989年5月23日的「戒嚴第4天」、1989年5月24日的「戒嚴第5天」、1989年5月25日的「戒嚴第6天」、1989年5月26日的「戒

嚴第7天」、1989年5月27日的「戒嚴第8天」、1989年5月28日的「戒嚴第9天」、1989年5月30日的「學運四周談」至1989年6月4日的「特別新聞報道」、1989年6月6日的「內戰」等片段中一再呈現（吳昊，2003），突然間，習於政治平穩的香港市民感受到軍隊的力量是如此逼近和恐怖。當時，就連左派報紙也不例外，1989年6月4日香港左派《新晚報》的頭版標題便是「廿萬解放軍出動坦克血洗北京城，死亡人數估計逾五百，數千人受傷」，文章這樣寫道：

當數以萬計的軍人及數十輛坦克、數十輛裝甲車集結在故宮門外，便排開三列陣式，炮口及槍口轉向廣場。廣場上有千多名學生，部分堅決不肯離去，軍隊在5時開始行動，坦克直駛到廣場上，為數百多個帳幕盡毀在坦克之下，不肯離去的學生，有些被坦克車壓死，有些被衝鋒槍打死。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亦被掃平，但目前流傳兩種說法，一是被炮彈炸毀，一是被坦克推倒再壓碎。

現實新聞的坦克鎮壓、血泊、受傷的人民、屍體，充塞着電視畫面。在沒有法律保障、自由人權的社會，一切赤裸裸地還原至弱肉強食的原始規則：擁有軍隊，便擁有權力，令到香港市民的內心埋下了對坦克鎮壓的恐懼陰霾，詹明信（Jameson, 1981）所謂的深層意識的壓制便透過這些不斷運用的符號反映到香港電影之中。在此段期間，提及「六四事件」的香港電影中，坦克與人民力量對峙的場面更構成了一種反複母題（leitmotif），《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裏坦克與救護車相撞，《喋血街頭》和《安樂戰場》中坦克對平民的鎮壓，《愛人同志》中阿祖（劉德華飾）在街頭看到爭取民主自由的越南市民和坦克對峙等場面，都在暗指這種壓制的關係。

攝影機推軌運動和俯拍、仰拍角度

電影語言（film language）包含着攝影機的運動和角度，運動的方向和拍攝角度都具有一定的涵意，例如俯拍表示一種貶低

被攝物的意思，仰拍使被攝客體帶有一種威脅的感覺，推軌鏡頭（dolly shot, tracking shot）產生動感，當攝影機推前，有壓迫感，拉後，有舒緩感，特寫（close-up）強調了畫面被攝物的重要性，遠鏡強調了人和環境的關係。水平鏡頭（eye-level shot）代表平等，傾斜角度象徵某種心理效果等，香港導演也運用這些電影語言技巧來表達他們對武力鎮壓的看法。例如《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中，當喪邦和周英傑交易，突然，喪邦出賣了民、Mark和傑，三人被迫和喪邦的軍人槍戰，此時，民和Mark第一次自己拿起槍來，掌握到真正的武器，和喪邦軍隊激戰，三人的武力不敵喪邦，喪邦正準備槍殺他們時，此時，突然，出現了坦克的特寫（俯拍，鏡頭1及仰拍，鏡頭2），後來，坦克的槍頭瞄準喪邦和其手下軍隊的全景（俯拍，鏡頭3a及3b）。

鏡頭	內容
鏡頭1	喪邦回頭，神情恐懼（俯拍）。
鏡頭2	一輛坦克面向鏡頭（仰拍）。
鏡頭3a	槍頭瞄準着喪邦（俯拍）。
鏡頭3b	槍頭慢慢地逼近（俯拍）。

這種電影的拍攝手法，帶有意識形態的建構意義，因為，坦克的槍頭（男性性器官的象徵）可以象徵父權（共產黨的權力），並以仰拍鏡頭2及俯拍鏡頭3的方法，在電影機制（cinema apparatus）中，隱藏着意識形態的運作（代表一種壓迫感，並置於鏡頭的正中和前方），坦克的火力當然比機關槍厲害，所以，喪邦立刻放下槍械，失去了權力，而周英傑重新獲取權力。另一個重要的場面調度，在《英雄本色III之夕陽之歌》的敘事大災難中，民被喪邦駕駛的坦克所追擊，Mark以手榴彈炸毀了坦克，代表了軍力的威脅已經消失（鏡頭4至8），象徵了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軍力威脅和坦克鎮壓的陰霾得到暫時的消除。

鏡頭	內容
鏡頭4	坦克和醫護車相撞。
鏡頭5a	坦克和醫護車對峙。
鏡頭5b	坦克射毀醫護車。
鏡頭6	Mark以手榴彈炸毀了坦克。
鏡頭7	Mark和民抱着傑。
鏡頭8	坦克正在燒毀。

從鏡頭4中，以全俯鏡頭，看到醫護車（代表生命）和坦克（代表毀滅）相撞，顯示兩者衝突的關係，從遠景以平視角度，看到醫護車被射毀（鏡頭5a微微地推前），緊接着一瞬間，醫護車就被炸毀了（鏡頭5b）。接着，以仰視角度拍攝坦克被手榴彈炸毀（鏡頭6），Mark和民抱着傑（鏡頭7，在鏡頭前方，被炸的坦克在後方），同樣地，以仰視角度拍攝坦克正在燒毀（鏡頭8），構成這種生命與死亡的二元建構的衝突關係。

主題蒙太奇

主題蒙太奇 (thematic montage) 的剪接是俄國導演謝爾蓋·艾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提倡的剪接法，剪接時不是因連戲而剪接，而是因其象徵的聯想產生了另一種意義而剪接 (Giannetti, 1996)。在《喋血街頭》裏，越南平民在越南大街和平示威，高叫：「不要戰爭，只要和平！」當中，一名越南青年以血肉之軀擋在坦克前，其影像和一名中國市民以血肉之軀擋着一列坦克前進極其相似 (圖片A)。

圖片	內容
圖片A	在北京市長安大街上，一名中國人王維林以血肉之軀擋一系列坦克前進。
鏡頭	內容
鏡頭9	阿B偶然看到街頭示威。
鏡頭10	一名示威者擋在坦克前。
鏡頭11	示威者高叫：「不要戰爭，只要和平！」
鏡頭12	示威者被軍人拘捕。
鏡頭13	示威者被軍人搥打。
鏡頭14	阿B感到非常憤慨。
鏡頭15	軍人向示威者開槍。
鏡頭16	示威者中槍，倒在坦克前。
鏡頭17	阿B震懾着，陷入回憶。
鏡頭18	昔日，香港「六七暴動」的片段（阿B的回憶）。

最後示威更演變成暴動，此景之後剪接阿B（梁朝偉飾）記憶中的1967年香港左派的「六七暴動」，以突顯兩者帶有關連性，都是極左思想的錯誤（鏡頭9至18），導演便是用一個主題蒙太奇的剪接場面來隱喻「六四事件」。

鏡頭10、11顯示一名示威者擋在坦克前，這個「電影中虛構」的場景和新聞圖片A王維林在天安門廣場擋着一列坦克車「真實的事件」極為相似，它們表達了吳宇森導演的政治批判，可是，耗資2千7百萬港元攝製的《喋血街頭》，上映17天後，卻只以8.55百萬港元的票房撤下銀幕。吳宇森感到英雄落寞，亦有人誤以為他是為了遷就西片市場而拍越戰背景的電影，訪問中，吳宇森無奈地說（黃曉紅，2004，188-190頁）：

我並不是為了遷就西片市場而去拍越戰，事實上在電影中我傳遞着很強烈的訊息，就是利用越南來影射現在（80至90年代）和未來的香港，可以說是借昔喻今。60年代我們曾經擁有過美好的東西，現在彷彿都失落了。我把這些美好的過去重現，是想提醒人們應該重拾已被遺忘的那些價值觀、溫情和美德。同時告訴觀眾，戰爭只會令人扭曲、飄零。所以電影中我一直強調回家的盼望，不要再活在飄泊中。現在的香港，能移民的都移民，走不了的都抱着今宵有酒今宵醉的心態，極力麻醉自己，忘掉九七的陰影。我是借六七諷喻九七，可惜觀眾都不願去聽、不願去想。

《喋血街頭》的創作意圖帶有詹明信（Jameson, 1981）提及的「政治潛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的色彩，反映了集體潛藏的政治憂慮（political anxiety）。所以，當鏡頭15，軍人向示威者開槍後，便開始剪接，在鏡頭18中，1967年的「六七暴動」事件中香港警察和示威人士發生武力衝突，乃是集體歷史傷痕記憶的再呈現。影片以昔日香港發生的極左事件及陷共後的越南，影射1989年後「六四事件」後的香港，及想像1997年後的香港，結合了「政治現代主義」（political modernism）的「歷史」特色（Bordwell & Thompson, 1988），結果還是被鎮壓（和「六四事件」對應），如鏡頭15，軍人開槍，鏡頭16，示威者中槍，倒在坦克前。

《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鬪篇》其中一場戲講述洪興幫和東星幫互相廝殺，這場戲批判了「六四事件」的屠殺場面和其後遺症——中港關係決裂。在電影敘事中，以母子分離作為政治隱喻（political metaphor），因為，長久以來，中國都被文藝作品描寫為母親的角色（盧偉力，1999，64頁），而香港就像是失散多年、等待回家的兒子或尋母的兒子一樣，少年陳浩南（洪興幫）準備和東星幫廝殺之前，突然收到母親病重的消息，然後，他坐在大佬

B的小型貨車中，車中的收音機傳來「六四事件」的廣播，時間正值1989年6月4日中午，在電影中，收音機的廣播成為畫外音（over-sound），聲音非常微弱，音量非常低沉：

學生發覺之後，便立刻用兩部大巴士將南北兩邊的路口截住，又去廣場和長安大街，號召一些人去幫助堵截，在學生和群眾衝下底下，軍隊就被衝散……下午6、7時，大部分的軍隊就回到人民大會堂。

及後，陳浩南一眾和東星幫在地盤工場大廝殺，影片以主題蒙太奇的手法，把幫會大廝殺和「六四鎮壓」的畫面剪接，此時，影片已不僅是一部以古惑仔為題材的電影，而帶有了強烈的政治批判，創作人還透過疊印在地上血泊上的疊印字幕（overlapping title）直接地告訴觀眾（鏡頭19及20），突出導演的看法：

有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流血！
有人為了個人理想而流血！
也有人不知為了什麼而流血！

鏡頭	內容
鏡頭19	血泊上疊印着創作人的批判。
鏡頭20	眾青年垂死地躺在地上。

接着，電視新聞廣播報導員的聲音：「各位，自從昨晚10點鐘，中國軍隊開了第一槍，射殺阻擋他們入城的北京群眾同學生之後，到現在，死亡人數已增加到超過2,600人，這次是中共建國40年以來，中國政府第一次……」跟着，陳浩南闖進醫院，查詢母親的病房，護士正忙着，她抱怨陳浩南，反駁：「仲惡過楊尚昆！」

（比楊尚昆還壞！）後來，緊緊地接上坦克車進駛入天安門廣場的畫面，電視廣播：「北京戒嚴部隊在北京時間昨晚大約10點鐘，開始進入北京城，展開鎮壓行動」陳浩南始發現母親已死，他哭

成淚人。「六四事件」發生後，便緊緊接上陳浩南母親突然病死，其實，在敘事結構上（narrative structure），陳浩南母親的死在主要情節上起不了作用，因為這是一部黑幫鬥爭和報仇的電影而已，但母親之死，母子之間的永久分開，隱喻中國與香港血脈相連的關係，亦都因為「六四事件」而割裂了。所以，其敘事作用的象徵性，比情感作用為多。實際上，「六四事件」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大量的移民潮，單在1989年8月，估計人數便有4.2萬人，而1992年更是歷年之冠，高達6萬多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綜合統計組（一）甲，2003，20頁）。香港人對北京中共政府的疑慮本來就深，而中國在6月4日以武力鎮壓民運，香港人對前途的疑慮和不安更為加劇，對中國「一國兩制」承諾的信心可說徹底幻滅了。

《舞牛》是另一部涉及「六四事件」的劇情片，它的批判雖帶點突兀，但卻也不含糊。整體上是齣偏重對白的電影，風格比較平實，只是在結局中以香港中環街頭作為政治表述的空間，藉由一齣象徵性的街頭舞劇，批判「六四事件」。《舞牛》故事講述許菁菁（繆騫人飾）和牛品超（黃秋生飾）為一對情侶，共同為舞蹈理想而奮鬥。後來，二人分手，牛品超退出了舞壇，但「六四事件」的發生，重燃起牛品超以舞蹈對政治作出批判，牛品超和阿靜（陳令智飾）一起看着「六四事件」的電視新聞。

阿靜（傷心地）：「一個政府怎可以這樣的？這樣對付學生，你一定要做些事！」

牛品超：「我能做什麼？」

阿靜：「就做你擅長的吧！」

牛品超：「待孩子出生再算吧！」

阿靜：「我沒有事的，我不想孩子將來沒希望！」

△電視新聞播着中國人擋着坦克的畫面。

以上的對白中，最重要為阿靜所說：「我不想孩子將來沒希望！」，顯示了她把學生（中國民主的希望）和自身的懷孕聯繫起

來，她亦希望將來的孩子能夠活在民主社會中。後來，牛品超和舞蹈團成員在中環一起表演街頭舞劇，在公共空間上，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抗議中共政權的武器。舞劇表演充滿了象徵意義，象徵中國國旗的紅布飄蓋十多名緊緊地握着拳頭的學生（鏡頭22），代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決心，然後，身穿着解放軍服的牛品超步進紅布中（鏡頭23），他目無表情，腳踐踏在紅布上（鏡頭24），畫外音響出：「民主不死！自由萬歲！」與此同時，許菁菁和一群舞蹈工作者一起示威，高喊着口號：「人民萬歲！血債血償！反對暴力鎮壓！民主不死！民主萬歲！人民萬歲！民主不死！暴政必亡！自由萬歲！……」接着遊行隊伍的口號聲響遍了平靜的大澳（鏡頭25），平行剪接不便遊行的阿靜正在痛苦地生產（鏡頭26）。

鏡頭	內容
鏡頭21	眾舞蹈員飾演學生。
鏡頭22	紅布蓋過了他們。
鏡頭23	解放軍（牛品超飾）踏進。
鏡頭24	以腳踐踏在紅布下的學生。以腳踐踏在紅布下的學生。
鏡頭25	眾舞蹈員在街頭示威。
鏡頭26	阿靜正在生產。

從鏡頭24中，反對暴力鎮壓的牛品超飾演解放軍士兵（他者的象徵），腳踏在紅布上，其象徵性的影像相當明顯。在《舞牛》中，牛品超本來選擇不問政事，歸隱在遠離塵囂的香港大澳去過平淡、安穩的教舞生活，但「六四事件」的衝激，重燃了他久被冷封的理想，他再次以街頭舞劇，表現了藝術家應有的社會責任，和藝術不應是政治犧牲品的精神。此時，舞蹈已不單純是身體動作韻律的美學形式，已超脫、升華成為批判政治的利器，就此看來，《舞牛》這部電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而且，從阿靜（導演的立場）眼中，民主不死，下一代才有希望，影片的結尾，以滿懷民主理想的學生的死亡（鏡頭4.24）和嬰兒的誕生（鏡頭26）作為主題蒙太奇，象徵了民主的火炬需要薪火相傳。

《鬼幹部》有一個明顯地作為政治批判的平行剪接場面，表達了「血魔」/「中共政權」就是「極左的恐怖思想」。被血魔牽引的「永靖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匾，殺死維護學生的黨員等（鏡頭27至38）。如鏡頭28以慢鏡拍攝維護學生的黨員正在離開，並運用聲效暗示不妙的事情將會發生；鏡頭29雷復鳴站在樓台前，仰拍，表達壓迫感；接着鏡頭30血魔作祟用蒙太奇剪接，表現血魔在雷復鳴的思想中作祟，紅色代表中國共產黨鏡頭；鏡頭31以化裝技巧將雷復鳴的雙眼薰黑，用來象徵邪惡；鏡頭32牌匾飛落來代表虛假的政權，牌匾亦可作為殺人武器；鏡頭37維護學生的黨員的頭被割下落地，代表正義被毀滅等。

鏡頭	內容
鏡頭27	永靖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匾。
鏡頭28	維護學生的黨員（慢鏡拍攝）。
鏡頭29	雷復鳴站在樓台前。
鏡頭30	血魔作祟。
鏡頭31	雷復鳴被血魔附體，眼睛薰黑。
鏡頭32	牌匾被血魔魔力牽引。
鏡頭33	牌匾向下飛。
鏡頭34	牌匾越過雷復鳴身前。
鏡頭35	牌匾向黨員的頸部飛去。
鏡頭36	黨員的頭部被割下，跌落地上。
鏡頭37	黨員的頭落在牌匾上。
鏡頭38	雷復鳴薰黑的眼神（血魔附體的象徵）。

電影設計了「血魔」附體的情節，就像是藏於人們潛意識的深層壓抑，同時，帶有政治現代主義的「神話」（myth）的意味（Bordwell & Thompson, 1988）。如影片開首的旁白：「五千年來，中國未曾有過真正安定的日子，血魔作祟，附於有權勢者身上，歷

代暴君，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中，殺人無數，血河成流。歷代亦有無名天師犧牲自己去鎮伏，可惜，每隔若干年，血魔因戰亂或運動，無意中被解放，破土而出。」對於那種極強和專制的思想，《鬼幹部》最終還是持有非常悲觀的態度，在影片結局中，當梁國棟的兒子拜祭伯父林剛時，他突然指着天空，說：「天咁紅！係咪有嘢會出來呀？」〔天這麼紅！是不是有東西會出來啊？〕梁國棟和雷珊神情非常無奈和戒備，暗示血魔又再次出現，為害人間。

香港獨立電影及紀錄電影中的「六四事件」

除了在商業戲院放映的香港電影外，香港還有些較為小眾和非主流的獨立電影，這些製作可能出自民間的製作公司，也可能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拍攝或發行。在這裏主要討論劇情片，如：《香港皇家警察的最後一夜之命運交響曲》（劉成漢、張偉強聯合導演，2002），《憂憂愁愁的走了》（崔允信導，2001）及紀錄電影《沒有太陽的日子》（舒琪導，1990）等。

對於「六四事件」，《香港皇家警察的最後一夜之命運交響曲》及《憂憂愁愁的走了》均表達了「忘記是罪行」的意識。在「六四事件」的十年後，相信一些人心中那把民主的火焰已經熄滅不少，一些曾經熱燙的理想亦冷卻，理想的失落，迫使人回歸至現實生活的問題，選擇忘記，然而，這個世界上，仍然有少數人堅持平反「六四」，悼念死難者。《香港皇家警察的最後一夜之命運交響曲》正是彰顯這個「六四事件」的後遺症，故事講述交通警察華（梁鴻俊飾）和其女友阿芳（何珮頤飾）因政治意見不同而分離的故事。華已淡忘「六四事件」，平平淡淡地當上交通警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女友阿芳則仍未忘記「六四事件」的傷痕。某夜，在中環蘭桂芳的「六四Bar」中，阿芳彈着結他，突然，二胡樂師轉換調子奏出〈血染的風采〉，而阿芳也頓時感慨，唱起了這首民運和悼念「六四事件」的歌曲：

也許我的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告別，將不能回來，你是否還相信我化作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付出的愛。

電影的手法是歌曲敘事 (song narration)，透過歌詞中多次提及「死亡」的文字意象來悼念「六四」的死者，呼應「六四事件」；如「也許我的告別，將不再回來」、「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共和國的土壤裏有我們血染的風采」、「你是否還相信我化作了山脈」等。1989年4、5月中國大陸民運期間，許多學生絕食死諫的悲情，其文字風格亦有點相似，當時學生的〈絕食宣言〉(馬龍，1999) 中有這樣一段：

當我們挨着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
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
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更好地活着，
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
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
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
民主事業也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絕食宣言〉和〈血染的風采〉裏都有「你不要悲哀」，而「當我們告別生命時」與「也許我的告別」等亦非常類似，可見《香港皇家警察的最後一夜之命運響曲》希望藉〈血染的風采〉的歌曲敘事，召喚 (interpellated, hailed) (Althusser, 1970) 起人們已久被冷卻的民主理想 (如歌詞中「你是否還要永久的期待」、〈絕食宣言〉中「死亡」，「在期待着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而且，歌曲亦插入 (insert) 許多「六四事件」的紀錄片段，其中還包括了昔日阿華和阿芳一起示威和吶喊，兩人感情非常融洽的片段。後來，二人的感情亦因對「六四事件」的分歧而分手，阿芳更因「六四事件」的激盪，而放棄了中學會考，阿華認為在講求實際的香港，遊行示威和空談政治理想都是沒有作為的，因此便選擇忘記。

同樣地，在《憂憂愁愁的走了》中，內心隱藏着「六四事件」傷痕的女編輯Chris亦覺對民主追求的一切理想已淡化了。她於一間小報規模的雜誌社工作，雜誌以揭露私隱和緋聞來爭取銷路，她在「八九民運」期間雖然也曾有過理想的火焰，但彷彿間一切都熄滅於香港商業化的赤裸現實中了。電影裏有一場戲，雜誌女編輯Chris對男記者小康說了一段話：「89年時，我在北京念書，正好是「六四」發生那年，上去不久已有這件事發生，連收拾的時間也沒有便要回港了，但過了半年後，我很想回去探望我的朋友和同學，但回去後，那裏的環境和氣氛跟從前完全不同。」對話中，

插入 (insert) 了北京大學的宿舍走廊、三角地、告示牌和校園空地等。這些民運時的「聖地」依舊，但是火紅、喧騰的年代已經消逝了。

我們都知道「毋忘六四！跨越九七！迎接挑戰！戰鬥到底！」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的口號。對於爭取民主的人士來說，「六四事件」已過了十多年，下一代究竟選擇記憶或是忘記是極度重要的問題，在「六四事件」發生十多年後，獨立製片的《愁》和《香》都刻意勾起了人們久被埋藏在心中的理想和沉痛傷痕的集體記憶。

《沒有太陽的日子》以16毫米菲林拍攝而成，是一部結合象徵風格的舞劇和紀錄電影，運用了大量的訪問和「六四事件」新聞片段，導演舒琪原本的題材是移居中國大陸的台灣歌手候德健，可是卻遇上「六四事件」，於是他改變了計劃，紀錄「六四事件」對香港人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感受。影片開始便是學運領袖柴玲的旁白：「今天是公元1989年6月8號，下午4時，我是柴玲」，強調了影片的時間紀實效果，然後，舞台上出現了一名女舞蹈家在跳舞，以男聲（舒琪導演）作為旁白：

中國，一個殺死自己兒子的父親，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個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幾千年，我的雙乳，變成了自己的墳墓，全身長滿了像霉菌一樣的苔蘚，這一首是貼在89年5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一首詩，題目叫做「瘋女人」，作者是個學生，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直到今日，我仍然在想，她在哪裏，是否死了！就像無數的冤魂一樣，在那恐怖的晚上，死在槍口和戰車之下，如果她仍然生存的話，會在那裏，在一個密不透風的監獄中，忍受着酷刑？還是在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孤獨地流浪？又或者在你和我身邊，忍氣吞聲地過活？我想知道答案，把它紀錄下來，用我的攝影機。

導演開宗明義地表明：(1) 自己是影片的作者，他的聲音出現在影片中，直接地表明自己是發言人，頗有法國新浪潮的作者風格 (auteur style)；(2) 強調以攝影機作為紀錄真實/真相的工具，反對虛假，帶有電影的真實性。接着，影片訪問了不同的人士，包括詩人多多、電影導演張堅庭和演員葉德嫻等，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重構了「六四事件」的發生過程，並和導演的旁白構成了對話。《沒有太陽的日子》直接地、明確地批判「六四事件」是一種鎮壓民主運動的專權和錯誤行為，電影還反證了為何要運用個人色彩濃烈的紀錄形式，因為，主流電影中的歷史書寫 (historical writing) 大部分是一種宏大的官方敘事 (grand official narration)，其實，亦可以是由個人所重構的，因此，必需要有一部以香港人的心情來記錄「六四事件」的紀錄電影。

香港紀錄電影亦對政治作出強烈的批判，小眾媒體在此擔當了捍衛民主、紀錄社運的任務，彌補了大眾媒體的虛構和不足。所以，小眾媒體可對大眾媒體所支配的意識形態作嚴肅的批判和深沉的反思，喚醒不知不覺的大多數民眾。大眾媒體以龐大的資金壟斷傳播，起着灌輸意識形態的作用，相對地，小眾媒體以個人有限的力量，揭示社會運動的真相，有助維護多元化，更開放的社會，彌補大眾媒體的虛假和不足。無論在質或量上，獨立製片都無法和主流的商業電影分庭抗禮，但它們的貢獻則是不容低估的！

傳媒亦是一種權力的關係，體現在資源、播放的覆蓋面等因素上，壟斷性的傳播很容易形成一種論述的霸權 (hegemony of discourse)，而犧牲或緘默了小眾傳媒、社群、族群的發言空間。雖然，紀錄電影一直並不是商業電影製作和發行的主流，放映空間異常狹窄，普遍觀眾亦未必明白紀錄電影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但是，其政治批判性卻比劇情電影強烈、直接和個人化，可是，由於缺乏明星效應和商業元素，所以，傳播的力量也相對地較為狹窄，多在香港藝術中心和電影節放映，雖然，亦能引起知識分子的關注和討論，可是，一般的觀眾對這種電影的興趣則是頗為冷淡的。

總結

在政治表述上，香港的主流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存着一定的差異。在題材上，商業電影比較傾向以重大事件或一個時段作背景，如《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和《愛人同志》中是動亂的越南，《勇闖天下》、《救命宣言》和《鬼幹部》中則是瘋狂的文革時代。在人物設計上，商業電影裏的主人翁大多是大陸新移民、大圈仔、黑幫人物、性工作者或大陸公安。商業電影必須面對廣大觀眾和電檢問題，因此政治訊息的傳遞亦遠較獨立電影間接和迂迴曲折，且電影類型亦多為娛樂性較強的喜劇和動作片。商業電影亦常投入大量的資金，故能拍攝如人群與坦克對抗的大場面，為了增加賣點或豐富場景的變化，商業電影也常遠赴外埠拍攝。另一邊廂，獨立電影受制於先天性資金不足的限制，故事多為劇情電影，甚至是短片，如《憂憂愁愁的走了》，製作格式以成本較輕的數碼錄像 (digital video) 為主，題材多關注個人的遭遇或對個別事件的紀錄，獨立電影缺乏類型包裝，但卻具導演個人的情懷和批判觀點。就電影手法和敘事風格而言，獨立電影要比商業電影更明確、更鮮明，根本上，去掉商業電影的曖昧和吞吞吐吐。這些影片的娛樂性稍欠，然而卻令觀眾反思。有了這些數量不多但卻難能可貴的獨立製片，一些極具保存價值的紀錄電影留傳下來了，《沒有太陽的日子》表述「六四事件」是代表作！

對「六四事件」鎮壓的批判，香港電影強調對坦克軍力威脅的消除，至「六四事件」後，香港電影則以陰魂不散的借昔諷今，這顯示了香港電影已嘗試結合娛樂元素、批判及諷刺政治的功能，回應了時代的需要。商業電影並非完全是「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或「純粹幻覺」(mere illusion) 的再製機器，反之，藉由類型電影的政治化，試圖隱藏政治表述。不過，香港電影的政治表述大部分是硬加進電影裏去的，顯示在過渡時期的香港電影亦甚具有後現代主義的特色，既帶有拼湊 (bricolage)、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和混雜 (hybridity) 的風格 (Barker, 2003; Foucault, 1990)，亦顯示了某程度的精神分裂狀態。因為，在

後現代的語境底下，混雜的元素彼此交錯，本土與國際文化（glocalization）、新儒家思想和西方消費主義、殖民地剩餘遺產（colonial heritage）和傳統文化交雜（傳統建築和殖民地建築、華洋社群共處、中英語言混用）等，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狀態。而且，高度資本主義下，資訊轉換極快，人的感情亦變化極速，喜怒哀樂無常，反映在香港電影中，成為極不一致的風格，不同的元素和類型都混雜在一起，這一切解釋了為何政治表述竟會存在於不同的類型電影中，借用史葛（Scott, 2000）、克莉絲汀·湯普森與大衛·鮑威爾（1988）對政治電影的概念，香港電影的政治表述是一種在眾多類型電影中簡單化再製香港政治的能指（Hong Kong cinema as the signifier of the simplified Hong Kong politics in many genres of movie-making.）。但同時，也產生了電影類型分類的曖昧，甚至解讀上的困難。在香港電影中，呈現後現代電影風格（postmodern film style），帶有反智、仿諷、戲謔、憤怒、激動、批判、情緒波動的成分，這在表述「六四事件」議題上也就似乎非常恰當。

參考書目

- 何思穎、何慧玲（編）（2002）。《劍嘯江湖——徐克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 吳昊（2003）。《香港電視史話》。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 卓伯棠（2003）。《香港電影新浪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綜合統計組（一）甲（2003）。《香港的發展（1967—2002）——統計圖表集》。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徐中約（2001）。《中國近代史》（上、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馬龍（1999）。《血染的歷史》。香港：世紀文化有限公司。
- 黃曉紅（2004）。《吳宇森——從獅子山到好萊塢》。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 盧偉力（1999）。〈失母的孩子，失家的成人——許鞍華研究〉，《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年後的回顧》（第廿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香港臨時市政局，61頁。

- Althusser, L. (1970).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en Brewster, Tran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en Brewster, Tran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Barker, C.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ordwell, D. & Thompson, K. (1988). *Film History—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 San Francisco: McGraw-Hill Inc.
- Foucault, M.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iannette, L. D. (1996). *Understanding Movies*. Prentice Hall.
-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I. (2000). *American Politics in Hollywood Fil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Thrall, W. F. & Hibbard, A. (1960).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Odyssey Press.

第十三章

《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 表述的「天安門屠殺」

象徵鬥爭、文化適應與普世價值

羅金義

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導論——西方媒體也被「他者化」？

英國廣播公司國際台2008年對全球21個國家進行民意調查（包括中國），認為中國對世界有負面影響的受訪者，約佔40%，比2007年增加7%，對中國主要持正面態度的國家數目也下跌了60%，從地域看，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國、日本、菲律賓、土耳其和埃及對中國的看法都有大幅惡化趨勢，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佔52%，情況「穩定」。^[1]

有關國家形象，內地學者最近的提法是：

「我們曾經習慣地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並沒有錯，而且也的確代表着一種珍視自身傳統、價值和選擇的形象、精神和風格。但是，我們或許

可以進一步說：走自己的路，並且告訴世界，中國所選擇的道路不僅不會帶來一些國家所渲染的『中國威脅』，相反，這樣的道路將進一步帶來中國的繁榮與發展，同樣會進一步促進全人類的和平與福祉。」

（劉明，2007：結束語）

從《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到最近的《中國不高興》，看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遠未演變到劉明所期望的那種豁達境界。反之，近年來國家善用舊「帝國主義者」的批評作為團結國民對「敵」的工具，卻甚為成功——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國民對官方宣傳信心大失，但西方媒體批評中國的氣焰反而令國民對官方的愛國主義宣傳開始受落，對西方「列強」的批評少了容忍（Zhao, 1998: 300），愈來愈懷疑西方媒體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受眾不能正確感知和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媒體偏見將中國「他者化」了（陳靜，2008）。

溝通了解從來都是雙向的事情吧？當國民埋怨西方媒體「他者化」中國的同時，中國又真能正確感知和了解西方「列強」嗎？如果「八九北京學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方最為敏感的、最難尋求妥協的議題之一，以此為個案，我們能否從中探究到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感知和了解有什麼誤差？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批評是否合理，未必從一開始就是爭論的重心，反而當鬥爭的心態瀰漫着雙方溝通的氛圍之中，甚至被受利用，「正確感知和了解」實在談何容易。

既然要探究的是西方「列強」的主流媒體，這個小習作選擇了美國的《紐約時報》與英國的《泰晤士報》作為抽樣源。《紐約時報》作為西方主流媒體的「霸主」，地位毋庸置疑，《大英百科全書》稱譽《紐約時報》為美國最重要的報紙，亦是影響世界的刊物。^[2] 倫敦城市大學新聞及出版學系主任Adrian Monck認為《紐約時報》在傳媒界的影響力，不單止於是美國主流的傳播媒體，往往代表了整體報業，乃至美國老百姓的觀點；一些媒體甚至會自覺推測《紐約時報》的觀點，從而斟酌釐定自身的新聞報導取

向 (Monck, 2008: 97)。《紐約時報》的觀點和意識早已滲透在美國的傳媒，乃至普羅大眾的文化生活中，不少專業新聞工作者可能一方面對《紐約時報》的報導有諸多不滿，但依然堅持每天也要翻閱 (Proctor, 2000: 11-14)。研究美國傳媒有關中國新聞報導的取態，《紐約時報》向來都是最熱門的對象 (例如Pan, 2008)，當中甚至包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劉康 (2006: 第19章)。為免流於過分「美國中心」，這裏再加上《泰晤士報》——連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陳力丹教授也稱許《泰晤士報》是「世界報紙的老大」 (2005)，相信合符資格與《紐約時報》並列為西方主流媒體的抽樣源。二十年來在兩份大報中提及「八九北京學運」的文章，不論着力輕重、篇幅長短、直接間接，加起來數以千計。作為一個小習作，又希望內容分析的基本材料更為精準，藉網絡檔案搜尋之便，這裏只選取在文章題目或開篇提要中提及「八九北京學運」的文章——這方法基本上依循新聞學的一個專業知識：「新聞的價值判斷，透過標題大小、詞語差別而具體化。也就是說，讀者是通過標題決定新聞價值，決定要不要閱讀內文，藉以了解外在世界，進而形成自己的意見。」 (戴定國, 2005: 36) 從事發後一年到2009年6月中旬，嘗盡認為可以連繫到「八九北京學運」的「關鍵詞」，兩報共約272篇入選，^[3] 我們將之分編入11個主題，每個主題下的文章分布非常參差。^[4]

國人埋怨西方「列強」主流媒體的偏見將中國「他者化」，雖然題目繁多，但未嘗不可總結為這幾大項：(1) 西方認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種模式 (謝曉光, 2008)，而看不到長期以來它們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民主而已 (范煒烽, 2006)，並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張維為, 2009)。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體，如果照搬，中國必將大亂 (劉瑞常, 2007)，連駐英大使傅瑩也「警告」世人勿以西方民主要求中國 (《文匯報》，2008)。以此推演，西方傳媒在表述「八九北京學運」時，也不過是「大規模的激進的」重演這種強加西方民主模式給中國的把戲。(2) 中國與西方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傳

統，是氣質迥異的兩種文明，中國如何能夠接受源於西方的價值，尤其是好些政治文明的內容呢（叢日雲，2008）？西方媒體偏愛挑剔西藏、法輪功之類的問題，用的是民族自決觀和宗教自由觀之類的西方政治文明，還將之連繫到「八九北京學運」，「把中國政府推上國際輿論的『道德審判席』」，「八九北京學運」是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敘述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劉康，2000）。

（3）西方「列強」主流媒體不見得秉持新聞專業的公正方針，其實是政府借傳媒來推進自己的外交設想，傳媒也為政府的既定方針充當代言人，這方面美國媒體是劣跡斑斑（劉乃京，2001），以此推演，它們在表述「八九北京學運」時，也不過是為政府的外交舉措搖旗吶喊吧？本文嘗試探討國人對西方的埋怨，有多少建基於對西方的「正確感知和了解」之上。

必也正名乎

「六四」、「六四事件」是華人新聞媒體（中國大陸以外）最常用於稱呼那個舉世震驚的晚上，一個日子，不及其餘，「中立」得很；至於對整個運動的命名，從最親中南海政權的「動亂」、「反革命」到比較「中立」的「風波」都有。英美新聞媒體對那個晚上和整個運動的最基本定義，表述清楚簡單得多（見圖13.1）：在《紐約時報》的118篇文章當中，近四成直稱「天安門廣場屠殺」，兩成半稱整個過程為「1989民主運動/示威」，其他的多是取態相近的提法。「六四」、「六四事件」僅只各自出現過一兩次，出現次數最多的所謂「中立」用詞是「天安門抗議」，曾用過十次，不及總數的9%。《泰晤士報》的表述與《紐約時報》相近，清晰明白：154篇文章當中，同樣直稱「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有43%，其他也是取態相近的提法；沒有一篇用「六四」或者「六四事件」，出現次數最多的所謂「中立」用詞是「天安門廣場抗議」，只用過六次，只及總數的5%；這類「中立」用詞的總和不及總篇數的五分之一。比起絕大部分華文傳媒，兩大報章透過對事件的命名去定義，沒有什麼忌諱，取態清晰直接。

強加民主還是譴責殺戮追悼無辜？

仔細觀察對關鍵詞的分析結果，有幾點值得一談：首先，藉天安門之變，西方傳媒批評的最主要着力點，是不是數落中國政治體制並未與西方趨同，乘機將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高高在上地強加於中國呢？實情未必如此——從關鍵詞看，《紐約時報》超過六成的文章以譴責政權的殺戮鎮壓行為為着力點，數量是強調那是一個民主運動的文章的兩倍有多。《泰晤士報》的取態相似，六成半的文章以譴責政權的殺戮鎮壓為着力點，數量是強調那是一個民主運動的文章的三倍多。在不少年份裏（《紐約時報》有五年，《泰晤士報》有七年），只有文章以批評殺戮鎮壓為着力點而沒有文章以民主運動為着力點。除了1991年的《紐約時報》外，在同一年當中，譴責政權的殺戮鎮壓的文章數量總是比強調那是一個民主運動的為多，表述的一貫性極高。如果中國論者埋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政體，西方傳媒卻老是際此作為與中國進行象徵鬥爭的命題，那麼，政權不應該殺戮鎮壓無槍無炮的示威學生，總算是普世價值吧？在「八九北京學運」這個案看來，西方傳媒兩大龍頭報章關心的看來是後者遠多於前者——這會不會也是西方文明對它最基本的歷史定義？至少史學大師 Timothy Brook 是這樣（悲觀地）認為，「天安門廣場屠殺」是20世紀人類凶殘（barbarity）的又一慘例，卻不奢望它能改變中國的權力狀態和性情（Brook, 1998: 3-4）。中國論者以為西方最熱衷於利用「八九北京學運」來強加西式自由民主模式於中國，是不正確地感知和了解西方傳媒的歷史立場了——姑勿論這種誤解是有意也好無意也好。

逢迎政權還是專業新聞？

透過國際新聞，美英兩大報章在為政權的外交舉措服務嗎？這種批評其實並非源出中國，西方新聞學者早有研究認為，美國的新聞媒體常被白宮的外交政策、行為牽着走（O' Hefferman,

1993; Spitzer, 1993)，即使不是流於為權貴敲邊鼓，至少也顯示了新聞媒體沒法突破白宮外交政策框框。例如50、60年代白宮對華採親蔣反共政策，美國主流新聞媒體自是配合，國民政府被視為遠東最重要的反共先鋒自由鬥士，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白宮開始轉向與北京修好，蔣家王朝的腐敗專制即躍然於美國報章紙上（朱立，1997：5）。

然而，以「天安門屠殺」為個案去考察，再次去控訴新聞媒體的那種不濟，論據不算有力（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這類事例），反而有更多論據證明它們更多地站在專業新聞的方向上（見圖13.2，下同）。例如，1998年，在中美最高領導人互訪的推動力之下，雙方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友好狀態，但這一年也正是多年來《紐約時報》提及「天安門廣場屠殺」最多的其中一次，主要關心中國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公平審訊和獲知真相的基本人權狀況仍然未如理想；當中確有文章為克林頓總統訪華「送行」，但數量還是比上述一類少得多。1999年正值事件10周年，相關文章的數量是1991年以來最多的，由於事件真相還未大白，絕大部分文章都是關心中國人民始終未能獲知真相和享有新聞自由。年中發生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將「天安門廣場屠殺」連繫到這宗外交爭議的，僅只一篇——以十年來「天安門廣場屠殺」真相依然諱莫如深，諷刺中國使館被炸原因只有北京心知肚明（*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9）。反觀2001年4月中美關係因海南軍機相撞事件陷入糾紛，《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劉康指斥「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達到新的高潮」（劉康，2006：255），但最易於借用來「妖魔化」中國的「天安門廣場屠殺」，在2001年4月後的《紐約時報》只有一篇，因應事件12周年之期，回顧批評當年老布殊總統的對華政策失敗，跟軍機相撞事件無關（*The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1）。

倫敦是「八九北京學運」之後西方「列強」中最早跟中國復交的政府，主要因為要理順香港回歸及其過渡期的安排。從事發約一年後倫敦外交部高層開始訪問北京，1991年春外相訪華，到首相馬卓安在9月訪京，兩年相關的文章有62篇，是近20年的總數的40%；關於外交及香港問題的文章確是比較多，共22篇，但還是

遠少於佔總數近一半的人權文章。22篇文章當中，沒有一篇不是以否定、譴責的用詞為當晚的慘劇命名，「天安門廣場屠殺」是最常用的。在10篇關於外交的文章當中，一半都是諷刺、質疑馬卓安政府及其他西方強國對華的姑息政策，有關香港的文章，自然地大部分是表述事件如何令香港人心惶惶。在一些有關人權的文章裏，都有提及馬卓安政府的對華政策，初期是諷刺他在公開譴責天安門廣場殺戮僅僅兩年之後就回頭跟北京和好，及後是讚賞他會見李鵬時敢於挑戰中國的人權問題，以及全球民主運動浩浩蕩蕩，警告中國領導者世人是不會忘記兩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屠殺的（*The Times*, September 3 & 4, 1991），等等。要說《泰晤士報》真的有同情當時倫敦的對華緩和態度，似乎僅兩篇而已（*The Times*, July 24, 1990）。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中英兩國的外交氣氛總算緩和，但《泰晤士報》似乎未有為此贈興，當年三篇提及「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文章，分別報導江澤民主席和遲浩田國防部長在訪問美國時拒絕為暴力鎮壓道歉，後者甚至否認事件中有人死亡（*The Times*, November 4, 1997; January 27, 1997），以及「國殤之柱」送達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展出以悼念「天安門廣場屠殺」（*The Times*, June 4, 1997）。陳力丹教授稱許《泰晤士報》會依自己的價值觀來表達分析觀點而不為迎合公眾，遠至華人社會亦看重其取態（2005），本個案的分析跟陳對《泰晤士報》的評價基本上吻合。

「妖魔化」中國的聚光燈？

中國論者認為，為了「把中國政府推上國際輿論的『道德審判席』」，西方媒體偏愛挑剔西藏、法輪功之類的問題，用西方的政治文明觀將之連繫到「天安門廣場屠殺」去提出批判，令「八九北京學運」作為「妖魔化」中國的聚光燈。按本文的選材方法，以題目和篇首提要為依歸，有關法輪功和西藏問題連繫到「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文章，近20年來在兩份大報中各自只有三至五篇，是各大分類中數量最少的其中一類。這跟劉康等的理解很不一樣。西藏問題長期困擾中國，落為西方批評中國的「口實」，但兩報分別

將之連繫到「天安門廣場屠殺」各只有兩次；2008年西藏的社會秩序浪潮再起，《紐約時報》甚至沒有一篇文章作這種連繫。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抗議發生在1999年4月，《紐約時報》只有一次將之連繫到「天安門廣場屠殺」，《泰晤士報》甚至一篇也沒有；此後法輪功學員奔走四方，十年來抗議不絕，相似的連繫性文章在兩報只有兩三篇。

京奧作為中國最大的面子工程，^[5]也有不少論者斷言西方媒體會藉機「負面化」中國，但到頭來「八九北京學運」不見得大派用場。從90年代初申辦千禧奧運到舉行2008京奧的十數年，跟「八九北京學運」的連繫性文章只有五篇，當中只有一篇出現在京奧期間（*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08）。台灣問題被視為西方媒體用以「妖魔化」中國的另一個常用的設定議題（劉康，2006：255），但自從「六四屠殺」一周年前夕的一篇之外（*The Times*, May 19, 1990），近20年來絕無僅有。

反而與軍事相關的連繫性文章還比那些關於文明、道德的議題稍多，關心中國國家形象的論者也常埋怨西方無理地誇大「中國威脅論」（劉明，2007：；劉康，2006：253-4）。但所謂「稍多」，兩報的總數也不過是九篇，比近20年來11個主題的平均篇數（近28篇）少得多。這些文章有誇大地渲染「中國威脅論」嗎？最早的一篇是關於南方的解放軍將領可能有份協助「八九北京學運」的領袖逃亡（*The Times*, May 21, 1990），近20年後這報導得到「黃雀行動」的總指揮陳達鈺清楚證實（文灼非，2009）。1990年《泰晤士報》報導解放軍軍區調戍，消息認為是跟前一年的「天安門廣場屠殺」有關（*The Times*, June 20, 1990），十年後學者的嚴謹探究發現，即使解放軍將領當中有人天良未泯，或曾令他們對1989年執行鎮壓有所猶疑，但黨的生存和鄧小平的威權還是高於個人良知，而鄧小平也非常成功地阻截了解改軍將領們組織非官方橫向協調網絡，防止鎮壓前後出現軍變的可能（Kou, 2000），這研究支持了《泰晤士報》的報導並非捕風捉影。此後多年，解放軍高級將領多次高調地否認當年軍隊曾執行殘忍鎮壓，又重申不排除對台動武（*The Times*, December 11, 1996）。從「八九北京學運」這個

案出發去理解，這些在在構成了西方輿論對解放軍威脅的疑慮揮之不去，合乎邏輯地對是否恢復對華出售武器提出異議，這能算是「妖魔化」中國嗎？

歸根究底，中國的人權問題才是兩大報章在報導或議論「八九北京學運」時最重要的議題，這一大主題在《紐約時報》佔文章總數超過一半，多於其他十個主題的文章數目的總和；在《泰晤士報》也佔文章總數接近49%，近20年來在兩報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報導「八九北京學運」而沒有相關於人權問題的文章，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十個主題。也許更重要的是，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報導或議論「八九北京學運」或「天安門廣場屠殺」，而不是借助「天安門廣場屠殺」的絕對悲劇性作為議題設定或敘述框架，以便渲染醜化中國的其他方面。舉例說，1998-99年的《紐約時報》有關「八九北京學運」的文章數量出現了一次高峰，文章多數是關心中國人和世人還未知道「天安門廣場屠殺」的真相，事件還未得到公正的調查，因涉案而被禁、被放逐者還未得到公平的審訊，中國人的新聞和言論自由還未有根本的落實。以「八九北京學運」為個案作條分縷析之後會發現，關心中國國家形象的論者對西方媒體的諸多埋怨和指斥，能夠有力站穩的並不多，只有人權一項確是屢遭西方媒體狠批。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從「八九北京學運」所演生出來的人權劣績，西方媒體到底是言之成理還是在「妖魔化」中國呢？

象徵鬥爭、文化適應還是普世價值？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太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趙紫陽，2009：6）

如果所謂將中國「他者化」、「妖魔化」，意思是指西方傳媒沒有正確感知和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誇張、以偏概全地將不大

相干的諸多事情硬套入預早設定的議程的敘述框架內處理，「八九北京學運」實在不見得是這套陰謀的工具之一。Pierre Bourdieu的「象徵鬥爭論」相信社會鬥爭是一種不斷競爭象徵權力的過程，爭取得到文化正當性，就能定義文化秩序以至社會秩序（Bourdieu, 1989）。假如中國不少論者都堅信「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旦夕都想着要強加西方民主模式在中國之上（張維為，2009），那麼，可能出乎意料之外，西方兩大報章並沒有借助「八九北京學運」來大玩這種命題的象徵鬥爭，其他被中國論者批評為常被利用的議題藉口，在兩大報章裏就更輕描淡寫了。要說它們確是在爭取某種文化正當性，定義某種文化秩序以至社會秩序，那只能說是一貫地對血腥鎮壓的譴責和追究，以及為涉案者訴求正義。

就當晚政府的鎮壓行徑持否定、譴責態度的命名長期一貫地被兩報應用，也長期一貫地作為再展現的主題，所謂「強加民主」反而變得次要，甚至有為數不算少的文章將「八九北京學運」連繫到黨國要人的新聞時，主要還是提醒讀者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屠殺」的角色。政權也好，不少重要的異見者也好，都為整個運動的定性爭辯不休：到底「天安門廣場屠殺」是否只是中共清肅黨內派系鬥爭的結果，而「八九北京學運」不過是表象而已（江迅，2009：32-3）？兩報反而不落宮廷鬥爭的俗套，比較集中關心對鎮壓的譴責，以及從而引伸出調查真相、公平審訊、新聞及言論自由等議題。哈佛大學的Stanley Lieberson透過對命名的定量研究去分析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動力（Lieberson, 1984），但從數量上看，所謂比較「中立」的命名數量太少，看不到有什麼模式存在。明顯地西方主流媒體沒有形成一種對「八九北京學運」較為「中立」的妥協，難以推論近20年西方因為什麼社會文化變遷在背後操弄着「中立」一類的命名而就事件的批判立場冷淡退卻。

中國政府對於「文化適應論」寄望甚殷——人類在面對環境變化，自會發展出不同種類的生存策略，生存心態（habitus）是一種已被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也是一種可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它強調的是一種無意識、近乎

本能的學習，所以要揚棄如「霸權」這樣的概念，多強調共謀、承認、誤認在建構社會秩序中的角色（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68；李廣均，2004: 23-4）——事實上，除了在中國各種媒體全方位地禁絕在公共話語上對「天安門廣場屠殺」的命名、定義、態度上跟官方有任何歧異的可能之外（Mackinnon, 2008），北京寄望以經濟增長的成就和尤關利益去中和持分者對事件的定性，這策略在內地頗見成效（香港政府領導班子和親建制精英對此取向更是馬首是瞻）。但這種共謀、承認、誤認對西方主流輿論看來並未生效（也不見得對香港民眾生效——見圖13.3）。2009年上半年美國國務卿、眾議院議長和財長先後訪華，態度客氣，馬上有內地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需求超過了中國對美國的需求」，「彰顯今日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肖榕，2009；李平，2009），素來對中國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來訪，甚至逾百人聚眾抗議、冷嘲熱諷一番。不過，不出一些資深的中國觀察家所預言（李平，2009），「天安門廣場屠殺」20周年當日，美國國務卿果然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要求撤查事件、公布真相、交代受害者情況（被殺、扣押、失蹤者……）、與「天安門母親」對話。靜觀內容，跟20年來西方兩大報章的焦點十分接近，也跟近年來有關「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探索中的第三條路有所契合——強調真相與復和的積極性高於制度民主轉型（Rotberg & Thompson, 2000）。以為「文化適應」會在西方對中國的感知上因為經濟原因而出現轉變，談何容易，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對西方的文明價值又有多少誤解？

民族主義對政權的利用價值不小，所以2009年1月底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時溫家寶總理會憤斥美國「唱衰」中國，2009年2月中出訪墨西哥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甚至用華人老百姓聽起來更「親切」的用語揶揄西方人「吃飽沒事幹」走來對中國指手劃腳，這些是多麼大快中國人民感情的話語。不過，中國官方都刻意阻截它們流入西方主流媒體，¹⁶¹ 掌權者是自欺欺人也好操弄民意也好，似乎他們也多麼的熱衷於象徵鬥爭的博弈。這種博弈在國內也在運行不絕——舉例說，1998年，在鄧小平逝世翌年，以及「八九北京學運」頭號通緝犯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在4月被放逐到美國

之後，江澤民趁北大百年校慶高調到訪，雖然跟學生高談闊論的是北大的愛國傳統，但江將自己置身於「天安門廣場屠殺」事外，嘗試跟知識分子和解的意圖是內行人都明白的（Fewsmith, 2008: 207-8）。至於嫻熟外務的西方人，就更不介意「靈活」關顧中國的面子，我們別「大喜過外」以為中國的富裕已經成功令致西方要就此作出「文化適應」而改變他們的文明價值——英國劍橋的地方法院可以因為日期「敏感」而更改原定在6月4日審訊向溫家寶總理擲鞋抗議的年青學者，^[7] 但最終年青學者還是被判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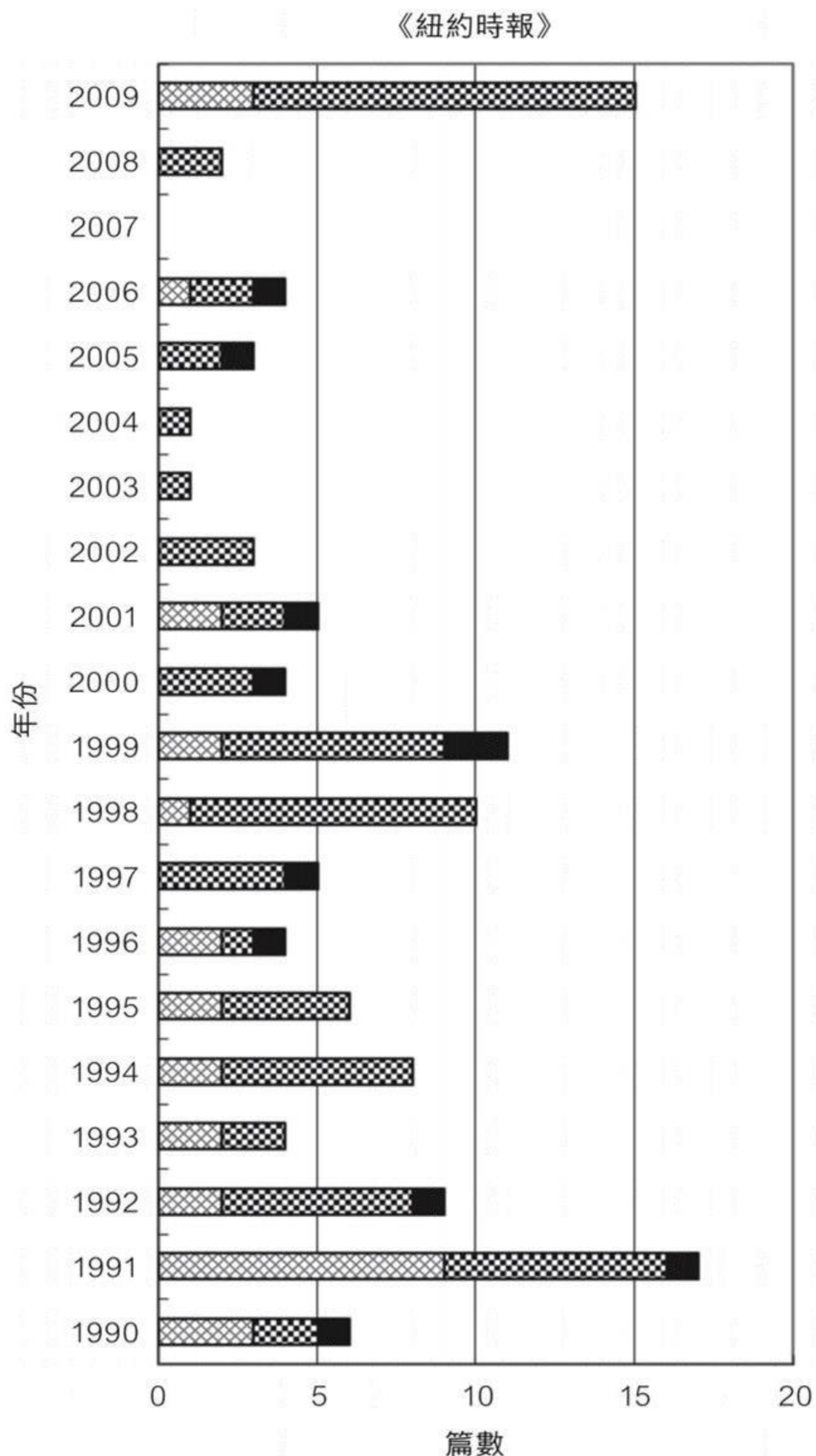
再者，西方傳媒的獨立價值取向，可能會對政府的外交行為產生壓力，在「八九北京學運」個案中明顯有跡可尋。上述1998-99年的《紐約時報》有關「八九北京學運」的報導頻率小高峰與克林頓總統訪華時對其人權狀況態度不失批判，跟1990-91年《泰晤士報》有關「八九北京學運」報導的取態與馬卓安首相訪華時挑戰中國人權問題，情況相似。2009年2月美國國務卿訪華時被西方主流傳媒批評對中國人權狀況態度迴避、軟弱（*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09; *The Times Online*, February 23, 2009），6月4日她發表強硬聲明時也不忘向這些傳媒的批評自辯回應一番。^[8] 批評西方傳媒在外交事務上未能善任「看家犬」的角色，甚或被政府牽着鼻子走，「八九北京學運」也許是個不大不小的反證——至少，兩者的關係從來不及中國的情況簡單（Harding, 1990: 166; Lee, 1990; 朱立, 1997）。

從20年代國民黨北伐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擔任《紐約時報》駐華通訊員十多年的Hallett Abend說，自1926年前赴遠東以來，覺得自己對事情的評價經常出錯，自勉應常常保持開放的專業態度，但追尋真理始終是令專業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原動力（French, 2009: 1）。90年代《華盛頓郵報》駐華的Steven Mufson也慨嘆，「天安門廣場鎮壓」對西方記者而言確是一個分水嶺：一方面，自此西方記者都太受事件的影響而令到他們對中國事態的

預測經常失準；另一方面，他們過去對中國光明、浪漫的憧憬，也覺醒到了盡頭（McGiffert, 2003: Chapter 9）。滄海桑田，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的氣焰容或高張，但他們對判斷事態背後的標準——對人類的關愛，福音的理想（鄭曦原，2003: 4），真的為了「妖魔化」中國而大大改變了？還是我們國家有些方面壓根兒就沒有大變？（羅金義，2009: 354）客觀的研究者沒有無視「八九學運」一些組織者的激進和不成熟，但是導致它悲劇性下場的許多結構性條件在中國並沒有因為改革而不再存在（趙鼎新，2009: 82），沒有獨立自由的政治、社會、媒體、司法等結構性條件去保障人權，學運能不論為激進和悲劇收場者幾稀（Wright, 2008）。

中國官方及大量論者批評西方的所謂「人權高於主權論」的爭議，並非這個小習作所能處理，但政權利益是否應該高於公平審訊權、獲知真相權、言論自由權和新聞自由權？這幾種人權在文明世界到底是否應該是普世價值？對於國人透過「八九北京學運」和其後的慘劇反思這些問題，比錯落在掌權者設定的話語博弈之中，意義更大。至於形象、面子成為國家大政，也不是中國獨有，2009年2月日本財務大臣中川昭一因為在七大工業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醉酒失儀貽笑國際，成為下台導火綫；當時的民主黨幹事長、現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批評他「鮮廉寡恥」，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無法估計，家庭主婦不滿他令國家形象在世人面前出醜。^[9]「面子」這種文化要素固然是廣泛蘊藏在儒家、東方文化圈的各個社會（劉燿，2004），但在「國家形象成為國家軟實力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大戰略性問題」的今天（劉明，2007: 編者的話），中國不似日本般以形象、面子作為慎己的承擔，卻更在意他者對自我形象的肯定還是否定，掌權者甚或藉此動員民氣，這也是值得向普世推廣的儒家價值的一部分嗎？^[10]近年來國家領導人在公開場合每愛引經據典，儒家《孟子》〈離婁上〉的「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願與國人互勉。

圖13.1 兩大報章對「八九北京學運」的表述——命名與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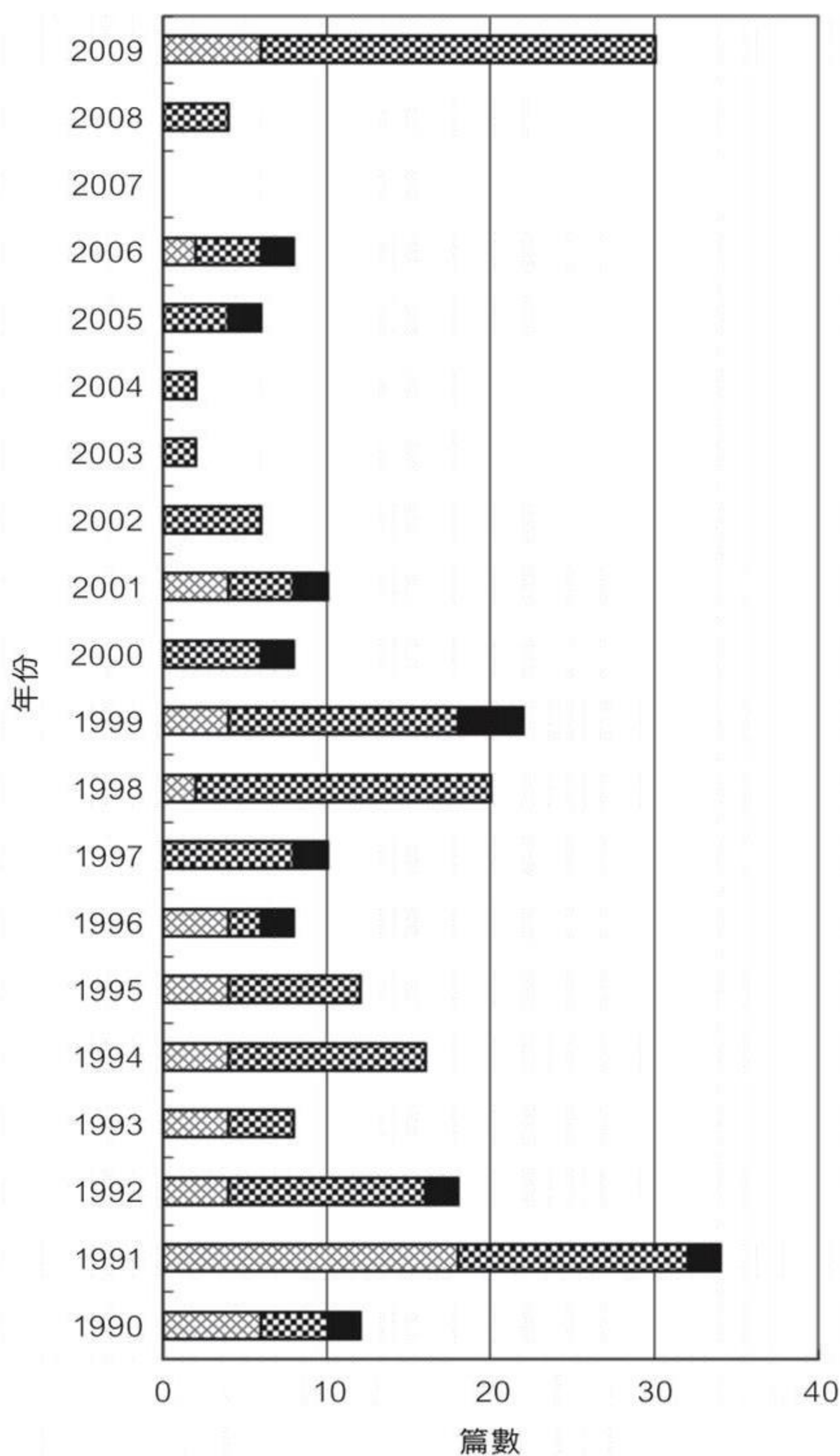


☒：對整個學生運動的命名持正面態度，包括：1989民主運動、爭取民主示威、學生起義。

☑：就當晚政府的行徑持否定、譴責態度的命名，包括：天安門廣場屠殺、天安門廣場殺戮、天安門廣場鎮壓、六四屠殺、1989屠殺、八九屠殺。

■：對當晚事件或整個運動比較「中立」的命名，包括：六四、六四事件、天安門抗議。

《泰晤士報》



- ☒ : 對整個學生運動的命名持正面態度，包括：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示威、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爭取民主抗議、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
- ▣ : 就當晚政府的行徑持否定、譴責態度的命名，包括：天安門廣場屠殺、天安門廣場殺戮、天安門廣場鎮壓、天安門屠殺、六四屠殺、1989屠殺、北京屠殺。
- : 對當晚事件或整個運動比較「中立」或對學生略帶批評語氣的命名，包括：天安門淌血、天安門廣場示威、1989學生抗議、天安門的鬼魂、天安門周年紀念、天安門敵對、天安門反叛、1989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抗議、天安門廣場挑釁、天安門廣場反抗。^[11]

圖13.2 兩大報章對「八九北京學運」的表述——主題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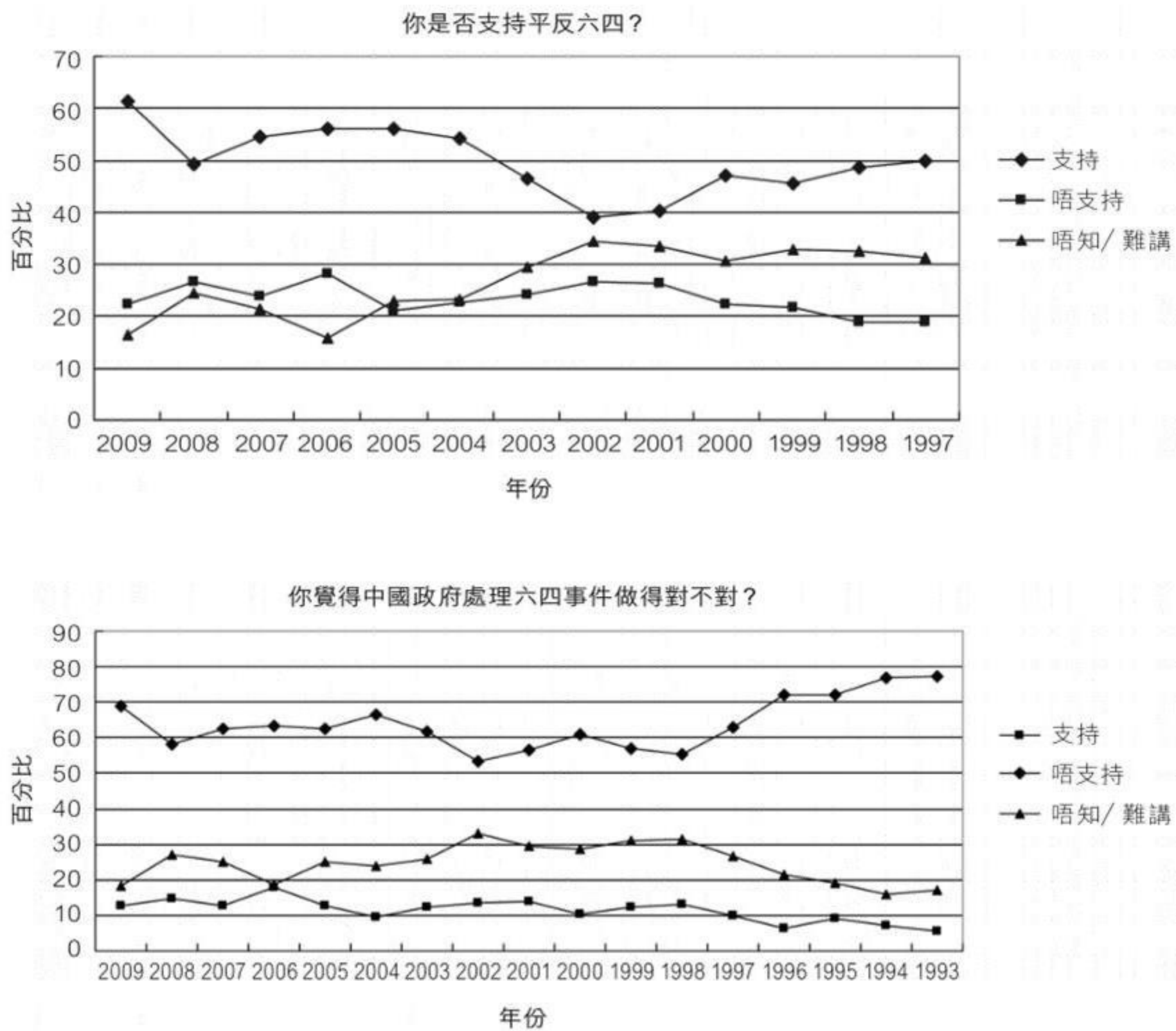
《紐約時報》

主題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總數
中國領袖		1	1					1				1				1	2		1		8
中國社會						1		1	1		2		2			1	1				9
經濟		2	1	1	1			1													6
法輪功										1		2									3
外交		3	2	1	1		1	1	2	1		1	1								14
香港	2	1					1	1												1	6
軍事			1						2							1					4
台灣問題																					0
西藏問題		1																		1	2
奧運												1							1		2
人權	4	10	3	2	6	5	2		5	9	2			1	1		1			13	64
公平審訊權	2	3	1	1	2		1							1	1		1			2	15
新聞自由		2			1	2	1		1	2	1								4		14
獲知真相權	1		1						1	6										6	15
言論自由	1	5	1	1	3	3			3	1	1									1	20
總數	6	18	8	4	8	6	4	5	10	11	4	5	3	1	1	3	4	0	2	15	118

《泰晤士報》

主題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總數
中國領袖	1	3	1	2	2	1	1	1					1	1	1	4					15
中國社會	1										1	1	1	1			1			1	6
中國經濟		1		1													2				4
法輪功																		1			1
外交	6	4	2	2	1	1	1								1						18
香港	5	7	1	2	4	1	2	2													24
軍事	2						1								1	1					5
奧運		1					1											1			3
台灣問題	1																				1
西藏問題			1																1		2
人權	10	20	4	1	2				2	1		2			4	2	5	2	3	17	75
言論自由	2	11	2	1	2				2	1		1			2	1	3		1	2	31
新聞自由	2	2	2													1	1	1	1	3	13
獲知真相權	6	1									1				2			1	1	12	24
公平審訊權																	1				7
總數	26	36	9	5	10	2	5	3	2	1	0	3	2	2	6	8	8	4	4	18	154

圖13.3 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態度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09）：〈六四事件最新調查〉，載《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瀏覽日期：2009年6月3日。

註釋

1. http://news.bbc.co.uk/go/pr/fr/-/chinese/simp/hi/newsid_7870000/newsid_7873600/7873676.stm，瀏覽日期：2009年2月6日。
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055543>，瀏覽日期：2009年2月20日。
3. 本文的探究主題是兩份報章對「八九北京學運」作為一個當代事件的再表述 (representation)，搜集內容分析的材料，宜於事件發生後待一個沉澱期，因此以1990年6月為抽樣的開始。而嚴格來說，還差一年左右才算是整整20年的考察。
4. 依循這裏的抽樣理念，做主題分類時，同一篇文章的內文如果涉及多於一個的主題，亦會依題目或開篇提要去斷定分類。假如以全文為基礎，將數以千計提及「八九北京學運」的文章作全面分析，結果也許會跟本文不盡相同，這是需向讀者交待的方法論特徵。分類主題的設計，參考了關心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論者 (朱立，1997；劉明，2007；劉康，2006，2000) 曾經列舉出西方媒體的中國報導的設定議題 (下詳)。本文用「八九北京學運」一詞，從趙鼎新教授的名著 (2007)。
5. 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的提法，《明報》，2008年8月13日，A01。
6. 前者的強烈話語，在西方的主要財經報章，例如 *Business Times*，都沒有出現；後者的提法被中國官方撤下的消息，可參考 www.dwn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2_14_8_49_35_627.html，瀏覽日期：2009年4月2日。
7.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uk_news/england/cambridgeshire/7987719.stm，瀏覽日期：2009年4月10日。
8. http://news.yahoo.com/s/ap/20090605/ap_on_go_ca_st_pe/us_us_china_tiananmen_4，瀏覽日期：2009年6月9日。
9. 《香港商報》，2009年2月17日，B05版；《太陽報》(香港)，2009年2月18日，A20。
10. 例如劉少航 (2008)。
11. provocation (挑釁)、revolt (反抗)、rebel (反叛)、confrontation (敵對) 等可以被理解為對行動者帶有批評意思的用詞，但在政治社會學的討論中也常被作中立用語，甚或對行動者略帶同情之意 (南方朔，1991)，筆者將之一併歸類為「中立」用語。而且，它們僅用於六篇文章，佔總數不過4%，相信對整體分析影響不大。

參考書目

- 文灼非 (2009)。〈「救共產黨必須堅持開放改革」——訪「黃雀行動」總指揮陳達鈺〉，《信報財經月刊》。387期。
- 《文匯報》(2008年10月2日)。〈駐英大使：勿以西方民主要求中國〉，<http://paper.wenweipo.com/2008/10/02/YO0810020011.htm>。瀏覽日期：2009年6月2日。
- 朱立 (1997)。〈《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背後〉，《信報財經月刊》(香港)，5月。
- 江迅 (2009)。〈六四大和解戴晴提南非模式引起迴響〉，《亞洲週刊》(香港)，3月15日。
- 李平 (2009)。〈美政要為什麼避談中國人權〉，《蘋果日報》(香港)，2009年5月28日。
- 李廣均 (2004)。《文化適應與象徵鬥爭——「名字/命名」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學富文化。
- 肖榕 (2009)。〈美國高官紮堆訪華的深層解讀〉，《北京青年報》，2009年6月7日。
- 南方朔 (1991)。《「反」的政治社會學：近代新反抗運動》。台北：久大文化。
- 范煒烽 (2006)。〈西方民主制的憂慮：兼論我國的政治改革取向〉，《蘭州學刊》。總149期。
- 陳力丹 (2005)。〈世界報紙的老大——《泰晤士報》〉，載《中華傳媒網》(學術網)，<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488>，瀏覽日期：2009年3月13日。
- 陳靜 (2008)。〈西方媒介精英：中國「他者化」呈現的根源〉，《社會科學戰線》。11期。
- 張維為 (2009)。〈一場關於民主的辯論〉，《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9-05/20/content_17806821.htm。瀏覽日期：2009年6月2日。
- 趙鼎新 (2007)。《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趙紫陽 (2009)。〈社會主義中國往何處去？〉，《信報財經月刊》。387期。
- 劉少航 (2001)。〈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潮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期。
- 劉乃京 (2001)。〈媒體全球化對外交的挑戰〉，《國際論壇》。3卷，3期。
- 劉明 (2007)。《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與傳播》。北京：外文出版社。
- 劉康 (2000)。〈國際傳播對中國報道的「話題設計」——兼論美國媒體對「法輪功」事件的報道〉，《國際新聞界》。11期。
- 劉康 (2006)。《文化·傳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劉熠 (2004)。〈論跨文化交際中的話語系統〉，《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卷,1期。
- 劉瑞常 (2007)。〈國人看世界：我見到的西方民主〉，《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6390097.html>，瀏覽日期：2009年6月2日。
- 謝曉光 (200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路徑分析〉，《學理論》。2期。
- 戴定國 (2005)。《新聞編輯與標題寫作》。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羅金義 (2009)。〈領導人形象——美國主流媒體「裝置」的標準〉。見羅金義、鄭宇碩編，《中國改革開放30年：變與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鄭曦原 (編)，李方惠等 (譯) (2003)。《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上、下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趙鼎新 (2009)。〈八九學運激進化論析〉，《二十一世紀》。總第113期。
- 叢日雲 (2008)。〈我們如何面對西方政治文明?〉，《中國政法大學學報》。6期。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et a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
- Brook, T. (1998).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J. (1992). "Official Reactions to Modern Art in China since the Beijing Massacre," *Pacific Affairs*, 65(3).
- Fewsmith, J. (2008).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nch, P. (2009).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H. (1990).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 Cas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C. C.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Y: The Guilford Press.
- Kim, J. & Nam, S. (1998). "The Concept and Dynamics of Face: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Asia," *Organization Science*, 9(4).
- Kou, C. (2000). "Why the Military Obeys the Party's Orders to Repress Popular Uprisings: The Chinese Military Crackdown of 1989," *Issues & Studies*, 36(6).
- Lee, C. (1990).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C. C.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Y: The Guilford Press.
- Lieberson, S. (1984). "What is in a Name? Some Sociolinguistic Pos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45.

- MacKinnon, R. (2008).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Blogs, Censorship and Civic Discourse in China," *Public Choice*, 134.
- McGiffert, C. (2003). *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The CSIS Press.
- Monck, A. (2008). *Can You Trust the Media?* Cambridge: Icon Books.
- O'Heffernan, P. (1993). "Mass Media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Mutual Exploitation Model of Media Influence in U.S. Policy," In R. J. Spitzer (Ed.),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CT: Praeger.
- Pan, P-L. (2008). "U.S. News Coverage of New Leaders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Agenda-setting Abilities of U.S. Newspapers and Governm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4(1).
- Proctor, W. (2000).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News Organization Shapes Your Mind and Values*.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 Rotberg, R. & Thompson, D. (Eds.) (2000). *Truth v. Justic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pitzer, R. J. (1993). "Defining the Media Link," In R. J. Spitzer (ed.),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CT: Praeger.
- Wright, T. (2008). "Student Movement in China and Taiwan," In K.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 (1998).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曾經組織過多種論文集，這一次要寫的〈編後記〉也許是最簡單的了——20年後還在為它組織論文集，行動本身已經沒有太多需要解釋的吧。

讓我談談書題。我們當然記得20年前的詩集《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組織本論文集時讀到《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老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八九學運十多年後王丹在散文集《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裏回想當年亡命天涯，隻身搭船從安徽赴南京，點起他自胡耀邦逝世以還投身學運的第一根菸，夜船上的廣播剛巧在報道公安部通緝令，頭號重犯正是自己，望着當下長江水天一色，天空晦暗，深心黯然，那夜也想必無星？他又回憶那位不顧獄方警告與他來往而被電棍擊打的囚友，面孔於他已經陌生，卻似曾相識，又素昧平生，但也清晰異常，不容逃避，在記憶中成為一顆流星——不思量，自難忘。

蕭條異地，大家都只能將希冀唏噓托負星星。在那種深不可測、忽明忽暗、若有似無的處境中，還能有多少選擇？20年過去，這種處境又有多大轉變？

衷心感謝十多位作者，或是第一身的見證或是第一手的研究或是第一流的論析。廿年人事幾番新，難得大家仍能下筆淋漓義無反顧，「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

本書各章都初成於2009年春，但由於種種原因，論文集未能在去年初夏配合20周年之期面世，情非得已，不無遺憾，謹此向讀者和耐心的作者們致歉。也衷心感謝出版社的專業支援和道德勇氣，編者兩位年青助理李瑞瑜和佘慧婷對諸多事務的後勤幫助。當年她們年紀還小，那場淒風苦雨想必在心田烙印不深，這是幸或不幸，難作定論。至於我們這一代，除了竭盡理智去回憶、回顧和前瞻，尚有此中能嘯傲：「你的臉貌我看得清楚，雖然那夜無星」。

羅金義

2010年4月

「天安門事件」距今已超過二十年，是中國當代劃時代的大事，也是對中共政權的一項重大挑戰，對以後中國改革的路向有深遠的影響。學術界及各方政經專家特別藉去年二十周年之際，為「六四」作出了一次總回顧，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剖析「六四事件」對中國政治的意義及影響。

本書共十三章，分為三部分，既前瞻了中國最近之民主及人權發展、政治經濟轉型，也回顧了關於「六四」之文化意蘊，以及探討了媒體及教育界如何看待「六四」。本書內容範疇廣闊，深入淺出，是研究「六四」問題一本不可多得的學術著作。對政商界、研究機構，以及對「中國事務」個別領域感興趣的廣大讀者而言，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隨時光的流逝，有關「六四」的著作越來越少。這本文集既是應時產物，也堪稱鳳毛麟角的佳品。……作者期望為「天安門事件」的見證盡一分力，為維護知識分子的風骨盡個人責任，這是紀念「六四事件」的高尚舉措。本書編者的出版精神——重視人的尊嚴、承擔社會良知和關懷國家民族——亦可圈可點。總而言之，本書不容錯過！

關信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作者討論這運動的多個方面，包括它對中國未來的含意，特別是民主的前景。……這是時候去想想這段期間中國和世界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從這運動及其鎮壓當中學會了甚麼。

Colin Mackerras 澳洲Griffith大學榮休教授

本書展示多位勇氣可嘉的新聞工作者和學者拒絕為宣傳工作「交貨」，努力地為中國的這段歷史提供了客觀分析。打破沉默之牆是推行民主向前的第一步。本書顯示香港繼續擔演它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角色——它依然是表達自由和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天堂。

Jean-Philippe Béja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ISBN 978-962-937-176-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